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98）成果

聂锦芳 主编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九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杨洪源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300-25476-0

Ⅰ.①重… Ⅱ.①杨… Ⅲ.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Ⅳ.①A81②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7735号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Chongdu Makesi：Wenben ji Qi Si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张	25.5插页3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5 000	**定　　价**	1980.00元（全十二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

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做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 MEGA2 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

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2 卷、中文 2 版第 3 卷（与 2000 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 1 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 1843 年 10 月—1845 年 1 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 3 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 9 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做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 1 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

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做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做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

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做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

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他们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都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做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

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做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 19 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

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 12 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 1848—1852 年一批“政治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 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 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 2018 年马克思诞辰 200 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两卷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2012 年 9 月 17 日

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目　录

导论　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 1

一、黑格尔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 …… 2

二、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黑格尔因素” …… 10

三、“我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过” …… 25

四、本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基本结构 …… 38

附录 …… 48

第一章　“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 50

一、“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 …… 51

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经济和谐论批判 …… 59

三、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工资固定论批判 …… 70

四、透视经济危机的方式：劳动货币论批判 …… 79

五、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思路及旧有模式的终结 …… 91

第二章　“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 96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 …… 96

二、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 112

三、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 …… 121

四、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到具体实在的再现 …… 131

五、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 137

第三章　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 145

一、商品（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 …… 146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 …… 153
三、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 …… 165
四、交换价值的实质及其表征的社会关系 …… 172
五、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和解决方式 …… 181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 195
一、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于商品本身 …… 196
二、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 …… 206
三、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 218
四、货币形式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 …… 232
五、货币的自我解体及其向资本的过渡 …… 245
第五章　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上） …… 251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过程 …… 253
二、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 …… 260
三、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 …… 273
四、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 289
五、资本的形成史与原始积累 …… 299
第六章　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下） …… 311
一、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过渡 …… 311
二、资本流通中的各种要素及其表现 …… 324
三、流通中的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 …… 334
四、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 …… 342
五、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 …… 346
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 353
一、系统整理“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 …… 353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 …… 361
三、当代思想图景和实践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369

参考文献 …… 372
主题索引 …… 378

Contents

Introduction Marx, Hegel 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1
1 Hegel on the Inherent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 2
2 "Hegelian Factors" in Process of Marx's Thought ····· 10
3 "The Process of My Own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 25
4 Basic Works and Structure of This Book ····· 38
Appendix ····· 48
Chapter 1 The Continu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e Old "Original Critique" Model ····· 50
1 The Old Model and General Approach of "Original Critique" ····· 51
2 Historicit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ir Rules: Critique of Economic Harmony Theory ····· 59
3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Wages: Critique of Fixed Salary Theory ····· 70
4 A Perspectiv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Critique of Labor Monetary Theory ····· 79
5 New Ideas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End of the Old Model ····· 91

Chapter 2 New Thoughts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s in "Original Critique" ····· 96
1 General System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 96
2 The Real Individuals and Production of Certain Social Nature ····· 112
3 General Relation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Other Superficially Independent Fields ····· 121
4 Reproduction from General Abstract Rules to Concrete Reality ····· 131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ategory and Concrete Reality ····· 137
Chapter 3 Goods a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ir Exchange Process ····· 145
1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Commodity (Value) Being Logical Starting Point ····· 146
2 The Value Theory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 ····· 153
3 Conversion from Use Value to Exchange Value ····· 165
4 The Essence of Exchange Valu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 172
5 Contradictions in Commodity Exchange Process and Their Solutions ····· 181
Chapter 4 Dialectics on Currency Form in Simple Circulation ····· 195
1 The Origin and Essence of Currency Lying in Commodity Itself ····· 196
2 History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urrency Form ····· 206
3 Regulations on Currency Form in Simple Circulation ····· 218
4 The Relations of Social Production Represented by Currency Form ····· 232
5 Self-disintegration of Currency and Its Transition to Capital ····· 245

Chapter 5 Capital in General and Its Tot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I ····· 251
1 The Logic Process of Converting Currency into Capital ··· 253
2 The Exchange Process of Capital and Labor ····· 260
3 Process of Self-propagation of Capital Value ····· 273
4 Conversion between Formation and Possession Law of Capital in General ····· 289
5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 299
Chapter 6 Capital in General and Its Tot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II ····· 311
1 The Transition of Capital from Production to Circulation ····· 311
2 Elements in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Their Performance ··· 324
3 Formal Regulations on Capital in General in Circulation ····· 334
4 Consequences of the Unification of Capital Production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 342
5 "Miniature" of the Theoretical History of Surplus Value ····· 346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353
1 Constant Attempts in Systemic Arrangement of "Monograph" ····· 353
2 In What Sense is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hilosophy ····· 361
3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Ideology and in Practice ····· 369

Bibliography ····· 372
Subject Index ····· 378

导论　马克思、黑格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走向系统深入，愈发凸显学术性和专业性，涌现出诸多可被称为“范式”的研究路向。其中，尤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学研究，由于其注重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而将文本、历史、理论和现实“勾连”起来的系统性研究，而取得了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

广义上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为“1857—1858年手稿”）①，作为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一组重要文献，是我们在真正“回到马克思”时所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8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建立在严密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进行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与构建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变为有客观规律支撑的一门科学。诚然，国内学者近年来已经破除了所谓“《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将“1857—1858年手稿”视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并在版本考证、出版传播、方法结构和思想阐释等方面取得了一

① 通常来说，“1857—1858年手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泛指马克思于1857年至1858年期间所撰写的编号为Ⅰ（A）-Ⅶ、M、C、B’、B”的11个笔记本。其中，笔记本C没有被保存下来，据推测其内容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部分初稿。其他被保存下来的笔记本对应着中译文普遍采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巴师夏和凯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狭义上的则是专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系列成果；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释方面仍较为薄弱，使得这部包含马克思各种哲学思考的手稿，至今还如同一块广袤的未被深耕过的荒漠土地，没有结出应有的理论硕果。

综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黑格尔在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成了马克思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① 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原本批判”过程中不是全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是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有意识地对它进行借鉴、运用、改造和区分。从这个意义来说，“黑格尔因素”是重新研究“1857—1858 年手稿”绕不开的前提性环节。事实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1857—1858 年手稿”是表征马克思在思想上借鉴黑格尔的重要著作。他们通过各种专著和论文的形式来证明上述结论。在这些成果中，解读和研究最为详尽的当属内田弘的《〈大纲〉与黑格尔的〈逻辑学〉》②（1985）一文，该文论证了“导言”与“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几乎涵盖了从“生命”到“因果性”这些黑格尔《逻辑学》中涉及的全部概念。这种研究方式对于阐释“1857—1858 年手稿”中的“黑格尔因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学界关于上述命题的研究中缺乏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对黑格尔思想中原本就有的关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内在合一的论述的阐释；二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复杂思想关系的完整梳理。这种研究上的不足最终导致对“1857—1858 年手稿”中“黑格尔因素”及其作用的不准确估量，或是贬得太低，或是拔得过高。有鉴于此，笔者的论述就从这两个方面开始。

一、黑格尔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

尽管在黑格尔的诸多著作中鲜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论述，但

---

①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理论探讨“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② 中译文参见内田弘. 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 王青，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31-470.

却不能否认黑格尔有着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其所处的正值政治经济学繁荣的启蒙时代①的影响，黑格尔重点阐释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正如卢卡奇所说，黑格尔在理解重大世界历史事件时所具有的如下特质，即“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奠定了他在同时代思想图景中的特殊地位。遵循卢卡奇开辟的研究路向，国内外学者不仅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来源和分期，而且还详尽地考察了他对包括劳动、需要、价值、货币、商品、资本积累等在内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不同理解。

其中，在黑格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来源方面，卡尔·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已经考证出黑格尔于 1799 年 2 月 19 日至 5 月 16 日曾阅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并做了一些评注（这一文献后来遗失）。对此，卢卡奇指出斯图亚特的经济学原理对黑格尔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③。与之相反，普兰特（Plante）指出，黑格尔从斯图亚特的理论中获得了三点启示：一是从积极方面肯定现代世界的历史哲学；二是交换经济在实现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形式；三是国家力量对市民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④

关于黑格尔青年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卢卡奇做了两次划分：（1）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 年），其思想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对英国现实经济发展做了相关分析⑤；（2）耶拿时期（1801—1807 年），黑格尔尝试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整合，以将他关于最发达的经济系统中的发现纳入社会科学体系中，而不是做经济学本身的原创性研究⑥。普兰特和苏联的一些学者则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1）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做了关于需要和劳动、早期基

① 不可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启蒙时代主要的重大成果。其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时代特点是：（1）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兴盛；（2）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3）政治经济学中彰显着启蒙时代特有的自由精神。

② 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选译）. 王玖兴，译. 商务印书馆，1963：23.

③ Georg Lukàcs. The Young Hegel.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1975：171.

④ 普兰特.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76-277.

⑤ 同③168.

⑥ 同③319.

督教的共产主义倾向及其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两处讨论；(2) 伯尔尼时期，他重点讨论罗马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公与私的分裂；(3) 法兰克福时期，他从报纸上摘录英国最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相关资料，详尽介绍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的内容；(4) 耶拿时期，他开始关注亚当·斯密的理论，着重研究了劳动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人的活动本质、劳动分工及其在市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5) 思想后期，特别是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律和范畴做了较为成熟的判断，并在市民社会层面懂得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①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具有一定的思想史价值，但存在着研究前提的局限性。他们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出发，再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寻相关论述，忽视了黑格尔是否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更缺乏关于黑格尔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关系本身的探讨。

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以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又内在合一的各个部分。他在《法哲学原理》中以作为伦理精神内在规定的自由为主线，将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整合了起来：家庭包含着自由的直接形式；市民社会是自由的普遍性阶段；政治国家则体现了普遍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是自由的实现阶段。不仅如此，较之斯密的“感情”式的、单方面强调道德作用且带有功利目的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具有强大的历史感。不论表现形式是多么抽象和观念化，黑格尔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的，尽管后者只是前者的验证。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黑格尔的思考自然会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中，并形成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见解，从而使他的哲学思考也具有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

(一) 需要的体系及其中介环节

黑格尔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大多贯穿于需要的体系和市民社会的阐释中。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黑格尔揭示了需要和劳动的哲

---

① 普兰特.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哲学家黑格尔的经济学贡献. 李光林，编译. 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第19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学内涵。他指出，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从而市场经济社会真正建立起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才作为有别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特殊领域而出现。很明显，人们在市场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根本无法准确地抽象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及其哲学内涵，更无从论及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表现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之前的契约论者无法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区分的原因也在于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黑格尔才对市民社会的内涵做了如下表述：“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虽然它的形成要晚于国家。因为作为差别［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为了能够存在，它必须有国家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此外，市民社会这个受造物（Schöpfung）属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遭遇到它们的正当性。如果国家被设想为不同的个人的统一体，亦即仅仅是共同性（Gemeinsamkeit）的统一，那么其所指的只是市民社会的规定。”①

黑格尔进一步分析说，市民社会中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而这种目的不能通过自身作为手段来实现；他必须同他人发生关系，从而使他人成为（特殊的）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样，（个人的）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相关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在实现他人福利的同时实现自己。正是由于特殊性同普遍性的条件通过上述方式联系起来，整个市民社会成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介基地。显而易见，黑格尔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中，分析得出的“目的即手段”和“私利即公利”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述是同出一脉的。

需要作为同一般意志的普遍相对抗的事物，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是他自身最初的目的。所以，市民社会的首要环节就是需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通过自身的和一切他人的劳动和需要的满足，使自身得到满足。相应地，需要也得到了中介。这种需要不再仅仅是斯密所说的自然意义上的物质需要，而是“特异化了的需要”——市场上的需要，它必须通过外在物和劳动这两种方式才能从其主观性达到客观性。这样，这种需要就不可避免地同劳动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伴随着分工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会愈发地趋向特殊化，一些新的需要也会被创造出来。

---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 7 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9.

另一方面，从需要的体系的一般概念来看，劳动也得到了中介。个人的劳动虽然是为了满足个人自身的需要即作为手段而存在，实际上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却具有社会的和普遍的内容（本质）。黑格尔指出，每个人的劳动按其内容来说都是普遍劳动，一切个人的劳动在完成个人需要的同时，就是满足一切个人的需要。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互相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同样，个人的劳动也不是对他自己所“是”的那种东西，而是对一切个人所“是”的那种东西。这样看来，劳动本质上作为“特异化了的需要”和“特异化了的手段”的中介而存在。“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依赖性和交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满足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具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的东西使特殊的东西得到中介。”① 这种劳动不再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劳动。相应地，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不是劳动者自身的需要物，而是他人的需要物。由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因此，需要的满足就必然要依赖于市场交换。概而言之，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成为整个“需要的体系”的基础，而这又恰恰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仅如此，黑格尔本人也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于需要的体系的作用，因为那些经济学家是以需要和劳动为起点，然后从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的简单原理，“在需要的领域中认识这种包含在事物中而且在起（调和）作用的合理性表现”②，最终阐明在需要的体系中发生的关系和辩证运动。究其实，个人的独立性对于共同体的关系，是摆在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面前的共同问题；他们都试图从哲学上去重新描述由需要和劳动所产生的共同体关系，并证明承认个人的独立性对共同体的分化作用决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种绝对利己主义观，而是要揭示出这一真实的本质及其合理性。由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的前提、内容、方法和归旨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所以，“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③ 这个论断，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 7 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41.

② 同①336. 中译文有改动。

③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

（二）所有权和司法体系对它的现实保护

除了需要和劳动之外，所有权也是同个人成为特殊的定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分析说，个人的意志即人格性，是在同某种“天赋的”（vorgefundenen）本性相联系的同时，又突破后者的限制这个方式实现的。“人格性是扬弃这种限制并给予自身以实现性的活动，换句话说，它就是要把前一种定在设立为它自己的定在这种东西。”① 在人格性突破自身限制的过程中，法首先是自由以直接的方式给予自身的直接定在。其中，自由在占有即所有权中是作为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而存在的，因而只是一个单一的人格同自身相处时的自由。正是扬弃人格的单纯性，而不是满足需要，才使得所有权合乎理性。

在需要和劳动的中介作用下，需要的体系不断融入新的要素而日益完善起来，市民社会的特征亦愈发明显。黑格尔认为，由劳动和满足需要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辩证运动，其结果是个人自身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正是在这种一切个人全面交织的相互依赖中，产生了他们的普遍财富。普遍财富和个人又是处于相互依赖的交互关系中，个人一方面分享了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另一方面通过其劳动中介的所得保存和增加了普遍财富。特殊财富之所以是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个人自身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资本和技能的交互关系的制约。至于技能本身，则又受到各种偶然情况（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制约。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整个关系构成为需要及其手段和劳动、满足方式和方法以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等方面的**特殊体系**，即个体分属于其中的体系，这就形成了**等级**的差别”②。随着等级的差别演绎为各种特殊的等级，也就是需要的某个特殊领域，个人只有把自身限制于其中才能实现其现实性。与此同时，个人又把这种限制作为普遍使命和纯粹外在的必然性。这样一来，成为定在即特定的特殊性的个人，不仅在自身中含有了自在自为存在的普遍性，即自由的普遍性，而且还实现了它的有效现实性。整个需要的体系亦是如此，它自身中包含的所有权法由于司法体系对所有权的保护而达到了有效的现实

---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 7 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7.

② 同①343.

性。“在需要的体系中，每一个人的生计和福利是一种可能性，它的现实性既受到他的任性和自然特殊性的制约，也受客观需要体系的制约。通过司法消除了对所有权和人身的侵害。”①

（三）维持需要的体系平衡的警察功能

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始终是悬在司法体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处于特殊性中的现实权利，既包括消除阻碍它实现的偶然性，也包含把特殊福利作为法权并使之实现的要求。通过司法只是保障人身和所有权的安全不受到侵害，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个人的生计和福利的保障。此时，就需要“警察”（Polizei）功能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警察的预防功能仍然没有超过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的范围。它一方面作为一种外部的秩序和机制，使包含在市民社会之特殊性中的普遍物得以实现并保持，又使大量的特殊目的和特殊利益的保护和保全得以实现，并把它们当作存在于上述普遍物中的；另一方面作为上级领导，负责照顾超出市民社会之外的利益。要言之，警察的功能在于维持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是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一般管制作用。

在强调警察的一般管制作用的同时，黑格尔也意识到，这种作用的发挥始终要与需要的体系相适应。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是重要的，但这种平衡不应该完全由国家的管制来加以保证，因为国家的严厉管制会给个人在市民社会中追求主观自由的努力带来“窒息”的危险。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不仅逐渐得到解放，还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意识到他自身的价值和作为主观自由的中心的地位。由此可见，需要的体系才是主观自由和特殊性的中心。实现主观自由和特殊性的任何一种国家的管制形式，都必须和它们的存在相适应。因此，在维持需要的体系的平衡方面，应当使警察的监督和照管成为个体和普遍可能性之间的中介，避免管制过多和放任不管这两个极端：前者虽然可能保证平衡，但却带来公民和政治秩序之间进一步异化的代价；后者会使需要的体系中的一切存在，都成为盲目的和非理性的相互依赖形式，从而造成重大的损害。

---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 7 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68.

相对于管制过多的代价，放任不管所带来的损害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管制过多表现为它和个人关于直观自由的意识互不相容所带来的矛盾，因为这种主观自由正是在加以管制的需要的体系中才得以实现，需要的体系的平衡还存在着。相形之下，放任不管却是使需要的体系完全失去平衡，因为需要的体系作为特殊性领域而存在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定。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对于放任不管的损害规避有余，而对于管制过多的代价认识不足。有鉴于此，黑格尔专门将管制过多的代价放在“正文”和“附释”中，把放任不管的危害“只是”作为“补充”。

黑格尔指出，只有在尚未意识到主观自由的意识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自认为管制过多是正当的形式。埃及的金字塔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巨大工程的劳动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巨大工程的兴建是出于公共目的，不以个人出于特殊任性和特殊利益的劳动为中介，因而被看作正当的行为。这种特殊性本身促使个人主观自由意识的觉醒：“它呼唤着工商业的自由以对抗上级的专横，但是上级的专横愈是盲目地浸沉于自私的目的，就愈加需要使这种专横回复到普遍之物，并使危险的震荡得以缓和，使冲突由于无意识的必然性而自动平复的间隔期间得以缩短。”①可是，这种特殊性在这里毕竟不是作为目的的存在，主观自由的意识的产生便无从谈起。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主观自由的意识没有萌芽且受到压制，对个人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集中管制才被视为正当的。

到了近代市民社会中，个人主观自由的意识断然不是处于上述地位。警察只应管制为了在需要的体系中维持平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事。不仅如此，政治国家本身外在于市民社会，这意味着为了将主观利益的特殊性加于经济领域，警察功能就必须置于某种代议制的政治管制之下。否则，警察就会成为一个异化了的结构，就像罗马帝国一样。黑格尔认为，在警察的范围内合法的管制有：规定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照管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警察在这些领域内的工作，将有助于需要的体系比在相反的情况下运行得更为有效和更为可靠。

以上就是黑格尔在关于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合一。如果说，他关于需要的体系及其中介的阐释表明他

---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 7 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70.

是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上的，那么，强调所有权以及司法和警察对它的保护，就表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的，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再坚持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而是将分配作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所有权”和“司法、警察等制度对它的保护”。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证，笔者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进行，在此不再赘述。

二、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黑格尔因素”

如前文所述，批判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构成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导因，但是马克思在其思想起源时期并没有注意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因素。他直到在“巴黎手稿”中尝试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进行内在整合时，才开始以间接的方式批判黑格尔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内在合一的论断。这种间接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主线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步骤，即超越黑格尔哲学以实现异化观的变革。概而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肇始于批判黑格尔，但却不是以批判黑格尔的形式展开的。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考察“1857—1858年手稿”中的“黑格尔因素”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的全部思想进程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完整且准确地理解和评价黑格尔之于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手稿”的作用。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进程，与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几乎囊括了后者的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具体讨论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范围做一个清晰的厘定。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哲学体系①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以及由精神哲学扩展而来的法哲学（国家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美学和哲学史等。精神现象学起初被黑

① 这里的“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是指黑格尔本人对其哲学体系的最终界定。大体而言，黑格尔对其哲学体系做过三次界定。一是耶拿时期：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二是《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时期：精神现象学（导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两者是等同的）；三是《哲学全书》时期：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格尔视为“科学体系”的“导言”和到达对“意识”的概念性认识的理论准备①，而后被归为精神哲学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有过非常严格的界定和类似的表述，前者将精神现象学视作“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②，后者则直接归纳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③。依据上述界定，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交集”主要集中于逻辑学、精神哲学及其扩展内容、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的辩证法等方面。

（一）精神哲学批判与“重写”哲学史

在马克思的思想起源时期，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后者同人文情怀和浪漫主义一起，共同影响着处于求学探索时期的马克思。④ 也就是说，马克思同黑格尔的思想“交往”最初是以间接的方式开始的。

众所周知，包括布鲁诺·鲍威尔等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从德国古典哲学（die deutsche klassische Philosophie）发展史的维度来理解和重释黑格尔哲学的，这其中绕不开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主题即理性如何观照现实世界的延续。自康德掀起人类思维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在“现象”和“物自体”、主体和客体等之间严格划界之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或是将客体统一到主体中，或是将上述过程颠倒过来，

---

① “在我的《精神现象学》一书里，我是采取这样的进程，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成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在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科学体系的第一部分）。因此，哲学的探讨，不能仅停留在单纯意识的形式里。”（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93-95.）

②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1.

③ “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自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全都结合在一个体系内，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恩格斯. 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89.）

④ 严格来讲，对作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来源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不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最初也起源于此。在其思想起源时期，马克思最先“接触”的是自我意识哲学、宗教批判、人文情怀和浪漫主义，不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随着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马克思才开始受到上述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

或是将主客体合而为一。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合而为一，但这两个对立领域的矛盾仍旧存在，只有消解“自我意识”如何对待“绝对精神”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上述矛盾。① 他由此将“自我意识”从黑格尔精神哲学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以获得对自身认识的精神的内涵，即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而非斯特劳斯理解的整个时代的实体精神。能够自我认识决定着“自我意识”成为创造现实世界的源泉和动力，它为实现最大的普遍性（自由）而推倒一切阻碍力量，将被割裂的事物全部统一起来。这样看来，“自我意识”兼具精神革命和现实变革的双重“使命”，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构成了全部的历史。综上所述，布鲁诺·鲍威尔通过彰显“自我意识”完成了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改造”，找到了哲学体系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方式。

在写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为《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马克思延续了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主题，充分吸收了后者对晚期古希腊哲学的正面肯定：“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② 基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所做的充分准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详细甄别了德谟克利特的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具体差别，以此作为表征自我意识哲学的特点——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的例证，为破解哲学体系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难题找到出路。具体而言，哲学体系在反思现实世界、同外物发生关系，进而实现其实践“理想”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它本有的完整性和自洽性。“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③ 此时，作为实现了的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转而又要冲破理论体系对它的束缚，将现实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由于“个别的自我意识”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也就是没有超过理论体系的范

① Bruno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 Bd. 3 1845.

②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新序言（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③ 同②75-76.

围，所以它冲破体系束缚的结果却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节。概而言之，自由与必然性的悖论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环节。

从马克思的上述理解来看，他接受了布鲁诺·鲍威尔关于“自我意识”之于变革现实世界作用的观点，但却没有将它设定为绝对原则，并且认识到它的“双刃要求”：既要通过外物肯定自身，又在肯定自身的过程中否定外物。这就表明，马克思已经有了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对“自我意识”的创新阐释上，还表现为对哲学史的重新注解上，后者构成了马克思的“一部更大著作”的计划。正如他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所说，一方面要对黑格尔式哲学史的“宏大叙事”所忽略的思想细节做详尽的说明和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则以思想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来克服“思辨的东西”（das Spekulative）即“精神”发展史叙事模式的诸多弊端。

此后，以不同于黑格尔的方式“重写”哲学史成了马克思的主要研究方向，他甚至打算以此作为申请伯恩大学教职的报告，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性摘录［《古典哲学著作摘录（柏林笔记）》］。这些摘录涵盖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版本待考证）、大卫·休谟的《人性论》（1790年哈雷版）、《莱布尼茨著作集》（1768年日内瓦版）、《斯宾诺莎全集》（1802年耶拿版）、罗森克朗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莱比锡1840年版）以及40余篇相关研究文献的目录，涉及灵魂论、认识论和不可知论、单子论、神学与宗教批判、康德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哲学的诞生等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和重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以亚里士多德为研究出发点的原因在于，后者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有着构成性的影响，黑格尔本人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观点。由此不难推断，若非“物质利益”这个“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研究的转向，他很可能会以“重写”黑格尔哲学史为起点而成为一名“学院派”哲学家。

（二）揭示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

由于申请教职未成而转向《莱茵报》编辑工作，马克思放弃了“重写”哲学史的规划。当现实世界中充斥着的各种反“自我意识”的事物——普鲁士专制制度、为统治者辩护的法学派和书报检查令等——逐

一呈现在马克思面前时，他最终认识到“自我意识”根本无法冲破必然性的束缚而成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支配现实世界和个人之间行为的要素，不是“自我意识”和理性，而是物质利益。此时，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及其核心观点，诸如“法”（Recht）是自由意志的“定在”（Dasein）、个人在国家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由等，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批判。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以逻辑学的形式[①]描绘出自由意志不断“求助”各种外在条件而自我实现的过程，构建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国家通过作为其本质环节的各种特殊职能和活动被个人所运用，来实现同他们的联系。在“私人”即以实现自身利益（特殊的东西）为目的的个人那里，普遍的东西只是手段。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对立，使得市民社会最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排斥的“战场”，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就无从保障。个人只有成为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的成员，才能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进而展开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等行为，从而达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上述关系“颠倒”了过来，揭示出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倾向：“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②] 进而言之，国家职能不是国家的本质环节，而是个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及活动方式；应当从个人的社会特质出发来考察他们同国家的联系，而不是相反。检验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标准不在于其职能是否被个人所运用，而在于个人的社会特质能否实现，而这又是由个人生存境遇决定的。现代世界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彼此分离使得个人同其本质相分离，且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结成了有着共同目的或利益的共同体、

---

① 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过渡……不是从家庭等等的**特殊**本质以及从国家的特殊本质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从**必然性**和**自由**的**普遍**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这完全是在逻辑学中所实现的那种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过渡。”（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并参见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1－305，471.）

②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

阶层等级和同业公会等。现实的个人成了“私人”。只有在国家消亡后形成的“真正的民主制”①，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君主立宪制，才能克服个人主义原则，实现个人的生活同其类生活的统一，真正保障人的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出发考察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也否定了作为其“内核”的逻辑学形式。

马克思并不否认黑格尔所揭示的现代世界的主要特征——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而是反对用国家力量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冲突。这种解决力量只能存在于市民社会内部中，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进入”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从“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后，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当他尝试用“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分别解释资产阶级社会和论证共产主义时，既考察了黑格尔“异化—扬弃”理论的得失，也批判了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缺陷。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关涉哲学出发点和本质问题这一总体性认识，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束缚于黑格尔哲学而与现时代的实际状况和实践活动相脱节的弊端；肯定了费尔巴哈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起点来观照世界，以及揭示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规定等做法；认识到同样可以借助于批判黑格尔哲学来论证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② ——的合理性。通过摘录《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结构以分析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实质③，马克思指出了它的双重错误：一是没有正确界定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内涵，将其规定为人的本质同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维而不是同非人的方式相对立的事物；二是没有正

---

① “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了。在一切不同于民主制的国家中，**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的东西，却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是说，并没有物质地贯穿于其他非政治领域的内容。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②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③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同②202.）

确揭示异化的扬弃的结果，将其归结为绝对知识即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而不是人向自身的复归，即重新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和现实的活动来扬弃私有财产，而不仅仅是思维上的“行动”即自我意识重新掌握其对象性本质，才能重新充实人的本质和重新证明人的力量。

在着手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马克思也在反思其思想起源时期与黑格尔思想“交往”的间接形式，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全面清算自己旧的哲学信仰。他一方面揭示了“思辨结构的秘密”——现实中具体形态的水果是“果品”这个实体自我运动的结果①；另一方面以评论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为中介，驳斥了埃德加·鲍威尔用逻辑关联取代现实关系、用自我意识取代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的谬论，肯定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作用，即消灭自身所处的非人状态而扬弃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所在：一是以纯粹的理性的形式回答一切，把全部现实问题转化为思辨问题；二是将绝对观念视为历史的前提，割裂了现实的个人同具体的历史之间的原本内在关联；三是仅仅将现实的个人作为观念的运动中的一个抽象环节，而不是整个历史和社会的前提与出发点。正是以现实的个人作为观照现实世界的出发点，马克思最终能够“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彻底解决或扬弃了自我意识如何观照现实世界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和历史观。正如他本人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②

（三）对逻辑学和辩证法的部分肯定与借鉴

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沉湎于观念领域的弊端持彻底批判的态

---

①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②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6.

度，但他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合理部分给予了肯定，并不断从中汲取“养分”。

不同于康德将“思辨的东西”不加区别地置于经验限度之内，黑格尔对它做了日常生活中的和哲学意义上的区分：前者具有主观任意的特点，常用以表示悬想或揣测；后者是“辩证的东西”，即“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①。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揭示了辩证法昭示的认识过程：（1）知性或理智式思维揭示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别，强调每一个概念的自存性；（2）辩证理性或否定理性则“走向”了知性或理智的反面，它否定不同概念间的差异而揭示它们的对立，且不可避免地存在否定一切概念的趋势；（3）思辨理性或肯定理性对辩证理性或否定理性进行“纠偏”，在概念间的对立即相互否定中揭示它们的相互肯定。上述过程中的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和缺一不可的，它们“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一般说来，亦即每一概念或每一真理的各环节”②。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和合题的真正内涵，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非此即彼”和康德“先验辩证论”无法超越经验界限的不足，凭借破除单纯否定的“阴影”并得出肯定的结果，具有了能够作为解释现实世界之工具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异化—扬弃”理论没有触及人的真正本质这一弊端的同时，肯定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在异化规定内的积极意义：无限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即每一次否定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存在及发展的合理描述；“扬弃”本身所具有的对本质力量的提升作用，正是通过上述每一个环节的依次交替而体现出来的。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严格地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合理性限定在解释现实世界的层面，认识到它们在解释现实世界

---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9.

②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2.

③ “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219.）

的过程中将所有事物都最终抽象化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极力反对将它们用于改变现实世界。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批判就是一个例证。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以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与人的认识过程的相反性为前提，黑格尔对现实世界做了如下解释：每个逻辑范畴都经历着自我设定、自相对立和自相合成的展开过程，从而构成它们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由于每个逻辑范畴都同它的自我展开过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逻辑范畴之间就构成了群，群的辩证运动产生了系列，系列的辩证运动又产生了整个体系；整个现实世界在逻辑上就以逻辑范畴的设定、对立和合成的形式而存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逻辑范畴能够自我设定的原因——它的纯粹性即除自身外没有与之对立的客体和与之合成的主体——入手，揭示其实质是只能在自身周围颠来倒去。若进一步将逻辑范畴的展开过程“颠倒过来”进行推演，全部的人或事物在逐步被抽去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偶然性”之后，只剩下了作为“实体”的逻辑范畴。可见，黑格尔的方法不是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分析，而只是抽象；也不是通过逻辑范畴的展开过程来呈现具体事物的多样性，而是离它们越来越远。同样，辩证的运动也和现实的运动脱节。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黑格尔辩证法尚且存在上述弊端，“冒牌的黑格尔词句”（蒲鲁东“系列辩证法”）更是漏洞百出。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黑格尔辩证法无须提出任何问题。蒲鲁东却试图将它变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工具，用以改变现实世界——每个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范畴的固有矛盾，人们应当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好的方面”和消除“坏的方面”。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正是难以忍受蒲鲁东对黑格尔哲学的所谓“活学活用”，马克思才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和“神秘外壳”一并抛弃了。他此时理解的“合理内核”主要是对现实世界存在和发展结果的肯定，而不是“巨大的历史感”（思维过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平行”）和“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中同时包含着的否定）。

一段相当长的时期（10 年）后，当马克思开始着手“加工”手中繁杂的经济学材料以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从整体上观照和把握资产

阶级社会时，他再次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① 马克思一方面承认黑格尔辩证法中所渗透的实在内容即现实世界中各对立关系的统一，将被黑格尔颠倒的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倒过来，将对立关系的解决从观念领域回归到现实世界，阐述资本在形成自身形态过程中不断积聚力量，统合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现实的、经济形态统一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不仅借用“一般性”（Allgemeinheit）、“特殊性”（Besonderheit）和“个别性”（Einzelnheit）的区分和联系，来表述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以及资本的诸形态间的关系，而且还运用黑格尔逻辑学中“本质”到“形式”的辩证运动，来阐述从商品（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过程，从而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②

（四）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严格划界

在“重拾”黑格尔辩证法以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辩证特性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同这个方法严格划界，提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来展现具体和实在的产生过程，而不是用观念来把握它们。③ 他在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时，就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具有的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和沃尔弗式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形式。也就是说，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性质和现有形式，是马克思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始终坚持的前提。他是在此前提下“重塑”被官方黑格尔派笨拙地应用和被新的自然科学所“遗弃”的黑格尔辩证法。

---

① “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 年 1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5.

③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出版和广泛传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遭到了各式无端指责，其中不乏“黑格尔式诡辩”或照搬黑格尔辩证法等观点（以杜林、孚赫为代表），甚至出现了一些出于善意的“误读”，最有代表性的是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为了回击杜林等人将马克思归入唯心主义哲学家行列的做法，考夫曼“创造性”地对马克思的方法做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指出前者是与“唯心主义”（idealism）对立的严格的“实在论”（realism），后者则是德国辩证法①。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上述结论最好的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在论基础在于通过以尽可能完善的现实及其依据为起点的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它具体表现为：第一，将社会运动看作受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以证实社会关系的既有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第二，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等为转移意味着意识要素在社会运动中起着从属作用，这又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只能是外部现象而非抽象观念；第三，通过对外部现象的详尽的科学考察，可以证实各种社会有机体整体结构的不同；第四，处于不同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的同一个外部现象受完全不同的客观规律所支配，换言之，支配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上述实在论基础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了科学的价值，这种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以及被另一个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并不反对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区分，但反对错误地定位它们的基础和性质、没有同黑格尔辩证法严格划界的做法。众所周知，马克思很早就将他用于改变现实世界的研究定性为“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本身作为近代以来的产物，与起源于柏拉图的强调理念作为唯一充分的存在的实在论有着质的不同，后者仍局限于解释现实世界。与实在论对立的是唯心主义即观念论，而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则是同属于近代哲

①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Кауфман.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Rezension zu: Капитал. T. 1. Спб. 1872.）

学产物的、强调灵魂与上帝之间沟通的“唯灵主义”（spiritualism）①。受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定启发，马克思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一方面扬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强调通过实践方式来解决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② 另一方面，“新唯物主义”以彻底改变哲学的功能和目的、吸收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各自合理因素的方式，在解决它们的对立的同时实现对它们的超越。马克思既要坚持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现实世界本身而非观念或逻辑范畴出发来解释它，来避免黑格尔辩证法将观念绝对化的弊端；又要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所表征着的社会运动即建构现实世界的能动性，来克服费尔巴哈片面强调现实世界的客体方面进而将它僵化的弊端。

正是有了“新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才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把握资产阶级社会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来找到社会变革的道路，实现解释现实世界和改变现实世界的统一。这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和性质始终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原本不需要过多地强调这一点，但是，以杜林为代表的反对者的有意曲解③和以考夫曼为代表的赞成者的无意误读，促使他再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特意强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严格划界，并对其辩证法的基础、性质和超越性做出了新的诠释。首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新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实在论的，考夫曼描述的所谓“实在论基础”正是辩证方法。其

---

①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② 同①192.

③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 500 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次，它的超越性不仅体现在所“唯”的东西（现实或观念）上，将被黑格尔辩证法颠倒了的观念和现实的“主谓关系”倒过来，而是对现实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截然相反的理解——不是否定之否定即肯定，而是肯定中包含着否定。“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必然是不同的，前者占有和考察现实材料的结果，要被后者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随着这些现实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被反映出来，人们容易被这种表象所蒙蔽，将其误认为一种先验的结构。然而，研究方法是叙述方法的前提和基础，这意味着叙述方法的性质从根本上不是由它自身的形式，而是由研究方法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性质必然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方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式的唯心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

（五）“巨大的历史感”的不同表达

马克思始终承认黑格尔哲学具有的“巨大的历史感”，并不断尝试对世界历史做出与黑格尔不同的表达。近代以降形成的世界历史有着多重指向，它既可以是关于全部社会运动和人类行为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路向的预判。在对上述多重指向的理解中，哲学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不同于历史学编纂研究中以世界历史的各种现象为起点而形成“普遍的观察”，黑格尔思考的是世界历史本身，指出“‘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②。他认为，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一切中都含有一种“思想”，理性就是“观察”世界历史的“思想”。在“理性”的指引下，个人按照一种规范性而非自身目的和利益来行动，不断扬弃“意志”与“自由”的矛盾，使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世界历史展现为一个合理性的过程，且趋向于一个共同目标——“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这个过程从东方社会开始并向西方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四种形态：以“道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45.

德”为“实体”或“规定”的东方世界；体现为“精神”真实更生的希腊世界；压服“命运”的罗马世界；表征现代世界“精神”的日耳曼世界。

综观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尽管形式上是抽象的，但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与观念相“平行”的真实性不会因黑格尔哲学被彻底批判而消失，反而成为马克思终其一生探究的主题之一。与黑格尔将东方社会作为“精神”发展的起点不同，马克思最初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以西方社会为“样板”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先是以分工为主线，描述了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再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最后到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类历史的一条演进路径；然后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阶段性标志，梳理了始于城乡分离止于大工业形成垄断的资产阶级开辟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到了“1857—1858 年手稿”中，出于土地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充当最主要劳动场所和生产资料的地位，马克思将所有制形式表征的世界历史进程聚焦到土地所有制上，勾勒出从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所有制或古希腊罗马所有制，再到日耳曼所有制，最后到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演进过程。他重点阐释了决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的特征及其形成的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具体表现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分离、劳动者同生活资料的分离、劳动者同其自身的分离。在土地、生产工具（主要是机器）和生产资料将人“排挤”出去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靠出卖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力，来维持个人及其家庭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因为源源不断供应的劳动力创造出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剩余价值。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和吞噬的悲惨状况，“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

---

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的前半部分更多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词，到了专门插入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理论分析时才开始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3.]

② 同①107-108.

走向。

此后，《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的问世，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的系统论证，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设想：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危机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然而，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上述设想。这些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1873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不断蔓延时却因各种政策的及时调整而得到缓解，以至于它不足以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资本在流通领域呈现的复苏之势，并催生出新兴金融资本和信贷行业，这些新情况都需要加以研究。① 第二，当时欧洲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被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所笼罩，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处于低谷时期。第三，俄国革命家向马克思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难题，使他将研究视角转向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后两者直接关涉俄国能否成为引发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以及资本主义是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等。马克思由此暂时中断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和整理工作，转向以成文史以前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和以成文史以后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并尝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引导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其他因素。

上述研究转向的成果就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前一部笔记的时间跨度为蒙昧时期到希腊-罗马时期，即从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到以专偶制家庭和保障私有制的继承法的确立为标志的政治社会的形成，内容包括史前社会中家庭形式的演变、最早的公有制及其向私有制的过渡，氏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向政治社会的转变等；后一部著作的时间跨度为罗马帝国早期到 17 世纪中叶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时期，内容涵盖成文史以来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主线之一。马克思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以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演进路径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梳理了东方社

---

① “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9 年 4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433.]

会中更为复杂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历程及其关涉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等重大问题，而且还详尽考察了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等，极大地拓展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视域。至此，马克思以黑格尔所不知的人类学研究的史前社会为出发点，以不同于“精神”运演并与之对立的方式，阐述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解。如果说黑格尔描绘的世界历史是“德意志版本”，强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承接罗马帝国的“正统”性，那么，马克思阐释的则是“英国版本”，强调英帝国在市民社会领域对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正统”的替代。

综合以上分析，在马克思建构其思想的过程中似乎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黑格尔的“幽灵”。每当他需要阐释新理论或新观点时，黑格尔哲学便“适时”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仿佛成了马克思重要的思想“宝库”。导致这种表象既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时间在前性有关，我们在讨论时间靠前的思想家与靠后的思想家的关系时，往往是从考察前者的思想结构开始的，又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史地位有关，特别是它作为解释现实世界之工具的合理性和其中包含的“巨大的历史感”。然而，表象终究不能取代本质。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受其影响而没有理论的超越性，也决不意味着要对马克思哲学做黑格尔式或“近黑格尔”式的阐释。前文的全部论述已经表明，马克思在与黑格尔的思想“交集”中，始终是处于主体地位。不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还是对它的借鉴、运用和区分，始终是受马克思研究内容的变化而“被动”地“服务”于他的思想建构和阐发的，而不是“主动”地或“先在”地融入其中。在“引入”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时期，马克思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它的实质性超越。接下来的部分，笔者要考察的是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建构和阐发过程。

三、“我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过”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的正式创作只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凝聚的却是他一生黄金时代十五年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间，马克思不断用新的哲学方法和历史观，反复考察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议题，从而

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①。因此，我们要对这部手稿创作的“史前史”，即马克思的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做简要的梳理。

（一）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态演进的把握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他是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了所谓“物质利益”问题，才转变了之前的理性自由主义立场，开始初步研究经济问题。在历经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论辩后，马克思意识到，物质利益决定着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与思想行为，并最终导致普遍自由的沦丧。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时作为现实批判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这些“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和“肤浅言论”② 提出了反对。尽管如此，马克思最终还是因为研究的不够深入而暂时放弃了对法兰西思潮的评判③。

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即理性的观念与反理性的现实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理论工作：一是诉诸历史事实弄清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的问题；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

---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 年 11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6.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③ 这里“研究的不够深入”是马克思本人的类似说法：“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同① 591）这表明了马克思科学严谨且谦逊的研究态度。事实上，马克思此时已经对法兰西思潮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代史（主要是法国革命史）研究，马克思从 1842 年 7 月到 1844 年初，研读了包括瓦克斯穆特《革命时代的法国史》、路易·勃朗《十年历史》、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路韦《回忆录》、蒙格亚尔《法国史》、德穆兰《论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和巴贝夫的著作等在内的涉及法国当代革命的哲学和史学著作，撰写了“法兰西历史笔记”。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历程做了总结，他指出，法国“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恩格斯.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8-469）。

方式，将诉诸历史的考察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上述两个理论工作的成果分别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私人利益体系即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并导致后者违背普遍理性而处于异化状态。因此，不是仅从政治国家的制度层面来扬弃其异化，而是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批判和实际改革，才能为自由寻得真正的出路。到了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①。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当时德国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方法，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和途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②，以哲学和无产阶级的“联姻”方式实现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历经上述思想的历练后意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有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才能为实现自由找到真正的出路。于是，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先后阅读、摘抄和评判了勒奈·勒瓦瑟尔、亚当·斯密、威廉·舒尔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让·巴蒂斯特·萨伊、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吉约姆·普雷沃、恩格斯和比雷等人的 20 余部著作。再加之对“当前的经济事实”的体察，马克思渐渐产生了表述自己独立观点的想法。随着评论性的评注逐渐增多并发展为长篇阐释和系统论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巴黎手稿”。他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即私有财产、分工、竞争和交换价值等出发，揭示出现代市民社会中工人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探讨了异化的规定、根源与扬弃方式，评判了当时主要的几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此外，马克思还意识到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来实现异化观的变革。

---

①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0.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

在此期间，马克思得到了那个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模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其要点大致如下：（1）人们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后者是必然的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2）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后者同时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存在，且制约着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不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社会革命（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受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并不会立刻导致社会形态的更迭，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起来之前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在其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之前出现。（5）“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6）资产阶级社会中孕育着解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即在此社会中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终结而告终。马克思据此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正确地揭示和理解社会变革的前景与方向，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具体考察社会变革时，他主张将物质生产的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变革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把前一种变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后一种变革是由前一种变革决定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

马克思特别指出，恩格斯及其所做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他的“原本批判”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不仅详细摘录了它的主要内容，还给予其“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③、“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④ 等高度评价。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马克思.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法文版前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1.

详尽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阶段、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商业、价值、价格、竞争、垄断、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基本范畴，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具有的“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特征，具体分析了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种种后果，论证了私有制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它的必要性。最终，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经济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不应被视为某种永恒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来批判它，通过全面变革社会关系的方式消灭私有制，并把这个制度的消灭看作它本身辩证发展的结果；工人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解放。①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他们的思想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当时盛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形式，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及体系，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实现方式，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哲学历史观基础。具体而言，就是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问题，即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②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过渡

在马克思看来，仅从方法论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视域问题是远不够的，还要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维度或理论归旨。这就是说，还要论证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正因为如此，他才

---

① “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51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共产党宣言》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作为表达他和恩格斯的见解的代表著作。其中，《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做了深刻且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指明了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采取革命的形式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本著作的基本思想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 这显然是同马克思所说的"总的结果"相一致的。而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包令博士自由贸易演说的伪善性，揭示出自由贸易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的实质，得出了"自由贸易在以资本自由的形式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同时还加速了社会革命的产生"这个结论。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只是某国建立大工业、促进国内自由竞争发展的手段，自由贸易则是资本榨取工人阶级最后脂膏的自由；前者在大工业时代是保守的，后者则对资产阶级社会起着破坏作用，它们都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毫不相干。自由贸易只有在加速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即"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②，才能说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著作中，《哲学的贫困》无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被他赋予首次科学地概述其"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地位。他以批判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社会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一思想主线的形式，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思考和整合。此外，马克思还在该著的最后部分逐一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政治革命无效性的各种论断，进而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性、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自我解放的必要性。显然，这与马克思所始终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是相契合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充分吸收了他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② 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9.

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看，《哲学的贫困》与“1857—1858 年手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来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诸如“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逻辑范畴无法再现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进程”“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直接被延续到“1857—1858 年手稿”中，最终形成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物质生产为起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批判“冒牌的黑格尔语句”还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全面反思，使他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工具的重要性，并最终汲取了这部分合理因素来进一步“加工”政治经济学的材料。① 其次，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所有权、分工、机器、竞争和垄断等的分析，奠定了他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探讨它们的基本论证框架。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从所有权的本质出发，以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为范例，初步批判了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并将后者把所有权作为特殊范畴和永恒观念的做法界定为“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到了写作“1857—1858 年手稿”时期，马克思继续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的本质，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光”下所有权规律的转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的各种土地所有权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蒲鲁东的自在所有权理论进行了深层批判。② 最后，就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旨即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哲学的贫困》和“1857—1858 年手稿”是相承接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立论落脚点在于工人阶级结盟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建立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联合体”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1857—1858 年手稿”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新联合体”的

---

① 在写作“1857—1858 年手稿”期间，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 年 1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② 详细内容可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3-206.

内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表征，而整个社会都将每个人的发展视为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

《哲学的贫困》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一次讲演中专门谈到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问题。他指出，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这样的假象：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即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为了货币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实际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他们的劳动力。工资不是工人对其所生产的商品的部分占有，而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部分。为了获得满足自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工人不得不将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劳动出卖给他者。这样看来，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就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工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同样，作为一种用以进行新的生产的积累劳动，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则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② 资本只有同劳动力相交换，进而产生雇佣劳动后，才能实现增殖；雇佣劳动只有使作为奴役它的权力的资本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过程中，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获取劳动这种工人的生产活动和创造能量。工人的这种宝贵的再生产力量不仅能补偿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正是剩余价值的奥秘所在。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复中断与延续

1848—1849 年的欧洲革命，使得马克思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转而论证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这这段时期内，整个欧洲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政治革命浪潮、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地的起义和革命层出不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② 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7.

穷，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都处于极度动荡之中。在这种政治动因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此期间直到 1850 年夏流亡伦敦以前，没有再拾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

然而，这场革命没有持续很久就失败了。在对欧洲革命进行全方面反思时，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考量经济因素对政治革命起作用的程度。从 1847 年的经济危机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事实，促使马克思去做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其思想。[①]《经济学家》杂志关于 1848—1850 年经济史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研究材料。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政治革命做了全面的剖析。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而政治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作为一般矛盾现实表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和人口的普遍贫困。1850 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工人运动开始步入低谷。“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②] 此时，马克思在经历现实的革命“洗礼”后意识到自己将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他所做的论证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的严谨分析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直观描述。马克思并未详细考察经济危机所波及的人口的阶级构成和贫困化程度，以及在此条件下各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足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行动。经济危机虽然使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贫困乃至破产，从而不断接近无产阶级的地位和阶级意识来进行政治革命，但这种趋势在 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不甚明显或根本不存在。因此，若要证明经济危机及贫困普遍化是政治革命的直接原因，既有待于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需要详细考察经济危机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各个阶级革命愿望的程度。换句话说，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一回事，而这个制度的不合理性已经超出了社会所能

---

①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② 马克思.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够容忍的界限从而必须进行变革则是另一回事。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真正揭示经济发展、经济危机、人口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机制——先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机制和特点，再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制条件下经济生产如何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才能判断出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临界点。

与此同时，科伦共产主义者也写信要求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于是，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他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小部分手稿，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在标有序号的24本笔记、共计约1250页的内容中，马克思探讨了以下三个中心议题：一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信贷政策出发，探寻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涉及货币的职能与形式、银行机构和信贷种类的发展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的货币政策发展趋势等。基于经济危机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而非流通领域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和格雷等人试图通过银行与货币改革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彻底否定了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二是探究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内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工资基金理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工作日法案及工作日的缩短、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受教育情况等。这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探讨社会变革前景这个致思路向的继续。三是通过考察人类历史在世界范围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多样性特征和形式，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形成过程，内容涵盖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宪法史、文学史、文化风俗史、建筑学史、妇女问题、伦理史和外交政策问题等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各个文化科学。上述三个中心议题不仅是马克思用于指导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具体展开，还延续到“1857—1858年手稿”中。

事实上，在伦敦研究政治经济学期间，马克思就已经有了整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计划，完成了提纲和材料准备，以便签订出版合同后再专心致志地着手写作。这个计划包括三卷，分别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说史本身的梳理。政治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批判等马克思写作《巴黎手

稿》时期的构想，已经被他放弃了。然而，上述计划遭到了出版商勒文塔尔（Löwenthal）的反对，他建议马克思一开始就写政治经济学说史的部分。马克思显然不能同意对提纲的上述修改，但受限于经济情况的拮据，又无法拒绝乃至放弃书稿的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上一些附加条件来同意出版商的建议，将提纲修订为四卷。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时的批判工作不只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注意到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社会经济学”（science économique）② 理论。例如，在《伦敦笔记》的笔记本 VII 中，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危机问题，着重研究了货币、信用和流通等，批判了蒲鲁东等人用资产阶级货币制度的缺陷解释经济危机和将资本无法兑现归因于缺乏信用的错误观点。③ 此外，《伦敦笔记》中还有摘录和评述蒲鲁东《无息信贷》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着重探讨了货币和利息问题，指出蒲鲁东走向阶级调和论的原因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的肤浅认识。深入

---

① “如果只能这样做，那么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需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而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是有它的困难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而且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来越大之后，才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向他们揭示了大秘密，那他们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就全有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 年 11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33-434.]

② 蒲鲁东认为，较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政治经济学是一切学科中最适于实践的一门。若用形而上学方法改造或重组这一学科，就能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亦即“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和“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a action）。此外，蒲鲁东还专门诠释了社会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一是社会经济学最早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具体表现为逻辑学与心理学；二是社会经济学和哲学有着一个共同目标，即实现全人类的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自由在内的福利；三是上述共同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因为形而上学是确定规律的根本方法。（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50.）

③ 具体内容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8.

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

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来看，批判蒲鲁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思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于1851年还曾计划写一本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著作，将它发表在《革命》杂志上。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①，但我们还是能在马克思的一些通信中找到他的批判思路：（1）蒲鲁东主义既极力排斥资本又试图保留资产阶级社会，它只铲除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不良倾向和弊病。（2）“社会清算”只是通过废除利息来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在资本价值不断贬值的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甚至无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清算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它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大资产阶级而永久存在。（3）银行是蒲鲁东赖以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他将“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形式贷出资本”这两项银行业务的难易程度混为一谈。“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②（4）“强大的工人协会”是蒲鲁东依靠的组织形式，而他却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其他诸如公社分享土地与房屋、工人占有工厂等具体举措。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

此后一段时期，马克思再次中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专门从事报刊撰稿人工作。同之前的那次暂时中断一样，他不仅没有完全放弃批判工作，反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事件的评论性文章，例如，《工厂工人状况》、《英国工厂制度》、《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和《法国的危机》等。这使他熟识了大量实际的细节（尽管是被动的），特

---

① 主要原因是《革命》杂志的停刊和没有其他的发表机会。最终完成且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评论即《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在这篇文章，恩格斯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做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6.

别是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客观上促进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具体考察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状况，详细分析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利率变动情况，时常追踪当时作为欧洲狂热投机活动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涨落行情，马克思总结到，虽然资本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但决不能像一部分经济学家那样将投机过度和信贷滥用归结为经济危机的终极原因。工商业的周期性“痉挛”，即“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①，是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内在矛盾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加剧使得各国政府竭力挽回资产阶级的损失，将危机的诸多恶果转嫁给工人阶级，从而恶化了后者的贫困处境。工厂主们不仅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还公然违反议会通过的法令，使用童工代替成年工。这导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正在迅速接近爆发真正的社会战争的地步”②，客观上为社会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

正是1857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马克思看到了欧洲革命的希望，促使他立即决定撰写“1857—1858年手稿”，并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完成了约50个印张的内容，以便在革命“洪潮”之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1857年夏到1858年春的这段时期几乎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高产和繁忙的时期，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通宵达旦地写作了比以前更多的东西。除了“1857—1858年手稿”和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几十篇文章外，他还同意为《美国新百科全书》（*The New American Cyclopedia*）撰写了许多词条，还编写了3本题为《关于危机的笔记》（*Crisis Notebooks*）的摘录笔记。与以往的手稿不同，这些笔记是由大量关于当时经济危机的材料组成的，包括欧洲和北美等地经济危机的进展、贸易汇率波动、著名的破产事件和股票市场趋向等。可是，革命运动并未随着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一并出现，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他距离完全掌握材料以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57—1858年手稿”也就只停留在草稿阶段。尽管如此，这部手稿仍然是马克思的

---

① 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01.

② 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6.

思想进程中的主要著作，它不仅涵盖了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还有许多颇具价值的独特理论成果，因而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进入决定性阶段的重要标志。

四、本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基本结构

按照本书的研究性质即文本学研究，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文本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等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工作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857—1858 年手稿”，也便于笔者拟定本书研究的基本结构。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在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1857—1858 年手稿”，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对其学术史和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仔细的梳理、清理和反思。众所周知，该手稿中最早面世的“导言”部分是由考茨基 1903 年在《新时代》上发表出来的，且第一个完整的版本（德文）出版于 1939—1941 年，而真正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它的出版和传播相对较晚，但“1857—1858 年手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百余年的学术史中，国外相关研究中呈现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是“苏联模式”，将“1857—1858 年手稿”作为“《资本论》初稿”而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考证、翻译、出版和研究，并使之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其主要特点为：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版本考证与史实研究结合紧密；强调作为一般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作用；研究与社会政治生活直接关联，有些过于夸大理论的普适性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塔利·维戈斯基(Vitalij Vygodski)，其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历史发现的历史：论〈资本论〉的创作》(1965)、《〈资本论〉的创作史》(1970)、《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197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交织》(1979) 等，不仅较早地强调了“1857—1858 年手稿”的重要性，诸如“天才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接近马克思

的思想历程[①]等，而且还对“1857—1858年手稿”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在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此外，苏联学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国际性作者群体，撰写了《〈资本论〉的第一手稿：卡尔·马克思的“1857—1858年手稿”》(1987)一书，全面评述了该手稿的创作背景、发展历史、理论意义、接受程度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论，至今仍被视为相关领域的最好研究论著之一。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命运的思考，重新“挖掘”和“发现”“1857—1858年手稿”中被“遮蔽”的思想。与“苏联模式”将“1857—1858年手稿”看作为《资本论》“铺路”的一部早期手稿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该手稿是一部体系概念完整的独立著作。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少数忽视或不解释“1857—1858年手稿”的人。例如，路易·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与意义，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仅仅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定义为马克思重要的认识论和哲学著作。[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8)一书的出版，它将过去关于马克思写作计划变化的相关探讨集中起来，用28章的内容详细注解了“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研究；另一个则是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未知的马克思》(1968)一文的发表，该文强调了“1857—1858

---

①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1974: 44.

② 在法国，阿尔都塞曾经发起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辩论，内容涉及唯物辩证法反思、认识论断裂概念澄清、历史相对论批判等，因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成为这场论辩的关键内容。但在这场论辩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都塞、莫里斯·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亨利·列斐伏尔（Herry Lefebvre）、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和吕西安·赛夫（Lucien Sève）中，除了赛夫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将“1857—1858年手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视和专门研究。

对此，吕西安·赛夫曾回忆说：“除了‘导言’这样的文本外……阿尔都塞从来不阅读‘1857—1858年手稿’。当然，这是就‘阅读’这次的真实含义而言的。”(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 2004: 29.) 针对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赛夫评价：“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参考书目方面的断裂，最终导致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起源及其与马克思成熟思想之间连续性的最错误观点。”(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 2004: 30.)

年手稿”全译本的重要性，使得该手稿广为人知。此后，“1857—1858年手稿”研究的热潮一直持续了下去，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重建革命主体和共产主义概念的思考①，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强调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创作的有利和不利影响②，吕西安·赛夫阐述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人道主义解释的全面反对③，亨利·丹尼斯（Herry Denis）宣称的价值转化价格困难的解决对马克思重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作用④，等等。

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致力于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实践”“方法”等方面探讨“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内容。比如，克莱尔·科希克（Klehr Kosik）在《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1963）中运用“1857—1858年手稿”中的部分概念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于人、劳动和异化的观念进行了综合；费伦茨·特凯伊（Ferenc Tökei）以马克思关于所谓的亚细亚占有形式和生产方式的思想为基础，详细论证了一个有关历史哲学的全面的理论⑤；捷尔吉·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在历史和历史必然性领域内发展了“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想⑥；普雷德拉格·弗拉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在揭露黑格尔关于现实作为抽象过程结果的幻想的同时，强调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的方法是建立在具体的辩证法基础上的，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⑦；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基于“1857—1858年手稿”中包含了对当代世界及其具体化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说明这一认识，指出该手稿在哲学上是超越《资本论》的⑧；等等。

四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仅在版本考证、思想阐释和现实价

① Antonio Negri. Marx au-delà de Marx. Paris 1998.

② Jacques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③ 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 hui. Paris 2004.

④ Herry Denis. L’《Économie》de Marx. Historie d’ un échec. Paris 1980.

⑤ Ferenc Tökei. A társadalmi formák elméletéhez. Budapest 1968.

⑥ György Márkus. Marxizmus és ‘antroplógia’. Az emberi léyeg fogalma Marx filozó fiájában. Budapest 1966.

⑦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ksizma. Zagreb 1975.

⑧ Gajo Petrović. Smisao i zna c enje Marxovih Grundrissa. Zagreb 1974.

值等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就，还在促使日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1857—1858 年手稿”完整版本正式出版时起，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大体历经“《资本论》形成史中的‘1857—1858 年手稿’”、“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1857—1858 年手稿’研究”和“世界视野中的‘1857—1858 年手稿’研究”这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见解。例如：望月清司从马克思历史理论角度对“1857—1858 年手稿”的解读，内田弘论证了“1857—1858 年手稿”同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等。此外，还出现了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和“注解”等内容也编译其中的“1857—1858 年手稿”新译本，使研究者对该手稿的修改和形成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以便于更好地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

五是“马克思学”的探讨，在破除意识形态偏见和学科局限性等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献信息彰显马克思在思想上对黑格尔的借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和让·马拉基亚斯（Jean Malaquais）所编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1857—1858 草稿》（1968），该版本打乱了原文顺序而将手稿重新编排如下：“货币乌托邦”、“资本”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种类”；此外，还为“巴师夏和凯里”这部分加了注释。① 这无疑为理解“1857—1858 年手稿”的思想开辟了新的路径。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1857—1858 年手稿”的研究在时间上要落后于国外，尽管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导言”中译本。国内学界大规模研究“1857—1858 年手稿”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如赵洪主编的《〈资本论〉第一稿研究》(1992)、汪水波的《马克思黄金时代的理论结晶——〈资本论〉最初手稿的研究》(1991)、顾海良的《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1993)、

① 笔者认为，这种编排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生平、著述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宗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找到依据：一是黑格尔逻辑学对马克思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作用［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 年 1 月 16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二是手稿的专题论文性质（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三是马克思要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性质的写作［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 年 12 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1］。

汤在新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1995）等。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出此时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受“《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隔离的板块进行研究，实际脱离了文本本身所阐发的社会现象和经济议题，未能完整再现“1857—1858 年手稿”的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进而客观地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实践价值。当然，国内学者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特别是 21 世纪初以“回到马克思”为宗旨的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兴起，基于最新文献和世界视野，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其哲学话语的转换。例如，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等。

概览国内外“1857—1858 年手稿”研究，尽管热潮不断、成果颇丰，但在对其思想细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阐发方面仍较为薄弱。在与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中也只停留在辩证法方法与文本结构的关系上（黑格尔本人亦颇为重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没有详尽阐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事实上，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诞生时起，它同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就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重要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缺少对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直接引述的和批判的对象及其著作（140 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和 10 余部哲学著作）的深入解读，从而造成该手稿基本部分解读的缺失，使得在提炼该手稿的重要思想和基本观点时普遍缺乏文本依据，难以形成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由此可见，重新研究“1857—1858 年手稿”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基于对马克思批判对象及其思想的理解，详尽阐发这一文本的思想细节，进而重构和再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并提炼其观照和把握社会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为再述该文本的思想史地位和实践价值奠定方法论基础。

（二）手稿的传播史和文献学问题疏证

毫不夸张地说，“1857—1858 年手稿”是马克思诸著作中最为“命途多舛”的一个。这部马克思“黄金时期”的著作，囿于各种复杂的实际因素，竟然在马克思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逐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

知。另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是关于这部手稿地位的长期不确定性。自梁赞诺夫1923年首次发现它时起，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关于它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直到1939年正式付梓才被正式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草稿）》。尽管这部手稿的编辑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的原则进行，但它还是作为单行本出版，没有被收入历史考证版中。此后，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部手稿的德文重印版于1953年才问世，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传播。

除了被重新发现历程的迂回曲折外，“1857—1858年手稿”的接受和传播起步较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结构的不寻常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晦涩，极大地增加了转译它的难度。根据不完全统计[①]，从1958—1965年的日文版到2008年的葡萄牙文版，“1857—1858年手稿”全文被翻译成22种语言，共计32个不同的译本，不包括节译本在内，已经被刊印了50多万册，极大地促进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和研究。

由于绝大部分的内容都被保存下来，且马克思本人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编号和排序，所以，“1857—1858年手稿”的文献学问题较少。除了它本身的逻辑结构外，争议最大的就是每个笔记本的具体写作时间了。诚然，弄清楚这部手稿每一个部分的具体写作时间，对于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变成因和路径将大有裨益。但是，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人们只能根据其他材料对这些具体写作时间进行推断，很难形成普遍认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掌握大概的写作时间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学研究终究不是文献学研究，文献学考证虽然对文本学研究起着前提的作用，但这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大致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讲的“小学”和“大学”的区分。按照这种思路，“1857—1858年手稿”自身的结构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参照马克思本人后来所做的写作计划和提纲，通过合理的解读和重新建构来进行破解。在这方面，编者和译者在目前的通行本中给每个部分加上标题以试图做逻辑建构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当然，随之带来的问题也

① 马塞罗·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5.

很明显，尤其是在有些部分的处理上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例如：手稿的主体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所谓“资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记本 II 第 8-23 页）被编者全部归为标题“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最早拟定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章”这个标题①。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内容，就会发现这个手稿片段中至少混杂着四个方面的内容：流通之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实现作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内涵。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的初稿片段中，专门做了区分和修正，将这些内容分别归到了他本人所拟定的“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向资本过渡”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小节中。其中，前两个小节属于“货币章”，后一个小节才属于“资本章”。又如：手稿的主体部分中所谓“资本章”中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这个部分（笔记本 III 第 43-45 页和笔记本 IV 第 1-14 页），其内容除了标题中所示之外，更多是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鉴于此，我们在解读和研究这部手稿时，切忌不能完全照搬中译文通行本中所做的内容划分。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马克思思想的具体细节的理解偏差。参照马克思本人在写作完这部手稿后所做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资本章计划草稿》《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以及这一时期的书信等材料，将会对我们解读和研究它大有裨益。此外，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已保存下来的初稿片段，也是我们理解“1857—1858 年手稿”的重要参考材料。特别是在笔记本 C（《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部分）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可以参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商品章”来对“1857—1858 年手稿”中应有的“商品章”或“价值章”内容进行还原式的阐释。

《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读和研究“1857—1858 年手稿”的重要参照材料，但我们却必须要注意使用它进行对照研究的限度，避免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形成的思路直接套用到“1857—1858 年手稿”中。这种“直接代入式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研究，又难免带来过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将相类似的内容专门归结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中。

度诠释的后果。也就是说，直接用《资本论》的思路来对“1857—1858年手稿”进行逻辑化的建构，完全对后者中的独有内容视而不见，从而陷入两种相对的极端：要么将马克思彼时的思想人为地拔高到《资本论》时期的水平上，要么重新退回到“《资本论》初稿论”上①。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学术观点概要

有鉴于此，笔者按照马克思本人所做的整理和纲要，在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马克思“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的基础上，打破“1857—1858年手稿”写作原始顺序的限制，就这部手稿中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等，做了全面、详尽且系统的解读——这种解读是对“1857—1858年手稿”中的全部内容和思想细节的梳理，关于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议题所涉及的这部手稿的内容范围，笔者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放在了本章的后面（附录）。最后，将它们置于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来阐明现实意义，以及进行客观的历史定位。

在此，笔者谨将本书的具体结构和主要学术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探究的是**马克思创作初期的思路变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思路的延续向新的逻辑建构的过渡**。受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的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巴师夏工资固定论、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仍然延续了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而言是从遭逢现实问题到指明社会变革的根本出路的循环，其一般手法为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式批判。尽管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入手，批判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与劳动货币论，再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但是无法体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独立表达和全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转而进行“导言”的创作，从而标志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

---

① 不可否认，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两种极端。当然，这本著作在同类研究中代表着极高的水平。

第二章讨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哲学方法**。当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把握和理解这些理论的得失，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建构的重要前提。马克思的思路是：首先在此前提下找出这些理论的一般体系及其哲学传统和方法；然后再重新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对象的物质生产，探讨生产一般同其他表面领域的现实关系，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最后阐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和分篇构想。这其中的哲学方法包括：**生产总体辩证法**，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的辩证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作为其内在要求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范畴和现实关系的辩证法**，涵盖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经济范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或它对于一切社会形式的适用性、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地位等。这些方法在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现实中的辩证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第三章阐明的是**作为一般性规定的商品的二重性和商品交换过程**。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这种分析框架在马克思写作“1857—1858 年手稿”时期始终是十分明确的。只是由于交换价值和货币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密切联系的，难以为人们在现实中所区分，所以马克思才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有关价值的论述不是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出现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对于资本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定。在关于商品（价值）的讨论中，马克思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他既为价值作为研究出发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以商品为载体描述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现实过程；既揭示出交换价值的本质，又刻画出现实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的场景；既解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及其带来的矛盾，又论证出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交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此外，他在论述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理论建构和理论史梳理密切结合起来，这也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重要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提供了扬弃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四章分析的是**作为特殊性规定的货币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辩证运动**。直到在“笔记本 I”中具体阐释货币和商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时，马

克思才意识到叙述的辩证方式，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所在。这种叙述方式既可以实现理论叙述的逻辑化和清晰化，又不可避免地带来极端抽象化的倾向。正是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最终使得马克思发现并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具体到关于货币形式的分析上，马克思不仅引入黑格尔所描述的“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辩证运动，来分析商品、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本质—形式”关系，而且借鉴了黑格尔关于根据作为矛盾的消解的存在这个说法，将商品二重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固定到货币形式上；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考察了简单流通中货币形式的辩证运动过程，指出了货币形式所表征的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辩证分析了流通所实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最后提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的方式。

第五章和第六章阐释的是**作为个别性规定的资本一般及其辩证的生产总过程**。从“1857—1858 年手稿”的现有内容来看，马克思未能完成他关于资本总体探讨的庞大计划，而只是对资本一般做了系统的梳理，并探讨了它的生产总过程。按照生产总体的概念，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从这个总过程的各种规定来看，作为其**要素**的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作为其**环节**的是商品交换过程、商品流通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作为其**产物**是商品的二重性规定、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和资本一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又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它还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只有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将上述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准确且系统地理解这个总过程，并以此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找到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和通往未来社会形式的正确道路，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最后的综论部分是**对“1857—1858 年手稿”做总体的观照和总结**。笔者在此部分着重讨论的内容有：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建构中的作用，特别是马克思系统整理这些“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这部手稿之于当代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意义，从而以文本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实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包含的“文本—历史—理论—现实”的有机统一。

附录

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议题和“1857—1858 年手稿”内容范围对照表

主要思想议题	具体思想细节	内容范围
“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经济和谐论批判	笔记本 III 1-4（30 卷 3-11）
	工资固定论批判	笔记本 III 5-7（30 卷 12-18）
	劳动货币论批判	笔记本 I 1-12（30 卷 59-88）
“原本批判”的新思路与哲学方法	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笔记本 M 1-5（30 卷 22-28）
	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	笔记本 M 5-13（30 卷 29-41）
	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到具体实在的再现	笔记本 M 14-15（30 卷 41-43）
	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笔记本 M 15-22（30 卷 43-53）
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	笔记本 II 13-18（30 卷 207-223） 笔记本 VII 63（31 卷 293-294）
	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	笔记本 I 12-15（30 卷 88-96）
	交换价值的实质及其表征的社会关系	笔记本 I 20-21（30 卷 105-108）
	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和解决方式	笔记本 I 15-20 21-24 （30 卷 95-105 108-115）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于商品本身	笔记本 I 24-28（30 卷 105-123）
	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	笔记本 VII 26-27 29-39 56-62 （31 卷 185-188 194-227 277-292）
	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笔记本 I 28-48（30 卷 124-170） 笔记本 B’ 1-17（31 卷 315-347）
	货币形式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	笔记本 I 48 笔记本 II 1-3 8-12 （30 卷 170-179 194-206） 笔记本 B’ 17-21 笔记本 B’’ 1-3 （31 卷 347-365）
	货币的自我解体及其向资本的过渡	笔记本 II 3-8（30 卷 179-192） 笔记本 B’’ 4-15（31 卷 365-392）

续前表

主要思想议题	具体思想细节	内容范围
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过程	笔记本 II 19-22（30 卷 223-232） 笔记本 B'' 16-20（31 卷 393-400）
	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	笔记本 II 22 25-29 笔记本 III 8-16 （30 卷 232-233 241-270）
	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	笔记本 III 17-23 27-33 38-43 笔记本 IV 8-14 笔记本 VI 9-10 笔记本 VII 39-40 （30 卷 270-287 296-310 321-335 359-380 587-590 31 卷 227-230）
	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笔记本 IV 44-45 50 笔记本 V 17 （30 卷 448-451 463-464 513）
	资本的形成史与原始积累	笔记本 II 23-24 笔记本 IV 46-53 笔记本 V 1-15 （30 卷 234-239 451-510）
	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过渡	笔记本 IV 15-22 23-25 32-44 笔记本 V 16（30 卷 381-397 400-407 419-448 510-512）
	资本流通中的各种要素及其表现	笔记本 V 16-32 笔记本 VI 21-27 31-37（30 卷 510-549 31 卷 11-29 44-68）
	流通中的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	笔记本 VI 19-21 27-30 37-44 笔记本 VII 1-15 （31 卷 5-10 29-44 68-143）
	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	笔记本 III 43-45 笔记本 IV 1-7 笔记本 VII 15-25 39-44 （30 卷 335-359 31 卷 144-181 227-243）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	笔记本 III 24-28 34-38 笔记本 IV 22-23 笔记本 V 32-33 笔记本 VI 1-18 （30 卷 287-296 311-321 397-400 408-419 549-623）

凡例：笔记本 III 1-4（30 卷 3-11），是指笔记本 III 第 1-4 页，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第 3-11 页。

第一章　“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延续与终结

在直接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以全面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写作《伦敦笔记》之后，马克思并未立即形成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使得他在开始尝试进行一些具有前提性的探讨时，没有完全摆脱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仍然延续了从哲学历史观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具体表现在“巴师夏《经济的和谐》[①] 1851 年巴黎第 2 版”（笔记本 III 第 I–VII 页）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 年巴黎版”（笔记本 I 第 I–XII 页）这两个片段中。过去，国内外学者在解读和研究上述两个片段时，往往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出发，阐述其首次明确区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驳蒲鲁东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等理论意义，缺乏对作为马克思直接批判对象的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的著作及思想的全面了解和分析。这种研究上的缺失，导致我们既无法全面且客观地呈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与进程，又无法直观地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性与深邃性。有鉴于此，笔者在本章中首先回溯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然后再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1 卷和《过去、现在和将来》、达里蒙《论银行改革》等著作来阐释他们各自的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最后分析马克思对上述理论的针对性批判，力求全面且客观地呈现

① *Harmonies économiques* 一书除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中的“经济的和谐”或中文 1 版中的“经济的谐和”译法外，还有一种译法，即中文通行本的“经济和谐论”。

马克思创作“1857—1858年手稿”的最初思想历程。

一、“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

自写作《巴黎手稿》到《伦敦笔记》为止，马克思在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研究模式和批判手法，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笔记本M中写下“导言”，详细地论述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标志着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走向终结。然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并没有摆脱旧有模式的影响（这符合一个思想家的真实思想历程，而且他本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在1857—1858年间是不断变化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这两个部分是以《哲学的贫困》为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和深入。在具体解读这两部分手稿的内容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做简要回溯。

（一）从遭逢现实问题到寻求变革出路

结合本书导论部分的内容，综观马克思本人所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遭逢的复杂问题是激发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因素。马克思首先做的是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和解决上述现实问题。他会为此圈定所读书目，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思路来做细致的摘录或者扼要的评注。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的阐发上，与“当前的经济事实”存在着许多不相吻合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一方面阅读和摘抄更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进行对比与辨析，以证实它们是否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逻辑论证和现实分析尝试破解这些问题，并形成较长篇幅的阐释。通过这样两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借助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提升了自身对复杂现实问题的理解，而且指明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或社会变革的根本性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工作在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往往呈现出循环的方式：他在遭逢新的现实问题时经常反复研究和摘录同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对同一个重要概念和关键问题做出深层解析和多角度探究。简而言之，遭逢现实问题→研读他人的著作→分析和批判他人的理论与思路→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做准确的表述→指明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就是马克思在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前的“原本批判”模式。特别是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清算了思辨哲学的影响，建构了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从现实出发来理解人、社会和历史，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社会变革）之后，他的研究模式就逐步固定起来。① 而且，在这种研究模式下，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内在整合。②

首先来看《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其直接动因是遭逢物质利益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尽管阅读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目的是为解答现实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先通过这些著作去熟知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对于初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而言，认真谨慎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最初阅读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以及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货币主义信徒、李嘉图等的著作时，他都只是做了大略的浏览和简要的摘抄。随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代表及其思想的熟知，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数量开始增加，其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甚至囊括了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以便于他从它们之间的彼此对立或互相补充中获得新的理解和认识。③ 正是经由反复的比较阅

---

①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后已经弄清了其新的哲学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而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成为他阐述这些基本特点的重要契机。（参见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一个典型。

② 在这其中，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思想是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范畴视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而非永恒的事物。政治经济学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它只有经由科学的和系统的考察（批判）才能从中找到通向未来理想社会形式的道路；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恰恰揭示出这条道路，即社会变革的前景和根本性方向。

③ 例如，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阅读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紧接着便阅读了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

读、细致的摘录和缜密的思考，才让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见解日臻完善，写下了大量的逻辑性摘抄和评论性文字。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基于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并完成对前人理论的超越。

比如，在《巴黎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是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栏进行摘录和评注的，并试图“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① 来进行阐述。他此时发现，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要素分配社会财富并没有实现他们所说的富裕状态，反而是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就越贫穷——这正是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② 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促使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必然性的理论前提，而后者恰恰是需要先做说明的③；这一学科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却不考察劳动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异化劳动的事实。为此，马克思提出要用异化劳动说明当前的经济事实，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和他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在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阐明分工、货币等范畴之前需要完成的两个理论任务：一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二是劳动异化、外化如何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④

---

①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4.

②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同①156.）

③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同①155.）事实上，早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以评述萨伊关于财富性质和流通原理的方式表述了上述至为重要的观点：“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MEGA2，Ⅳ/2，1981：316，319.）

④ 关于《巴黎手稿》内容和结构的分析可参阅拙作：原始手稿本来面貌的直接呈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描述. 教学与研究，2011（11）.

此外，在反思与批判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马克思还对包括价值、分工、货币、信贷等在内的重要的经济学范畴，以及对比这些范畴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不同意义的方式，做了集中的考察。以价值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为例，马克思先是摘录了斯密、斯卡尔培克和萨伊关于价值的不同看法，然后在摘录李嘉图著作时写下了这样的评注："李嘉图在价值规定中只抓住生产费用，萨伊只抓住效用（有用性）。在萨伊那里，竞争代表生产费用。"① 当马克思注意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有关于类似主题的评述时，他又将这部分内容摘录了下来。正是对价值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分析比较，才使得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全面否定到放弃否定再到肯定吸收，进而为自己的价值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马克思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也是由现实问题引入的。承接《巴黎笔记》中的《毕莱笔记》的内容，马克思继续关注资产阶级社会中英法工人的贫困问题，并在摘录西斯蒙第著作时回到了考察劳动阶级贫困现状的主题。通过摘录和对比萨伊《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博朗《论贫困，古代和今天的状况》和巴格蒙特《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御的对策》等，马克思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特定的时代具有特定的规定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贫困问题带有异质性，如基督教经济学面对的是欧洲中世纪的贫困问题，而呈现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其二，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着研究者对贫困问题的不同态度与判断，萨伊、西斯蒙第和毕莱就是分别从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贫困问题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萌生出理解政治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不同体系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研究构想，而这成为他接下来摘录和研讨的重要课题。

同样，对现实中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加之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被译作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导致他们思想混乱，使得马

① MEGA2，IV/2，1981：11.

克思断然与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及其最新体现者蒲鲁东决裂，“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与前文带有手稿性质的著述稍有不同的是，马克思此时形成了自己新的哲学历史观，使得对蒲鲁东著作的摘录和评述成为表述其独立思想的佐证。具体而言，马克思是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形态必然依附于社会机体之上”“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等哲学观点出发，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进而推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错误论断，消除《贫困的哲学》对变革社会的现实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批判蒲鲁东分工天命观为例，马克思是在充分认识到分工的实质（即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类活动）、分工所表征的历史过程（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分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中的表现形式及作用、分工的后果和前景等的基础上，直接切中蒲鲁东分工理论的要害：一是将分工视作永恒范畴和永恒规律，用“分”的观念抹杀了分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质的差异；二是没有做任何实质上的创新，只是夸大了、重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论述分工的好处时所得出的结论；三是用简单的观念或范畴来揭示分工产生有害结果的原因，人为地虚构出不同时代的分工之间的对立。②

至于马克思创作《伦敦笔记》的直接动因，则更为研究者所熟知，那就是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摘录和对比了图克、泰勒、加尔涅、毕希、桑顿和斯密等人的著作，从他们的国家货币学和信贷政策中找寻经济危机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的蒲鲁东和格雷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批判了他们通过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错误做法。货币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事物，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才具有了普遍性，进而奴役人并同人相对峙。蒲鲁东和

---

① 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5-426.

② 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86-294.

格雷的错误缘于没有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他们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①。正因为这样，他们仅能认识到只有消除现行的货币体系并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自由；他们的认识只能局限于表面的流通领域，而不是作为本质的生产领域。蒲鲁东和格雷的做法是一种矛盾的幻想，他们既要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货币体系，又要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的交换并没有改变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个总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其存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先在性，即掌握资本的资本家决定着工人的命运，资本也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社会财富普遍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才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讨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论，而这恰恰是“1857—1858 年手稿”的一个主题。

（二）推导逻辑矛盾和“追根溯源”批判

批判与建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与之密切相联系的则是其“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第一，从批判对象的理论前提本身出发，得出与前提相左或与现实相矛盾的结论②，从而反证出批判对象的理论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接呈现所批判的理论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第二，追溯批判对象的思想先导或主要创立者，通过批判后者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驳倒前者。

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必然会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批判，其理论也首先成为后者“原本批判”一般手法的“试验品”。按照斯密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通过研究社会财富的主体、性质、动力机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到达一种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在他看来，财富的根源在于劳动，其动力机制则内在于由劳动分工、商业贸易和法制规则所共同构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基本范畴起着主导作用，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

---

① 马克思. 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1.

②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说，“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2）。

要依据，而工资、利润和地租则相应地成为价值的主要构成因素。由此不难推论，对工资的所有者工人来说，社会财富日益增长是最为有利的状态，此时工人所分配的财富也会增加。但实际生活中的情形却正好相反。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细致的探究：首先，财富的增长会导致工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料的唯一来源（工资）而过度劳动甚至放弃一切自由，这势必会导致工人寿命的缩短。其次，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大量劳动的积累、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聚。此时，由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①，所以，工人的劳动产品，也就是他们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会被积聚到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少数资本家手中，工人最终沦为资本的奴隶。而分工的扩大则会导致工人的数量增多和竞争加剧，进而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片面的和机器般的劳动，最终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沦为机器。此外，资本的积聚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这将使得一部分小资本家破产而成为工人，从而使工人数量的增加和资本家之间对于工人需求的竞争减弱，最终导致工人之间产生新的竞争和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最后，当财富的增长达到顶点即完满的状态时，工资和资本的利息都会变得很低，工人之间的竞争会激烈到工资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而这个结论恰恰是斯密本人得出来的。由此可见，斯密所向往的社会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状态却导致大多数人口（工人）的痛苦和不幸，“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②。

在体现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全部著作中，运用一般手法最为“纯熟”的当属《哲学的贫困》。在批判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时，马克思采用的是批判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方式，他认为后者本身就有着将一切事物最终抽象为逻辑范畴的极端倾向，只学到了“皮毛功夫”的蒲鲁东的哲学方法更是漏洞百出。只要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抽象化的实质和错误，那么“冒牌的黑格尔词句”就会不攻自破了。在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解释时，马克思直接从作为蒲鲁东批判对象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本身出发来反驳其各种谬误，深

---

①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0.

② 同①122.

刻地指出蒲鲁东只是在重复斯密所创立的“循环论证法”。[①] 在剖析蒲鲁东所“发明”的构成价值的实质时，马克思指出，所谓构成价值的成因、决定因素、形成过程、作用、新特性和意义等，不过是在模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抽象地谈论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及其运动而已。如果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尚且带有空想主义的性质，那么，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则更是一种“玩弄辞句的企图”。在驳斥蒲鲁东关于构成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时，马克思通过大段的引用、评论约翰·布雷的观点来暗讽蒲鲁东的理论无任何新意，他认为既然布雷的学说已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构成价值理论就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随处可见，正是这种间接的和不屑一顾的批判方式彻底终结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

当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主要方式还是从前提出发推导矛盾，或者直接呈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相符，且这种方式是基于他此时已形成的新的哲学历史观的。例如，基于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根本性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机器观时指出，要把机器置于历史视域中并结合现代大工业及作为其组织形式的自动工厂来考察，要将机器生产作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非将机器本身视作永恒的经济范畴。蒲鲁东将作为“经济范畴”的“机器”界定为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新归于统一的“合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机器大生产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而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机器的真正发展过程是：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机器即生产工具的积累不是分工的否定，与之相反，这两者

① 例如，蒲鲁东只是在交换价值已经产生的前提下论证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由于满足人类各种需求所进行的不止一个人的生产就意味着分工已经存在，有了分工则意味着有了交换，因此，需求决定生产应该被扩展为这样的逻辑顺序：需求→生产＝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而斯密很早就采用这种论述方式：“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又如，蒲鲁东一方面通过确定价值尺度推导出劳动者工资的平等，另一方面却把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即一定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都是相等的），当作既成事实来确定价值尺度。多么奇妙的辩证法！

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而且，机器的应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工厂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及其劳动进一步被分割。

以上内容就是关于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的概述，接下来，笔者就要结合“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 年巴黎第 2 版”和“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 年巴黎版”这两个片段，来论证这种旧有模式和一般手法是如何被马克思延续和终结的。

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经济和谐论批判

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马克思会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要涉及的就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相关理论进行摘录和评述。在此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待经济危机的态度无外有两种，即“掩盖”和“正视”。前者的“典型代表”① 是巴师夏，他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一种表现，只要发现和排除扰乱经济规律正常运行的因素，就能很快消除经济危机；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他直面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的各种表现，主张用改革货币制度的方式消除经济危机。

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两者，他首先批判的是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后者主张经济规律在自由发挥作用时的自然和谐，并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各种使经济规律不起作用的因素，如掠夺、战争、奴隶制、神权统治、垄断、政府剥削、假博爱或共产主义等②；认为经济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存在性不是对作为本质的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否定，而是一种反面证明或肯定。“因此，不仅要在其庄严的和谐中阐明社会范畴的自然规律，还必须指出使这些规律不起作用的那些扰乱原因。”③ 这种掩盖经济危机实质的做法，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颇为有趣的是，巴师夏

---

① “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4]。

② 事实上，巴师夏在《经济的和谐》中只简单论述了掠夺和战争对经济规律自由发挥作用的影响。

③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的论证结构居然与其理论对手蒲鲁东[①]论述经济范畴的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②]。对于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彻底批判过蒲鲁东的马克思来说，批判巴师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以致他最后出于不屑[③]而终止了批判。

（一）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和谐

从文本内容来看，马克思从哲学历史观出发，以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为前提，结合批判作为巴师夏理论先导的凯里学说展开了论述。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对凯里的经济和谐论做简要回溯。

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是在其熟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发展现实[④]的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英法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环境差异和地理差异，决定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适用于美国。于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构建新的经济理论，就成为凯里的主要理论任务。同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一样，凯里的批判和建构也始于价值理论这个全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凯里提出了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即价值的源泉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本或劳动牺牲而不在于包括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成本。生产的动态性决定了劳动的创造能力的变化，使得后者因不稳定性而无法成为价值的标

---

① 1850年，巴师夏和蒲鲁东曾就生息资本、无息信贷和银行信用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② 蒲鲁东的结构为：经济范畴的合理性→干扰合理性的因素→解决矛盾的办法；巴师夏的结构为：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扰乱经济规律的因素→解决问题的办法。

③ “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谐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④ 凯里很早就仔细研读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并深受其影响。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凯里早在1835年就对模仿李嘉图理论并将其庸俗化的西尼耳的“节欲论”（将利息视作货币所有者为积累资本放弃当前消费而“节欲”的报酬）进行了猛烈抨击，撰写了《关于工资率》和《全世界劳动人口条件不同的调查》等文。1837—1840年，凯里创作了《政治经济学原理》（3卷本），在充分认清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首次对价值、分配、人口、土地、货币和价格、保护关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系统论述，完成了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凯里称作“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准。具体而言，劳动的效率会随着经验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而不断提升，导致生产同样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断减少，或者同等的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也就是说，“产品的价值不断在下降，而人的价值则不断在提升”①。

价值决定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以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优等土地的有限和人口的无限增长，使得劣等土地被耕种与劳动报酬降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而这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和谐现象迭生——势必遭到凯里的批驳。级差地租论只适用于工业资本反对《谷物法》的时期，并不符合 19 世纪美国的现实情况。此时，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地租和利息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它们都产生于自然支配人类和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冲突中。起初，一块土地在一个新的国家中是不具有价值的，伴随着对它的改造和它因交通改善而更靠近市场等，它才逐渐获得价值。要言之，正是投资于土地上的资本才使得它有了价值。况且，美国的情况与李嘉图所论述的耕种从优等土地转向劣等正好相反：受位于河床下游的较为肥沃的土地极易遭受洪灾而绝收的影响，美国人最初在靠近山顶或半山腰的较为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从而导致已耕作的远不如未开垦的土地要肥沃。此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既提升了贫瘠土地的质量，也提高了肥沃土地的开垦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加，地租就不可避免地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和积累。在人口和财富共同增长的同时，人的思想也会不断进步，并趋向联合与和谐，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和谐与财富增长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趋势。

不同于从结论出发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论，凯里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始于论证其理论前提的不可能性。他不否认英国社会中各种贫困惨状的存在，而是反对将它们作为如下前提和结论的事实依据：人口所呈现的几何式增长始终要快过生活资料所呈现的算术式增长，从而导致工人的工资降低和生活恶化，人口进一步减少。现实中和理论上不符合上述前提的事例比比皆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人类生育能力的变

①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37.

化，这说明人口的再生产速度是可变的；英国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工人真实工资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贫困惨状不能全部归因于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可以提高个人发明量及其实际应用速度，这说明人口增长的规模及趋势有助于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人均产出的增加；人类的机体和机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在大脑功能不断完善的情况，其再生育功能可能会持续下降，这说明只从动物性的角度来阐述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是不合理的；等等。由此可见，人口状况不是受某种天意的摆布以呈现出几何式增长趋势，而是基本上受人为控制的，以致人口增长可以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质言之，马尔萨斯所代表的作为满足人口需要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各种理论表现是亟待修正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增长会随着交往增加、资本增长和技术提升而产生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伴随着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替代规律作用，会使得人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大为降低。

凯里批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根本目的是强调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就他所观察到的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而言，各个阶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普遍获益，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水平甚至要高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从再生产费用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日益改进和完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生产一定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日趋减少，过去一定时间的劳动现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劳动在社会再生产费用中的份额日益扩大，资本所占的份额相应地日益缩小；工资会随着劳动价值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利润会随着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不断下降；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在增加，资本家的绝对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其相对量却在减少。这样一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也会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土地可被视作一种资本，所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工人的份额在比例上和数量上都得到增加，资本家的份额在数量上增加，但在比例上较少。这个规律总是要使人们处在平等的境地。”① 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类生产要素的非对抗性，可以为社会各阶级的合作提供真正的机会，进而产生更多的职业和产业，

①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113.

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和谐发展。

用经济的和谐破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当然绝非易事。首当其冲的就是现实中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如工资并没有不断上涨、资本家的财富积累速度不断上扬等。凯里将这个现象归结为政府的一系列不正当政策，后者影响着经济和谐规律的正常发挥。只需改变或废除这些不正当政策，就可以恢复经济和谐的秩序。

英国强势地位造成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则构成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另一大挑战。为此，他提出了保护关税的观点，来扭转或避免美国与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不利竞争局面，使前者能够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凯里指出，英国所提倡的自由贸易的实质是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剥削，“在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和以农业或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①。同样，工业主导型国家和农业主导型国家也不可能结成一种非服从的和非操纵的联盟，以及在这样的联盟下开展对外贸易以发展经济。对美国刚发展起来的产业来说，恢复与英国的贸易交往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因此，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和保护关税，既能尽量避免同英国工业的直接竞争，又能推进产业多元化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政府的适当作用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问题。就这个角度而言，经济学家莫里斯对凯里的如下评价无疑是中肯的：“尽管凯里不是第一个提倡贸易保护的美国人，但他是第一个充分且完整将贸易保护融入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美国人。他不仅阐述了贸易保护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作用，而且论证了国家制度在经济发展和贸易保护之间所起到的纽带作用。”②

（二）“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

不同于凯里从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入手创立经济和谐论，巴师夏以解决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问题为起点，围绕“一切正当的利益都是和谐的”展开论述。在他看来，解

---

① H. C. Carey.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cholarly Publishing Office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6: 84.

② G. F. Vaugh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 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3 (9): 686.

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如何看待它：如果从利益的自然和谐出发，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为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那么，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办法就是不妨碍和不转移利益；如果从利益的对立出发，并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此，那么，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只能诉诸强制，并让人们（即自由的主体）普遍接受。要言之，人类的利益在任由其自由存在时是否是和谐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它们既不否认一般的经济规律的先在性，也承认这些规律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有分歧的，即让这些规律继续起作用还是废除这些规律。这样看来，如果证明出一般的经济规律本身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就不仅可以消除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立，还能推论出经济规律的和谐及其在自由发挥作用时，会实现个人利益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和谐一致。在对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方面，巴师夏是截然相反的：前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其原理无法完全证明利益的和谐而已；后者则将原本和谐的利益说成是对立的并诉诸强制来解决对立。因此，巴师夏只需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用一种“正—反—合”的方式组合起来即可。[②] 其中，正题：和谐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反题：干扰性的人为原因；合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具体而言，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和谐地组织起来的整体，这是由经

---

①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凯里和巴师夏的一个共同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② “作为开始，我将确定几个经济学概念。借助于我的前人工作，我将竭力把政治经济学概括在一个真实的、简单的和富有成果的原理中；这个原理，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对它有所认识，并不断接近它，而现在也许是到了为这个原理确定一个公式的时候了。然后在这个火炬的照耀下，我将试行几个尚有争论的问题，如竞争、机器、对外贸易、奢侈、资本、地租，等等。我将指出政治经济学同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同它们之间的和谐，并谈一谈个人利益、财产、共有财产、自由、平等、责任、连带责任、博爱、统一这些词所表达的严重问题。最后，我将请读者注意人类社会和平的、正常的和渐进的发展所遇到的人为的障碍。从和谐的自然规律和干扰性的人为的原因这两个观念中，人们将推论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3-44.）

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决定的，而后者又取决于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以人为研究课题的。人的本质在于需要、努力和满足的结合，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一个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只有个人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需要、努力和满足这个完整的经济现象，是按照交换这一公正的法则在每个人身上实现的，而被交换的事物或者中介环节则是努力（包括劳动在内）。这个逻辑次序具体为：单独的个人通过努力实现了需要和满足在其自身的结合，然后通过从简单易货到买和卖所组成的复合交换，最后通过信贷、典契、汇票和钞票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交易过程，扩展到全部的个人身上。因此，从经济学来说，社会就是交换。交换的首要产物是价值（概念），它是两种被交换的服务之间的关系（比率），因为当两个人互相出让各自的现时的或以往的努力的成果时，他们都是互相提供服务。效用与价值不是等同的，前者是指大自然所创造的和无偿提供的、事物本身固有的用途，后者则是指人所创造的有偿服务。“任何人都无偿地享有大自然所提供或制造的一切效用，但条件是要付出辛劳去取得它们，或者用一种等价的服务去偿还那些代劳因而提供服务的人。”① 价值是在有偿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在需要和满足之间存在着各种障碍，人们通过努力去克服障碍的过程，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在上述论证过程中，巴师夏确立了两个原则：交换平等（服务交换服务）原则和无偿效用与有偿服务相区分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巴师夏论证了作为财富表征的资本、财产（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地产、地租、工资、储蓄和人口诸事物所带来的自然和谐，并推论出社会各阶级利益分配的和谐与经济和谐的总趋势。以资本为例，由于它是由自然要素和劳动工具组成的，所以，它的出现会使一定比例的无偿效用代替一部分有偿服务，人们付出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取产品。换句话说，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总产品会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资本的增长又必然导致利息降低，资本的比例份额同劳动的比例份额相比不断缩小；相应地，“资本家在产品总额中所得的绝对份额增加，而其相对份额则减少。与此相反，劳动者所得的份额却在两方面都增加”②。可见，资本家和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商务印书馆，2009：230-231.

② 同①218. 显然，巴师夏的这一提法借鉴了凯里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

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和谐的而非对立的关系。同样，“价值、利息、地租、人口诸法则以及任何其他伟大的自然法则，并不像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把失调引入了这个美好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这些法则产生了和谐”①。巴师夏由此总结到，作为经济和谐的表现的社会化与平等化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在生产中所取得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都日益增加；（2）私有财产直接和不断扩大共有财产，后者愈丰富，财产的不平等愈要消失；（3）自由原则使服务趋于获得与劳动成比例的、正常的价值。

既然等价服务原则导向的是平等化与经济和谐，那么，一切扰乱等价服务的因素或事物都会导致过分的不平等即贫富的极端对立。巴师夏分析说，一切扰乱因素都源于对获取个人利益的无休止渴望，它使得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和更大的满足来应付过分的需求（欲望）。此时，作为满足和需要的中介环节的努力也会偏离方向。也就是说，祸害的首要根源是人们因判断上的弱点或激情的力量而产生的错误。当这种错误出现在个体身上即只具有道德性质时，其祸害程度仅局限于个体，通过思考、试验和共同负责就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当它扩及全部社会成员即被系统化为社会性质时，其祸害程度非常之深，仅靠提高道德水平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不仅需要人的共同责任感的发挥，还依赖构成人的可完善性事物（智慧），才能使人从错误过渡到产生福利的真理。

综上所述，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是建立在一种人性论假设基础上的，用简单的“正—反—合”的哲学方法将各种经济范畴重新组合起来，以证明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即永恒性；再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将各种扰乱经济规律自由发挥的因素归因为人的需要的过分满足；最后，从道德领域中找到可完善性的智慧，以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这种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论断，在现实中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而言毫无裨益，因而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三）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与反历史性

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哲学历史观，马克思始终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现实中去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将经济范畴和经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97.

济规律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坚决批判将它们永恒化和超历史解释的各种做法，巴师夏的理论亦不例外。马克思首先对巴师夏做了追根溯源式的批判，直接指出后者是以凯里为依据的。马克思没有忽略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贡献，他部分肯定了他们对当时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的超越。这种超越性表现为他们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不是一味地模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罗列既有的经济学材料或扩充个别细节，而是从其各自所处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①。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而是从内自生的，且它的生产力的空前自由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或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凯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形成经济和谐论是十分自然的。只是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不足以证实凯里经济和谐论的全部合理性。相反，凯里实际上犯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家一样的错误，只是具体形式稍有不同：他将 19 世纪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关系。

用个别性代替普遍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凯里经济和谐论的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对凯里经济和谐论做了逻辑和历史（现实）的双重批判。从逻辑上说，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都属于“个别性”，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作为英国社会生产关系理论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本就与美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合。既然如此，那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②？凯里用美国的经济现实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理论，然后论证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孕育”它的英国社会生产关系不相符合，这是讲不通的。从其本质来看，不论是经济和谐的规律还是政府的政策行为，都是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凯里的错误在于，只是将经济和谐的规律看作资产阶级关系的产物，将政府的政策行为看作这种关系之外的、影响经济和谐的规律发挥作用的因素，肯定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他

---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② 同①7.

那里，只要“抽掉”赋税、国家垄断行为等的干涉，工资就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殊不知，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是相伴而生的，例如在美国，政府权力是同资本积聚一起增长的。

就历史（现实）而言，凯里用保护关税维护经济和谐的做法是天真的和不切实际的。撇开仅靠保护关税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不利竞争局面这一点不谈，单看凯里的理论本身就有矛盾，他一方面将政府行为视作破坏经济和谐的唯一的因素，另一方面却又把保护关税这一政府行为说成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破坏力量、维护经济和谐的有力“屏障”。凯里没有看到英国大工业生产的真实作用，反而以主观解释为依据，人为地勾勒这样一条路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阶级利益冲突论）→作为世界市场统治力量的英国国内经济的不和谐→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不和谐。“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这种统治的结果而成为破坏性势力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① 对于如何看待大工业生产和资本积聚的作用，凯里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执行着双重标准：如果大工业生产在某个国家内部瓦解了家长制生产，即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及其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和谐的；但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生产瓦解了另一个国家的家长制的生产形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即英国的资本积聚所形成的垄断及其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资本的瓦解作用，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② 马克思认为，凯里不仅不懂得他所谓的世界市场不和谐只是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而存在，而且还忘记了这种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正是凯里所说的和谐的情形，即对一国内部现实关系的抽象反映。

既然凯里经济和谐论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那么远不如它的巴师夏经济和谐论亦是如此。马克思指出，凯里经济和谐论尚有其合理的一

---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② 同①10.

面，而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和结构则一无是处：凯里所理解的和谐是对美国经济的现实关系的抽象，巴师夏的和谐则是“彼岸”的事物，它不是基于法国经济的现实关系，而是一种想象的形式；凯里基于他所总结出的英国大工业在世界市场中所带来的不和谐现象而提出保护关税的主张，巴师夏则从头到尾都在做关于和谐的循环论证；凯里是从政治经济学本身出发，认真研究了包括信贷、地租等在内的若干经济学的议题，巴师夏则只是用最简单的逻辑形式和伦理学（人性论）语言，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重新编排了一下次序而已；凯里掌握了大量作为对现实的部分反映的经济学材料并进行整合，巴师夏提供的则是虚构的历史，且充斥着理性形式和假想形式之间的矛盾；凯里因其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而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理性，巴师夏则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立面（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对立面而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样看来，马克思确实没必要再从巴师夏经济和谐论的方法与结构本身出发来做专门的批判了，尽管这种批判对于早已进行过类似批判（批判作为“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马克思来说，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更为重要的是，凯里和巴师夏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①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来加工他

---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事实上，凯里直到最后完成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时也没有克服这一致命缺陷。从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科学原理》（3卷本）的部分章节目录中可见一斑：“论价值。第一节 价值概念的起源。价值尺度。价值取决于再生产费用。第二节 价值概念同比较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每当联合和组合的力量变得更加完善时，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品的价格便下降。第三节 每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时，人的价值便提高。第四节 再生产费用的减少，必定引起为使用生活必需品和物品所作支付的份额减少。价值的定义。第五节 价值概念依附于哪些事物之上？这些事物为什么具有价值？它们的价格是多少？第六节 亚当·斯密同其他经济学家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的不一致。土地及其全部组成部分和产品的唯一源泉。分别表现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中与土地上的价值相关的现象。第七节 分配规律。它的普遍适用性。第八节 全部的价值都只是大自然给人们获得其渴望的东西的障碍的尺度。第九节 所有的事物都要趋向于对人的有用性。事物有可能成为这样，人必须有能力掌握这一趋势。效用是人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尺度。而价值则是自然战胜人的能力的尺度。”（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2015：15-16.）

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学材料，以从根本上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建构。

三、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工资固定论批判

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理论做一般性评论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详细评述《经济的和谐》的具体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摘录和评述某部经济学著作时，很少将其全部内容做一番评论，而是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择要而行。即便是被他批判得最为严厉和翔实的《贫困的哲学》一书，马克思也是选择了分工和机器、垄断和竞争、所有权这几个经济范畴来论述，没有遍及蒲鲁东所谈论的全部经济范畴。这是因为：只有竞争和垄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构成“正—反题”，分工和机器只能勉强算是，准确地说应该是分工和使用机器。其他诸如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等，根本无法从中找到一对“正—反题”，并且除了所有权之外，都是蒲鲁东虚构出来的理论，不值得做任何探讨。出于相似的理由，马克思在讨论巴师夏的著作时，也只是选取了“工资”（《经济的和谐》第14章）进行剖析，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展开相关评判。更为重要的是，巴师夏试图通过工资固定论来调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化解经济危机。这样一来，“工资”章自然而然地成了马克思摘录和批判的核心。① 马克思此时的哲学历史观仍偏重于阐释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他通过揭示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来批判巴师夏的工资固定论。

---

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编译者的如下判断是不准确的：“手稿笔记本第4页上半页至此中断。下半页空着。可以设想，继1—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可能是想谈这本书前13章的某些内容。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在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评论的已是第14章的基本论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8.）事实上，正是通过对《经济的和谐》第14章的摘录、研读和分析，马克思才最终得出了该书不值得探讨的结论。我们可以找到两段马克思本人的话作为佐证，一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这部分手稿的结尾处：“**（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18.）另一处就是笔者在前文注释中提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的和谐》一书所做的简短评述。

（一）工资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固定性的渴望

如前文所述，巴师夏是从人性论出发构建其经济和谐论的，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后者试图将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囊括到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在讨论工资这个范畴时，巴师夏仍然遵循“需要—满足”关系和交换平等原则，论述了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工资从根本上源于人们渴望固定性和规避风险的需要，后者是人的一种有利的、道德的、普遍的和不可被消灭的自然趋势。人们热衷于谋求公职，以获取一种可靠的地位而不是公职所授予的荣誉，就是人类珍视固定性的有力证明。当然，满足人们对固定性需要的首要产物是固定收入，而不是工资；工资只是固定收入的一种特殊性规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同利润和利息一样，工资的实质是人们遵循交换平等原则而制定的一种交易办法。正如巴师夏所说：“人类交易产生了众多的办法，需用大量的经济词汇加以表达，但是利润、利息、工资这些用来表达细微差别的词却并不改变事物的实质。产品换产品，或者不如说，服务换服务，在经济观点上，这始终是人类进化的基础。这条法则对于雇工们并不例外。”① 从其起源和性质来看，工资都是有利于固定性的。“固定性也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两种持久的现象有利于固定性：（1）人渴望固定性，（2）人每天都在获得实现固定性的办法。”② 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缺乏经验和野蛮的时代，捕鱼、狩猎和畜牧是其中主要的生产方式；这决定着偶然性，特别是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季节变化和灾害意外所导致的劳动成果的偶然性，极大地制约着人类对固定性的需要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采取了“结社”的方式来共同承担风险。

此时的社团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的、初级的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结社行为就发生了变化。在两方共同承担风险和长期共同劳动的情况下，存在着评估风险的可能。于是，一方就给予另一方以约定的报偿，让后者来承担全部风险。这种“协议”必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自由达成的，且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方因承担风险而获得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3.
② 同①387.

独立经营权，另一方则得到了固定性；一方依靠“过往的劳动”即资本来获得报酬，另一方则依靠“现实的劳动”即劳动来获得报酬。这种分享收益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两者的共存或联合。不论协议的条款发生怎样的变化，协议双方仍将联合努力、分享收益，因此，社团不是在解散而是在变更：资本一方将得到一切额外盈利作为承担一切风险的补偿，而劳动一方将从固定性中受益。这正是工资的起源，它是与过去的劳动报酬形式不同的。由于风险是不能自行消灭的，所以，一方以承包方式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如果由资本来承担（风险），劳动就以工资的名义领取固定的报酬。如果劳动愿意承担风险，资本就以利息的名义取得固定的报酬。”① 这种承担风险的承包方式，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雏形，后者产生于一种不能摧毁的自然趋势，是不同于过去的劳动形式的规定。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使固定收入分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两个部分；换言之，利润和工资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

（二）雇佣劳动制度对维护工资固定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阐述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过程，巴师夏将劳动者所处的状况划分为三种：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稳定性占统治地位和这两者的中间状态。他指出，雇佣劳动制度就是这个中间状态，尽管它无法确保全部的工人都被雇用，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固定性的需要，只是使工人的工资更为平均。若缺少了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者将长期处于偶然性的支配下，人类社会就会后退到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文明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使得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过渡到现代状态。②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对于地位的固定性和

---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8.

② 巴师夏在阐述这一观点时所运用的叙事手法是：“首先，以往的劳动与现时的劳动，在共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在共同经营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在这样一种形式下的范围当是很受限制的。如果社会未曾找到其他的组合方法，世界上就绝不会完成过重大业绩，人类就会停留在狩猎、捕鱼和农业这些雏形状态中。后来两个合伙人听从双重感情的驱使，即对稳定性的喜爱和追求，以及甘冒风险来领导事业的愿望，议订由一方承包共同风险的契约，但并不中断双方的联合。双方约定，由一方给予对方一个固定报酬，并由他承担全部风险和主持事业。当这种固定性适用于以往的劳动，即资本时，它就叫做利息；当它适用于现时的劳动时，就称为工资。”（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2.）这与他的论敌蒲鲁东在阐述“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时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后者将雇

稳定性的需要，是无法消除的和不可停止的。劳动者决不会满足于雇佣劳动制度这个中间状态，在通往稳定性的道路上停止努力，他们创造出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更为固定。正如巴师夏所说，为了满足在年老或患病而无法劳动即失业时期的需要，劳动者必须在有工可做的时候即就业时期进行储蓄。[①]然而，对劳动者个体而言，这种需要何时出现却是难以预知的。于是，互助会应运而生，毕竟由社团来为劳动者失业时期的需要提供帮助，要比将其交由个人命运来做更为有效。由此可见，互助会远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真正的“发明者”是需要，是人对于固定性的渴望，其目的在于“使满足得到普遍的取齐，把在好日子里领得的工资分摊在生活的各个时期上”[②]。

在互助会中，个体或单个行业的利益和困难成为共同的利益和困难。互助会成员处于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巴师夏据此指出，这种依存关系建立在责任的转移之上，互助会的困难正在于此。如果互助会成员对

佣劳动视为经济矛盾体系中机器时期的突出特点，并描述了分工、机器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假定某个人曾“注意”（remaqur）到分工能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而增加产品的总量。当他会抓住这个头脑中的线索进一步思考时，就会发现如果根据每个行业的自身需要选拔一批劳动者，并组成一个永久性集团即“工场”（atelier），就能够减少生产费用和提高产量，使生产持久下去。之后，这个人向劳动者提出了合作的建议，由他来保证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在工业的萌芽时期，这个后来成为工场主的人与其同伴们即后来的雇佣工人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工场主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地位，这种原始的平等很快就会消失。工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单独的劳动，它在使劳动者居于从属地位之后，最终将他们从手艺人的行列中排除出来，彻底沦为小工。[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2-194.] 这就是蒲鲁东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或“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的一个标本。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是极为准确的。笔者在后文还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①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明的进步而上升到雇佣制的劳动阶级，在实现稳定性的道路上并未就此停止努力。当然做了一天工之后，准有工资可得；但是，当种种情况、工业危机，或仅仅患病迫使工人失业时，工资也停发了，那时，难道工人和他的老婆、孩子们就得挨饿吗？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有工可做的日子里储蓄，以满足年老生病时的需要。”（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3.）马克思在批判巴师夏时，摘录了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并把它作为劳动者达到稳定性状况的重要环节。

② 同①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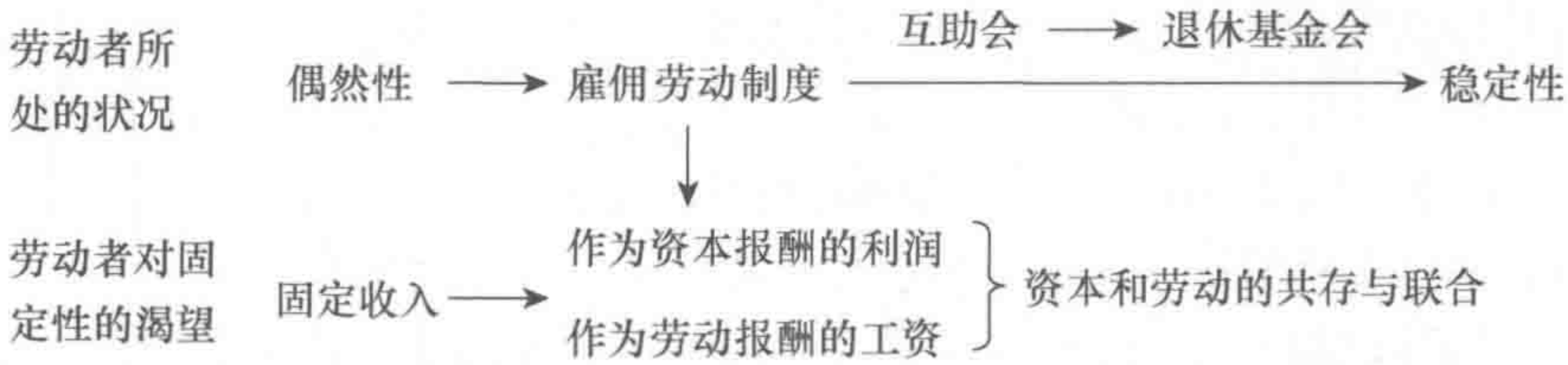
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就必然会影响互助会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当互助会的部分成员最终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集资援助那些不能劳动或找不到工作的人时，他们也将因对惰性的自然倾向而变为坐享其成者，勤劳者就会被懒惰者欺骗。为了保证互助基金不被用罄，互助会需要一种监督机制，这既能保障互助会全体成员的生存，又能让他们免于受骗。这种监督机制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才能得以实施并取得成果：互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是自由的、自主的但也是受限制的。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即监督机制的主体是谁。政府首先是要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只会假借集中的名义来占有一切款项。即便政府能够公正分配与合理使用互助基金，也需要包括审查员、检查员和监督员等在内各种庞杂的机构人员来维持运行。在需要和援助中间横亘着无数烦琐的手续。此时，互助会实际上就变成了警察部门。当政府增加一个新的职位、为自己擅自加上一个职权的同时，它就会增加一个新的、应对可怕后果的责任。这个可怕后果就是不断推迟对日益增加的弊端①的整顿，最终不得不诉诸那些思想败坏到已丧失正义感的政府首脑。若要使互助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就必须赋予其独立性，把它交由与之有关的人去管理。就像英国政府所做的那样：凡是个人利益足以自由地进行管理的地方，就无须运用政府行为加以干预，从而使英国的互助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独立性不仅能使互助会成员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且还使政府相对地不负责任，从而实现互助会的稳定性。

在互助会获得独立性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机构中，巴师夏将退休基金会放在了首位。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每个互助会成员都希望“老有所依”，这是他们普遍、一致、强烈、衷心且自然的渴望。为了表明这种渴望的强烈感，巴师夏“设身处地”替一个工人表达了他每天醒来都会有的、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他的想法：“我年轻而身强力壮……可是，当我年纪大了或者生病不能劳动时，我将变得怎样，他们又将怎样呢？我必须克制自己，要以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超人的谨慎从我的工资里积蓄一些钱，以应付不幸的日子……为什么没有一种社会机构，在我年

① 根据巴师夏的描述，这些弊端包括：工人们将认为互助会中的基金与自己无关、在失业或生病时领取的救济不是预留的互助会基金而是社会的债务，他们既不承认社会无法偿还上述债务，又对领取的款项永不满意。此时，政府将被迫不断向财政委员会要求拨款补助工人，而这一要求迟早会有遭到后者反对的时候，这样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轻时，甚至强迫我交出一些钱，以便拿来救济我的晚年？”① 退休基金会源自劳动者对固定性的渴望，这意味着它必须要靠劳动者自身的“牺牲”，从固定报酬即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而不应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否则，这一机构就因丧失独立性而不复存在。除了保持独立性之外，退休基金会的建立还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互助会的财产不断增加；二是道德状况的完善，互助会成员具备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自愿捐款筹措资金而非诉诸捐税等强制手段迫使局外的阶级资助，更不能将退休基金挪作他用。也就是说，退休基金会的建立取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它应该是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的产物。这种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进一步确保了互助会成员的收入固定性。

综上所述，巴师夏从探究工资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入手，勾勒出一个“历史结构”：劳动者出于对固定性的渴望，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这两个机构，不断完善雇佣劳动制度，实现从偶然性阶段向稳定性阶段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固定收入演变为作为资本报酬的利润和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这两种形式。具体如下图所示：



尽管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在稳定性方面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较为先进的组织形式，但它们给偶然性还留下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偶然性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人们头上：工人只知道用劳动赚取工资来获得稳定性，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工作到何时、自己的劳动力能维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获得了应得的报酬；而资本家则只知道靠资本获取利息，不知道所获得利息是高还是低。要言之，劳动与资本的现实对立仍然存在。巴师夏将这种对立限定在现实中，意在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命定的和谐。一方面，资本作为“以往的劳动”，其存在与否始终由作为“现时的劳动”的劳动掌握，它们在交换时所依据的是各自的价值即互相提供的服务或彼此的效用，而不是它们的强度或时间。另一方面，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09-410.

资本的存在远比它的不存在更有利于劳动，“不管它的奢望达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它在使奢望成功的努力中是如何幸运，它也绝不会把劳动置于比在孤立状态下更坏的状况中”①。这就是社会世界普遍法则的和谐性的体现。同样，作为劳动“领取”固定报酬的名义，工资及支配它的自然规律也会改变工人们的命运。工人趋向于上升到资本主义企业主之列，工资日趋提高，雇佣劳动制度向企业的过渡日趋容易。这就表明，巴师夏在强调工资是出于人们对固定性渴望的同时，也论述了它的非固定化即变动的作用。

（三）现存的雇佣劳动制度对工资固定论的否定

对于巴师夏的上述论证逻辑，马克思有着准确且全面的把握，从其摘录中就可见一斑。笔者在此择其要义简述如下：（1）一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固定收入源自所有人对固定性的渴望，工资因作为劳动报酬的固定形式而成为一种合理的社会产物（“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2）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劳动者处于偶然性之中，雇佣劳动制度是偶然性阶段和稳定性阶段的中间阶段，稳定性阶段的实现要通过互助会和退休基金会（“工人养老金”）。② 关于第（1）点，马克思评述到，巴师夏采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诡辩手法③，除了反复阐述工资的一般规定性即固定性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至于工资的特殊规定性即它特有的性质，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资的特性和作用，巴师夏丝毫没有提及。这种论述方式使巴师夏工资固定论注定只能起到说教的作用，诸如“对固定性的渴望”“自然和谐”“自然趋势”等，只适用于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于揭示工资所表征具体关系的经济学家而言毫无裨益。巴师夏只是一个说教者，而不是一位有着严格的学理性和强烈现实感的经济学家。先是用一般性代替特殊性，然后再用反问的语气陈述这个一般性是“好”东西，是人们出自对人性中的某个“好的”东西的追求。这种手法的现实危害性在于，它同样可以把某个“不好的”制度（如奴隶制）说成是“好的”。

---

①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29.

②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3.

③ “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这种律师和辩护士的惯用手法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同②13.）

用“收入固定性”代替“工资”，并不意味着巴师夏认为不固定性，即超过一个固定点向前发展是坏的东西。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点，指出巴师夏确实也提到了雇佣劳动制度的非固定化对于工人增加工资而转变为资本家所起到的作用。用固定性和不固定性都能说明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东西，一方面，表明工资固定论的自相矛盾性（这一点比较符合马克思“原本批判”的一般手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个理论构筑在空洞的抽象而不是现实基础之上。巴师夏完全忽略了工资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空谈和诡辩，他首先将这种现实的关系归结为片面的规定，之后又解释这种规定的肯定性而非否定性，以此来证明它是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对第（1）点做了带有一般引论性质的批判后，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是对第（2）点，即工资固定论的实际结构进行分析和批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工资固定论的谬误首先表现为非历史性，它没有对人类社会从半野蛮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做任何解释。巴师夏将工人和资本家当作预先存在的前提，至于他们在稳定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议定的阶段”① 中，是何时出现的和怎样出现的、是如何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都没有做任何说明。同样，他也没有阐释在偶然性阶段，也就是联合体最初形式中的渔夫、猎人和牧人，是如何成为雇佣工人的。

其次是工资固定论的反历史性。雇佣劳动制度在现实的历史过渡中表现为不固定性，它是对工资固定性的否定。从社会所有制形式来看，雇佣劳动制度产生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公有制（主要是指东方社会和斯拉夫各民族社会）的解体。若进一步拓展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从囊括全部时代和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上来看，雇佣劳动制度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形式、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这些消亡的制度形式和生产方式（现实的历史过渡中的诸关系）中，作为它们的物质载体的内容、场所和规模等都是固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则表现为这些关系的解体和消灭。**“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

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① 同样，巴师夏将英国的互助会视为雇佣劳动制度“最新成果”的做法，也是杜撰出来的、毫无历史依据的。

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特点是不固定性，巴师夏的“历史结构”则正好相反。马克思据此做进一步追问：（1）在这一“历史结构”中，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固定性和工资的固定性是如何共存的？也就是说，如何从这种非固定化得出一个固定的结构呢？（2）既然雇佣劳动制度作为偶然性和稳定性的中间阶段，它是比联合体最初形式更好的形式，那么，如何对此做历史性说明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现存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巴师夏在具体阐释上述关系时承袭并改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工资看作雇佣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和与作为资本产物的利润相对立的事物，也就是说，雇佣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他们强调工资的固定性和利润的不固定性（即资本风险），其意图在于使工人懂得无权分享利润并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固定性只是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工资的固定性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辩护性论断。而巴师夏却认为，工资是与过去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相对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其对立面不是利润，而是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固定性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工资和利润又都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因此，固定性也是产生利润及其所表征的全部现存关系的历史基础。这样看来，原本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居然变成了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也是不固定的。事实上，在供求规律的决定作用下，在经济危机、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和调配劳动的分工的影响下，工资是处于变动的即提高或降低的状态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这点。马克思认为，所谓工资的固定性，亦即工资最低额，是指工资在某种平均状况下所实现的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它主要是确保在利润下降甚至消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支付工资以维持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的某种平均连续性。工资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

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只能靠工资生存，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了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这就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换句话说，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和工人工资的固定性，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不是巴师夏所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巴师夏没有正确揭示出工资固定性所表征的现存关系，只是在错误地陈述着上述“同义反复”。此外，他在阐述高度文明即资本发达社会状态下互助会成员收入更加固定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资本发达和收入更加固定也是一种“同义反复”，其所表征的现实是资本和雇佣劳动本身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生产本身的发展。“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①。由此可见，非历史性和反历史性、“同义反复”，决定着工资固定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就不值得马克思再做任何评论了。

四、透视经济危机的方式：劳动货币论批判

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事实，使得任何掩盖其实质的理论都失去了价值。关于这场具体表现在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危机的论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有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中。马克思此时自然会将视角转向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危机的流行做法。② 在具体的理论切入点

---

① 马克思. 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

② 在英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没有增发货币来刺激消费而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及依照它所作制定的 1844 年银行法成为英国经济学界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一学说主张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其数量越多，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商品的价格就越高。在法国，蒲鲁东将经济危机归结为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他们主张使用劳动货币来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尽管在《论银行改革》中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其他因素，但用劳动货币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是与蒲鲁东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笔记本 I 中批判达里蒙时没有提及“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一重要命题，而是在笔记本 IV 中做了相关分析。（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命题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0.）此外，马克思运用“追根溯源”方式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主要体现在批判劳动货币的非现实性上；而且，他在批判达里蒙时也顺带提到了英国人的做法。

上，马克思选取了当时较为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观点：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统治地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特权使银行将贵金属视为全部，并将其主要职能转向防止贵金属流向国外，而非满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然而，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正是实际流通的需要，贵金属的缺失、流通需要的不足，影响了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的正常秩序，进而产生经济危机。用劳动货币（劳动券和小时券等支付给工人用以证明其劳动时间的票据）打破贵金属的统治地位，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就能消除经济危机。上述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谬误，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的现实出发，批判了达里蒙通过流通领域的变更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揭示出劳动货币论的实质和非现实性。

（一）劳动货币对消除经济危机的作用

首先来看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的整体结构[①]，以便于我们能够从中归纳出主旨观点。在这本 200 多页的小册子中，达里蒙以论述法兰西银行为制止贵金属储备不断减少的措施为起点，再通过剖析银行的运作模式、回溯银行流通简史和论证流通领域中的需求与趋势，指出法兰西银行的措施只是权宜之计。在此基础上，达里蒙从改革银行所承担的六种主要职能即清算、价格监管、直接信用、交换、货币发行及管理和保险出发，批判德·吉拉尔丹（M. de Girardin）关于“合理的银行”（la banque rationnelle）的论断，指明只有“人民银行”（la banque du peuple）所使用的劳动货币才能实现“好的交换”（bon d'échange）。由此可见，达里蒙银行改革论的要义就在于，推行劳动货币以消除经济危机并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

达里蒙认为，不论是现时段的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的商品危机，这一切的灾难，“都源于人们执着地维持着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②]。也就是说，银行根本不考虑实际中的流通需要即公众对银

---

① 《论银行改革》一书共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除导言外，共计十四章，分别是：“第一章 法兰西银行的措施；第二章 银行运作；第三章 银行流通简史；第四章 需要与趋势；第五章 权宜之计；第六章 银行清算；第七章 银行价格监管；第八章 银行直接信用；第九章 银行交换；第十章 货币代理行；第十一章 银行保险（担保）；第十二章 合理的银行；第十三章 人民银行；第十四章 结论。”（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1856：212.）

② 同①1-2.

行服务的需要，只是在一味地维持金银等贵金属作为真正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达里蒙列举了1855年4—9月中的6个时间点上法兰西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和贴现的证券（简称为银行券）总存额的对比变化，具体如下表1-1所示：

表1-1

	贵金属储备（法郎）	证券总存额（法郎）
4月12日	432 614 797.88	322 904 313.65
5月10日	420 914 028.00	310 744 925.88
6月14日	407 769 813.28	310 369 439.30
7月12日	314 629 614.13	381 699 256.68
8月9日	338 784 444.29	458 689 605.07
9月13日	288 645 333.87	431 390 562.64

银行券总存额的增长表明流通的需要，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的增长。达里蒙指出，面对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量（14 400万法郎）大于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量（10 100万法郎）的状况，法兰西银行却随即采取保护措施，在10月4日和18日连续提高贴现率（从4%到5%再到6%）和缩短贴现期限（从90天到75天），通过上述增加流通领域中取得贵金属的难度的方式来减缓其外流速度。“我们从这些数字得出的首要教训是：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优势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缺乏为公众服务的行为。”① 当流通中所需的作为交换媒介的贵金属无法得到满足时，经济危机自然就产生了。至于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和证券总存额增加的原因，达里蒙将它们分别归结为谷物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和1855年法国工业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众多巨大的交易活动。

在达里蒙看来，法兰西银行所采取的上述保护措施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引起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一场大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因其对贵金属的垄断而造成信贷调节失衡，并最终导致商业停滞；后者则辩解防止贵金属外流是其首要职责，因为一旦失去了贵金属储备就什么都做不成。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贵金属是否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

① 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 1856: 3.

品。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教授等公众代言人认为，金银就是商品，银行的贵金属储备的必要性不在于维护贵金属在交换和流通中的优势地位，而在于在紧急时期用来到国外购买急需的物品。而银行则宣称，贵金属不是商品，而是交换工具，它因此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从理论上说，解决这场争论并消除经济危机所带来各种不悦的关键在于，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并赋予其以商品和交换工具的双重属性。正如达里蒙所说："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① 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推行银行改革，建立人民银行和发行劳动货币，废除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一方面，劳动券或小时券在每一个产品上都标明了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使全部的产品都具有了直接交换的属性，从而排除了产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解决了产品的"自我实现"问题。另一方面，用劳动券直接反映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可以消除金银的特权地位和缺乏现象，从根本上消解经济危机的根源。

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明显是继承了蒲鲁东的理论，后者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论述过贵金属具有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的原因②，

---

① 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1856：7.

②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及拥有这一特权的原因在于它是价值已经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其过程是：金银在宗法时期就已经比其他商品显现出优势，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君主逐渐占有贵金属并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章后，贵金属便成为货币这种最优越的（par excellence）商品；交易中的任何动荡都无法改变这种商品所保持的、在各种支付中被人们所接收的一定的比值。总而言之，"金银除了它所具有的金属特殊性能外，还因为它本身开采困难，特别是由于国家所作的干预，所以很早以来便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确实性的商品"。从这点来说，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价值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值执行支付手段的功能。这种价值尽管有可能会不断改变，但是绝不会像别的价值那样发生贬损。［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6-110.］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达里蒙时曾评论："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主张废除货币和使用劳动券①。到了19世纪50年代，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无息信贷理论和银行改革的观念。他指出，作为君主理性安排和国家的某些执政者特殊意志的产物，货币的出现正是产生剥削的根源，它使得产品的直接交换变为间接交换，并产生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他们为了追求货币而肆意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得劳动者无法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某种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产品。产品的贷放更是一件坏事，它将导致人们在不失去产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反复出售同一产品。由于对整个社会而言，产品总是确定的价值，换言之，产品和资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资本的放贷（取息）也是一件坏事，它总是在积累利息的过程中不断回到其出发点，总能带来利润。要消灭剥削，改善劳动者贫困的状况，就必须消灭货币。最彻底且有效的办法是为产品做“标记”，按照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进行交换。为了做到这一点，蒲鲁东在成立人民银行时就设想按劳动货币进行交换，取消现存的货币形式和实行无息信贷。具体说来，由人民银行来收购小工厂和小作坊的全部产品、发放劳动券，劳动者凭借这种标明劳动数量的证券按需进行产品的直接交换。而实行无息信贷的好处就在于能使劳动者一下子免除总计约60亿法郎的额外支出，从而为和平合法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基于对蒲鲁东和达里蒙之间思想传承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便不可避免地回到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②

---

① 蒲鲁东在1848年所写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信贷组织》和《社会问题概观》等著作中指出，王权、所有权和货币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三位一体，是社会变革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从经济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成立交换银行（人民银行）来实施无息信贷，并把用以交换的产品全部折算成劳动券，人们凭借劳动券各自获得所需的、与自己的产品完全等值的产品，从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交换，消除通过货币进行间接交换所带来的贫困、剥削、奢侈等一系列恶果。

② 同样，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蒲鲁东的劳动货币理论时，也明显带有这种“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痕迹。众所周知，劳动货币理论和制度的最早创立者是欧文、约翰·布雷和约翰·格雷。欧文认为，劳动是自然的价值尺度，货币是人为的价值尺度，正是后者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并用商业原则来替代它，进而使剥削成为可能。因此，要改革已有的货币制度，建立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直接用劳动时间衡量产品的价值。约翰·布雷指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和交换的性质要求交换双方的利益必须相等，这种平等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在平等和公平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生产它们所消

（二）“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

对于达里蒙“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①]，马克思有着极为准确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达里蒙在试图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时，错误地将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②]，混淆了它们各自的需要。银行贴现证券的数量及其波动，反映的只是信贷的需要，而非货币流通的需要；后者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因素，即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常识。平均而言，银行贴现证券数量的波动与货币实际流通中的波动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相反的。证券总存额的增减能够完全表征信贷需要的变化，但货币流通需要的变化不完全是由贵金属储备的增减所反映出来的。依循达里蒙的论述思路，仅就证券总存额和贵金属储备来说，只需对达里蒙的统计论证简单地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性：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减幅却大为不同；双方都增加，但增加的额度大小不一。[③] 减幅和增幅的不同表明这两者既不是反比例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不是因果关系。统计论证无法给出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反而留下了一大堆谜题。

再进一步来说，只列举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

耗的费用总和来确定，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约翰·格雷主张各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由中央银行通过其支行来确定，生产者从银行中领换取其产品的正式价值凭证，即换取表明其产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据。上述三者的理论共同构成了蒲鲁东劳动货币理论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正是从批判他们出发来批判蒲鲁东的。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② 马克思在这一结论后面还加上这一段话：“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同①70.）这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的又一个直接证据。

③ 马克思在此饶有兴致地详细对比了 4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5 月 10 日至 6 月 14 日、6 月 14 日至 7 月 12 日、7 月 12 日至 8 月 9 日、8 月 9 日至 9 月 13 日这几个时间段的银行贵金属储备和证券总存额各自的变动情况。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64.

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①。如果要真实地呈现货币流通的需要和信贷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达里蒙就要在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之外，再加上证券流通总额栏和存款总额栏，谜一样的事实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具体而言：（1）贵金属储备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的情况，这是由贵金属储备同时再增加、部分银行券仍在流通而未被换成贵金属、银行券以存款或汇款的形式再次进入流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2）证券总存额减幅小于贵金属储备减幅或这两者的减幅都较小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人们取出存款或用证券兑换贵金属。通过上述合理的解释，也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诸如：银行不一定非要通过增加银行券的流通数量来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这种流通的增减并不与贵金属储备的增减相一致；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也就是说，达里蒙为解释经济危机根源而构建的银行金属基础（以贵金属储备为代表）与流通的需要（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之间的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并未找到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统计例证所得出的某种永恒性规律永远无法解释或取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②在永恒与历史、抽象观念与经济事实之间，马克思选择的当然是后者。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达里蒙的立论要点在于：银行为了维持贵金属的统治地位而导致它在外流严重时与流通需要发生矛盾，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只要劳动券取消贵金属的优势和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就能化解经济危机。他从三个层次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摘录和批判。

第一，贵金属的统治地位无须银行的刻意维持，包括谷物商人和银行等在内的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要受到供求关系这一普遍经济规律的支配。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谷物商人的出发点是利用谷物的供需失调来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满足公众的急需。为此，他们用自己的汇票兑现银行券，用银行券兑换黄金，用黄金换取外国的谷物，用谷物换取货币。银行在此过程中受到供求关系的支配，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以备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② 同①65.

在急需谷物时从外国换取；而外国接受贵金属以换出其商品就意味着，贵金属已经且必须维持其统治地位，与银行本身无关。

第二，贵金属外流与经济危机决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制止贵金属外流的行为会加剧经济危机。导致法国贵金属外流的不仅有谷物歉收和工业博览会期间的交易活动，还包括蚕茧歉收、投机活动和战争等诸多复杂性因素。在考虑货币的情况下（即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是取得贵金属的凭证，也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劳动力的凭证），一方面谷物和蚕茧歉收以及可供交换的财富被固定到贵金属上，使得可被用以直接交换的国家财富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提高银行券贴现的条件使得其数量无限制地增加，这些势必导致纸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生产突然瘫痪。而在完全不考虑货币甚至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法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谷物歉收所导致的其价格上涨意味着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因为购买其他产品的数额会随着购买谷物数额的增加而减少。产品价格的下跌就意味着它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的比值下降，从而造成生产部门的生产率降低；与此同时，产品的平均价格又是一切契约、债务等的基础，换言之，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上述两种因素共同导致经济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还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更为重要的是，谷物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贵金属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相对地贬值，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任何特权或统治地位都无法使贵金属免于贬值。“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①

第三，经济危机的原因决不是银行券可兑换贵金属，更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1809—1811 年英国经济危机时发行的正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就能够充分证明上述论断。在调和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争论时，达里蒙肤浅地认为通过发行劳动券的方式以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和银行券的可兑换性，就能够消除经济危机。这种论调的重要前提是银行可以凭借其对贵金属储备的垄断而绝对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贷，但实际上银行调节信贷的权力是有条件的且受限制的，它只有当私人“贴现业者”完成贴现即终止调节信贷权力时才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废除贵金属特权等同于将一切商品都提高到贵金属才享有的统治地位，用劳动券取代银行券和废除货币的办法却是将全部商品都变成货币并赋予其以货币的特性，这种做法已经表明了其荒谬性，它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决定着它不可能被解决。任何特殊的交换工具或一般等价物所造成的不便必然会重复出现，由此就产生一个实际的问题：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般等价物？“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①

（三）劳动货币论的错误前提与非现实性

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及构筑于此之上的社会关系，是改变流通关系的前提；仅改变流通工具或流通组织，不能改变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达里蒙错误地将上述关系颠倒了过来，认为建立人民银行并发行劳动货币，不仅能够废除贵金属基础，而且会创造出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② 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表明，达里蒙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因而无法掌握经济危机根源于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而非流通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决定性意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式中，财产的积聚与流通的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因流通的缺乏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通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流通组织（现代信用设施）和流通工具（信用货币）与资本积聚互为因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改变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形式，如用劳动货币取代信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② 同①69.

用货币，就能够消除因（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固有矛盾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在包括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等在内的货币的不同文明形式中，后一种可能消除前一种无法克服的缺点以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但是，只要它们作为货币形式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而存在，其固有矛盾就无法被消除。正如雇佣劳动具体形式的改变不能消除其本身缺点一样，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的固有矛盾，而只能以不同的形式承载或反映着这些矛盾。

除了基本前提的谬误外，劳动货币论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非现实性。马克思此时不再单独讨论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而是蒲鲁东所代表的整个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论。在他看来，**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首先表现为没有认识到可兑换性与不可兑换性、相对贬值与相对升值的辩证关系。**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是否一致，取决于它们的实际可兑换性即可交换性；它们实际的互相平行运动和互相交换，就是兑换。可兑换使金银等贵金属成为以它们命名的任何货币形式（纸币和信用货币）的实际价值尺度，不论这种货币在法律上是否可兑现。不可兑现的货币形式也具有可兑换性。就英国在经济危机时发行的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说，可兑换性表现在用金属货币命名的信用货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此时，金属货币是由自己来命名的，其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它们不是以某个第三种商品来估价的，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可除部分。“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可靠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① 受金属货币名义上不可贬值的迷惑，人们（包括达里蒙等蒲鲁东主义者在内）普遍只会片面地看到金属货币在危机中的相对升值，而没有看到金属货币在价格暂时普遍上涨时已经相对贬值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推理：可兑换性要求货币成为一个价值符号，即让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大前提）；等同意味着它已经包含着作为其对立面的可能的不等同（小前提）；可兑换性“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其对立面的不可兑现性，升值“潜在地包含着”贬值（结论）。金属货币的相对贬值总是大于相对升值，要预防货币的周期性重复贬值，也就是达里蒙所说的废除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贵金属对货币的特权，就要取消价格的涨落。取消价格的涨落就是消灭价格即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而这又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由此可见，“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不能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

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其次表现为劳动货币的不可兑现性，后者是由劳动货币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相容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现在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它已经包含的劳动时间，即过去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固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会使得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或增加。使用劳动货币，不论是金劳动货币还是纸劳动货币①，必然使商品交换更加混乱。在金劳动货币中，一定量的金所包含的是过去的劳动时间，而劳动货币代表的则是现在的活劳动时间。假定一磅金是 20 小时劳动的产品，有可能后来生产它只需 10 个小时。过去的一磅金同现在的一磅金相交换，等于过去的 20 劳动小时同现在的 10 劳动小时相交换，这显然是矛盾的。只有在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始终不变的情况下，金劳动货币才能够保持可兑现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由于生产费用的不断降低和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不断减少，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地不断贬值。同样，随着劳动小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并积累下来，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也会不断地积累。其后果是：“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增长。”② 这样看来，推行纸劳动货币并没有实现蒲鲁东主义者设想的使工人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得到快乐，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工人创造他人财富和不断自我贬值的状况。

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最后表现为没有正确理解交换价值（实际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价格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但这不是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而是它们名义上的差别，即实和名的差别。导致它们的实际差别的原因在于决定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因素的不

---

① 劳动货币，简单说来就是给商品简单地加上劳动时间的符号，这种符号如果用金来代表就是金劳动货币，用纸来代表就是纸劳动货币。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同：前者取决于劳动时间，后者则取决于供求关系。具体而言，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实际价值，只是它的平均价值，而商品的市场价值（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其平均价值；市场价值的不断波动也就是与自身的不相等，而不是与作为第三种物的实际价值相等，决定着它最终平均化为市场价值。① 同样，由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的变化，实际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即自我否定，从而使商品的实际价值同其自身规定性产生矛盾，出现贬值或升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意味着作为价值决定要素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同时成为表现价格的要素，否则就会产生矛盾和混乱，即劳动时间同时是决定者和被决定者，同时和自身相等又不相等。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只能观念地存在着。此时，需要有另一个作为尺度的第三种商品（往往是货币）而不是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而这个尺度就成为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名义差别的表现。换言之，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决定着它们的名义差别，而不是相反。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上述关系，误认为只要取消了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名义差别就能消除它们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进而消除资产阶级的一切危机和弊病。毋庸赘言，劳动货币论不仅因其非现实性而无助于消除交换价值与价格的矛盾，还会带来更大的矛盾与混乱。② 在劳动货币论批判已经过渡到对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以及它们的本质的分析上时，马克思接下来自然要讨论货币的本质和产生问题了。③

---

①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② “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会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同① 87-88.）

③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虽然放弃从批判劳动货币论到分析价值、货币和价格的做法，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劳动货币论的批判。比如，在谈到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及其关系的发展，从而导致货币制度及其之下产品交换的矛盾时，马克思再次批判了用劳动货币解决上述矛盾的错误做法。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内容详加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五、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思路及旧有模式的终结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入手，批判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与劳动货币论，再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然而，这种做法的前期成果与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并无二意，无法直接体现出他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新思路和新计划。况且，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时髦”做法。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首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时髦的做法则是在开头用一个总论部分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比如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这样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应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正因如此，马克思之后不仅完全放弃了批判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的做法[①]，而且在继续写作笔记本Ⅰ分析价值、货币和价格的过程中，暂时中断了这一工作，转而进行“导言”的创作，从而标志着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开始终结。

其实，马克思转变和写作的实际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他在其中不断夹杂着自己新的思考，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杂糅着他各种思考内容的堆砌。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言：“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

①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后来写作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可以提供直接证明。其中，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中，写有“(I) 价值”的内容直接是从笔记本Ⅰ第XII页开始索引，没有提及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论，只是在“(II) 价值”提到了与“货币作为尺度”直接相关的内容；而笔记本III第I–VII页的批判巴师夏和凯里的部分则没有被提及。到了《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马克思直接将“巴师夏和凯里（1—4）”和“巴师夏论工资（5—7）”直接置于笔记本III提要的末尾。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只是放弃了以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批判为起点，再进入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本质探讨的做法；而他之后在探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与劳动关系等时，还是涉及批判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主义者的内容。要言之，马克思放弃的是论证方式，而不是批判内容。

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① 为了透视资本主义迅变的经济结构和运行过程中最本质的部分，从而在总体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对其写作计划数易其稿。

首先来看“导言”和笔记本 II 中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的“五篇结构”。

第一篇考察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包括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在内的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抽象规定，即生产一般。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作为社会生产结果的商品只是以载体形式来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也就是说它并非被设定在这些规定上。申言之，交换本身最初也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只是表现为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剩余物的交换。这些剩余物在发达的社会中同样会处于直接的现成的商品世界中。从现实的历史发展来看，虽然生产一般及其包含的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或多或少地通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也就是作为一种片面的关系而存在，但是，它们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逐步由资本的支配而发展起来，并作为现实的抽象而逐渐明显化。理论依附于现实，理论发展史同样依附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观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此时必然要对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做出阐释。简言之，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范畴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忽视了这些范畴的历史性，而是将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而非其他社会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永恒化，并应用到一切社会形式中。“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 因而，从总体上把握资产阶级社会和批判政治经济学，要从重新考察这些范畴开始。③

---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9.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③ 正如马克思之后所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第二篇讨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它们涵盖了资产阶级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私有财产上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虽然被交换的剩余物处于直接的现成的商品世界中，但商品世界能够超越自身而显现出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此时，应当讨论凝结在商品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它们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换句话说，考察生产一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新变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范畴便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在考察这些范畴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同时，还要探讨竖立其上的新的城乡结构和三大社会“生产”阶级、这些范畴在上述载体上进行的交换和流通、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私人的）信用事业等。

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因而在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后，就要考察它的法律结构和政治结构，即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一方面，要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形成的国家新形式；另一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国家对内行为（赋税及由其导致产生的“非生产”阶级、国债、人口）和对外行为（殖民、向国外移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扩张和人口向世界范围内迁移，生产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都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以上对生产的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考察，分别构成了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三篇和第四篇。

最后一篇是考察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使资产阶级社会超出了国家的界限，从而导致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它不仅使商品交换扩大到最大范围，使人们的交往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且形成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普遍地展开了，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且表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

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①

在写作“导言”、制订“五篇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因而它必须要放在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之前讨论。马克思发现，资本不仅能够占有他人劳动而增殖，支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如土地所有权），而且还能够无限自我增殖，逐步发展为资本之间的竞争、积累和信用，形成股份资本等。这样看来，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不如研究资本更为直接，况且讨论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生产一般的具体范畴的内容，完全可以归入资本发生史之中。于是，“五篇结构”逐步演化为“六册计划”，即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初稿”最早出现在笔记本 II 中③。

对比“五篇结构”和“六册计划雏形”，可以发现马克思探讨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大的变化，他只是丰富了资本向多种资本发展过程的内容。不久，在充分借鉴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后，马克思按照“一般性”（Allgemeinheit）、“特殊性”（Besonderheit）和“个别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1.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2.

③ 一、资本。I.（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II.（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诸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诸资本的竞争**。（γ）**诸资本的积聚**。III. 资本作为信用。IV. 资本作为股份资本。V. 资本作为货币市场。VI. 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

二、土地所有权。

三、雇佣劳动。以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为前提，价格运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而存在。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的“生产”阶级而存在。

四、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

五、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

六、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

同①220-221.

马克思在这里并未将对外贸易单独作为一章来阐述。

性”（Einzelnheit）的顺序，将“六册计划初稿”中关于资本的六个部分（“资本六篇结构”）调整为三个部分（“资本三篇结构”）。①

从内容来看，“资本三篇结构”不仅比“资本六篇结构”逻辑性更强，而且变更了之前定位不准确的地方，诸如：产品、原料和工具被划入资本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中；利润、利息从资本特殊性中剔除，归入资本的一般性；资本作为货币被准确表述为资本的一般性中的“资本的个别性”；等等。虽然马克思对写作结构有了更为逻辑化和清晰化的认识，但他实际上需要探索的内容并没有减少。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只是完成了资本一般性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一般性自身又蕴含着一般性、特殊化和个别性。为了避免概念上使用的混乱，马克思在写作完七个笔记本后开始用“资本一般”代替资本一般性，并在笔记本 M 中写下了新的提纲（第一稿），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一般展开论述。②

至此，马克思暂时停止了写作计划的思考，开始按照上述提纲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这些初稿和笔记本 M、笔记本 I–VII 共同构成了“1857—1858 年手稿”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 1859 年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模式及其成果公开问世，也正式宣告其“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全部终结。

---

① 资本 I. 一般性：（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的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II. 特殊性：（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III. 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234.]

② （I）价值（II）货币一般论述。从价值到货币的过渡：（1）货币作为尺度（2）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简单流通（3）货币作为货币（4）作为货币承担者的贵金属（5）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III）资本一般：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1）资本的生产过程（a）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b）绝对剩余价值（c）相对剩余价值（d）原始积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前提）（e）占有规律的转变（2）资本流通过程。[马克思.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第一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9-304. 第二稿只是对第一稿中关于货币的内容的完善。]

第二章　“原本批判”的新思路及哲学方法

在放弃了从经济危机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后，马克思立即拟定了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思路和哲学方法。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建构首先应当对当时的整个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做总体的观照和把握，找出它们的一般体系及其哲学方法和哲学传统；然后再重新考察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直接对象的物质生产，探讨生产一般同其他表面领域的现实关系，并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或基点；最后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和分篇构想。

从“导言”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既直接批判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否定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及其同其他表面领域的内在联系的错误理解，又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既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找到的作为一般抽象规定的若干经济学范畴，如价值、货币和资本，又否定他们关于经济学范畴的错误理解。由此可见，对“导言”内容的解读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其中的思想细节，从而形成对马克思此时思想意图的准确把握。

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

不论是巴师夏和凯里，还是约翰·穆勒等，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

理论前提和批判对象，来展开各自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既批判其自认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合理之处，也继承这一学科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合理性解释。比如，巴师夏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点的改造，从“需要—满足”的关系出发阐释经济规律的自然和谐；凯里曾猛烈抨击将李嘉图理论庸俗化的纳索·西尼耳（Nassau Senior）的“节欲论”，以维护前者的“正统”；约翰·穆勒也自评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做的进一步完善①。更为重要的是，约翰·穆勒始终没有脱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传统，并且将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然而，一些传统的论断却只是抽离出马克思本人的部分论述，在缺乏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全面且系统了解的情况下一味地否定它，甚至将它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对立起来，完全无视这两者之间的思想延续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讨论“导言”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系统梳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这既是一种思想史方面的澄清，也是同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过程相符合的。

（一）以劳动和需要为起点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

按照传统观点中关于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解释，它是由诸多理论构成的，比如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这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用分支理论“肢解”了作为整体的斯密政治经济学，忽视了斯密的研究主题和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支理论并不是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他在第一篇讨论的一国财富

① “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最大特点，使它和某些其他著作最不相同的特点，乃是它始终把原理和应用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著作虽然和它是不相上下或甚至还略胜一筹，但只不过是这一主题一般原理的说明……本书作者认为，一本在目的和概念上类似于亚当·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贡献。《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而社会哲学（实际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同亚当·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 赵荣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8.）

的形成、增长和分配过程，以及第二篇探讨的资本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作用中的部分内容。总体而言，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从劳动和需要出发探讨以财富增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① 在他看来，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前提和基础地位；换句话说，财富是劳动的创造物，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斯密的具体论述以作为劳动生产力增长之原因的分工为起点。

从分工开始，斯密详尽梳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的某种需要即交换的倾向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的扩大使货币成为通用媒介→货币导致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导致商品价格组成要素的变化→劳动生产物被分配为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在上述过程中，斯密着重阐释了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法则、自然价格本身随其组成部分自然率的变动的原因。由此可见，斯密的论述符合他在第一篇的论证主题——“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而所谓的分工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等等，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论证依据。

斯密进一步指出，随着分工的彻底实行，资财积蓄的绝对必要性愈发凸显，并且它要早于分工。换言之，资财积蓄是物质生产的前提，这就是它的性质所在。一方面，资财积蓄的丰裕程度决定着分工的细密程度，后者又直接影响着同等数量工人所能加工材料的数量和新机器发明的实际运用；另一方面，行业分工愈细密，其所需工人数量愈多，必须预储的材料和工具愈多。社会各行业皆是如此，资财积蓄与分工的上述关系扩展到一个国家时也是如此。“在每一个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② 这就是资财积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个人的资财和整个社会的总资财（全部个人

---

① “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

② 同①254.

资财的总和）可被分为留供消费的部分和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而资本又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斯密特别指出，在资财的各种门类中，货币的作用又是极为特殊的，它作为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却对社会收入起着与固定资本相似的影响：一是制造和维持货币所耗费的材料与劳动，不能用于消费和增加人们的生活资料；二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而非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同样，从资本的用途来说，也应该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分别考察。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个人，或是将资本留为自己使用不断积累下来，或是将其贷给他人使用取得利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为目的的资本，在等量条件下会随着用途的不同而推动不同的生产性劳动量。大体而言，整个社会的资本有四种用途：农业家、矿业家和渔业家用来获取社会所必须消费和使用的原生产物；制造业者用来加工原生产物以适应社会眼前的消费和使用；批发商用来将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处运到缺乏处；零售商用来分散少量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以满足需要者的临时需要。“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①

在斯密看来，资本的上述用途是有着先后顺序的，它们从社会大的分工来说分别对应着农业、工业和贸易。这就是说，按照资本发展的自然趋势，应当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然而，这个顺序在当时欧洲各国却极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国外贸易引起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这两者又共同推动农业大改良。这导致一些欧洲国家采取的政策，或是鼓励农村的产业，即农业；或是鼓励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可能最初起因于维护特殊阶级的利益；虽然它们在被制定时不曾考虑这些政策对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影响，但实际上引起了两个极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前者将农业视作“唯一”的生产部门，否认其他部门的生产；后者则把金属货币看作财富，从而将贸易顺差视为国家致富的源泉。只有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资本积累，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致富。由此可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31.

见，斯密是以理论史批判的方式来进一步论证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性的。

通过对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和对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斯密还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任何违反资本发展自然趋势的政策和理论，只能阻碍社会的发展。① 他由此推论到，应取消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包括君主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在内，听由经济的完全自由发展。这样一来，国家或君主的义务就只剩下保护国家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上述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由一定的收入来保障。斯密由此提出，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即赋税，以及其中应有由全体社会成员承担的部分和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承担的部分；考察赋税的各种征收方式及它们各自的利弊；分析近代欧洲各国将赋税的一部分用以举债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真实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密围绕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理论、政策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看到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意义，即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并从需要和劳动这两个物质生产中的基本范畴出发，以工场手工业劳动为经验事实，将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②，逐步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同样，他所论述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斯密所描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以经验描述的方式给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的合理性论证。上述哲学上的经验论方法，使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了解释现实世界的部分合理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时肯定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和实

---

①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限制特定产业……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

②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26.）

在的体系构建方式；虽然他最初介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曾猛烈批判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诸如将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①，从分工到交换再到分工的循环论证②，没有说明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原因③等。

除了经验论方法外，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还有着鲜明的道德哲学色彩。按照当时苏格兰社会中关于学科的划分，以及在斯密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神学、伦理、法学和政治学共同构成了“道德哲学”这一学科④，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斯密最初的设想是通过研究整个道德哲学，即从最高层面探讨社会全体成员为更好地生活所形成的且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以及他们生活的最终目的、过程和形态。秉承霍布斯利己主义人性论和孟德斯鸠“私利即公益”理论，斯密把私人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包括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等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并用“自爱”(Self-Love) 来定义这种基于私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⑤ 在“自爱”的引导下，个人出于迷恋发明、

---

①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5.）

② “十分有趣的是斯密做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1981：336.）

③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同①237－241.）

④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道德和政治批判之间的关系，并“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同①111）。

⑤ 斯密.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全集：第 1 卷. 蒋自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2.

改良和革新的本能，出于实现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需要，而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与此同时，“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即可以判断克制私人利益的能力，又使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特别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使个人为了建立一个有必要的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普遍利益即私人利益的总体，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在“看不见的手”① 的指引下促进社会繁荣。斯密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以上述论述为前提的。

强调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意味着斯密以孤立的个人为起点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考察单独的个体展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他看来，社会是由单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所谓社会关系则只是单个人之间的某种或某些联系。斯密之后的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皆是如此。②

事实上，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起，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传统就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出发，配第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对经验材料的考察；不是单纯的思维活动，而是诉诸感性的论证；不是考察以个人变化无常的主观意愿（如意图、见解、爱好和情绪等）为根据的原因，而是探究以看得见的经验事实为根据的原因。③ 不仅如此，配第还以自然法即自然的（天然的）道德法则为准则和研究内容。“我们应

---

①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② “‘个人主义’的观点是：必须从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你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属性；然后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而后才能理解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社会。这个观点不仅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核心，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说来是如此，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也是如此。”[魏小萍.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7）.]

③ “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只进行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根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在这里敢坦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作依据）的原因是不能谈得透彻的。”（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

该很好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就是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抗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人虽能一时强胜自然，但自然仍将恢复其威力。”① 这就是说，道德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天然存在性，决定政治经济学研究根本无法违背它；只有诉诸人们的感性观察并对经验材料加以加工，才能获得它。

（二）作为自然形式的分配规律

按照李嘉图的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如土地产品就是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这样一来，以土地产品为中心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即分配给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像斯密那样对上述自然过程做历史的说明。然而，土壤的肥沃程度、资本积累情况、人口状况、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程度、农业工具的改进程度等，在不同社会阶段中是极不相同的，这决定了全部土地产品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极为不同。因此，确立作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此时，李嘉图不需要像斯密那样，论述从分工到货币产生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是直接以价值为出发点，对斯密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分析批判，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如他本人所说：“这门科学（政治经济学）虽然已经由于杜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著作对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过程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亚当·斯密以及我所提到的许多名家由于对地租的原理没有正确的观点，所以忽视了许多唯有在彻底理解地租问题之后才能发现的重要真理。”②

从内容结构来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叙述形式是缺乏逻辑性的，这与他本人的写作方式直接相关。他是在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表达完成之后，才开始逻辑编排和章节划分的工作。比如，李嘉图认为要简化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必须撇开地租问题，因而，与斯密不

---

① 威廉·配第. 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 陈冬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7-58.

②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 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同，他在讨论价值之后就马上考察地租，然后再谈及工资和利润。同样，他在探讨赋税时也是如此，先讨论农产品税，再依次考察地租税、什一税、土地税、黄金税、房屋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税以外的其他商品税和济贫税等。最后，讨论资本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及其导致的工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再加上由评论斯密和其他作家各种理论，如价值与财富的特性、资本积累对利润和利息的影响、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等，所组成的“附录”，或一系列彼此没有直接关联的评论补篇。

尽管在内容编排方面的明显缺点经常被人们所诟病，但这并不妨碍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从托马斯·昆西（Thomas Quincey）到马克思，众多思想家和评论家都曾提出按逻辑顺序把《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的各章重新加以编排的方法。[①] 与斯密围绕阐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同，李嘉图是以原理的形式展开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关于两者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部分对比参见表 2-1）；相应地，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是由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地租、工资和利润）、货币数量理论等若干理论构成的，包括对外贸易和赋税等在内的其余部分只是上述理论原则的解释、应用和补充。其中的精华或核心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②]

---

① 马克思认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具有非常奇特的和必然谬误的结果。在全书第 3 版的 32 章内容中，第 1-6 章和 27 章是基础理论的部分，分别对应着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地租、工资和利润）、货币数量理论，其余的部分仅仅是这些理论原则的解释、应用和补充。其中，涉及赋税问题的 14 章（第 8-18、22、23 和 29 章）、涉及对外贸易的 2 章（第 7 和 25 章）是理论的应用部分；第 20 章是第 1 章即价值理论的补充，第 24、28 和 32 章是地租理论（第 2 和 3 章）的补充；第 19 和 30 章是第 4 章的附录，第 31 章是第 5 和 6 章的附录，第 21、26 章是第 2-6 章的附录。［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4-185.］

② “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在这两章中，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差究竟是什么情况。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包含着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的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同时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同①187.）

表 2-1

政治经济学体系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一章 论价值
	第二章 论地租 第三章 论矿山租金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四章 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第五章 论工资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第六章 论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十一章 论地租	

在认同斯密关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前提下，李嘉图做了如下批判与“改进”：（1）稀少性和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具有效用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源泉；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时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非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2）不同的劳动的性质及付给它们的报酬，影响着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而不影响着其相对价值的变动；（3）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其生产的“活劳动”，而且还有生产资料上的物化劳动；（4）投放在商品生产上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变动，商品上市时间的不同，导致劳动价值的涨落和工资的涨落，影响着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5）商品价格的变动，既来自商品价值的变动，也来自作为其媒介的货币价值的变动。综合以上几点，我们不难发现，李嘉图将商品的价值和它的自然价格即生产价格混同了起来，他因而自然会将自然价格变动的原因理解为价值变动的原因。① 用

① “由于这种媒介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和其价值变动需加确定的其他商品不同，所以它的价值会由于工资的涨落而发生相对的变动。此外，它所用的固定资本的耐久性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如不相等，或是将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时间和其变动需加确定的商品相比时如有长有短，它也会由于同一原因而发生变动。”（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1 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5.）

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就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不是居于中等条件的情况下，工资的变动就会引起利润的相反变动，进而引起生产价格的变动。李嘉图据此认为，只要维持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时间居于中等，就能够维持自然价格不变。也就是说，存在价值分配为工资和利润的比例变动而自然价格不变的价值尺度。

在李嘉图看来，确定不变的价值尺度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在探究资产阶级社会分配规律的过程中，他首先注意到了地租的特殊性，直接指明了斯密同时将地租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前后矛盾。李嘉图指出，地租和土地租金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付给地主以获得对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的使用，后者则包括地租和投在土地上的部分资本，如建筑物的利息或利润以及折旧费用。土地的肥沃程度是不同的，其耕种顺序是从优等到劣等，从而导致人们在投入一定等量的资本和劳动后得到产品和扣除它们之后的剩余都不同。于是，地租或级差地租就产生了，它是由耕种最劣等土地的生产条件决定的。除了等量资本投在不同土地上的利润差额之外，还存在等量资本投在同一土地上的利润差额。质言之，规定土地产品价格高低的是用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土地产品，而地租决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土地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不论是耕种劣等土地，还是在同一土地上追加投资而导致生产率降低，土地产品价值或价格上涨，级差地租增加。由此可见，地租不是价格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也不是价值的构成因素，应当废除旨在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

这样看来，土地的占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地租本身并不涉及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而造成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商品的价值要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其中，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它是由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利润则是商品的价值中支付工资以后的剩余额。工资和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此大彼小、互相对立的关系，由货币价值变动而引起工资上涨的情况除外。如果工资上涨是由劳动者的报酬提升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增加而引起的，就会引起利润的降低。“当我们判断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涨落时，所根据的是某一农场的全部土地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而不是这种产品按公认为可变的媒介计算的价值。”①

①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9.

应当根据任一阶级获得的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他们所获得的绝对产品量，来正确判断地租率、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变动。在总产品增加的情况，如果地租、工资和利润增加的倍数一致，那么任何一项都不会有相对的变动；相反，如果工资和地租都没有照数增加，剩下的增量全部归于利润，那么此时工资和地租都已降低而利润增加。

李嘉图虽然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分配规律为研究主题，但他的分配理论是以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且他也没有孤立地考察分配问题，而是将它同实际的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决定着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没有摆脱经验论的影响，他以可感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为立论依据，从中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所谓的经济“法则”或规律。此外，李嘉图仍旧坚持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立场，强调从私人利益出发实现普遍利益，揭示个人如何在相互联系中实现自我利益并满足他人利益，实现社会的繁荣。比如说，人们都可以自由支配其资本去寻找一种获利最大的方式，所有资本使用者都愿意放弃利润较少的行业去追求有较高利润的行业。这种愿望极强地促使利润平均化。李嘉图在此用社会资本的运行证实了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合理性，从某种程度上跳出了斯密的经验主义描述框架，具有了更为严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①

（三）决定生产和分配的法则及其应用

基于对斯密和李嘉图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合，约翰·穆勒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可否认，在约翰·穆勒之前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都赞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而约翰·穆勒则首次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予以明确论证。不同于当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即“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传授或自称为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约翰·穆勒指明“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

① 在这一方面，卢森贝的如下评论无疑是中肯的：“把李嘉图当作隐在遥远的云端里的抽象的思想家，是没有根据的。不应该把抽象方法跟狭窄的学院主义，跟逃避轰动当代的现实问题混为一谈。李嘉图的方法恰正是为当前的时代服务的；他用自己的抽象法，最正确地，即最科学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李嘉图的可能范围以内）解决了当时轰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李侠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383.）

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①。要言之，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议题。人类各民族之间在上述两个方面必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而，找出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并揭示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约翰·穆勒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法则是不同的，前者是自然法则，具体为经济法则；后者是人为法则，具体为社会法则。作为从物质世界索取人类生存和享受的手段，财富的生产要在一些必要的条件（诸如物质的性质及其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下才能完成，它从根本上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上述必要条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自然科学或日常经验能够解释的。在默认财富生产的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政治经济学将这些事实同关于人类本性的真理结合起来，尝试探索出一些决定财富的生产、用以解释今昔的贫富差异和预言财富增加的程度的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与财富的生产不同，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令或习惯，因为个人必须在取得关于财富所有的“共识”的基础上才能保有自己的财富，这些“共识”的固定化就是社会制度。出于人类主观意志制定的财富分配法则不具有随意性，它需要结合人类本性的各种基本法则，并根据人们当时的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智力和道德修养状况予以调整，故而具有同自然法则相似的真理性。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研究财富分配问题，即根据当时的社会法则造成的财富分配结果时，就要审视这个结果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如果不是，就要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对财富的分配法则予以调整。由此可见，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立场。

在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目的之后，约翰·穆勒从生产、分配、交换这三个领域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阐释，形成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静态理论”；然后，他分别考察了社会进步和政府各自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形成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动态理论”；最终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讲的“原理和方法论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体如下表 2-2 所示：

---

①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海派经济学，2004（3）.

表 2-2

		原理		方法论
静态理论	生产	生产要素的组成	劳动的定义及其类型	
			非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及其分类	
			资本的定义及其基本命题	
		决定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程度的原因		
		生产增长规律	劳动增长规律	在生产因欲望不足时而采取的补救办法；在若干情况下必须限制人口
			资本增长规律	
			土地与生产增长规律的关系	
	分配	所有权问题：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分别考察		改良私有制的措施
		获得产品分配的各阶级	自耕农、分益佃农、投标佃农	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办法
			劳动者：工资因职业而异	补偿低工资的方法
			资本家：利润的定义及其规律	
			土地所有者：地租的定义及其规律	
	交换	价值的组成及其定义		
		供给与需求、生产费用、地租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理论的 17 个要点及其特殊情况下的修正		
		货币的定义及其决定因素		
		作为货币替代物的信用及其对价格的影响		
		不兑现货币的实质		驳斥鼓吹不兑现货币的理论
		价值的尺度和若干特殊情形		
		国际贸易的定位和利益		通商在经济和道德上的间接利益要大于直接利益

续前表

		原理	方法论
静态理论	交换	国际价值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输入品的货币及其遵循的法则	
		国外汇兑的目的和作用	区分自行调整和只能依靠价格调整这两种汇率
		贵金属在商业世界的分配	
		通货对汇兑和对外贸易的影响	避免增加不兑现纸币的不利影响
		利率的决定因素和作用	应当从一般资本的角度考察利率
		可兑换纸币的调节作用	
		各国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	
		交换和货币不会影响工资、地租和利润的法则	
动态理论	社会进步的影响	财富增长状态的一般特征	充分吸收社会经济进步的力量
		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对价值、价格、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影响	社会走向静止状态本身并不可恶；对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的预测
		利润降至最低限度的趋势及其种种后果	
	政府的影响	政府的必要职能及其种类	撇开错误理论以认清政府职能
		课税的一般原则及其种类	坚持赋税公平原则的措施
		政府的一般职能及其经济影响	发挥政府一般职能的有利影响
		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	适时进行政府干预
		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则以及所受到的限制	

由上表可以看出，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是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他首先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样板”，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和自然这三种，分别论述了它们的定义及种类。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程度，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变化很大，这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劳动干劲的大小、技能和知识的高低、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安全感的高低、劳动联合和分工的程度、生产规模的大小等等。

既然生产的必要条件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要素，那么生产的增长必然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性质。生产增长的规律和限度，肯定是生产要素规律的结果及其确定的限度。第一，劳动增长规律即人口增长规律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力原本是无限的，但饥饿、对贫困的畏惧、国家政策和社会习俗等抑制着这种无限增长，最终呈现为按几何比率均匀而迅速增长的趋势。第二，资本增长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增长取决于能够节约资金的数量和节约意向的强度，能增强人们享受储蓄可能性和社会生活安全感等的因素，都正当且合理地有助于增强积累的欲望；而道德和智力方面导致的目光短浅或对他人漠不关心，则造成积累欲望不够强烈。第三，土地与生产增长的关系为：土地数量及其生产力的有限性是对生产的真正限制；土地生产规律，即随着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而劳动报酬递减的规律；生产技术方面任何可能的改进，如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和交通工具的改进等，都会以某种方式抵消劳动报酬递减规律。考察生产增长规律的目的是运用它，在运用上述经济增长的规律方面，应注意不同情况对财富生产的限制而采取一些补救办法，诸如：生产在因欲望不足而受到限制时应改善政治制度、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引进外国技术和输入外国资本；在财产平等的国家、在粮食进出口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和向外国移民等方面，也必须限制人口等。

人为法则与自然法则有着质的不同，探讨财富分配的法则应考察其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产生的原因。“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控制不了其行为给他们本人或别人带来的后果。社会可以使财富的分配按它认为最好的规则进行，但是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像寻求自然界或精神上的其他一切真理那样，明了这些法则的作用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然后，我们进而考察分配土地和劳动产品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或者是已在实践中采用，或者是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的。”① 在这些方式中间，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制度。按照约翰·穆勒的理解，现实中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公有制，存在着无法解决人们的劳动态度、导致人口无节制增长、难以确定劳动分配原则而造就新的不公正等难以克服的问题，最终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相较而言，现存的私有制虽然带来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等后果，但这些后果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它

①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 赵荣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7-228.

们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违背了私有制应当遵循的原则，即不是作为公正分配或劳动所得的结果的财产分配，而是作为征服和暴力行为的结果的财产分配。真正的私有制意味着可按契约自由取得财产，只有对现有的私有制进行改良才能实现分配的正义。这些改良措施包括：以密切劳资之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劳动雇佣制度；实施土地税使地租社会化；限制遗产继承权来缩小贫富分化程度；采取法律手段干预人口增长；实施租地分配制度来补贴工资；用教育而不是贫困干预措施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习惯等。值得注意的是，约翰·穆勒所谓的以真正的私有制为原则的分配正义，不是以消除贫富差距来实现财富的完全均等①，而是对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的适度调整，其实质仍旧是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

尽管约翰·穆勒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将政治经济学变得更为系统化，但他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仍旧没有摆脱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科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看来，道德科学是以精神法则为准则的，它以人为研究对象并在“几种性质决然不同的假设之下”讨论它。政治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② 这类人性法则关涉生活中的个人产生的思想和情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为了某个或若干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人类整体或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以人性法则作为研究法则，决定着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路线”。不论约翰·穆勒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做了怎样的抽象，都无碍于其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论的感觉论基础之上的，他的经验论研究路向与其功利主义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二、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体系和哲学基础，马克思有着极为

---

① “财富的完全均等，对于人们积极增加财富的努力来说是不利的。一般而言，如果人们拥有的东西和其邻人的一样多，或自认为和其邻人一样多，则人们就往往不会努力来获取更多的东西，不论是就财富来说，还是就才能、知识和美德来说，情况莫不如此。但是，社会并不因此而就需要一些大富豪来让穷人妒忌和羡慕。靠劳动获得的财产同样可以达到上述目的，而且可以更好地达到上述目的。”（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 胡企林，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77.）

②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海派经济学，2004（3）.

深刻的理解。他本身不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及其经验论方法，但反对他们抽象地而不是现实地考察物质生产及其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可以像约翰·穆勒那样，直接考察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本身，揭示这一范畴所遵循的内在法则；也不意味着可以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从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的结果入手，逐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这两类做法的共同实质和谬误在于，抽象地谈论物质生产及其结果，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视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本身是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历史活动，以及作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个人及其作用。因而，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应当从阐释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入手。一旦描述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过程，揭示出其背后的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所谓以“道德情操”克服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对普遍利益的促进作用，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道德哲学传统等，就会不攻自破。要言之，现实的关系对道德假设的“冲击”，决定着马克思不去理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传统。

（一）从孤立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

早在自己新的哲学和历史观形成的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把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视作社会和历史的前提，探究现实的个人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制约的方式①。到了《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批判蒲鲁东将普遍理性作为社会前提和历史出发点的方式，强调只有把现实的个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②，才能找到历史真正的出发点。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社会关系进行着的物质生产；相应地，在

---

①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论“世界历史”形成前后的两个时代里，还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实际进程中，现实的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缺席的，历史的进程并未围绕这个前提来进行。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个人受共同体的制约直接相关。只有把个人自主活动真正贯穿于“生产—交往形式”的结构中，才能真正解决现代共同体对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制约，使社会的发展真正成为个人自由、自主和自觉活动的显现和提升，从而使其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②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

社会中进行生产的现实的个人，自然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作为对象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如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猎人”和“渔夫”，还是卢梭在道德哲学的自然法基础上构造的相互间具有契约关系的天生独立主体，都属于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虚构。

众所周知，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某个孤立的猎人为例，来分析作为分工原因的交换的产生过程，以此为基础来考察社会经济现象，进而引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全部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个人就其本性来说是相互需要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相互帮忙，后者在社会中的表现就是交换。“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弩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弩与他人交换家禽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拿来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① 人的本性是自然的，而它又决定了交换的产生，因而，交换及其导致的分工也是自然的现象。同样，李嘉图在考察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因素②（劳动使用的节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等）时，也是以猎人和渔夫为例的，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孤立的个人。

为了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卢梭尝试用社会契约的方式将个人联系了起来。他指出，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此时，就需要以一种全体联合的形式即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重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们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而且，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与智慧上不平等，但由于约定和根据权利，人人都成为平等。”③ 个人服从契约就是服从其意志，因而，个人在订立契约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以个人意志为前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个人的社会状态的基

---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31.

② “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8.）

③ 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0.

础。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平等和服从个人意志这样的人性假象，就意味着个人仍然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样的个人与斯密等人的渔夫和猎人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孤立的个人是18世纪以鲁滨逊故事为代表的普遍人性预言的具体表现。这类故事决不是对人类过度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从而重新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而是单个的人在16世纪封建社会向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竭力摆脱自然状态的诉求的表现。这样的个人不是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基于人性观念理解的那样，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若进一步往前追溯历史，结论也是如此。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物质生产，个人始终表现为非独立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最初的家庭到由其扩大而来的氏族，再到氏族之间融合和冲突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关系始终作为个人的内在规定而存在。只有到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才成为个人外在必然性的表现，成为实现其私人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在此似乎有一个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孤立的个人这个观点的时代，却是迄今为止具有最发达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上述不合理现象是可以被理解的。18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从圈地运动到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有大量凭借货币关系获取私人利益、试图成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只要个人尽量凭借货币的力量支配产品，他们就会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支配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从政治共同体向市民社会发展步骤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近代人，表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生来享有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安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全等权利的“自然人”。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从历史而是从自然中产生”的“错觉”是每个新时代都具有的特征。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被资本所统摄并完全被确立起来，个人完全内化于其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和承担者，而不再是它的支配者。此时，作为19世纪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再郑重其事地将18世纪的自然人性论引入到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中，采用编排神话的方式将包含着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比作“普罗米修斯”，并以此来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必然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和生产着个人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应首先探究这个生产方式本身，考察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是如何被组织和运作的。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虽然理论上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人身安全权等，但是他实际上却成为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产生的运动形态的承担者。与其将与现实毫无关联的“自然人”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如把规定着生产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作为起点。

（二）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关系

马克思理解的“生产一般”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涵：（1）生产的一切时代具有一个共同规定或共同标志，即个人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2）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社会个人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① 上述理解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概念上的神秘化做法——将生产一般解释为不存在或依附于现实的任何社会形式中的抽象范畴，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承认生产一般作为抽象范畴的属性，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仅将这一结论当作前提，且不断做同义反复式论证的做法。只要将生产一般的共同规定或共同点提炼并固定下来，就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合理的抽

①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

象，并以此为基础来在思维中重建现实。

在这里，于马克思而言，就是辩证地看待抽象且赋予以实证功能[①]：一方面，对物质生产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定（生产一般）和它适用于特定社会阶段的规定（生产特殊），做严格的区分和证明；另一方面，还要对生产特殊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生产一般对生产特殊的作用，予以强调和论述。马克思指出，抽象有助于呈现物质生产的最广泛现象，却无法正确表现作为真正历史的物质生产的特殊方面。（早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就有过类似的看法[②]。）“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③]。如果没有将抽象和表现物质生产的特殊方面联系起来，就会完全掩盖物质生产的各种具体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别，使它从一个特定的和有差别的现象，转变为永恒的和同一性的过程。这就等于重复巴师夏和凯里等经济和谐论者的错误，他们就是通过掩盖上述本质差别来证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的永恒性与和谐性。例如，凯里把资本视为一种一般的和永存的自然关系，这种做法恰恰忽略了资本本身能够作为生产工具即过去的客体化劳动这一属性，也就是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生产一般之于生产特殊的作用。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物质生产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一个总体，即由诸如农业、畜牧业和制造业等特殊生产部门构成的总体。“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④] 政治经济学不是像工艺学那样只研究具体的生产部门，而是首先以这个总体为研究对象。当然，不论生

---

① 这种做法意味着马克思修正了过去对“抽象”的理解，诸如德国观念论哲学对现实的代替的同义语，黑格尔把全部事物都转化为逻辑范畴的同义语。

②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6.）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④ 同③10.

产一般，还是生产特殊，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而孤立地存在。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定存在于特殊生产形式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中，特殊生产形式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又以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定为前提。此外，生产一般中的“一般”本身就有一些普遍组成部分，这其中当然包括人类劳动和自然物质；没有这样的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就没有物质生产本身。因此，对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证，是科学地描述物质生产的现实运动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二分法的批判

严格来说，生产一般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作为一切生产形式的共同标志或共同抽象，是有着现实基础的，且可被用以理解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物质生产；后者则只是脱离了具体现实的纯粹思维上的抽象要素，根本不可能被用以理解任何一个特定社会形式中的具体生产。更为重要的是，19 世纪的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探讨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及其规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承认现有的分配方式即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并非来源于对其有用性的任何考虑。这种考虑是私有制建立以后人们为其辩护所持的理由。”① 由此，在简要概述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关系后，马克思按照其常用的理论手法，主要通过批判约翰·穆勒关于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二分法，来展开具体的论证。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生产理论，通常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归纳起来有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这三大类。由它们各自扩展而来的其他规定，例如，用于原料生产的劳动和用于工具制造的劳动、为生产性消费提供物品的劳动和为非生产性消费提供物品的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都只是浅薄的同义反复。二是促进生产的条件，比如斯密所说的社会进步状

①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 赵荣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8.

态、静止状态和退步状态。① 若使斯密的这一论断具有科学性，必须超出促进生产的条件这个命题本身，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各民族不同发展时期的生产率程度，并结合关于竞争和积累的分析来谈论这个命题。按照一般的说法，当一个工业民族达到其历史高峰时，也就达到了其生产高峰，判断后者的标准在于这个民族以谋取利润而不是维护利润为主要任务。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构成促进生产的真正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探究生产的基本要素和促进生产的条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论述生产的真正目的。他们借此强调的是生产与分配的二分或异质性。这些要素和条件的客观性，决定着生产应当遵循与历史无关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也随之成为永恒不变的事物和不可置疑的前提。相反，人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分配。殊不知，除却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现实关系，分配或多或少要受到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和特定规律的支配。“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② 况且，决定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中分配的规则（律），必然是不同的。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仅靠得到

---

① “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5.）

早在创作《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就对斯密的上述论断做了条分缕析的批判，考察了工人在其中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谋求实现自我活动的可能性而不断斗争的状况。首先，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阶级遭受的痛苦显而易见是最大的，他们甚至因大量失业而完全丧失生活乃至生存的可能性。其次，在财富日益增长的社会中，整个工人阶级也摆脱不了超负荷劳动和过劳死的命运。在其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资本积累、分工扩大、相互竞争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人或是屈从于资本家的一切要求，沦为资本的奴隶；或是完全依赖于高度细化的片面劳动，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沦为机器；或是在愈发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的竞争中，部分沦为乞丐或身陷饿死之境地。最后，在社会静止即财富达到顶点的状态中，工资会缩减到仅能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人口已经饱和，超出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工人的贫困处境持续不变。（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9-12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的一定量食物来生存，征服者、官吏、土地所有者、僧侣和传教士，则凭借其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靠贡赋、税收、地租、施舍和什一税来生活。这根本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残酷的剥削！

在人为决定分配的前提下，19 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堂而皇之”地搬出了所有权，赋予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以“神圣性”。他们将“所有权”和“司法、警察对它的保护”作为考察分配的两个要点。这显然是继承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中的做法，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财产关系归结为某种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把所有权视为永恒观念。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这两个要点做了简要的回应：

其一，将所有权（占有①）作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式的描述，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②。它没有对所有权的起源这一问题做任何实质性回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就将所有权的进一步形式如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自明的事实和理论前提，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为可笑的。确切地说，所有权只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把所有权视为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认为没有所有权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及生产，是错误的观点。

其二，作为进行生产的一种保障，现代警察制度和强权一样，都是以某种特定形式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谓“法治国家”中的强者的权利。现代警察制度只是一种法的关系，只是特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的暂时性产物，根本不是与所有权发生着偶然关系、纯粹反思联系的

---

① 在德语中，“占有”（Besit）、“领有”（Aneignung）、“所有”（Eigentum）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占有”是指只能使用而不能随意支配和转让某物；“领有”是具有对自己的物品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或是在对某物长期的、实际的、有效占有的基础上，将本不属于自身的这一物品据为己有，并具有对它的使用权和支配权；“所有”则是对某物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与排他权，即能够占有、使用和转让它。整个西方思想史中的所有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论证从“占有”到“领有”再到“所有”的实现过程。换句话说，所有权就是让人们对物的占有事实由自然状态转化为权利状态。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更多使用的是 Aneign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的译者将 Besit 和 Aneignung 都译为“占有”。出于使用中译本原文的需要，笔者还是沿用“占有”这个译法，特此说明。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永恒事物。生产上的紊乱，尽管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初步形成和已经衰亡的状态下，程度和影响会有所不同，但仍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仅靠现代警察制度，而不是诉诸生产关系的变革，无从解决生产上的紊乱。由此可见，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当作生产的一般条件，诸如所有权和现代警察制度，不能被用以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形式。

三、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

除了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和正确理解生产一般之外，进一步分析生产还离不开考察它同其他表面独立的领域，如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形成了一个彼此结合的“正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抽象规定（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化规定（特殊），消费是个别性规定（个别）；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二重化的中间环节——前者作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后者作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生产受一般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分配取决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即人为法则，交换的决定因素介于自然规律和人为法则之间，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则带有决定因素的性质，它既作为最终目标的结束行为，又反作用于起点重新引起这个过程。

具体而言，从主体的维度来看，个人先是通过生产来占有自然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然后遵循一定的分配法则分取这些产品；再然后用分配给他的那部分产品，按照相应的交换方式，换取他人那部分的特殊产品；最后以消费的形式重新占有和享用这些产品。从客体的维度来看，产品依次表现为被生产制造出来的适合需要的对象，按照社会规律被分配的对象，按照个人需要被再次分配的对象，摆脱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对象。在生产和消费中，上述主客体关系又表现为颠倒的形式。作为主体的个人在生产中被对象化，作为客体的产品又带有主体性。在分配和交换中，社会和个人分别以一般的规定性和偶然的规定性，来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

然而，上述三段论法揭示出来的只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

的一种肤浅联系，它本身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仅从这个三段论法出发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责备它粗暴地割裂了这种肤浅的联系，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些责备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处于同一水平，甚至低于它。例如，责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的说法，恰恰与它出自相同的理论前提，即把生产和分配当作同等并列的独立领域。又如，责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统一性的说法，只是在对概念做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水平都不如，后者毕竟是以现实的材料为依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做一种抽象的解释。马克思由此提出，超越黑格尔式三段论法的水平，重新考察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的辩证运动，形成“生产总体辩证法”，为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基础。此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交换过程、货币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时，无一例外都运用了这种方法。

（一）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

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家确实从客体的维度，认识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直接的同一性：生产行为中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和重新分解，这本身就是消费生产资料的行为。用斯宾诺莎的术语可以表述为“规定即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即有规定性的存在，其内部都包含否定它的要素。上述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命名为“生产的消费”。

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从主体的维度来考察生产与消费之间直接的同一性。就个人而言，他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在生产行为中消费（使用和消耗）这种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①。全面考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不仅要从生产即消费的统一面出发，还要从消费的原有之义，即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出发。一方面，消费以中介运动的方式生产着生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产，它使得产品真正成为产品，后者不再只是物化了的活动，而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与此同时，它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在观念或主观形式上提出生产的对象、动力和目的。另一方面，生产从三个方面中介和生产着消费：一是为消费提供材料和对象；二是从主体和客体形式上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作为消费的动力，通过产品作用于消费者身上引起新的需要①，使消费脱离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

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或者说辩证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这种同一性以消费的生产即再生产和生产的消费的形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前者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关于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应当看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此做过区分。

（2）间接的同一性：两者在各自独立、外在于对方的前提下，互为中介、互相依存、互为表现手段，并形成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生产为消费提供作为外在对象的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作为内在对象和目的的需要。生产和消费在现实中不能脱离彼此，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复论证过这一点。

（3）最后的同一性：两者因自我实现而创造出对方，且都把自己视为对方创造出来。生产由于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和动力，把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所以生产出消费。消费既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即消耗掉产品的独立物体形式，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即通过反复的需要将生产者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而来的素质上升为熟练技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供给和需求、对象和需要、社会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个最后同一性。

马克思所总结出来的上述结论，明显带有黑格尔式的语言风格，任何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都很容易将生产和消费以上述方式等同起来。他本人也明确指出，不论格律恩和蒲鲁东这样的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还是萨

① 对于对象的知觉创造出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艺术作品可以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会创造出有所需要的消费者。

伊和亨利希·施托尔希（Heinrich Storch）之类平庸的经济学家，都这样做过。[①]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花费篇幅做这样的论证呢？究其实，他意在通过对生产和消费之间同一性的描述，来揭示其背后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总是表现为一个主体或许多个人的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要素。其中，生产作为整个活动过程的“实际起点”起着支配作用，并将消费纳入生产活动中；而生产活动本身又是“实现的起点”，它支配整个活动过程重新进行。在上述过程中，个人既生产出一个对象（产品），又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因而表现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这两种形态。然而，随着对象的真正完成，也就是产品一经完全对象化，个人对它的关系成为一种外在的关系。此时，再让产品回归个人，就只能取决于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直接占有产品；直接占有产品也不再成为在社会生产中的个人的目的，后者只是通过生产保持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以获得维持其生存的产品。具体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产品直接创造者的工人只能依靠资本家所提供的微薄工资来重新购买产品，以维持生存；而资本家则可以借对工人的统治地位直接占有产品。[②] 这才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和消费之间同一性的真正所指，也是他和前面提到的几类派别的根本不同之处。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8. 笔者在此做以下补充说明：

从整个国家来看，每年所生产的产品的全部价值都会在当年消费掉，所以，只存在总产品而不存在纯产品。这是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的重要论断。对此，施托尔希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中直接批驳到，一个国家年产品的价值可被分为资本和利润两个部分，每一部分中都要留有购买国民所需产品的额度，以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资金。这就是说，一个国家不会全部消费掉自己的产品，而是用于创造固定资本和生产资料等。蒲鲁东则是“另辟蹊径”，将萨伊的上述重要论断作为前提，推导出“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的结论，并以此作为所有权的不可能性（《什么是所有权》）、构成价值理论（《哲学的贫困》）、设立人民银行和实施无息信贷（《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和《无息信贷》）等一系列理论和现实举措的基本依据。格律恩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中摘抄了蒲鲁东论证所有权的不可能性的相关段落，并评论说是对所有权的全面分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26）和《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8-130）中，马克思就一一做出了反驳。

② 上述论断显然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用异化劳动解释工人无法买回自己创造出的产品的进一步延伸。

（二）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

在产品外在于生产者的现实过程中，分配借助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占有的产品份额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中间。那么，接下来要考察的问题就是：分配是不是处于生产之外的、和它并列的独立领域？它与生产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以要素对应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相应就有什么样的分配要素。马克思指出，生产要素在任意一本普通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被赋予收入源泉即分配形式的决定要素这个属性。因此，就其形式和对象而言，分配就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参与分配的只能是生产的成果。比如，利息和利润既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为前提的分配方式，也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一方面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即雇佣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一旦离开了雇佣劳动这个规定性，如在奴隶制度下，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就不再表现为工资。最后，作为地产（而不是土地）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地租是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而不是土地一般）为前提的。把土地只放在生产上、把地租只放在分配上来谈，这完全是幻觉。正是自觉将分配形式视为一定社会形式中各个生产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表现，李嘉图等一些看似只重视生产的经济学家，才会专门讲分配作为研究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分配似乎是先于并决定生产的经济事实：它在单个的个人面前表现为决定其生产地位的社会规律，这个人可能一出生就因没有资本和土地而只能从事雇佣劳动。同样，整个社会在所有出现过的历史情况下，也表现为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一个民族不论通过征服、掠夺、奴役、革命和立法的形式，还是按照劳动创造一切的神圣信条，赋予地产以新的分配形式，都会使在土地上进行的生产有了新的性质。

这样看来，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上，理论和现实似乎产生了矛盾。这也使得分配是否具有独立性变得复杂起来。一种最为直接和浅显的解释是，产品在进行分配时已经脱离了生产领域，因此，分配相对于生产而言是独立的。可是，在产品的分配之前，分配表现为生产工具的

分配和个人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它内在于生产过程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只是它的结果。无视这种分配来考察生产，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空洞的抽象。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将分配而不是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本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他的理论诉求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决定生产本身的这种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生产本身内部进行讨论。至于分配在特定意义上先于生产的问题，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①

究其实，考察分配的独立性，也就是它和生产的一般关系问题，就是回答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怎样起作用，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有怎样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前文所列举的历史情境如征服和立法，都只能说明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分析说，一个征服民族可以将其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如英国19世纪在爱尔兰的做法。或者，它只满足于征收贡赋，让被征服民族的旧生产方式继续存在，如古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的做法。或者，在上述两种生产方式共同作用下，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如日耳曼人的部分做法。这些生产方式始终决定着新出现的分配形式，后者同时是一般历史生产和特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它只是在表面上表现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前提而已。同样，靠掠夺形成的分配，也由生产来决定。一方面，只有生产才能提供可被掠夺的东西；另一方面，从事掠夺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决定其掠夺方式。至于直接掠夺生产工具、使用奴隶所形成的分配，必须以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建立一种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为前提。最后，可以确定诸如土地之类的生产资料属于特定家庭的法律，只有在大地产与社会生产相适应的时候（比如在英国），才具有经济意义。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后的情形，将大地产分割成为小块土地只存在于法律状态，财产仍旧集中于特权阶层手中。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分配受生产所支配，交换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它从属于交换总体——也不例外。“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① 马克思认为，由于交换只是生产及其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的中介要素，消费和生产具有同一性，它本身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所以，交换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中。不论是交换本身，还是其客体形式和主体行为，都不能脱离生产的限度：（1）生产中的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从本质上组成生产；（2）产品的交换作为制造可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始终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3）主体之间的交换行为，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取决于生产，而且其本身也是生产活动。不仅如此，由于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以，直至交换的最后阶段，即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时，也由生产决定。

综上所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一个生产的总体以及其中的各个环节和差别，而不是同一的东西。一方面，从整体来看，在整个统一体及其运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同时支配着自身和其他要素；作为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都不是决定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本身就在生产内。要言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②。另一方面，每一个有机统一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就其单方面形式而言，生产也取决于其他要素。举凡：市场即交换范围扩大，直接影响到生产规模和分工的扩大；随着分配发生变动，诸如资本集聚、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生产也就发生变动；不言而喻，消费的需要更是决定着生产；等等。

以上就是“生产总体辩证法”的内容。这种哲学方法在马克思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辩证运动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

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生产有着极为广泛的内涵。马克思意识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② 同①.

到，考察生产一般、生产同消费等的关系，尚不足以全面理解生产。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诸如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生产关系和法的关系、生产关系和家庭关系等，都应纳入考察的范围。马克思在此列举了八个要点，具体如下所示：（1）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特征在军队中要比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更为显著；（2）观念史特别是文化史同现实史的关系，主观的、客观的和哲学的历史叙述方式；（3）包括国际关系等在内的生产关系派生物；（4）用唯物主义理解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以及对这种见解的种种责难的回击；（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6）物质生产发展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7）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表现为必然性；（8）从自然规定性出发来理解生产关系同其他关系的关系。

在上述要点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了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秉承艺术是特殊生产形式的思路①，他强调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是不成比例的或有矛盾的。即使在艺术自身领域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发达程度不相符合，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样看来，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的矛盾问题，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带有特殊性。只要将一定的艺术形式同它所处的社会形式，特别是社会物质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理解上述矛盾问题了。以古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为例。希腊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前提，前者同其他任何神话一样，都是借助想象来征服和支配自然，把自然的力量形象化，也就是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不自觉”表现。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的理性思考，并取得对自然力的实际支配，希腊神话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古希腊艺术因失去素材而无法再现。

结合社会物质条件来考察一定的艺术形式，固然能解释一般的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问题。可它终究无法解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何以仍然给

---

①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6.）“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人们带来相当高的精神享受，乃至在某些方面成为永恒的经典。如果我们将现代社会比喻为成人，将古代社会比喻为儿童，就能形象地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成人不能再变回儿童，否则就会显得稚气。尽管如此，儿童的天真确实能使成人愉悦，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成人更应该努力在更高层面上再现儿童般的真实。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它固有的性格即纯粹性和真实性正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正常的儿童”，即人类童年时代的最完美时期，难道不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恒的魅力吗？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人就是“正常的儿童”，其他古代民族大多是“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希腊艺术的魅力和它所处的不发达社会形式并不矛盾，相反，它是这个社会形式的结果。正是产生它且它只能在此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社会条件永不复返，古希腊艺术才成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已经注意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和机械的决定论。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它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确实制约着精神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些精神生产的高级产物如古希腊艺术，会随着制约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消失而无法再现，这种无法再现与制约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性质（永不复返）共同决定着它的性质（永恒性）。这两种生产活动更多地呈现出彼此制约的关系，平衡它们的关系绝非易事。

马克思虽然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没有过多提及如何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甚至成为马克思探讨未来社会新形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时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这段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很好的例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建立在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协调发展上。事实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现都有赖于一定的时间。在整个人类活动的时间总量既定的前提下，物质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精神生产所需的自由时间之间是此消彼长的：投入到一方的时间的缩短，潜在地包含着投入到另一方的时间的增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质生产活动效率的提高，有可能会带动精神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从自由时间中看到了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① 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的自由时间是靠工人的非自由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即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产生的。本来可以用作平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自由时间，却被一切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占有了。② 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了这些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决定了他们的发展范围。一方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在于另一方的全部时间和发展空间被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为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抗的基础上。因此，让自由时间复归其真正创造者，结束上述对抗，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秉承上述思路，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中将工作日的缩短作为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在认识到对抗性的前提下，他重点论证物质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有利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形成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使社会发展进入这样一个阶段：（1）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现象将被消灭；（2）一些新的关系的物质条件和萌芽将被创造出来，这些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结合起来。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5.

②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这就是说，剩余劳动生产率及其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只有在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才能得到发展。

四、从一般的抽象规定到具体实在的再现

对于重新建构一个新的科学体系而言，确立研究方法与明确研究对象同等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似乎更为重要。马克思此时所要做的不是零碎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著作和个别章节，也不是孤立地评论和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重大争论议题，而是系统地概括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在联系中揭示所谓资产阶级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实质①，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征的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实在。而在具体的表述中，则不可避免地使用抽象范畴。如何避免用思维把握的具体代替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成为马克思探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的核心议题，否则，哲学仍然停留在“天国”而无法回到“人间”。

（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认真梳理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德国思想界和理论界情形，就会发现方法特别是哲学方法在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中已然“失语”，“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②。黑格尔辩证法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保留下来的只有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官方黑格尔派只会搬弄黑格尔式语句，简单套用从“无”推出“一切”的逻辑过程，显得极为拙劣和可笑。取而代之，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死灰复燃”，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勃兴”，前者以克里斯蒂安·沃尔弗（Christian Wolff）为代表，后者的代表人

---

① 如前所述，从李嘉图到约翰·穆勒等，无一例外都是这些规律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因而，在马克思的阐述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他们的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②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0.

物是费尔巴哈。这两种思潮的产生，是与1848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其实，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18世纪旧唯物主义没有实质上的理论差别，它强于后者的地方只在于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同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倡导者一样，费尔巴哈的信众们也不停地在最简单范畴上纠缠不清。自诩为“引领”时代精神的“驾车者”尚且如此狭隘庸俗，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拉车的“笨马”自然无法跨越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

平心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固然有其唯心的和抽象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巨大的历史感。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演进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思辨哲学中到处渗透着具体实在的内容。他的最大不足是将真正的关系“头脚倒置”，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证明历史中存在一种发展着的和内在联系的人，进而构建一种将各种现实材料按照历史的一定形式（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起来的宏大历史观。更难能可贵的是，仅仅从“纯粹思维”出发就能轻而易举地终结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表明黑格尔辩证法除了诡辩形式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具有真正合理的“内核”。正是由于黑格尔学派没有发现辩证方法这个“内核”，且无法将其从唯心主义的“外壳”中剥离出来，黑格尔辩证法才从未被真正批判过和彻底驳倒过。它被人们所遗忘的原因也在于此。强大的历史感和合理的辩证方法，使黑格尔辩证法成为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阐述其新唯物主义方法的直接理论批判前提，纵然“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①。

在明确了研究方法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探究叙述方法，将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准确表达出来。这里便要涉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本人没有在“1857—1858年手稿”中直接地提出这一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回避它。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和将这个结论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往往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异质性可能导致它们以相反的甚至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研究方法大多是实证的或实在论的，而呈现给读者的叙述方式则很

①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可能是思辨的或观念论的。人们关于这种认识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后来给马克思著作带来的严重误解和巨大争议，是马克思本人始料未及的。① 在写作“1857—1858 年手稿”初期，他只是提出准备回应对研究方法的新唯物主义性质的责难，以及这种新唯物主义同实在论特别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②

在运用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之后，为了澄清可能给读者造成的照搬黑格尔的误解，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的部分最终成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经问世，便授意恩格斯以书评的形式对其研究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依然无法阻止各种非难和误解的产生。于是，马克思在再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时专门谈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

毫无疑问，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分属科学理论创作的不同阶段，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这两种方法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因为它们在形式上都统一于实际的科学认识过程。我们既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同一性，也决不能只看到统一而漠视形式上的差别。通常而言，研究方法的要素和过程如下：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反映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就是从各种经济现象推进到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联系。作为适当叙述现实的运动，叙述方法反映出来的是材料的“现实运动”。当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的时候，理论就有可能面临被误解为“先验的结构”的危险。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关系的“后知后觉”，最终使得“1857—1858 年手稿”呈现出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交织即相互作用的景象。

---

① 这种争议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正式问世凸显出来。以孚赫、杜林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指责马克思的方法直接照搬黑格尔辩证法，只是“黑格尔式诡辩”。考夫曼为了回击这些非难，特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研究方法（实在论）和叙述方法（德国辩证法）的区分。马克思显然不会同意这两类观点。

② **“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对其所做研究的新唯物主义性质及其完成的双重超越——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做了说明。鉴于此，他此后未再专门解释上述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的联系，属于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系的派生关系。后一种关系，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和个别过程来看，涉及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认识过程。与这种认识关系相适应，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由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以实在和具体为前提，以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为前提，考察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其中，配第从人口、土地、资本、产业等构成国力的要素入手，通过数字、重量、尺度等方面的分析和对比，得出英国可以运用合理政策提升国力而握有欧洲霸权的结论。顺此倒推，政策的合理发挥需要充足的财力保证，财力的保证则有赖于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振兴。英国恰恰拥有充裕而方便的资本以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它担负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同样，布阿吉尔贝尔立足于法国国情即人口、土地和货币的具体情况，在认清财富、货币和赋税性质的基础上①，从分析法国国民财富减少的原因出发，通过提供给国王大量现金并增加其经常收入的方式，同步提高国民收入。

马克思认为，这条路径是不充分的和错误的。“人口”这个概念看似具体和实在，实则为不确定的主体。除却作为其构成要素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同样，脱离了阶级划分的依据或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等等，阶级又成了一句空话。这些因素自身不仅以其他因素为前提，而且互相联系。例如，如果没有交换、分工、价值、货币、价格、雇佣劳动等等，资本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以人口作为研究起点，首先将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只能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决定着这条路径是错误的。而后这种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

① 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货币本身只是流通手段，由于人们错误地将它同财富等同起来，它才成为“商业交易的专横暴君”和主宰人们幸福生活的神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祸害。同样，赋税本来是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但在法国却成为君主的特权。法国应当改革税制，按照能力大小和收入多少来负担捐税，清除那些不合理的征收办法，使广大民众从捐税的盘剥中解脱出来。“恢复公正和理性的法律能够很快地重建社会的协调。”（布阿吉尔贝尔.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8.）

象，直至若干最简单的规定；最后将上述过程倒过来叙述回到人口，此时它就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主体——这决定着这条路径是不充分的，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本人后来所说：“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①

斯密、李嘉图等18世纪的经济学家正是充分吸收了第一条路径的合理性部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形成了第二条路径：从实在与具体开始，经由层层分析后找出若干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诸如劳动、分工、价值和货币等，最后将上述抽象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作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用以指导国家政策。马克思将这种方法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 aufzusteigen），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die abstrakten Bestimmungen zur Reproduktion des Konkreten im Weg des Denkens）。这种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极容易混同，比如，黑格尔认为综合的和系统的科学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以一个普遍形式出现的对象为开端，从把握抽象的和简单的思维规定到把握具体的对象。所以，马克思接下来要以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批判的“靶子”，来阐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其实质。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及其实质

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否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能够成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② 关键是这种方法是以现实的个人还是以抽象的或孤立的个人为起点。

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抽象生成具体的方法有着质的不同：前者只是用思维来表达具体，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6.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生过程；后者则是把具体理解为能够自我进行综合、深化和运动的思维的结果。以一个比较简单的经济范畴交换价值为例，它以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以及某种公社、家庭或国家为前提，且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和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关系而存在。相反，它作为一个范畴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即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哲学意识所说的“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一行为的结果”这一命题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只有将“具体总体”（die konkrete Totalität）理解为思维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的能够思维且自我生成的概念的产物的时候，上述命题才是正确的。当整体作为思想整体在头脑中出现时，它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和不同于艺术、宗教、实践的方式来掌握外部世界。此时，只要这个头脑还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实在主体”（Das reale Subjekt）就仍在头脑之外保持其独立性。因此，从理论方法方面来说，作为主体的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直观和表象之上。

究其实，包含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研究都是在处理思维与现实（存在）、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叙事与历史叙事不是矛盾的，逻辑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历史的具体形式和偶然性因素的历史叙事，“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①。不仅如此，一般的抽象规定所具有的历史性只有在现实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对于任何一个抽象范畴来说，其一般性都是经过比较分析后抽取出来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本身就包含各种成分和具体规定，其中一些属于一切历史阶段，而另一些则由部分阶段所共有。一旦离开了这些共同点，一切一般的抽象规定就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而且，构成一般性的抽象规定发展的正是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般的抽象规定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和暂时性的，以它们的发展为线索的逻辑叙事就是历史叙事。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五、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明确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整体性方法之后，就要将其具体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建构之中。马克思认为，这个方法的具体运用在于，批判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关于经济范畴的错误理解，即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① 事实上，早在批判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错误理解②时，马克思就已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从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经济范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或它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适用性、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地位等方面，详细考察了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的关系。

（一）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逻辑范畴从简单到具体的展开过程，始终与外部现实的发展程度相一致：逻辑范畴越是具体，越是接近外部现实，其发展程度越高。而在马克思这里，上述命题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方能成立，真实的情况要比黑格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比较简单的范畴同比较具体的范畴相比，可以具有历史或自然上的优先存在性。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比较简单的范畴的存在，表明一些较不发展的具体已经在上述关系中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作为比较具体的范畴的现实基础，一些较多方面的现实联系或关系尚未产生，比较简单的范畴则被比较发展的具体当作一种从

---

①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

② 蒲鲁东认为，普遍理性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作为“集体的人”的“社会天才”通过普遍理性创造经济范畴的形式来不断进步；反过来说，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展现，现实的生产关系只是经济范畴的化身。

属关系保存下来。比如，在资本、银行和雇佣劳动等等形成之前，货币能够且在历史中确实存在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①。这就是前述黑格尔的命题的限度。只有在此情况下，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程才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其次，一些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并不具有独立的自然存在或历史存在。以黑格尔对法的讨论为例，他以占有作为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②，探讨了它同所有权的关系③，区分了占有财产的合理性（对外在事物的关系）和特殊性（对主观的目的、需要、才能、人性和外部情况等的把握）。马克思认为，这种将占有和所有权做简单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划分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占有在家庭团体或主奴关系等具体关系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者直接说，占有在历史中发展成为家庭团体，这是不对的。相反，存在着没有所有权而只有占有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这则是对的。同所有权相比，占有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则表现为一个发达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换句话说，占有在所有权产生前不是法的关系（比如，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它在所有权产生后又总是以后者为前提并发展成为一种法的关系。

最后，比较简单的范畴和比较具体的范畴的发展，可能会分别呈现出统一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和相反的方向。“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

② “法首先是自由以直接的方式给予自身的直接定在。（a）占有，就是所有权。自由在这里是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或者，正因此是一个单一的人格仅仅同自身相处时的自由。”（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8.）

③ “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光有某物应该是我的这个我的内在观念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愿获得定在，这个包含他人的承认（Erkennbarkeit）在内。我所能占有的事物是无主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消极条件，或者毋宁说，它已经暗含着跟他人的关系。”（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5.）

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① 在一些处于发展中的、尚不成熟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可能有比较具体的经济范畴，但未必会有比较简单的经济范畴。马克思举例说，在被西班牙征服以前，相对落后的秘鲁社会中就有发达的分工和协作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却没有任何货币。斯拉夫公社中的货币或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为，只存在于不同公社之间的交往中，很少或根本不会在同一公社内部出现。货币虽然很早就已经在历史中全面地发挥着作用，但它的作用仅仅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才会凸显出来，且只是处于支配地位。在最文明的古罗马社会和古希腊社会里，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货币的作用也只有在它们解体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相反，充分发展的货币形式即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力量。由此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才能表现出它的充分力量，它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比较具体的范畴则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二）经济范畴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适用性

马克思讨论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优先性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它们都不具有超越历史本身的先在性。即使最为抽象或十分简单的范畴，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类范畴虽然可以凭借其抽象性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这种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即只有在它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以“劳动”（Arbeit）为例，它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而且作为其一般性的“劳动一般”（Arbeit überhaupt）的表象也是古老的。然而，政治经济学从简单性上所把握的“劳动”，却是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中逐步抽象出来的范畴，也是在不断深化对物质生产和财富本身的认识过程中逐渐被赋予各种规定的。众所周知，较早的货币主义者将财富视为以货币为载体的、完全客观的和与主体无关的“身外之物”，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外在的客观事物。到了重工主义者或重商主义者那里，对财富的性质及其根源的探索，开始从外在对象过渡到主体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与货币主义者相比，他们的上述探索具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

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将创造财富的主体活动本身局限在取得货币即财富的表现形式而非财富本身。相较而言，重农主义者将作为某种特定的劳动形式即农业行为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且将财富的对象固定在作为劳动的一般成果的产品一般上，而不是将其“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重农主义者以特殊劳动作为劳动本身，这种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所理解的产品一般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同前人相比，斯密的进步更为明显，他抛弃了创造财富的劳动的全部具体规定，如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等，直接将它们的抽象一般性即劳动本身规定为财富的源泉。“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①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对财富源泉的上述探索，即从货币到具体的劳动形式再到劳动一般即把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等看待，这些步骤“跨”得看似容易，但实际上极为艰难。就连斯密本人都要时不时回到重农主义的立场上，以描述农业劳动及其产品的方式来阐述劳动本身。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一方面具有它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替作为生产者的个人的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种抽象表现，不论他们处于哪种社会形式下。另一方面，它的谬误在于把劳动一般作为永恒范畴推广到全部社会形式中，忽略了全部种类的劳动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不同表现。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意味着全部劳动种类可以构成一个作为前提的、发达的总体，其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能支配其他种类。由于最一般的抽象普遍产生于其特殊形式最为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所以就不能以特殊形式来抽象思考劳动一般，更不能将它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

否定劳动一般的永恒适用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现实存在性。马克思认为，劳动一般不仅是由全部种类的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而且还具有其现实性。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适用于劳动一般在它已经得到最充分发展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中的现实的个人很容易就从一种劳动转向另一种，不同种类的劳动对个人而言已成为偶然的、无差别的和可用时间来进行量化的事物。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

此时，劳动在范畴和现实中同时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不再被规定为具有同种劳动能力的个人的结合。这种情况只有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中，才是最为发达的。只有在那里，劳动和劳动一般等被政治经济学家放在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最简单抽象，才会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尽管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在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形式中具有不同的属性，它在美国表现为历史的产物，而在俄罗斯则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这不能否认劳动一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适用性，因为文明人的自主行为和野蛮人的被动适应有着质的区别，后者只有在外来的影响下才能从被固定到某种特定劳动形式的传统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适用于全部其他社会形式也是正确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生产组织。马克思据此提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① 这个方法论。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在之前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些旧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并且那些在旧的社会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会在这里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人们能够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及各种范畴的剖析，来透视旧的社会形式中残存的和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事物。

通过资产阶级经济来透视古代经济，决不意味着可以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经济范畴当成永恒观念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从而抹杀了一切历史差别。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在概念用语上相同的经济范畴，在历史与现实中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地租来理解代役租和什一税，但却不能就此把它们等同起来。从实质上说，资产阶级社会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那些在旧的社会形式中的各种关系，如公社所有制等，往往在这个社会形式中以十分萎缩的、完全扭曲的或漫画式的种种形式出现，与它自身的应有形式有着质的差别。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且只能建立在用新形式来理解旧形式进而进行自

---

①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我批判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①。基督教只有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而不只是在对异教的批判或新教批判旧教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早期神话的客观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亦是如此，它不只是在批判与之直接对立的封建经济的前提下，更不是以编造神话的方式与过去的经济形式完全等同起来，而是以自我批判为起点来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三）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地位

除了经济范畴在特定社会形式中的适用性之外，如何理解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社会形式中的地位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内容；后者既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更是正确把握经济范畴与具体现实关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马克思指出，同一经济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具有不同地位，经济范畴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次序是它们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相互关系的颠倒形式。他一再强调，其谈论的作为主体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头脑和现实中都是既定的；这个既定的社会在科学上决不是被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时才开始存在，范畴只是表现这一既定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和个别侧面。正如在研究任何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时一样，这个论断是研究经济范畴发展时始终要把握的前提，它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分篇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这个决定性意义在于，在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着一种起着根本决定性作用和绝对支配力的生产方式；它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直接决定着一切其他生产方式的地位和影响，它们的关系亦决定着一切其他社会关系。

从上述方法论出发，来审视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以地租或土地所有权为起点的做法，就会发现它表面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既同土地这个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又与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

农业这一社会的最初生产形式结合在一起——但实质上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在游牧民族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农业的具体形式、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有着质的差别与不同。在畜牧业居于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社会如斯拉夫公社那里，农业生产活动是按畜牧业的方式进行的，土地所有权带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性质。在农业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事定居耕作民族的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如古罗马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社会，土地所有权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商业和工业的所有权形式多少都带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具体表现为工业完全附属于农业，或者城市中的工业组织及其社会关系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到了以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或大工业生产已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农业逐步变为一个工业部门，完全受资本所支配。地租和土地所有权亦不例外。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① 此时，应当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先把资本看作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再分别对两者进行考察后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或者像蒲鲁东那样描述的“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②，都是错误的。质言之，对经济范畴次序的排列，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关系同它们的所谓自然次序或历史次序刚好相反。马克思借此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历史次序（即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或者在观念次序（即“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在于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同一经济范畴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式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

② 蒲鲁东指出，普遍理性对人类社会起决定性作用，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的工具及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呈现。每个经济范畴都对应特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的更替通过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的运动来完成。既然人类社会的前提和历史的出发点是普遍理性，那么，要叙述的不是那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理解了上述观点，就等同于找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和理性序列的方法，就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化。（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7.）

中，而且在同一社会形式的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的地位。在资本尚未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时期，包括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在内的古代商业民族、中世纪的伦巴第人和犹太人，他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抽象规定性，是由农业民族及其生产方式占优势的境况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只是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抽象规定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股份公司只是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而后才逐步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此外，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时还存在“国家”这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无形中都全部或部分保留着“创造国民财富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观念。这不过是一种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现代国家在财富本身和财富生产面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与工具。

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按照如下方式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此处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是指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基本范畴，它们在社会诸形式中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它们能够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但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它们作为社会现实的抽象的属性就愈发明显，并最终在政治经济学中被阐发出来。由于它们依存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以研究这些基本范畴对透析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产阶级内部结构及基本阶级所依据的范畴是资本、雇佣劳动与土地所有权。正如我们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所看到的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探讨模式，马克思先是讨论了作为一般抽象规定的交换价值的本质，接着讨论交换价值向货币的转化，以及由货币转化而来的资本一般（即资本的一般特性）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表现：第一，它是能够无偿占有他人劳动进而能够无限自我增殖的主体；第二，它是能够支配承担一般劳动的雇佣工人的总体劳动的实体；第三，它的具体表现是为生产而生产。随后，马克思讨论了资本发展的各种形式及其发展出来的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1857—1858 年手稿”的主体部分。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3.

第三章　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过程

从商品（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研究模式和写作思路，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极为明确的。对于资本而言，商品（价值）和货币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定。而且，交换价值和货币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密切联系的，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更是难以将它们区分开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有关价值的论述不是以专门章节的形式出现的，而是散见于“货币章”和“资本章”中。鉴于这种现状，按照一定的逻辑，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原初思想意图，将这些散见于各处的论述统合起来，无疑是中肯且必要的做法。《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章”、《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显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材料。

在这些材料的“指引”和“印证”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既为价值作为研究出发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以商品为载体描述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现实过程；既揭示出交换价值的本质，又刻画出现实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的场景；既解释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及其带来的矛盾，又论证出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交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此外，在论述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还有意识地将理论建构和理论史梳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更具有说服力。

一、商品（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

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摆在人们面前的正是大量琳琅满目的商品，它们是表现财富的第一个范畴，且自身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规定的统一。这是我们观照和把握资产阶级社会时所绕不开的前提，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共识。由此，在写作“1857—1858 年手稿”初期，马克思认为不需过多强调这个共识，更不用对此专门提供方法论依据。笔记本 I 中从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自然过渡到讨论价值（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的本质，就是很好的例证。与此同时，“导言”中已经明确了以一般抽象规定为起点的研究方法，若再论述商品（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就画蛇添足了。

然而，共识中必然包含着实质的差异。拿使用价值来说，当它以物质形态即作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体系的物出现时，可以从属于任何生产时期，因而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旦它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相互影响而发生形态变化，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出于体系的严整性而只做一般性的论证或描述，唯一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分析，将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作为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固定下来加以考察。但是，现实中的既定前提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的分析。使用价值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正是交换价值给使用价值打上了商品的印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忽略了上述事实，还把它颠倒过来。马克思则是要揭示出这个一定的经济关系，研究它之于使用价值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劳动一般”视为财富及其表现形式（商品）的源泉。这将导致一个逻辑上看似合理的“误区”，即直接从“劳动一般”着手剖析资产阶级社会。

综上所述，实质性差异的存在和避免误区的需要，使得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的生产过程时特意插入一些内容（笔记本 II 第 13-18 页），借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手法来强调价值作为逻辑起点的方法论依据，并最终将价值（商品）章作为开篇补加进来（笔记本 VII 第 63 页），且一直沿用

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中。我们的分析就从这些马克思插入的内容开始。

（一）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价值概念在理论上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概念本身是对现实的抽象表达。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价值概念的纯粹展开和现实生成都要以构筑于资本之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和单个劳动者本身来说已经不再是产品，产品如果没有通过流通实现交换价值和完成货币形式，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同样，如果生产者和单个劳动者没有创造出交换价值和货币，他们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基于对价值和资本相互关系的认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些场合把资本看作价值的创造者和源泉，而在另一种场合又将价值视为资本形成的前提，认为资本只是执行某种特定职能的价值额。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场合本身是不矛盾的，我们不能通过看似矛盾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的本质属性，它不是纯粹的概念或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① 价值规定的各要素更是如此，它们是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较早阶段的产物。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前，交换价值较使用价值而言只起着次要作用，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相反，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资本紧随价值之后并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前提，并且土地所有权也不能脱离这个前提而存在。

实际上，上述表述涉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层面。这就意味着，从价值过渡到资本，是处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统摄”下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在交换价值尚未成为生产的前提下，通过流通产生的交换价值和整个流通过程——货币同商品交换，商品同货币交换，即G—W—W—G，产生出资本的最初形式即商业资本，亦即流通资本的一种形式。**“这种为卖而买的运动，即构成商业的形式规定的运动，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最早的状态中；这是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内容的最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7.

初的运动，交换价值在这种运动中不仅是形式，而且是运动本身的内容。”① 流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形式是货币资本和货币利息，资本在这些形式上决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脱离了生产这个基础，只是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运动，决不可能形成资本。这种运动甚至可能导致货币的抽出、积累和消失。消融在同用以消费的商品相交换的一系列过程中的货币，会随着其购买力的用尽而消失，以货币为中介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商品也会退出流通而被消费和消灭。

与生产相比，流通本身不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它要受到其要素的先在性的制约。它不仅会被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要素所否定——从它们开始反复进行的过程会随着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停止，而且还被它们之间的简单交换和简单流通所否定。只有商品源源不断投入到流通中，流通才得以凭借这个中介而存在，它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此时，我们又回到创造商品的过程即生产。然而，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它显然不是生产过程的表面现象。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揭示的，生产决定着流通，这两者又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重要环节。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是这样的：**“它的前提是作为发展了的要素的流通，**并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断的过程。”② 这导致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以较为复杂的形态出现，既在历史上导致产生价值的劳动，又出现在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制度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制度内部。

这样，就又回到了资本是以劳动还是以价值为逻辑起点的问题。如果资本被规定为手段或生产工具，即生产出新的劳动的积累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方面，并把它错误地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忽视了资本本身作为历史产物的本质属性，以及使之所以为之的形式规定。将资本作为手段的规定使资本完全成为抽象的产物：除了积累的劳动之外，产品的其他内容（材料）都被抽掉了；同样，除了生产一般以外，产品作为手段用以实现的其他特殊目的也被抽掉了。实际上，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8.

② 同①211.

特殊规定，其要害在于错误地把资本理解为物，而不是关系和过程。此外，将资本与积累的劳动对应起来，显然是一种同义反复。如果从概念上赋予资本以直观的规定性，那只能是对象化的劳动。① 对象化劳动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而后者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产品。因此，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且已经从流通运动中得到发展的交换价值出发。正像不可能从原始自然状态直接过渡到蒸汽机时代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

（二）流通运动和来自其中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

从价值的概念出发阐明资本的概念，决不意味着可以从价值直接过渡到资本。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完成，即流通运动和在其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② 缺乏了流通运动，交换价值一开始在货币身上取得的与流通相独立的形式，或者是消极的、转瞬即逝的，或者是虚幻的、固定化的。货币只有与流通联系起来并真正进入其中才能存在；而它一旦实现，就又重新回到作为交换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这两个过去的规定上来。当货币同交换价值一样，表现为与流通相独立的形式，并且在其中保存它自身（及其交换价值）时，它就不再是货币而是资本了。要言之，货币作为交换价值到达资本的规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初将货币与资本混同起来，或者直接将货币视为资本的唯一适当形式，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交换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也决不意味着交换价值可以通过简单流通达到资本的规定，它在简单流通运动中总是会自我

---

① 马克思很早就将劳动和资本分别规定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客体本质，并阐明了它们的辩证关系。“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2.）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

否定即消失。简单流通包含着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要素，它不外乎有以下四种形式：（1）当商品以货币为中介同商品相交换时，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随着商品的实现而消失，商品本身也会脱离这种交换关系而成为直接的需要对象；（2）当货币同商品相交换时，不只是交换价值，甚至连交换的形式——占有商品自然材料的纯粹形式上的中介，都注定要消失；（3）当商品同货币相交换时，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即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纯粹是在观念上虚幻的实现，因为货币的实体形式即赋予交换价值的独立性以可被感知的形式，只有在货币退出交换、处于交换之外的情况下才能保存下来；（4）当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的时候，不同东西之间连形式上的差别都没有了，交换价值和使它消失的运动都消失了。上述四种规定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就是以货币还是以商品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是货币交换商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的物质内容相交换而消失；还是商品交换货币，即商品的内容同商品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相交换而消失。在第一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在第二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实体；可见，在这两个场合，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转瞬即逝的。”①

事实上，简单流通不是“自为的流通”即真正的流通，而只是“自在的流通”。从过程上来看，交换价值的实体是一定的商品，这是简单流通的实际起点；只有交换价值先变为货币再变为商品而重新回到这个起点，也就是说实际起点和复归点的同一，才是真正的流通。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不断地更换，商品同货币相对立也是如此。流通和循环只是在于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简单反复和交替。从结果来看，简单流通摆脱不了双重否定的结局。一方面，投入流通的商品都实现了各自目的，即通过交换成为需要的对象而被消费，失去了自身形式规定的货币成为单纯的残余留下来。这是单纯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肯定的否定——被否定的不是货币的对象性和自为存在性，即单纯在流通中消失的交换价值，而是其对立的独立性，即货币固定在其中的单纯抽象的一般性。

综合上述两种考察，货币都是否定并退出流通才得以自我保存。仅就货币被保存下来这一点而言，简单流通充其量是货币流通。相反，资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6.

本正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才保存自己。只有在资本的身上，交换价值才真正成为交换价值。它既没有失去实体，也没有丧失形式规定；它不断实现在另外不同的实体中，实现在这些实体的总体中，在每个不同实体中保存着自我同一性。此时，交换价值本身就是交换的不断更新的循环，与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流通完全不同。资本则以流通为前提并在其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不仅在观念上始终是简单流通中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而且还交替地采取它们的形式。这种交替不是从一个要素过渡到另一个要素，而是在观念上包含如下关系：“在这两个规定中的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①。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资本本身就是这两种规定的交替。第二，资本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资本在商品和货币的特殊性上表现交换价值的一般性，而这种特殊性本身是特殊性的总体，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不关注这种特殊性本身，而是不关注个别的或个别化的特殊性。资本所成为的商品不是某个具体的商品，而是商品的总体；它仍然表现为货币，却是暂时地采取这种交换价值一般性的对立规定，重新和商品相交换。作为资本的前提的交换价值，不再是存在于尚未进入流通中的商品的单纯观念上的规定，而是“（1）存在于对象性的形式中；（2）来自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但同时又是从作为流通前提的自身出发的”②。第三，资本作为交换价值的实体和形式规定，只有通过劳动不断增殖才能真正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同时作为流通的前提和结果，意味着它必须成为需要的对象而被消费，且必须由劳动来消费，并由此实现自身的再生产。按照其内容来说，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它本身就是劳动或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性质决定了交换价值可以通过简单流通就能实现客体化，达到作为可被感知的货币的存在。然而，到了真正的流通中，交换价值因必须重新设定出发点而重新设定劳动。它不再作为简单等价物或劳动的简单对象化，而是实现了自身的对象化和独立化：“它只是为了更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重新开始流通，才把自己提供给劳动，变成劳动的材料。因此，这也不再像在流通中那样是单纯的相等即保持交换价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8.

② 同①219.

值的同一性，而是自行**倍增**。”① 相应地，货币和劳动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货币作为资本从固定的可被感知的事物变成动态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实现了自我复归，从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变为把活劳动用作自我再生产的手段。

以上所说的三层意思，是从资本的角度阐释它同交换价值和流通的关系。如果转换一下“角色”，从交换价值和流通本身审视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也可以做如下表述：其一，对于任何商品来说，作为客体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以商品和货币的形式（规定）出现，且这两种规定不能同时出现。其二，从流通的全程本身来看，它是作为主体的交换价值的这样一种运动，即交换价值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交换价值在商品上作为货币和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的情况，在简单流通中只是自在地存在着，且没有表现出来；直到设定为资本的时候，才实现了自在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②

（三）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

马克思将商品（价值）作为逻辑起点，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展开的。不可否认，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范畴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经济范畴的出现跟随着现实的发展。这样看来，按照经济范畴出现的时间顺序逐一展开对它们的讨论，即写作政治经济学史的方式，似乎是明确的和有益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无法摆脱历史的一种常态——跳跃发展和曲折前进所带来的限制。如果时刻跟随着历史的“脚步”，就会注意到许多无关紧要的经济学材料，甚至随时打断思想建构的进程，陷入解释的无目的性中。再加上常常有必要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阐释，这就会陷入漫无止境的工作中，无暇顾及一切准备性的工作。此时，逻辑的方式成了唯一适用的方式。然而，现实与观念、历史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② 同①223.

进程与思想进程实际上又是密不可分的，这决定着逻辑的方式也是历史的方式，是摆脱了具体形式和各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的方式。正如恩格斯对此所做的解释："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

既然逻辑的方式是历史的方式，那么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马克思是从最初的、最简单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出发的，这种关系在抽象的思想进程和实在的现实进程（确实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中不断推向各种新的关系。从最初的关系来看，即便它是最简单的——就像价值那样，也意味着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通过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可以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和相互作用。与此同时，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意味着它们不是同一的而是差异的，差异性就意味着对立的存在，对立进而演变为矛盾。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本身不能消除这个矛盾，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着的，而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经由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解决方式在于新的关系的建立，而这种新的关系本身又会历经同前一种关系一样的过程，我们又需要说明这个新的关系的两个对立面，等等。综观整部"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所做的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考察正是按照上述方式展开的。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

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它可以采取逻辑的和历史的方式。不论从历史本身还是从反映它的文献来看，所谓的发展大体上都由最简单的关系向比较复杂的关系演进。这样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即理论史能够为批判这个学科本身提供一种自然的线索，而且，经济范畴在历史中出现的顺序与在逻辑中发展的顺序大体上相一致。这种

①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理论史之于理论建构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检视其文本创作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在思考和论证某个问题时，始终以对这个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和评析作为辅助材料。考察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对于理解马克思“1857—1858 年手稿”中的价值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写作“1857—1858 年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始终处于“进行时”，价值理论和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是他在较晚时候构思的内容，且篇幅少而分散。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章”的“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可以作为重要参照材料。

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并把价值置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领域；后者则把价值置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领域，且遵从和“服务”于分配规律。马克思并不赞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做法，因而在阐释关于价值分析的历史时将庸俗政治经济学排除在外。正如他本人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①

以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后半部分为依据，从“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分别论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在将劳动时间看作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的同时，这两个传统也确实有着一些实质性的不同，比如，“英国传统”主要以财富的生产为研究对象，强调生产、供给等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法国传统”则注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强调消费、需要的作用，提出了极具特色的比例关系学说。然而，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重点在前半部分，着重指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具有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同样，本书的论述也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强调的是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的发展脉络，也就是价值的二重性的被逐步揭示并确立其决定因素的过程，具体包括：交换价值如何被归结于劳动时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对象化在商品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

交换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如何从有用的实在劳动到劳动一般再到带有一定社会性质的劳动；等等。

（一）交换价值如何被归结于劳动时间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配第被公认为最先认识到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将价值归结于劳动。他不是直接明确地提出了上述论断，而是在有关地租、工资等问题的讨论中有所涉及，并以例证的形式说明了衡量各种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等量关系的方法。比如，采掘白银用以铸造货币的一个人的劳动和从事谷物生产的另一个人的劳动，尽管它们的所属种类、所需技术和承担风险等都不同，但是，只要消耗了等量的时间，就具有相等的价值。至于价值究竟是什么，配第没有对此做明确的说明。他只是在具体讨论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以及它们的关系时，对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稍作区分，将前者定义为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的人手的多少所决定的价值，将后者定义为生产中实际使用的人手所决定的价格的货币表现。此外，配第已经意识并谈到价值尺度的问题。在他看来，既然劳动和土地都能够创造出价值，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区分出劳动和土地在产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份额，找出表示它们各自所占价值份额的共同物品，即共同的价值尺度。

在配第那里，价值的二重性尚未被明确下来，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混用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他会将价值解释成为一定数量的谷物；有时，则直接说商品值多少货币。在另外一些场合，比如在谈论利息时，他把商品的效用直接称为价值；而在分析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时，又将它们所能提供的产品的数量分别称作土地价值和人口价值。

实际上，配第在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所说的价值是使用价值——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注意到自然条件对劳动创造力的限制作用。这里的劳动是实在劳动，它在社会总体形态中等同于分工进而等同于生产力。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使配第得以通过《政治算术》实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最初形式，而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同时强调劳动的作用却无果而终。综观《政治算术》一书，配第在具体论述中总能做到“以小见大”，以小的行业分工为起点来看一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在上述过程中，从感官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以及说明它们的数字、重量和尺度等形式，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他利用年租

金额乘以一定年数得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出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目和盈余收益推论出整个国家的财富。这种方法在配第看来不是传统的，而是开创性的，且能够成为一门新的科学的奠基石。“和只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语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他“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①。

比配第更进一步，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事实上已经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尽管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分析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费用时指出，只有按照“公平的价格”或“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偿付商品的生产费用，才会使得买卖双方都能在交易中互惠互利。而商品的“公平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的比例，即商品交换在自然状态下的平衡。只有实行完全的自由竞争，生产商品的各个人的劳动时间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的产业部门。② 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共同合作，才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自然的平衡或和谐状态。

第一次真正有意识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是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认为，银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稀少性和丰裕程度，其本身不具有一定的恒久的价值，所以，它可以作为交换媒介即作为财富的符号，而不能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的价值唯有用劳动来衡量，才是公正的。“白银的价值和其他物品一样，也可以用劳动来衡量。”③ 比如，假设在某个特定时间内，一个人种植谷物的产量（20 蒲式耳）同另一个人采掘和提炼白银的产量（20 盎司），互为自然价格。那么，此时生产 1 蒲式耳谷物所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就等于 1 盎司银的价值。假设由于发现了更近、更易开采和更丰富的矿藏，现在

---

①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

② “为了维持那种稳定人民和各等级的人们、从而稳定国王收入的经济协调，就决不应该使某一部分的发展超过其他的部分：也就是说，必须使一切贸易往来这样均衡发展，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同样得到好处，各得其所，否则，就像人们用不准确的度量衡出卖货物的时候那样，交易的某一方就一定会吃大亏。”（布阿吉尔贝尔. 谷物论//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5.）

③ 富兰克林. 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 刘学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9.

一个人生产 40 盎司白银和生产 20 盎司白银一样容易，而生产 20 蒲式耳谷物所耗费的劳动仍然不变，此时，1 蒲式耳谷物就值 2 盎司白银。这样看来，一国的财富不是由它的居民拥有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而是由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价的。对于任何经济学家而言，实在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都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问题关键在于替它们的价值量找到一种尺度。由于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所以，“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①。富兰克林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此。

比富兰克林稍晚一些，斯图亚特也有意识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然而，从配第到布阿吉尔贝尔再到富兰克林和斯图亚特，他们关于衡量交换价值的因素的，不论是事实上的、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浅显而明白的，都是建立在没有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格区分的基础上的。在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阶段上，经济范畴尚未或正处于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以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的形式出现，交换价值也不例外。比如，斯图亚特有时会说商品的实在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有时又会把原料和工资也加入实在价值的决定因素中；在某些场合，他把商品所含的自然物质称为其内在价值，而把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其使用价值。

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前者表示物品的特定效用，后者则是指由于占有某物而获得的对他物的购买力。斯密通过揭示现实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来批判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说：“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物品才能与之交换。”② 此时，交换价值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归结于劳动时间。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0.

②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

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对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做了最为透彻的阐释和发挥。他指出，在任何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种商品的价值直接表现为能够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上，而不是劳动量上。商品的这种价值被李嘉图叫作相对价值，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则被他称作绝对价值。除了非再生产性商品以外，生产性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交换价值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非再生产性商品的价值量则取决于其稀缺程度。

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在批判“英国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价值理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只考察财富的生产，还应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人是出发点和归宿，财富是人们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个人的生产源自他的需求和愿望，即消费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在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之前，产品的价值只能用效用来衡量；而在交换经济中，效用被交换价值的概念所取代，消费决定生产就表现为社会需求要优先于社会供给。因此，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应当保持相应的比例。在此基础上，西斯蒙第进一步得出了如下结论：价值就是人们的需求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总需求量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总量之间必须要保持一定必要的比例，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平衡的保障，是消耗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从而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的重要前提。二是单位商品所代表的价值量是由社会所决定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构成的。“每磅银子用来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日，用它可以开矿，并且可把它带到交换银子的地点：对那些规定数额的人来说是个未知数，然而社会是根据需求双方的相互努力来作出估计的”①。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有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

①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 2 卷. 胡尧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3. 译文有改动。

必要劳动时间”①。

（二）确证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漫长历程

古典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这样一个前提：并不是任意一种劳动，只要创造产品或实现为使用价值就能直接创造财富。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配第等人，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事实上承认这一点。和交换价值被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历程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何种特殊的实在劳动可以作为财富的源泉，这个问题在18世纪演变为实在的有用劳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对立。

认识到劳动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意味着配第实现了对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的理解。他只看到了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就把交换价值直接看成货币，而把货币本身看成金银即存在着的商品。正是受重商主义财富观即货币本位观念的束缚，配第才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固定到特殊种类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上面。“他实际上是认为，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让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对象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②

与配第相反，布阿吉尔贝尔强烈地反对货币，认为后者破坏了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谐，且无意识地证明出劳动时间可以作为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尽管如此，他还是将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③ 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和享受（而非财富的精神内容）。至于劳动在特定社会中的形式（古代形式、中世纪形式和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等等，都被他看作个人劳动达到满足人们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5. 并参见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 胡尧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6.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7.

③ “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已经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布阿吉尔贝尔.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53.）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同布阿吉尔贝尔一样，整个重农学派也都无一例外将确立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①

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富兰克林也认为农业劳动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的唯一正当的途径。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即生产尚未发展的阶段上，人们通过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能够大量增加物质生活资料，包括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以及衣服原料等等。它们除供给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属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而这些剩余就是财富。正是农产品的多余部分转化为商品，构成商品交换的主要对象。而且，农产品的剩余是制造业和商业赖以产生的基础。人们有了多余的产品或财富，才有可能雇用劳动者，建造房屋，制造工业品，兴建城市，等等。由此可见，房屋和工业品不过是由维持生活的物品转化而成的另一种形态。人们拿他们劳动创造的剩余物品进行交换，互通有无，这就是贸易。“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劳动同劳动的相交换……一切物品的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是最公正的。”②在这里，一旦将“劳动”替换为“实在劳动”，就会发现富兰克林把不同形式的劳动混为一谈了。由于他没有把交换价值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转让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所以，他认为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它只是为了使用方便而被引入到交换中的外部工具。这种出于一定实际需要而对个别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决定了富兰克林关于交换价值的分析无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发展起到更为直接的影响。

斯图亚特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有的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即作为产业的劳动和实在劳动的区别。在他看来，产业劳动是与劳动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形式。不仅如此，他还较早地揭示和证明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才真正成为财富的基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1.

② 富兰克林. 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 刘学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1.

本的元素形式，转让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

有赖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严格区分，斯密结束了财富的源泉在实在劳动的诸多特殊形式之间轮流的状态，“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①。在他看来，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是衡量它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则最终决定了它的真实价格即价值。“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做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② 既然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量自然同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成正比。

诚然，斯密将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但是，他又把这种决定性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时代，对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中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他关于价值的分析还存在两个致命性的缺点：一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的真实价格直接等同起来；二是把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这两种异质性的东西并列起来使用。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向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转化，却又陷入了从交换到分工再到交换的解释循环。③（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无疑是正确的，将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就错了。在一些有过十分发达的分工的地方，比如古代秘鲁社会中，就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未转化为商品。

李嘉图看到了斯密的上述缺点，并做了一定的修正。得益于对其所处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都在降低，而商品本身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却始终处于变动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3.

②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2.

③ 早在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期，马克思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中写有如下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又以分工和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MEGA2，IV/2，Berlin：Dietz Verlag，1982：336.）

不居的状态——的认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斯密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和它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混为一谈的做法，坚持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的观点。这种劳动被李嘉图称作社会必要劳动，即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所耗费的较大量的劳动。并且，任何种类的实在劳动都可被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复杂劳动只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而已。社会必要劳动又有直接的形式和间接的形式，商品的价值本身相应地就包括工人直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由间接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只有工人新加入的“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机器等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创造新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要义并不在于确证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而在于或者限于恒定交换价值的量上。①

诚如李嘉图本人所言：“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② 这就是说，价值规律的发展和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它要以资产阶级社会即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为前提。同时，他又在许多地方完全忘记了这个历史前提。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永恒化并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通病”，李嘉图也未能幸免。受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看成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按照他的理解，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最早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不仅一下子获得了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懂得用对象化在鱼和野鹿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它们，而且还知道把劳动工具的折损率和雇用他人的费

---

① 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要义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物品的稀有性和获得它所需的劳动量确定了其交换价值。第二，既肯定了亚当·斯密把劳动时间当作一切物品（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其数量的物品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的意义，又指出其缺陷在于使用多个价值尺度和观点适用的局限性。第三，产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是有区别的，资本积累、资本在性质上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工资率对产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第四，物品的价格不是如一般所说的由供求关系来调节，而是归根到底由生产费用来调节。（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0-92. 并参见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9，20，及其注释2，74，327，330.）

②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

用考虑进去。[①]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李嘉图在此犯了时代错误。

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西斯蒙第基于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分析，事实上已经认识到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有社会性质。他论述说，商业兴起之前的时期，每个个人创造财富的目的是自己的使用，产品数量的增加就是财富的直接增加。自从有了商业之后，个人不仅要将其劳动产品供给社会中的其他个人消费，而且其自身的消费也要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此时，劳动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带有社会性质。每一个个人都为自己所不认识的其他事物个人劳动，即为社会劳动，并从社会中获得相应的劳动报偿。与此同时，对产品估价的效用概念被交换价值的概念所代替，“只有劳动，也就是为互相交换的两种物品所作出的必要的努力才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②]。这就表明，西斯蒙第业已将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归结为一种特殊的间接的社会劳动。

（三）对上述批判性成果的反思和超越

就理论的最终走向而言，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分别实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意识终结（完成即终结）和有意识终结（自我否定）。[③] 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准确判断。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批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并辅以西斯蒙第的价值理论作为论据，似乎顺理成章且极具说服力。事实上，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种种非难，都集中到了李嘉图身上。这些非难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第一，劳动时间已经作为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样就会陷入一种不断追问尺度的恶性循环。工资作为劳动的交换价值，它的内在尺度又是什么？第二，既然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一定量的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应当与同等数量工作日的产品相等。可是，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

---

①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 1 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0-21.

②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 2 卷. 胡尧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2.

③ “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5.）

的生产中，为什么会出现工人的工资不足以偿付他所创造出来的产品的价值的现状？第三，商品的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围绕其交换价值上下波动，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由此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基于交换价值形成的与它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交换价值规律是如何且只能实现在它的对立物中的？第四，如果交换价值不外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非劳动创造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

对于力图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马克思来说，逐一揭示和解决上述四类问题，直至批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都是必不可缺的理论工作。马克思本人也明确表示要分别从雇佣劳动学说、资本学说、竞争学说和地租学说中解决它们。同时，只做到这些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意味着退回到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旧有模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的超越，必须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

综观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始终是围绕商品即物本身展开的，其所论述的“历史过程”都是从产品由个人或原始共同体（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的。但是，与物相结合的始终是人与人的关系，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它身上结合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这样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就会出现有悖自己的宗旨的一个事实——它研究的不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其背后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这个可怕的事实势必引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混乱。实际上，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如西斯蒙第，也在个别场合察觉到凝结于商品之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首次科学地揭示出这种联系之于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意义，并运用他的辩证方法让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这个难题变得简单明了。[①]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考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了的商品关系，而不是从在最初的自然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形成且艰难发展着的

① 正如恩格斯所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605.）

商品关系出发，分清和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各自的规定性，再揭示出商品在进入交换过程中所呈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性，以及产生的矛盾和矛盾的解决。

三、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

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既定前提有着明确的限度，这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并不适用和扩及每一个商品所有者身上。事实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商品中既直接结合着，也彼此分离着。商品所有者只有不把商品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时，才使得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和真正成为商品。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和交换，商品所有者才能占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以满足其需要。从转让和交换到占有，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基本形式，交换价值则自然成为这种社会生产制度的最简单和最抽象的表现。那么，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究竟是怎样变为商品的呢？商品又是如何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呢？马克思对此做出了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答。

（一）商品二重地存在着

客观而全面地揭示一定的事实的过程，首先要正确描述这个事实。商品作为二重物存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和最简单的事实。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也是以此为论证的前提，但做出了不同的表述。他是从现实中可以感知的商品本身，而不是从观念上把握的价值出发，来描述这种二重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篇将“价值”改为“商品”的重要原因。当然，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关于作为逻辑起点和一般抽象规定的价值的阐释，和关于商品的二重性的阐释结合起来。“商品二重地存在”和“商品的价值具有二重性”，这两者虽然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代表的是不同的致思路向。商品同时作为一定的产品的存在和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前者在自己的可被感知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潜在）地包含着交换价值，后者则又抛弃了同前者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而只作为社会形式存在。对于前一方面，我们不难理解，并非所有具有使

用价值的产品都具有交换价值。后一方面，即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及其产生过程，则成为马克思论述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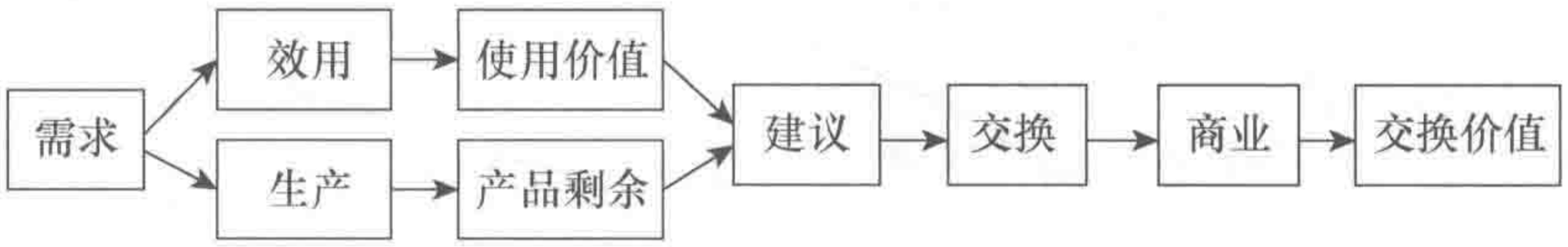
“商品 a=1 先令（1/X 银），商品 b=2 先令（2/X 银），商品 b=商品 a 的价值的两倍。”这是马克思在探讨交换价值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公式。他意在说明，只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比例适当，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完全同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关系是在观念上实现的，即价值比例是通过与一个价值比例相交换得以实现的。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是通过这两者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比如银）相交换的比例得以实现的。申言之，商品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其交换价值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比如，去除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在交换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等、实际价值和价格相等的前提下，某个商品等于 1 小时劳动时间，就意味着它可以同都是 1 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一切商品相交换。“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全都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量和互相替换（互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①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本身显然是不同的，后者只有在现实或观念的交换中才成为前者。交换价值在表征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的同时，也成为商品的特有的可交换性。另一方面，从本质的角度来看，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社会关系，即经济上的质。当作为交换价值的时候，商品是其他商品的一定比例的等价物。这就意味着商品失去了它的一切自然属性，也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不仅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交换手段，而且是它们的一般尺度。为什么商品必然会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呢？马克思对此解释到，各种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差别只体现在量上，每一种商品在质上和自身的交换价值必然是不同的，后者也必然在质上取得一个与前者相区别的存在。由于商品的自然差别和经济等价之间必然发生矛盾，所以商品和它的交换价值的可分离性在交换中变成实际的分离；而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并存，只是由于商品已经取得了二重存在即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价值的单纯符号。”① 这决定了商品是可以等分的。而在其自然存在中，商品却不是这样。

不难理解，交换和需要在商品具有二重性存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交换和需要显然是历史的和现实的，而不是观念上的。马克思始终强调这一点，并且强烈反对将交换和需要观念化的各种做法，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就这样做过。蒲鲁东曾经构建出一条从需要到交换价值的观念演进路径，具体如下图所示：



蒲鲁东认为，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产品的有限性或不存在性，决定了他们要进行生产。由于个人受其精力限制而不可能生产出满足其需要的一切产品，所以，他就开始求助于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并“建议”（proposer）后者和他进行产品交换，最终以商业形式固定下来。此外，这种交换还需满足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有所剩余，也就是生产大于消费。马克思对此批判到，蒲鲁东所做的只是一种前提和结论等同的循环论证。满足人类各种需要所进行的不止一个人的生产行为就是分工，而交换本身是分工的前提，有了分工就意味着有了交换。这样，蒲鲁东的上述逻辑就可以归结为：需求→生产＝分工＝交换→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② 不仅如此，蒲鲁东的谬误还在于用被永恒范畴化的建议取代人类进行产品交换的历史，抹杀了交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质的差异。从交换的范围来看，最初的时期比如中世纪，用于交换的只是生产超过消费的那部分产品；而在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中，一切产品都处在商业的范围内，全部生产都以交换为目的；到了最后一个时期，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包括德行、爱情、信仰、知识以及良心等在内，都可以变为交换价值。“建议”这个范畴，显然无法实现上述最初的、二次方的、三次方的交换。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0.

②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

如果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强调需要和交换的历史性，那么他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正面阐述它们的现实性。他指出，商品在实际中进行交换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形态或存在形式上的异质性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时具有一般性，不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具有多少存在形式，都保持不变；同时，它的可交换尺度取决于它自身。相反，商品作为实际的商品时则是一种特殊性，它只有符合一定的特殊条件，即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与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

（二）价值符号的中介作用

简单来说，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的过程是：产品成为商品即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一般说来，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才能使自身重新个体化。”① 同样，完成产品成为商品和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首先要将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我们在计算、记账、估价等等时，都会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在头脑中或观念上将商品的物质及其一切属性抽象掉。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即是如此。马克思举例说，西非海岸的某些人就使用金属条块（bars），某种商品等于 X 金属条块，商品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相交换前，这些人先在头脑中和语言上将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再进行估价，最后进行结算以抵偿一个交换价值超过另一个交换价值的余额。

同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一样，对商品进行单纯的比较即估价，也只要在头脑中进行就够了。马克思指出，不同物之间的单纯比较，离不开一个中介即与它们自身都不同的第三物，商品交换亦不例外。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②——交换价值即一定量的劳动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② 马克思认为，其所以在质上不同，有两方面的原因：（1）商品不是作为处于运动形式和过程形式的劳动时间，而是处于静止形式和结果形式的物化的劳动时间；（2）商品不是只存在于观念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个一般劳动时间是与自身相分离的、只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和自然规定的劳动的一定结果（这个劳动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

时间。“转化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明若干量的其他商品和它相等，是它的等价物，或者说，它按什么比例是其他商品的等价物”①。例如，为了确定一码麻布能够交换多少磅面包，我们首要使一码麻布＝其自身的交换价值＝1/X 劳动时间；同样，还要使一磅面包＝其自身的交换价值＝1/X 或 2/X 等等劳动时间。于是，我们得出 1 码麻布＝y 磅面包。此时，这个第三物就成为一定的关系的表现，它最初存在于想象中和头脑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的那些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②

诚然，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只需要一种抽象即观念上的价值符号，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纯粹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但是，当某种商品成为交换价值时，它不仅在量上转化为比例数，而且必须在质上转化为另一种要素；正是后一种转化，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变成可通约的。换句话说，在实际交换中，抽象必须对象化，通过一种实际的中介即对象化的价值符号来实现。马克思对此解释说，一方面，当商品在实际中进行交换时，其自然属性（物质上的不可随意分割性）同其作为交换价值和纯粹名数的规定（可同约性即可分割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对象化活动，实际的交换总是在特殊的境况下完成的：进行交换的总是特殊的商品，它们是否可交换和按照怎样的比例进行交换等，都要受地点和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对象化的价值符号的出现是必然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头脑中一下子就能做出的商品之间的比较，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相继实现的。当某个人取得了 100 塔勒（Taler，德国旧银币名）的收入时，他并不是直接交换一个交换价值为 100 塔勒的任意商品，而是按照其需要的顺序交换总共等于 100 塔勒的一系列商品。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只是表明这个商品是等价物，表明它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而不是让它和其他一切商品相等。由此可见，让商品只和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交换，并不能使商品实现作为交换价值且具有它的一般作用。与商品相交换的第三物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② 同①.

必须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这种象征是以得到普遍承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社会象征且实际上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①；它不是一种先验观念的实现，而是现实的交换本身的产物；它代表劳动时间的可除部分，代表着这样一些可除部分的交换价值，即通过简单算术组合来表现出各交换价值互相间的一切比例。

（三）使用价值的前提作用

产品成为商品和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符号的中介作用，更多是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所做的考察。由于使用价值是商品之为商品的既定的和必要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在最初的写作中认为只从交换价值的角度考察就足够了。这种考察在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向其社会属性转化的原因方面是充分的，但在解释具体的转化过程方面却是不充分的，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的相关论述（笔记本 I 第 12-14 页）中，时而前后重复，时而插入叙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总是仅仅从结果的观点上被考察。”②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才在后来的正式出版物（《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专门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对其之于交换价值的前提作用加以考察。

马克思指出，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而言，使用价值在财富的任何形式下都是构成它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商品首先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给人们带来享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作为人类需要的对象，商品是最广义的生活资料。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物质的存在是一致的。使用价值在质上和量上都是一定的，其用途的多少全在于它作为一定属性的物质存在，它的尺度的大小也与其自然特征相一致。使用价值虽然因作为社会需要的对象而处于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对于商品来说，成为使用价值

---

① “事实上，被用作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商品的一个象征又可能代替这种商品本身。这种商品现在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3-94.］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9.

是必要的前提；相反，对于使用价值来说，成为商品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与经济规定无关的使用价值，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前提的限度在于：它只有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的时候，才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

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不同的使用价值（质）之间可以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且表现为一定的比例关系；只要比例适当，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完全同值。比如，虽然诗歌和烟草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但是1本《普罗佩尔提乌斯诗歌集》和8盎司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又如，为了说明他们生产的大批的鞋油的交换价值之大，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的交换价值来描述。“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①

在明确了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前提的限度之后，马克思接下来就需要考察使用价值的前提作用是怎样体现的。承前所述，从属性和用途上看，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而后者本身又是对象化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一切商品都是同一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定性质的劳动的结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抽象一般的劳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同的使用价值成为具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同一交换量，意味着它们代表着同一种一般的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因与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而与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也无关。另一方面，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个人的活动即个性不同的劳动的产物，相反，使用价值却代表着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即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一旦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就消失了，不同种类的劳动的质的差别也随之消失。此时，劳动所能具有的唯一差别就只能体现在量上，即劳动本身持续时间的长短。劳动时间既是劳动量的活的存在，也自身带有内在尺度（时、日、周等）；它既是让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也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1.

是对商品的一定价值量的计量。

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当量是等价物，换句话说，一切使用价值，在它们包含的已支出的对象化劳动时间相等的比例上，都是等价物。"① 这里的"等价物"的实质就是表现在别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同的交换价值总会以不等的体积表现相同的交换价值。在包含相等量的劳动时间的情况下，一个商品所用的使用价值体积越小，其特有的交换价值就越大；反之亦然。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不同的使用价值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彼此间总是构成一个特有的交换价值的系列。这个系列中的交换价值彼此间虽然不是保持着不变的比例关系，但是保持着诸如金、银、铜、铁这样的高低级次的一般关系。这种物的关系显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

四、交换价值的实质及其表征的社会关系

按照恩格斯的表述，在揭示商品背后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其之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方面，马克思具有首创性。认真梳理内容形式复杂交错的"货币章"，不难发现马克思有着极为明确的旨向，那就是揭示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所表征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旨向并不是始于马克思写作"1857—1858 年手稿"时期，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以批判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方式，深刻阐述了由劳动时间衡量的交换价值所反映的工人遭受奴役的残酷社会现实。到了"货币章"中，马克思进一步对上述社会现实的内在机制——彼此独立的个人之间是如何实现相互的和全面的依赖的，以及这种社会联系如何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做了清晰的剖析。如果说马克思最初强调的是交换价值所表现的阶级之间的对抗性，那么他后来所做的补充和修正，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社会联系中（潜在）包含的对立和矛盾，则更为全面一些。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2.

（一）劳动力变为商品和工人遭受奴役的现代公式

马克思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劳动力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彻底沦为可以被买卖的商品，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的，这是“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劳动力这种商品是由生产它时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即“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① 来衡量的。由于资本家为了现实利润的最大化会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所以，劳动的自然价格（正常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而工资的市场价格总是趋向于这一数额。工资的具体数额的决定权是掌握在雇用工人的资本家的手中，工人只能依靠微薄的工资来购买能够勉强维持生计的必需品，这样，工人的命运就被牢牢地掌握在了资本家手中，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当务之急就是揭露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而不是像蒲鲁东那样幻想着用劳动时间的均等来直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②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劳动力是被进行买卖的商品就意味着：第一，劳动也具有交换价值，它取决于食物的贵贱、劳动人手供应量的大小等，但劳动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并不生产什么。第二，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性劳动，而是某种特定的、具体的劳动，这类劳动的特性与劳动对象之间互为决定要素。第三，同其他商品一样，人们购买劳动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效用，把它当成生产工具，这与购买机器无异。总的来说，“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③。

尽管劳动力可被买卖，但“劳动价值”与“劳动的价值产品”是各不相同的。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劳动价值根本不能成为

---

①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94.

② 蒲鲁东的立论要点在于：“任何产品的价值都等于它的成本，产品必须用产品来购买，可以推论出生活条件平等的定理。”具体而言，劳动日是人类生产系列中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劳动日与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不存在质的差别。因此，社会上一切成员的工资都是相等的，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2.）

③ 同①101.

价值尺度，商品能够购买（交换）的劳动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根本不是一回事。固定单位数量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可能会增加或减少，但这些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始终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如果生产一缪伊的粮食由原来耗费一个劳动日增加到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交换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缪伊粮食能购买的劳动量绝不会增加一倍，因为它的效用和原来一样。同理可知，若用同样的劳动能生产出比原来多一倍的衣服，那么衣服的交换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这些衣服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并不会降低一半，还是和原来一样。这样看来，劳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确定的交换价值，劳动能生产的商品数量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一种与经济事实相抵触的循环论证。

就其实质而言，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当成价值尺度得出平等的结论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以麻布、呢绒为例，它们本身都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这些劳动量不会随着制造上述产品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地位的变化而变动。同样，假定生产麻布、呢绒所需的劳动量是相等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是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也不会改变产品制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好占有他们以前在呢绒中所占有的那一份。这也就意味着平等分配在交换之前就是可以存在的。因此，蒲鲁东所认为的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的产品，以及它们的交换会使生产者获得均等报酬，这种说法就是用平等来证明平等的循环假设。

更为重要的是，把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决不意味着每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只有竞争才是各种不同劳动日的尺度。尽管竞争可以决定着一个复杂的劳动日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即复杂劳动日可以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日，但是，这不能代表简单劳动可以成为价值尺度。在马克思看来，将复杂劳动日化为一定数额的简单劳动日与蒲鲁东的任何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说法，在实质上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在用一种换算方式或比例公式把不同质的劳动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不同劳动在现实中质的差异。这样做的实质是在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枢纽，其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极端的分工和机器的普遍使用，不同的劳动逐渐趋向一致；劳动把它的主体即人置于次要地位，钟表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尺度；在一切生产活动中，时

间就是一切，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正如后马克思时代的一些学者所言，工业革命的标志不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而是钟表成为一切生产行为的尺度。这种劳动的量化和平均化不是蒲鲁东所说的永恒平等的体现，而是现代工业生产的真实写照。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非但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蒲鲁东所期许的报酬均等，反而使他们彻底沦为现代工业的奴隶。

（二）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前提

客观而言，尽管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乃至之前的著述中已经认识到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并对这一命题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缺乏对一些要点的实质性分析。这些要点有：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前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和特征。[①] 这实际上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最后的成果”的正面回应，而且它本身是理解交换价值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的前提的。基于对这种回应的必要性的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做了系统的阐释。

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包含两个前提：一是把不同种类的劳动都简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二是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其中，第一个前提表现为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这种抽象带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用时间来量化的一般人类劳动，存在于平均劳动，即一定的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简单劳动中。简单劳动，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非熟练劳动”（Unskilled labor），也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完成的一定的体力和脑力的生产消耗。就其性质而言，简单劳动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不尽相同，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却是一定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简单劳动构成了它的所有劳动量的绝大部分，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都可以简化为复合的或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作为交换价值，复

---

① “要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必须把握住下列几个主要观点：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因而生产商品的劳动借以成为**社会劳动**的特有方式；最后，以使用价值为结果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结果的劳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2.）

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① 在第二个前提中，所谓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一定的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每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对象化在一定商品中的不同的个人的劳动总是一样多，或者说，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

（三）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特征

诚然，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前提的上述说明，显然是认同并吸收了李嘉图的观点。但是，李嘉图只是停留在这两个前提上做关于劳动的量的分析，而没有关注劳动的质即它的社会性规定（社会性质）。简单劳动对现实的个人意味着什么，它表征着怎样的社会关系，这是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盲点”。马克思超越李嘉图乃至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方就在于，从对交换价值的上述分析中不仅得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特有的社会性规定，即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劳动的规定，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规定，而且还从哲学的维度阐述这种社会劳动的三个社会性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首先表现为相同性，也就是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它是不同的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们的劳动通过交换价值所化为的同种劳动，以及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关系。由此可见，交换价值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只有作为相同的劳动同所有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时，才表现为交换价值；而且只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有相同性这种社会性。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第二个社会性特征是一般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劳动的一般性与个人劳动的一般性，以及作为后者直接表现的个人劳动的社会性，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劳动是以分散的即以个别的形式出现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个人劳动是通过与自身相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的。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这是个人劳动的一般性之一，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3.

后者又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既然不同的个人的劳动具有相同性，或者说，他们完成的是同等的劳动，那么个人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简言之，任何个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是其他个人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一般劳动时间同时作为不同的个人的劳动时间和共同的劳动时间，所以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为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作为一般劳动时间，它在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或一般等价物中表现出来。个人劳动要成为交换价值，就必须成为一般等价物，因而使个人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但是，社会劳动的社会性不在于个人产品作为一般等价物相互交换，或者说，不在于个人产品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无差别且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①。即便社会劳动的最初历史形式，即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的共同劳动，其社会性也不是通过个人劳动采取抽象的一般性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作为生产前提的劳动，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而不是成为私人劳动。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最后一个社会性特征是颠倒性，即人和人在其劳动中的关系被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彼此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如前所述，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相同的和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则是具体的和特殊的个人劳动。只有在一个作为物的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与其他同样作为物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的个人劳动才作为相同的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相互发生关系。马克思据此得出如下结论：交换价值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若换个角度来说亦是如此。既然两个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所以交换价值表现为作为物的使用价值的固有规定性即社会的自然规定性。正是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才在交换的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相互替换并成为等价物。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颠倒性本来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是司空见惯和不言自明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当这种错觉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5.

适用于理解简单的社会生产关系如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关系时，人们或多或少还能感觉到这是他们与其相互之间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可是，一旦这种错觉适用于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就会犯无可挽回的致命性错误。正如货币主义者的一切谬误根源在于看不清货币的本质和形式（它本身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形式）一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上也会陷入错觉，他们往往会将这些本身表征着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范畴错误地解释为永恒的可以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的物。嘲笑货币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同样会被嘲笑。“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①

在揭示出交换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前提，以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特征之后，马克思便不难归纳出交换价值的实质：（1）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发生的关系；（2）劳动的一种特有社会形式的对象化表现。以此来重新审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的说法，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如果说劳动是生产交换价值和由它构成的那种财富的唯一源泉，或者说，自然物质因不包含劳动而不包含交换价值，就都是同义反复。生产交换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前者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后者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往往将两种劳动混同起来使用。第二，如果说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就是错误的。从商品的观点出发，使用价值是它的前提，也就等于说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因合乎一定的目的而具有特殊效用。既然劳动是使自然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自然物质作为前提。“劳动作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② 况且，使用价值总要有一个自然的基质，尽管不同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和自然物质的比例大不相同。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27.

② 同①429.

（四）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

毫无疑问，交换价值表征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探究交换价值问题的前提。至于这样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没有做出说明。而在这个正式出版物之前的手稿中，马克思却专门对此进行了阐释，也就是我们所熟识的关于“社会形态三阶段说”的那部分论述。

承前所述，马克思始终较为重视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力沦为商品的事实，并试图从中找出一条社会变革的道路。他在“1857—1858 年手稿”的“货币章”中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大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以至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交换价值。这个过程的实现，既要以生产中的个人的一切旧的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他们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个人的生产和消费，都愈发地依赖于其他个人的生产和消费。同样，交换也得到充分发展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并延及一切生产关系。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然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

这种互相依赖之所以表现为如此，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当每个个人都追求私人利益时，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个人的私人利益即普遍利益服务。相反，每个个人都在妨碍着其他个人的私人利益的实现。正如霍布斯所说，自然状态最本质的特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其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不仅如此，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都是由不以个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彼此独立的个人的社会联系对象化为交换价值的原因是：（1）每个个人只有通过且必须生产作为一般产品的交换价值，才能使他的产品或活动成为属于他的东西；（2）每个个人正是凭借交换价值的所有者身份，才能够行使支配其他个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

除了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之外，以交换价值为中介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6.

的交换还受社会分工的影响。这是由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自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起就意识到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每个个人为自己劳动而参加社会总的生产，其目的不是自己使用劳动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这些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与交换的互相补充，是个人作为生产者互相间关系的体现。当社会分工形成并固定下来时，它仿佛呈现为一种存在于个人之外且不以个人为转移的自然关系。随着生产者统一于整个社会分工中，其私人利益同时又被完全隔离起来。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私人利益的隔离，作为前提使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得以实现。

“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① 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使得个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包括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和产品的社会形式）和它的表现形式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事物：一个是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家庭、氏族和共同体的个人，他可以从自然界直接进行自我再生产，或者在一定的劳动和产品形式下参与生产活动，并由此决定他和其他个人的关系；另一个却是个人任何形式的活动和一切活动的产品都成为交换价值，也就是一切个性和特性都被一种一般的东西否定和消灭。要言之，对于个人来说，其活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异己的和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他们从属于一些由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利害冲突所产生的且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关系，而不是变现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交换价值上，这种异己性同时表现为颠倒性，即人的社会关系和能力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相应地，物的能力越小，人的能力就越大；反之亦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②

在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的情况下，个人如果想从物那里夺回这种权力，必然要赋予他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马克思指出，从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② 同①107.

个人互相间不存在社会权力到他们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再到他们不断夺回社会的权力的过程，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式或阶段。其中，个人互相间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个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个阶段上最终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 这个阶段的实现，有赖于第二个阶段所创造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和封建制度等都会没落下去，而资产阶级社会所代表的现代社会则会同步发展起来。

五、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和解决方式

强调在商品上实现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否定它们的对立。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阐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对立不同，马克思的关注点在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本身及其现实性。在他看来，商品所实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从属于商品自身的限度，即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互相间的实际关系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是彼此独立的个人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活动，他们互为对方的和他们的商品的存在，因而实际上只作为这个过程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出现。个人在这个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样，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就出现了商品所有者、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以及围绕着它们所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具有抽象性和理论性，而且还反映出自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直接的和简单的物物交换——以来就有的且源于其本性的困难和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过程又是货币的形成过程，因为商品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结晶为一般等价物的不同规定。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就相应地过渡到货币上。将代表一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到货币上，是解决上述不可能性的方式。

（一）商品的交换过程是矛盾的展开和解决的统一

关于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并未做详细的阐释。他在手稿中将交换价值和货币放在一起论述，指出货币同商品并存从一开始就没有掩盖随着这种关系而产生的矛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才正式展开相关论述。

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商品只有进入交换过程，经历抛弃其形式存在——它对于其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而对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这个唯一的形式变换，才变成使用价值。要言之，个人的商品从其他个人的使用价值变成他本人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个人的商品必须首先变成其他个人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固然是使用价值；但与此同时，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它同时又不是使用价值。假如商品在其所有者那里成为使用价值，就直接是满足后者需要的手段，而不再是使用价值。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只是非使用价值、交换手段和交换价值的积极的物质承担者；它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时，才是他人即其他商品所有者的使用价值。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在上述规定性上理解使用价值。① 个人的商品一旦无法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他的劳动就是无用劳动，而商品也不再是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商品所有者的生活资料在他本人的商品之外，在别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必须成为其所有者本人的使用价值，成为满足后者自身需要的对象。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全面地变化位置，从将其作为交换手段的人手中转到将其作为使用手段的人手中。正是通过商品的这种全面转让，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才成为有用劳动。不同的个人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彼此间发生着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不仅没有

① “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但这总不是鞋的正用，因为制鞋的原意［是为了自己要穿着，］不是为了交换。其他一切财物的情况相同，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5.）

取得任何新的经济的形式规定，反而失去了它们本来具有的形式规定。①

商品进入交换过程为交换而存在，就意味着它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实现为交换价值才实现为使用价值。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变现为独立的物，相反，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一开始就是在它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中被考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由此而产生。马克思认为，作为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商品固然是交换价值，但它又不直接是交换价值，而是先要变成交换价值，因为它的直接形式只是具有特殊内容的对象化的个人的劳动时间。作为使用价值，商品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它可以交换的原因在于它作为等价物存在，而它成为等价物的原因则是它包含等量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只在于它作为等价物去任意替换一定量的任何其他商品。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及其同特殊需要的关系，即它对于其他商品所有者是否为使用价值，都无须考虑。但是，一个商品只有对其他商品的所有者是使用价值时才成为商品，而它对于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只有在上述前提下才成为交换价值。这就是说，不同的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量和量的关系，同时又应该是作为质上不同且满足特殊需要的物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表现为商品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它作为各种使用价值而相异的关系，既是同一的又是相互排斥的。它是“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而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出现一个恶性循环”②。

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是上述矛盾的展开和解决。然而，这些矛盾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却又表现得极为复杂，绝不仅仅表现得像前面所说的那种相等和相异之间的相互排斥那样简单。马克思分析说，商品本身作为使用价值彼此间发生的关系是现实的，相反，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却只

---

①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举例如下：“例如，面包从面包师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并不改变它作为面包的存在。相反，只有消费者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当作这种一定的食品，而在面包师手中，它本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承担者，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5.）

② 同①437.

存在于每个商品所有者的想象中，其互相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在交换过程中才成为现实。但是在实际的交换过程内部，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应该表现为商品自己的相互关系。因此，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表现的第一个困难是：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就要先作为使用价值转让给他人，而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转让反过来又要以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对于一个商品而言，这个困难的解决意味着它已经摆脱其特殊使用价值，并通过使用价值的转让而成为一般社会劳动。此时，这个商品对其他商品就是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和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从而摆脱作为一种特殊使用价值所只能起到的有限作用，获得一种直接将一切使用价值都表现为自己的等价物的能力。要言之，作为一般等价物分离出来的商品，理论上能够解决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矛盾。

当然，完成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切其他商品现在首先把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这个分离出来的商品的观念上的、尚待实现的等式，那么，就这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说，虽然它的使用价值是实际存在的，但在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得到实现。”① 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一切商品都同作为商品一般——一般劳动时间在一种特殊使用价值中的存在——的同一切商品本身相脱离的商品发生关系，因而作为特殊商品同一个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商品所有者将其个人劳动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相互来对待的关系，就表现为他们将其各自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对待的关系。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相互对待的关系，则反过来表现为一种特殊商品同其他一切其他商品的特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似乎天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这种同一切商品本身相脱离的且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存在的特殊商品，就是货币。货币是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商品交换价值的结晶。“如果说商品在交换过程内部只有解脱了一切形式规定性，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才变成互为**使用价值**，那么，它们为了彼此表现为**交换价值**，就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发展成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1.

货币。”①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同时又是货币的形成过程。

（二）货币同商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

随着货币的产生，整个交换过程就可以表述为：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后者进而成为前者内在的货币属性；这个属性作为货币和一切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存在形式；商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因而成为对同它并存的或在它之外的货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虽然解决了商品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但是也逐步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马克思将这些对立和矛盾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交换价值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商品的二重的和不同的存在即区别，必然发展为差异，而差异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② 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二重设定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必要性——既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又表现为货币。此时，商品的可交换性存在于同它并存的外在的东西上，而不是和它直接同一的东西上。可见，上述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和货币不能互相转化的可能性，而商品还必须和这种异己的东西等同。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取决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人们的需要。相反，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取决于不以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为转移的各种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因为在交换中得到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和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③ 尽管货币作为一般交换能力同商品的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并且使后者消失，但货币同商品又应当始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样便产生了不一致。

二是交换行为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正如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一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买和卖这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随着这两个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2.

② 显然，这种叙述方式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本质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叙述和分析，笔者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进行。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要遵循马克思的论述顺序。更进一步的原因，请读者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一部分。

③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7.

行为取得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彼此分离的、漠不相关的存在形式，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不复存在了。它们的相一致或不一致、相适应或不适应、相协调或不协调，都有可能出现。与此同时，它们又在不断趋于平衡。这样一来，一种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不断的平衡的运动，代替了过去的买和卖的直接相等。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才能达到协调和适应。

三是交换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交换行为本身的分裂，导致交换的总运动本身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商品而交换同为交换而交换相分离。于是，在生产者中间出现了一个只是不断为卖而买的商人阶层。与之相伴随，为交换而交换演变为商业。商人从事上述活动不再是为了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只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或货币本身。在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中，整个商人阶层对生产本身的影响和作用是完全主要的。相反，他们在单纯的物物交换中对生产本身起着次要的影响，因为他们支配的只是交换双方生产的剩余物。

与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相适应，交换（商业）脱离交换者而获得了独立的职能，交换价值也从商品交换的尺度变成商业的目的。谋取交换价值和货币，取代直接占有和消费所交换的商品，进而导致为消费而交换同为交换而交换相分离。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业危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流通本身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果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取决于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差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①，因此，流通本身与其结果彼此有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当然，强调交换的二重化有可能导致商业危机，并不意味着否定生产方式作为商业危机的根源。由于交换（商业）是生产的直接目的，消费是生产的间接目的，所以，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尽管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决定的，但生产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的影响。

四是货币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如前所述，交换价值在商品和货币上都取得了自身的存在。作为交换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和其他任何商品等同或可以相比较。商品的这种等同和统一，在货币上既表现为商品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共同的要素，又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第三物。此时，交换价值虽然存在于商品之外，但仍然是商品固有的属性和一般性质。相反，货币不再作为商品的属性和一般性质而存在，而是作为与商品并列的个体化存在，即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既可以由供求关系决定，又可以分为各种特殊的形式。这样看来，货币既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又不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它既是一般交换价值，又是一种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交换价值；它在同其他商品相交换时既取决于绝对的一般可交换性，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正因如此，货币同它本身及其规定（性质和形式）发生着矛盾，并表现在实践中。尤其是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中分离出来的时候，货币的特殊性质再次显现出来，它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更为明显和激烈。

综合以上四种主要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将货币的内在特点总结如下："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①

除了从理论上阐述货币同商品并存所导致的矛盾之外，马克思同时关注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困难，并且对一些理论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做了摘录和评述。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金属货币的发行价格高于或低于它所含金属的价值，即货币的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的不一致。对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法是将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一切行业，从而使这些行业在货币市场上的一切波动中损益均衡或抵消；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则是发行小时券。对于前一种理论，马克思认为它没有认识到货币制度下的一切矛盾的产生过程——货币制度本身和这种制度下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价值本身的规定）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故而无法付诸现实。而后一种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则是完全无视小时券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如银行、公共信用等。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101.

蒲鲁东主义者或许会对此反驳说，小时券是“经济进化的系列”的最后的产物。在他们看来，这个系列实现了观念和历史的统一[①]，因此，当小时券最符合货币的“纯粹”概念时，就会“出现”在现实中。马克思则分析说，尽管离开了银行和公共信用等这样一些条件，交换价值和货币也能存在并且存在着，但小时券总要有一定的发行机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些机构的性质与银行无异。我们姑且还是将它们称作银行。任何银行发行小时券，无一例外都要满足如下公式：交换价值为 x 即等于 x 劳动时间的商品 a，同代表 x 劳动时间的货币相交换。这就表明银行也必须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一切商品。可是，发行小时券的银行并没有为这种购买花费分文，它所给予卖者的只是商品的象征化的交换价值，而非在某种特定实体形式上占有的交换价值。换句话说，小时券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是领取等量交换价值的其他一切商品的凭证。它只是自称为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而没有任何价值。相反，真正的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不仅代表着交换价值，而且还在实际交换中就是交换价值。由此可见，小时券与纸质货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它的发行必然无法解决商品同货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

再进一步来说，银行发行小时券也无法改变交换行为的二重化。小时券的发行和兑现，无外有两种情况：其一，商品（产品和劳动）的全体所有者都想按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其商品。此时，他们不再关注是否有其他买者，而是直接把商品出售给发行小时券的银行。与之相适应，银行必须使每一种商品都转化为其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进而成为一切商品的总的买者。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也必然是总的卖者；它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而且还是一切商品的占有者。其二，只有一部分商品所有者想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小时券只是在银行及其

① 蒲鲁东认为，同平等和自由等观念一样，价值、分工、机器、竞争、垄断、交换、对外贸易、税收、信用、地租、所有权等在经济学词汇中出现的一切范畴，以及它们的反题、合题，在理性中都是同时出现的。当这些经济范畴“反映”或“出现”在社会现实中的时候，就会表现为一个包含着各种难以预料的事件和长期动乱且极不稳定的社会制度的系列。此时，只有用“系列”的方法将这些经济范畴重新组合起来，以表明它们彼此的生成次序、起源、过程和结果，才能形成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科学。由此可见，“系列”的方法是一种现实与观念并行的方法，它可以同时避免唯物论和观念论各自的片面性——前者仅从经验事实出发，后者则把观念当作一切立论的起点。用“系列”的方法重新梳理各种经济范畴的逻辑形式和现实样态的结果就是“经济进化的系列”。

顾客之间流通，而不是在全体公众中流通，也就意味着它不再适应货币的要求。因此，小时券的兑现只能存在于上述第一种情况中。随着银行同时是总的买者和卖者，交换行为的二重化和它带来的矛盾亦不可避免。

不仅如此，发行小时券的银行还超出了交换和流通的职能范围，成为总的生产者，或者说，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①] 它不仅要履行记简单的往来账的职能，还要为一个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具体而言，它至少还需要具备以下几种职能：(1) 精准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对象化在它们中的劳动时间；(2) 规定必须生产出商品的时间，即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3) 规定不同的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劳动时间量，即保证整个生产并且让它按照满足各个交换者需要的一定比例进行。而一旦银行能够履行上述职能，就不仅意味着全部生产者处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而且还意味着交换和流通决定着生产。上述情形显然是不现实的。用发行小时券的方式克服货币制度下的一切矛盾和困难，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的幻想，是堂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

(三) 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的现实“症结”

如前所述，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现实前提是：生产者的一切旧的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社会分工。在货币形成以后，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这种交换反映的不是概念的“生成”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必然关系，即个人必须先将其全部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和货币，再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并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上述必然性表明，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从事生产，但这种生产还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为它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因此，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的必然性，“折射”出个人与社会生产相对立，个人既在社会生产之中又在它之外。“个人从属于

---

① “圣西门主义者把他们的银行变成了统治生产的教皇政权。”[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5.]

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①

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表现为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都用货币来计量，以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揭示这种私人交换的现实“症结”的目的在于探究如何克服它所带来的现实困难。他指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私有交换同旧有的分配、未来的自由交换相对立。不论旧的社会形式为何，即个人互相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以此为基础的分配，都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私人交换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作为附加形式，只发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决没有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更谈不上遍及全部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随着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个人将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进行真正的自由交换。然而，自由交换同私人交换相对立，决不意味着前者的形成完全脱离后者的现实基础。“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② 私人交换产生出的世界贸易、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银行制度和交换制度等，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发现隐蔽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未来的无阶级社会所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是“炸毁”私人交换产生出的各种统一形式的对立性质，进而实现自由交换的前提。仅仅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显然无法完成上述过程。

在明确了实现从私人交换向自由交换转变的总体方式之后，要探究的就是实现上述转变的具体路径。私人交换仍旧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于是，货币所表征的社会关系成为马克思进行分析的起点。他分析说，交换价值是个人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经济学家们以此为前提，将货币理解为社会联系的物化。在这种场合，货币对于个人只作为“社会的抵押品”来使用。个人从他人手中获得商品，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给他人。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信赖的是物而不是人本身，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联系。可是，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② 同①109.

对货币成为社会的抵押品进行深入追问。事实上，货币因自身具有的社会属性而成为抵押品。每个个人使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才赋予货币以社会属性。当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都用货币来计量时，这个“行情表”不仅意味着物的社会性脱离人而独立，而且还意味着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全部个人都是异己的。

（四）消除全面异化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消除这种全面的异化呢？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的发展“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在全面异化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又使这些物重新从属于个人，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和货币关系互利共生，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独立一起增长，这种矛盾的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人们去消除经济危机就是在试图消除全面的异化。与此同时，“行情表”作为整个商业和整个生产的概况的呈现，表明个人本身的交换和生产都是作为独立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每个个人都可以通过“行情表”等来获知其他个人的交换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情况，并力求使自己的上述活动与之相适应。这种对普遍的交换和生产的情况的了解，即一种“比较”，不仅使单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比较”取代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还对供求关系产生实际影响。“**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①]也就是说，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它们带来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与他之前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诚然，个人在创造出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显然无法将由物的依赖性实现的个人的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同样，从社会演进的形态来看，这种物的联系显然要好于单个个人之间没有联系，也好于以血缘关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但是，如果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将这种单纯的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的、同个性的自然不可分割的、个性即个人的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将构筑于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形式，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解为最终的永恒的形式，就都是荒谬的。单纯的物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全部个人的产物，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从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对于个人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说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即使个人的全面发展，即个人真正地支配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只有个人能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才能使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正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和货币基础上的生产，既导致个人同自己和他人相异化的普遍性，也产生出个人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当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人互相间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中，单个个人没有产生出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因而无法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的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他只是表现得比较全面，而不是真正的全面。如果按照浪漫主义的观点，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以前个人的浪漫地位，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就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浪漫主义的观点，都将“升入天堂”。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由物的依赖性实现的个人的联系的考察，是以资产阶级社会——较为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为“样本”的。如果考察那些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就会更容易发现个人对某种规定的依赖性。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如种姓成员或阶级成员、地主和农奴、封建主和臣仆等等，而互相发生关系。发达的交换制度和货币关系，虽然打破了人的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旧的人身依赖纽带，但却没有粉碎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每个个人只是看似独立，这种独立无非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彼此关系冷漠意义上的错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人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发达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物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不以其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人的限制性和物的限制性，都属于个人自己的人的规定性。只是由于单个个人在发达的形态上虽不能摆脱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外部关系或条件，才让他的自由显得比较强大而已。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决不意味着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后者变成普遍的形式，确切地说，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每个个人都从属于并且必然从属于它们。除个别的个人偶然“战胜”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以外，其他

大量的个人仍旧受它们控制。只有属于一个阶级或联合体等的每个个人，作为全体来消灭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才能真正地克服它们。

不发达形态上的人的依赖关系和发达形态上的物的依赖关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个人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①，它们都表现为个人从自然的互相依赖变成受“抽象”或“观念”的统治。因此，消除全面异化还要破除观念论的影响，尽管抽象或观念只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要破除资产阶级时代的观念论，还要破除封建时代的观念论即“纯粹的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前一类观念论的危害在于，误导人们相信时代受观念统治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征，进而错误地认为只实现哲学观念的变革即推翻观念统治，而不是消灭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就能实现自由个性。由于物质关系的统治在个人自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扶持和灌输观念的永恒性，即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所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容易犯上述错误。后一类观念的危害则在于它的狭隘性，即局限于自然或现有秩序而不做任何改变。“纯粹人的关系”固然在其自身范围内和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但是，由这种关系没落而变成的物的关系却具有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使人们误认为这种关系就是真正的人的关系，从而不再做出任何改变。与只实现哲学观念的变革相比，这种因循守旧更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上述关于消除全面异化并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论断，在他之后的正式出版物《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删除了。这同马克思认为在此处尚未做关于资本的分析有着直接的关系。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笔锋一转，开始讨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当然，上述思想片段在马克思那里的“命运”，并不意味着我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们要放弃阐述它。相反，它却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时普遍引证的经典语句。这也提醒着文本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要遗漏马克思著述中的每一个片段或思想细节，它们往往构成我们客观且全面地诠释马克思思想的深邃性的“锁钥”。

第四章　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

从其思想的原貌来看，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开始借用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论中的一般性、特殊化和个别性的区别和联系，来表述和建构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以及资本诸形态之间的关系，时间上要晚于“货币章”的主体部分，即“笔记本 I”。“资本六篇结构”和“资本三篇结构”均出现在“笔记本 II”中。不仅如此，马克思直到在“笔记本 I”中具体阐释货币和商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时，才意识到他所描述的“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过程，使用诸如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等概念（范畴），带有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色彩。有鉴于此，他不可避免地要澄清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关系。① 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又使得原本混乱不堪、杂糅着各种内容的“货币章”的脉络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正是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最终使得马克思发现并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早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期，马克思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体现在作为认识世界之工具的合理性，只不过出于彻底批判蒲鲁东的需要，才将“合理内核”和“神秘外壳”一并抛

---

① “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弃。到了“1857—1858 年手稿”中，特别是“货币章”的写作阶段，黑格尔逻辑学作为认识世界之工具的合理性，被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为本质论所蕴含的辩证方法的重要性。他引入“同一→差异→对立→矛盾”的辩证运动，来分析商品、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本质—形式”关系；借鉴“消解了的矛盾就是根据”① 的说法，将商品二重化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解决固定到货币形式②上。于是，货币的本质和形式及其辩证运动就成为需要加以重点考察的内容。从文本原貌来看，马克思关于上述问题的探讨三易其稿，包括笔记本 I 第 19-48 页和笔记本 II 第 1-12 页、笔记本 VII 第 26-39 页、笔记本 B’ 第 1-21 页和笔记本 B’’ 第 1-3 页，并在此基础上成稿刊印。这些手稿保留较为完整，有助于我们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建构过程。

一、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于商品本身

综观前述马克思关于“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阐释，极容易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假象：他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和概念的辩证法，似乎采用的只是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会对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唯物主义”方法带来挑战。在写作“货币章”时，马克思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③，并且提出对“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货币”这类的说法做一番考察。这些考察描绘的是历史的和现实的辩证

---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60.

② “1857—1858 年手稿”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都没有价值形式的分析。正因如此，苏联学者伊萨克·鲁宾、德国“新阅读学派”和“新辩证法学派”等，将价值形式作为理解《资本论》基石，较少涉及“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探讨的货币形式的辩证法，虽然与《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实质相同，但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③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主义’是以一种如此令人乏味的方式被经常强调，以至于任何一个初学《大纲》的读者都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那就是这本著作似乎只是一种关于‘概念的辩证法’，其中的经济范畴呈现出自我运动的方式，以典型的黑格尔主义风格进行分化和融合（separating and merging）。通过《大纲》的一个注释，显然马克思本人预料到了这样一种误解。”［罗斯多尔斯基. 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教学与研究，2014（4）.］

运动，而不是抽象的辩证运动。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克思此时的预判具有很强的先见性。1867 年《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发表后不久，德国思想界就有过关于马克思抄袭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指责，以及叙述方法（唯心主义）和研究方法（实在论）二分的误解。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强调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性质的同一性即“新唯物主义”有所不同，马克思在“货币章”中阐释的是“成为”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具体现实过程，他不仅从历史性和现实性入手揭示“成为”的必然性，而且还在揭示“成为”所带来的矛盾及其现实表现的基础上找寻破解现实困难的方式，而不是阐述概念间生成的必然性和概念发生史。

（一）黑格尔的“本质—形式”辩证法

为了便于直接呈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本质—形式”辩证法方面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先来看看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中，“本质论”揭示出本质发展的三个时期：（1）本质的内在反思，即本质自身；（2）本质的外在反思，即现象；（3）本质的内在反思和外在反思的统一，即现实。黑格尔认为，本质的内在反思，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抽象的反思，是一种内部的尚且没有表现为外在关系的反思。正因为本质是绝对的，所以本质在内在反思阶段还没有表现出来。本质的内在反思运动分为若干阶段：本质内在的映象，即反思；各种反思规定或本质性；作为进行的规定而成为根据，并进一步过渡为存在和现象。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本质内在的映象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本质自身中本来就包含着映象，映象就是直接的反思；其二，这种映象是本质内在的无限（变和过渡）运动，而不是固定不动的；其三，这种运动直接是由于本质自身的否定性，“本质在它的这个自身运动中就是**反思**”①。要言之，反思就是直接的反思和通过辩证法的否定深入自身的运动。与之相应，有三种反思：一是建立的反思。不论是回到直接性即直接思考自身，还是从对象返回自身或否定性，其结果都是最初的本质。二是外在的反思。它是对反思建立过程的思考。随着反思的建立，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4.

我们往往直接使用通过它得到的各种东西，转而忘记这个建立过程本身。当我们思考这个建立过程本身时，就意味着将对象作为自身之外的东西。三是进行规定的反思。在外在的反思中，我们只是将自身同对象对立起来，根本没有超出初级本质或直接物的界限。只有进行规定的反思，使反思同时成为自身的否定和它自身，实现否定的统一，才能够真正深入本质自身。

既然反思作为被规定了的反思，那么，本质就是作为被规定了的本质，即本质性。各种反思规定或本质性是本质内在反思的第二个阶段，它的第一个环节是同一，后者作为本质内在反思中的自身联系，具有对内在反思的肯定性。同一作为反思规定，意味着一切事物都是与它自身等同的。同一又分为抽象的同一和具体的同一，前者是抛开任何区别的、绝对的统一，后者则把区别也包含在自身内部的同一中，是把同一性和区别性统一于一体的真正的同一。区别是从同一推演出来的概念，是对内在反思的否定。区别包含同一和区别本身这两个环节，前者本身直接是内在反思的环节，后者同样又是区别，即自在的区别、反思的区别。反思在区别本身中还是自在的。正如黑格尔所说："自在的区别是自身相关的区别；所以它就是它自己的否定性，不是由一个他物而来的区别，乃是**由它自身**而来的区别；它不是它本身，而是它的他物。但是和区别相区别的东西就是同一。所以区别既是它本身，又是同一。两者一起构成区别；区别既是整体，又是其环节。"① 作为区别的一个环节，同一把自己同作为另一个环节的区别自身对立起来，而不是丝毫不具有区别。区别由于具有上述两个环节而成为差异，即同一和区别在彼此包含的基础上又彼此独立、漠不相关，差异作为形式规定，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或者说，没有两个彼此等同的事物。正是由于这种漠不相关，反思在差异中就变成外在的了。

作为区别的两个环节，同一和区别既是它们自身，即在自在的反思中规定了自身，又在外在的反思中规定了自身。其中，外在的同一就是等同，而外在的区别就是不等同。等同和不等同是相对的。黑格尔指出，作为外在反思的环节，等同和不等同漠不相关，没有相互规定性，只能与自身相关。与此同时，它们在自身以外可以自在地反思，因为它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7-38.

们是一个不同于它们本身的他物的等同和不等同。这种反思作为否定的统一，本身自在地是等同和等同的区别。同样，差异在其漠不相关的方面也是一个否定的统一的环节，即对立。反过来说，对立就是本质的差异，它包含等同和不等同这两种环节。等同的反思规定是肯定的东西，不等同的反思规定是否定的东西。对立的反思规定在于，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东西，要么是肯定的东西，要么是否定的东西，没有第三物。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都作为这样一种整体而存在："**通过它的他物**而以自身为中介，并且**包含了**他物。但它又进一步**通过它的他物的非有**而以自身为中介；所以，它是自为地有的统一体，并且把他物**排斥**出自身之外。"① 这就是说，对立的一方必须在承认另一方存在的前提之下才存在自身，但双方又是彼此排斥因而彼此独立的。这种既彼此相关又漠不相关，就是矛盾。对比同一、差异和对立这样的纯反思规定，矛盾的作为反思规定意味着任何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即概念自身所具有的否定的东西引导它发展，因而成为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而辩证法的目的和立场是阐述概念的自身运动和发展，或者说，揭示一切事物的推动原则。因此，在对象的本质中去揭示本质所具有的矛盾，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

那么，矛盾又会过渡到哪个概念呢？黑格尔继续分析说，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作为反思规定是从区别所包含的两个环节中得到的，这意味着区别已经是自在的矛盾。但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却是建立起来的矛盾，它们既把自身建立为否定的统一，又在建立之中扬弃自身而过渡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而使进行规定的反思成为排斥的反思。于是，这种排斥的反思就成为对立面的自在的反思，它使得对立面具有作为有区别的环节的独立性，即对立中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排斥的反思本身具有排斥性，对立中的独立性同样也在扬弃自身。这样看来，对立不仅消灭了，而且还转回到它作为根据那样的本质中。所谓作为根据的本质，是指本质就自身或我们而言都是被规定为根据。② 由于"对立仅仅

---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5.

② 本质的绝对同一性和绝对否定性处于直接的统一中，本质向作为存在层面的"有"的自身回归就是这种绝对否定性；换句话说，否定的东西就是本质的反思规定。可是，本质自身不曾建立上述规定性，它不是根据而是被规定为根据。

是自在地进行扬弃的东西，但本质则是在其规定中自身反思的东西”①，所以，对立中的独立物本身又是一个自身矛盾的东西，矛盾仍然直接留在作为其根据那样的本质中，它只是消解在根据中，而没有消灭。

随着矛盾的消解，本质的内在反思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根据。根据作为本质的反思规定，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充分的根据；但它却是最后的、扬弃了的规定，因为本质消失于由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构成的反思规定中，后两者都扬弃了自身。根据的概念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在分析任何事物时就会区分出它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其中，直接性就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即有根据的；间接性则是由于直接性而间接存在的。黑格尔将根据划分为三个层面：绝对的根据、被规定的根据和条件。所谓绝对的根据，就是绝对的、一般的、普遍的根据关系，就是对任何事物和任何情况都实用的根据，绝对没有例外。形式与本质、形式与质料、形式与内容，都是绝对的根据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形式与本质之间所具有的否定性的内在关系，不是由形式本身造成的，而是本质内在反思的结果。根据建立于扬弃自身即否定性之上，是在其否定性中与自身同一的本质，因而本质的规定性就具有了同一性（有根据的）和否定的同一性（有根据的东西）的双重化的统一，也就是直接性和否定性的统一。这样，本质的规定性就与它的绝对同一相区别，进而构成与本质相对立的形式。“形式就是绝对否定性本身或说是否定的绝对自身同一，本质正因此就不是有而是本质。”②本质在内部反思中发生着将其直接性规定为否定性的同时，又将其否定性规定为直接性的运动。换句话说，本质的抽象性在形式中被规定，而这种规定本身又以本质为根据。因此，形式作为完成了的反思的整体，既是被扬弃了的，又是在被扬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既然进行规定的形式同时建立起自身和被扬弃，意味着它事先建立起它的同一，所以本质就是不曾规定的东西，形式和本质互为他物。于是，本质不再是形式的基础和根据，而是被规定为无形式的同一，即质料。相应地，形式从本质的反思规定中获得相对独立性，进而具有能动性。形式的这种能动性在于既否定自身又否定质料，而这又意味着形式在自身运动中扬弃了其独立性。形式虽然具有能动性，但它的自身运动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60.
② 同①78.

并非与作为质料的本质无关；相反，形式一旦脱离了质料就无法持存，而不是以本质为根据和基础，因为形式的独立性本身就是质料，它在质料中具有它的本质的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说：“因为形式是绝对的自身同一，所以把质料包含在自身之中；同样，因为质料以其纯粹的抽象或说绝对否定性而在它本身中具有形式，所以形式对质料，以及由形式而规定质料的能动性，不如说只是两者**漠不相关**和区别性那种**映象的扬弃**。”①

形式具有了持存性之后，本质就成为形式化的质料，即内容。内容首先是建立起来的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并且由于形式和内容都从属于本质，因而是建立起来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这是内容的第一种性质。在上述关系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在基础，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内容的另一种性质是不同于本质的同一性。不论在形式中还是在质料中，内容都是同一的。这又意味着形式和质料对于内容是漠不相关的、外在的规定，但它们同时又在内容中转回到统一或根据去。用黑格尔的话说，内容是形式规定的否定的自身反思。于是，最初对形式漠不相关的内容的统一也是形式的统一，形式对质料的关系中的能动性也就消失了。

以上内容构成了黑格尔的“本质—形式”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突出特点在于，不仅揭示了不同概念间的生成过程，而且呈现出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尽管它是唯心式的、带有抽象的色彩，但不可否认，它对于认识和厘清充斥着各种复杂事物及其表象的比较高级的社会形式，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作用。

（二）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规定性

从商品到在考察商品和货币并存带来的矛盾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品为何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② 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此时，直接运用黑格尔的“本

---

①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1.

② “虽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的真凭实据，并不能在交换价值世界中充当商品的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

质—形式”辩证法，找出货币的本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并不否认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他所揭示的“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过程确实符合本质内在反思的部分过程。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揭示这样的过程，而在于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即同一、差异、对立和矛盾的具体内容，更在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现实表现。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已在本书第三章做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是专门论述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分析说，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就意味着：（1）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并存。此时，商品可以采取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而成的共同形式，即货币的形式，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一旦采取了这种形式，这个商品就失去了其自然特性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也就是同其他一切商品相等的一定比例，同时也被确定下来。它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而不是作为货币一般的商品。（2）货币在作为商品一般的同时，其本身还必须作为特殊商品同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和实际的交换工具而存在。由此可见，货币起源于商品本身，它是交换的产物，而不是约定的产物。

作为交换的产物，货币的形式是与交换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货币更多地是以尺度而不是实际的交换工具的形式来出现的。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往往是作为需要的对象而非消费的对象[①]交换进来的，它能够可靠地用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具有最能代表社会财富、满足普遍的供求、特殊的使用价值等属性，比如，毛皮、盐、牲畜和奴隶等。商品满足需要的前提是其使用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或直接的生产工具——而成为货币。随着交换的发展，充当货币的商品越来越直接服务于交换本身的需要。与之前商品因其特殊有用性而成为货币刚好相反，商品最终因充当货币（交换价值）而获得新的特殊有用性。当然，这个过程中间还存在着商品因同时充当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货币的情况。在生产和交换的

① 在法语中有“作为交易品的商品”（marchandise）和“作为消费品的商品”（denrée）之分，而德语中却没有。

略高阶段上，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大于产品。金属之所以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作为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具有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运送等与交换价值相适用的属性。而后，与较高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贵金属由于不氧化性、质地均匀、稀少性、对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低等，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的代表。

由一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不管是毛皮和奴隶，还是金属或贵金属，这表明这种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后者的交换价值的特权。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既然一种特殊商品能够作为货币实体同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而出现，那么，货币的交换价值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尽管如此，充当货币的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由于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本身，所以把货币比作“血液”和“语言”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前一种比喻影射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后一种比喻影射以约翰·布雷（John Bray）为代表的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对此批判说，货币虽然产生于商品流通（交换）过程，但并不是“流通”本身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货币是以生产为起点的社会有机统一的产物。同样，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虽然可以在人们头脑中观念地存在，但还不能从“观念”直接成为“语言”。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的社会性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货币具有同质性，而语言具有异质性，观念交流或流通的实现必须先要从本族语言翻译成为别族语言。

既然货币的本质是商品，那么，它只是作为中介或第三者，使不同的商品等同起来，即商品交换的中介，因而具有普遍效用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这个角度说，莎士比亚将货币比作“人尽可夫的娼妇”的做法无疑是中肯的。[①] 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

① 这个比喻出自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引述莎士比亚的这段话来阐述货币的特性：一是作为“有形的神明”，使个人能够凭借货币的“神力”来实现个人一切本质力量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从而导致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被颠倒和混淆；二是作为“普遍的牵线人”和“中介”，把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中的本质力量（观念）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再把这种本质力量变成纯粹抽象的观念，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

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① 秉承《巴黎手稿》中的思路，马克思此时认为，货币的中介作用和“牵线人”角色表现在能够购买一切东西和占有一切对象，从而将人的需要（即人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和对象、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个人和他人等“连接”起来。于是，货币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使人产生没有货币就没有致富欲之类的错觉。另一方面，个人的积累和积累欲也由于同时受到需要和产品有限性的制约而表现为自然而然的、有限的事物。要言之，人与货币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此时的理解比“穆勒评注”中的相关阐述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虽然仍将这种异化定位在依赖关系上，即人的依赖关系反而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但已经提出如何解决摆脱这种依赖关系的异化，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这种致思路向表明，马克思绝不是简单运用黑格尔“本质—形式”辩证法找出货币的本质，而是发现本质所表现的现实“症结”，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三）劳动时间本身不能成为货币

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本身，商品因作为交换价值而同货币交换并相等，而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由此可见，劳动

的外化和异化。货币的后一种特性决定着前一种特性，前者包含在后者中。

到了同一时期所写的“穆勒评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进一步从人的活动层面将货币界定为人与人交往的“异己的中介”。本来，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商品则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因此，商品的交换就是人的活动之间的相互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本质在于人的活动间互相补充的中介运动。随着人的劳动成为与人相异化的活动，货币作为中介也脱离人本身而活动，成为人与人之间“异己”的东西。此时，对于个人而言，这个“异己的中介”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依赖货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不再按照其需要进行，进而导致个人的活动不受自身支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再以其意志为转移，这一切最终只能借助于货币的力量。在这个“异己的中介”的统治下，个人的价值只能用他所拥有的货币来体现。货币对人的依赖变成人对货币的绝对依赖。人与货币关系的异化，导致这样的后果：“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5.]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3.

时间和货币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前者决定着后者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成的货币量。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在货币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和可以交换的形式上被计量，还包含在货币形式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货币解释为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①

劳动时间和货币之间有着上述直接的关系，是否意味着劳动时间能够直接成为货币呢？或者说，劳动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呢？用哲学术语可以表述为，劳动时间是不是作为形式的货币的本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考察劳动时间能否直接成为货币，涉及这个可能的过程所包含的生产、交换或流通等环节。从生产和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斯密关于"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马克思对此也予以部分肯定。但他同时强调，此种意义上的"货币"只是个人用来购买其特殊劳动的特定产品的一种特殊货币。个人劳动只有从一开始就作为一般劳动而不是特殊劳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才能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生产即个人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在商品交换产生之前，最先赋予个人劳动以一般性质。生产的社会性作为前提参与消费，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而不是互相独立的个人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这个前提本身就起着中介作用。相反，在以个人的独立生产活动为前提的情况下，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交换价值和货币都是这种关系的表现。个人劳动不直接具有一般性，个人劳动的产品只有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才能获得一般性。由此可见，将个人劳动的产品直接设定为货币即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是自相矛盾的做法，更是一种不可能的历史"倒退"，因为它等同于将个人劳动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从而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

从交换或流通的环节来考察，正如商品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一样，劳动时间本身也不能直接成为货币，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直接成为自己的货币。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是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商品上，而是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商品上。劳动时间只是作为一般的象征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7.

性对象恰好存在于被设定为货币的那种特殊产品中，而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自然属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的交换对象而存在。后一种存在形式又是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只有通过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来达成上述条件：劳动从而劳动时间的一般性，使劳动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进而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这种属性又意味着货币能够脱离商品而独立存在。此外，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是有差异的。劳动时间原本只是作为主体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即同一的事物。它本身可以交换，成为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但这种劳动时间却在质和量上都被规定了，不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事物。同理，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劳动时间不能成为作为形式的货币的本质。

由于货币必须通过某种特殊商品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所以，还要对这种特殊商品本身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矛盾做必要的说明。马克思指出，通过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来完成货币的实现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要对象化在具有能够满足特殊需要的自然特殊属性的特殊商品中；另一方面，它要对象化在与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的份额或量上以便于等量交换的特殊商品中。显然，作为对象的商品的这两种属性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它本身的对象化，也就是商品的二重化，即同时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和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才能得到解决。而后一种形式的实现，有赖于由某种特殊商品充当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① 行文至此，马克思才以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真正完成对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考察。接下来，他自然要说明直接产生于商品交换中的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究竟是什么。

二、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

商品的交换过程同时是货币的形成过程，因此，考察货币的形式规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8-119.

定性应将其置于流通领域。从进入流通到这个过程的完成，货币大体上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完成了的货币本身这三种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充当**尺度**（例如，在荷马著作中充当这种尺度的是公牛），先于充当**交换手段**，因为在物物交换时，每个商品本身还是它自己的交换手段。但商品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或本身的比较标准。"① 实际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对货币的上述形式做了详尽的考察。尽管这些考察不直接具有系统性，没有正确揭示出货币的这三种形式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但它们还是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货币形式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出现的顺序。同价值理论发展史或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获得了肯定一样，关于货币形式分析的历史之于理解货币形式的作用，也被马克思所重视。为此，他在笔记本 VII 的最后部分（第 30－38 页，第 56－62 页）专门梳理了这些内容。

（一）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

不言而喻，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因是极为明确的。首先，它代表着物化在一定实体上的劳动时间而自身是价值。其次，它作为价值的一般物质化身，是与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不同的劳动时间本身的化身，因而成为等价物发挥尺度的职能。人们之所以在关于观念的价值尺度方面产生混乱和争论，主要是因为货币只是作为价格标准和计算货币在起作用。它不仅在尺度职能上只是想象的比较点，只需在观念上存在，使商品在个人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的观念中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在作为尺度的质上仅仅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值多少英镑、先令、法郎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17 世纪末叶②便产生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或货币观念本位学说。"这种观点认为，充当计算单位的镑、先令、基尼、元等名称，不是一定量金银等等的一定名称，而只是一些任意的比较点，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4.

② 在笔记本 VII 中，马克思认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于 18 世纪初。[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5.] 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正式将其订正为 17 世纪末叶。[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71.]

它们本身不表示任何价值，不表示任何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① 马克思之后正式把它命名为“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斯图亚特较早系统地阐述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并且一直影响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甚至将这一理论视为解决1857年商业危机的“良方”。鉴于此，马克思主要以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3卷本为依据，从洛克和威廉·朗兹（William Lowndes）关于银的市场价格超过银铸币的发行价格问题的争论为切入点，展开了引证和分析。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和一些历史事实的佐证，特别是货币的兑换，使得这个问题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重要意义。

朗兹将这个问题解释为金银条块价值的上涨，所以计算铸币的价值降低，应当将英镑贬值。洛克坚决反对朗兹的这一提法。他认为，货币作为商品，其市场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货币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特性，人们对它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货币不存在供大于求的现象，货币价值最终决定于它的供给数量。造成当时英国生银的市场价格高于银铸币发行价格的原因，不是生银的价值增高，而是流通的铸币的银量减少。除此之外，允许生银输出和禁止银币输出，也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货币的价格实质上只是提高计算货币的名称。“通过提高货币价值只能在‘口头上’造成‘更多的货币’，但不能在‘重量上和价值上’造成更多的货币。”② 因此，不应对英镑做任何贬值，而是将过去的银铸币回炉进行重铸。

诚然，洛克是这场争论中正确的和取得胜利的一方。但是，这场争论的议题原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因为除了金银条块在铸成货币时要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之外，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供求关系的变化、战争等因素，都会导致某种铸币的价值超过它的金属含量的价值。它仅仅表明为了更好地实现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金属货币恰好采取了英镑或法郎的形式，而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英镑或法郎这些名称能够脱离开金属货币本身而独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一个法权问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6.

② Luke.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Nach：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1770：73.

题：在金属货币已经贬值的情况，是否应当用足值的金属货币承认并偿还按贬值时的标准签订的国债或其他债务。货币在这里不是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而是充当不变的等价物即作为价值本身，从而充当契约上的一般材料。而表现货币的这种材料的价值一旦变动，势必会在一国的不同阶级之间引起一些巨大的革命。这样看来，原本作为调整一方的债券和另一方的义务的问题，即作为经济关系的问题，却最终偏离到了改变货币标准的问题上了。由于这种偏离的错误，以这场争论为重要论据的斯图亚特不足以正确揭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深入剖析了斯图亚特关于货币作为观念的价值尺度的论证过程。大体而言，斯图亚特的论证要点如下：作为价格尺度，铸币是实在的等价物；而计算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不具有实体形式，它只是为了计量商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分标准。货币采取某个单位作为名称的用途只限于标示比例。因此，货币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之间保持不变的比例，或者说，它不能固定在任何特定量的贵金属或其他商品上。“货币只是具有等分的观念标准……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和非洲海岸的安哥拉货币就是这种观念货币的例子。”① 马克思对此批判到，货币单位不是单纯的名称，而是实际上具有某种实体的，即相对地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等分这个比例的出现，已经预设了商品成为可通约的量。“货币作为尺度出现，代表货币的那种商品的一定量作为尺度单位出现，正是为了求出**比例**，为了把商品表示成可通约的东西并进行买卖。”②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以实在的货币商品为根据的，后者后来才转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并且固定下来。银行货币和安哥拉货币根本不是观念货币，因为它们都不过是把流通的铸币还原为它们的贵金属含量。斯图亚特颠倒了观念的价值尺度与实在的价值尺度之间的关系，甚至还直接将后者忽视了。货币制度只有使自己的进一步的规定得到发展，才能使这种观念的即想象的标准成为客观现实。此外，斯图亚特也没有阐述甚至根本不了解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就直接将用作计量单位的一定量金对价值本身做尺度，从而把货币

---

①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 107.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0.

计量单位名称同货币价格混为一谈。

斯图亚特将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发挥得如此充分，以至后来的很多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其影响。举凡：货币是人们“愿望”的尺度，而“愿望”反过来也是货币本身和价值的尺度（威廉·高吉）①；计算货币几乎从来不用实在的等价的铸币作为代表，而古代一切铸币起初都是重量单位（热曼尔·加尔涅）②；货币首先是具体普遍销路的商品，然后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最后是价值的尺度（塞米尔·贝利）③；要正确规定货币的发行价格，否则币制就会陷于混乱（亚当·亨利希·弥勒）④；金的价值应当由其自身重量来确定，这个重量所取的假名只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戴维·乌尔卡尔特）⑤；等等。这种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导致观念的价值尺度理论模糊和消散，其固有的思想内容显露出来⑥，从而归结为用劳动时间直接代表货币的理论和现实诉求。“这就是要求：价值规定不应导致货币规定这一不同的规定，或者说，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不应发展到使对象化在一定商品中的劳动成为其他价值的尺度。”⑦ 实际上，斯密很早就做了真实价值尺度（劳动）和名义价值尺度（货币）的区分。综上可见，上述理论的和现实的诉求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否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蒲鲁东主义者（如达里蒙）只是做到了重复提出这一诉求，却将其渲染成为适应于并变革现存生产关系的新事物和伟大创举。鉴于此，重新阐释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既是政治

---

① William Gouge. A Short History of Paper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hiladelphia, 1883: 67.

② Germain Garnier.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jusqu' au règne de Charlemagne. T. 1. Paris, 1819: 76.

③ Samuel Bailey.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London, 1837: 1-3.

④ Adam Heinrich 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 1809: 280.

⑤ David Urquhart. Familiar Word as Affecting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London, 1856: 104-105.

⑥ “劳动是形成生产费用的实体，它赋予金以相对价值，就像赋予铁一样。因而，不论用什么特别的计算名称来表示一个人的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是表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Thomas Wright & John Harlow. The Currency Question. London, 1844: 272.）

⑦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3.

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蒲鲁东主义者劳动货币论的批判。

（二）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作为观念的价值尺度的“另一面”，是货币的价值问题。这显然要涉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方面。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16—17 世纪），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就将金银即货币确立为现代世界的唯一财富，尽管它们是从货币作为流通的结晶产物这个形式规定性即它的固定性上来认识的。与此相反，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货币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即它的流动性上来认定。流通手段本身被固定到它作为铸币的职能上，是要转化为价值符号的。可是，又由于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流通支配形式为金属流通，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先把金属货币理解为铸币，再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价值符号。然后，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提出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原理。这就是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普遍说法，早期货币数量论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法国重商主义者让·博丹（Jean Bodin）那里，经由洛克、孟德斯鸠、休谟等人的发展，在形式上被李嘉图推到“极端”，最终为詹姆斯·穆勒所集大成。博丹最早提出，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的数量，南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是当时欧洲“价格革命”的原因。洛克从货币供求关系入手，把货币价值高归因于货币的供给量永远小于其需求量。孟德斯鸠认为，商品和货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处于对应的两极。商品的价值通过货币来表现，反过来，货币的作用在于表现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和货币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动，其价值必然发生变动。休谟指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符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的数量，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① 李嘉图一方面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和流通所必需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则继承洛克的观点，强调在货币需求既定的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供给。基于货币只是能够迅速而便利地实现交换的“一种机械”这个认识，詹姆

① “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同样明显的是：与其说价格是取决于国内的商品和货币的绝对数量，不如说它取决于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绝对数量以及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绝对数。”（休谟. 论货币//休谟经济论文选. 陈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8.）

斯·穆勒明确将货币的供求和流通的商品数量归为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并且特别强调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价值的影响。

关于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史，是马克思最为熟悉不过的了。[①] 若把这个历史过程从头到尾梳理下来，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就会纳入进来，显然不利于核心思想观点的直接表述。于是，马克思在笔记本 VII 中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谟、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的观点，以及英国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做了摘录和少量的评述，而绝大部分的评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完成的。

正如斯图亚特所总结的那样，休谟（包括洛克和孟德斯鸠在内）的货币数量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1）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该国的货币量；（2）一国中流通的货币代表该国内所有的商品（和劳动），后者按照前者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有多有少；（3）商品的价格会随着商品增加而降低，随着货币增加而提高。[②] 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说，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而不是相反。随着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变动，也就是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价格的贵金属即货币材料的价值提高或降低，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降低，从而引起较多或较少的贵金属作为铸币来流通。商品的价格在它的交换价值不变时随着流通手段量的增减而变化，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表面现象。可见，只有假定货币材料的价值保持一定，才能对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做科学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休谟完全没有按照上述前提进行论证，而是恰好相反地考察了贵金属自身的价值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即美洲矿山发现后随着金属货币量增加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提高的时期。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材料的使用“错位”。休谟的追随者们经常援引的古罗马帝国征服扩张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现象，并不属于货币流通内在规律起作用的范围。

---

① “关于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的学说，最初是洛克提出的，1711 年 10 月 19 日的《旁观者》复述了这一学说，休谟和孟德斯鸠把它发展了并作了优雅的表述；李嘉图在它的基础上从形式上把它推到了极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等人则把这一学说连同它所有的荒谬之处实际应用于银行业等等。”[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5.]

②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398-399.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货币流通的内在规律所需要的大量材料，诸如可靠的商品价格史、关于通货的官方连续统计等，只有在银行业得到充分发展时才能产生。18 世纪的休谟显然缺少也无从获得这些材料，只能以 16、17 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随着从欧洲输入的金银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为事实材料，归纳出三条原理。他不仅完全违背了他的哲学原则，竟然把片面观察到的事实不加批判地上升到一般原理的层面，而且还出现了自相矛盾，先赋予通过非商品形式进入商品世界的金银以铸币的职能，反过来却又把它们变成可以同其他商品进行简单交换的单纯商品。商品世界终究是由无数不同的使用价值组成的，它们的相对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决定于它们的相对数量。一国现存的贵金属重量和商品数量之间的机械相等，注定只是一种幻想，根本无法代替“由商品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引起的、表现在货币流通中并结晶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商品的过程中的运动”①。

在笔记本 VII 中，马克思只是简要提到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考察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且还将其思路归纳如下：由于对象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量决定金银的价值，而金银又同时是衡量一切商品的标准，所以，一国中的流通手段量决定于货币单位的价值和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额，而前者又决定了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由此可见，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唯一原理”就是：“在货币价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的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成一定金量的符号，而不像休谟那样看成商品的没有价值的代表。”② 换句话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国中流通的金的数量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假设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额有了增减，流通中的货币量对金的交换价值来说就是过少或过多了，金就变成了交换价值比自己低或高的金属的符号，商品好像是在用一种价值比金低或高的金属来估价。因此，商品价格的运动即涨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在与它相适应的水平上下发生膨胀或紧缩的结果。即便商品的价值总额发生不变，流通中的金量也会因金矿藏采掘量的变化而出现同样的结果。不难发现，金成为货币在这里只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60.

② 同①566.

是充当流通手段而流通，与其内在价值的比例和商品的价值总额没有必然关联。这样看来，李嘉图实际上证明的还是商品价格或货币价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从而抹杀了货币除作为流通手段职能以外的其他一切职能。

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抽象性和空虚性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他又给自己的理论“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用以解释国际货币流通和收支平衡问题。按照李嘉图的解释，每个国家在正常流通情况下都拥有与其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其实际价值或生产费用的价值进行流通，因而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此时，一国的货币不会输入或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各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即通货之间就保持平衡。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在商品交换价值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有了增减，或者流通中的商品交换价值总额在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了增减，国际货币流通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除此之外，金银条块本身还会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价值波动，进而导致金属货币在国与国之间流通：一国因发现新的金银矿藏而储备增加，或者个别国家流通中的商品交换价值总额有了增减。这种流通的趋势表现为：如果一国因货币流通量过多而发生价格上涨，金的价值跌到其金属价值之下，那么这个国家的金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贬值了，其商品价格则是提高。此时，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反，结果也就相反。直至国际货币流通的平衡为止。这样看来，金的输出或输入好像始终只是因流通手段量的变化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值。“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国流通，只是由于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铸币流通。货币只是铸币，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①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国际货币流通问题再次重复回到了那个简单的教条上，表面上的宏大叙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其基本思想的渺小。

除了李嘉图之外，马克思在笔记本 VII 中还摘录和评述了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观点，其要义如下：（1）假定货币能交换的商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每当货币价值有了变动，其原因必然是货币量有了成比例的变化。以上是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要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71.

前提。他显然陷入了论证循环，这个作为前提的假定正好是他要证明的东西。(2) 詹姆斯·穆勒也承认，总的货币价值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前者等于后者除以货币的流通次数。这种说法只是“商品的价格就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的同义反复。其混乱性表现为，在承认货币本身的价值在每次交换中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却又随着流通速度中的每一变动而升降。(3) 詹姆斯·穆勒认为，由于现实中每天总是只有部分货币同部分商品相交换，而且极少用现金支付，所以，一国中的货币总量和商品总量的交换是一下子完成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天内商品交易的总量同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无关，后者是预先完成的、完全不以当时的货币储备为转移的交易量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可见，詹姆斯·穆勒以抽象或者仅仅想象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犯了因果颠倒的错误。(4) 詹姆斯·穆勒试图用简单的货币流通来说明流通手段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也同时承认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的生产费用即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在具体论证中又偏偏总是忽视这一点。总的来说，詹姆斯·穆勒从根本上忽略了货币价值的真正决定因素，颠倒了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只是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同样，他的儿子约翰·穆勒也秉承了李嘉图的观点，将实际的流通手段量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流通速度。

(三) 围绕货币数量论的争论

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在主要关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对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有所论及。比如，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在国际货币流通问题上的应用，从侧面反映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一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的直接形式。每当货币的这一特性要充分暴露的时刻，也就是货币必须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绝对的等价物和一般财富形式，即金银这种形式的时刻，并且这种时刻往往伴随着经济危机（不管是普遍危机还是粮食危机），金银总是从金银最贵也就是一切商品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输往金银最贱也就是商品价格相对较高的国家。不仅如此，交换的一般特点也决定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一般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而货币作为由交换本身所产生的尺度、交换手段和一般等价物，不是在内部交

往中，而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民族等等之间的交往中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①。事实上，早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用以清偿国际债务就引起了资产阶级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注意。于是，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在经济危机的时刻“意外”彰显出独特价值，英国的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围绕这一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经过1825—1857年间有规则的相继发生的四次货币危机以后，货币采取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即金银在国际交往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普遍承认。

严格地讲，不是李嘉图，而是斯图亚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流通货币量与商品价格的决定关系这个问题。斯图亚特还批判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他关于铸币和货币的研究就是以详细批判休谟和孟德斯鸠为起点的。斯图亚特的阐述虽然对交换价值的定位不清楚、陷入观念的价值尺度的幻想和迷恋重商主义，但还是发现了货币的一些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因为他实际地从商品交换本身的各种要素出发来说明货币的各种职能，而不是先简单地把商品和货币各自放在一边，再机械地将它们对应起来。在此基础上，斯图亚特将象征性货币和充当支付手段的金属货币区分开来，指出前者只能在国内流通中而不能在世界市场上代替它们。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区别，斯图亚特才能有力地批判将货币价值只取决于流通手段量的做法，并为后人批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奠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斯图亚特**反对这一学说，而且他的阐述实际上几乎预示了后来博赞克特、图克和威尔逊所主张的一切。”②

笔记本Ⅶ的最后部分表明，马克思曾试图还原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并且首先表达了对银行学派批判李嘉图的做法的部分肯定态度，重点摘录了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的观点。后者的理论要义如下所示：（1）李嘉图习惯于将汇率和金价的一切波动归结为银行券的过量发放，从而不承认有对外贸易逆差的存在，错误地把货币金属本位制视为停止金银外流的根本性措施。（2）李嘉图甚至错误地认为，战争的临时用途引起了金银条块的流通，后者会随着战争等的结束而停止。事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5.

② 同①185-186.

实却并非如此，黄金外流现象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存在。（3）金银具有价值尺度、任意转化为流通手段、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和充当货币等属性。这些属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其中，通货（currency）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而铸币本身只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手段，比如履行契约规定来偿还内债或外债；货币（money）则被用来表示货币本身。（4）金银条块价格高于金银铸币的发行价格的原因是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这个现象反映着作为尺度和等价物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矛盾。（5）金银发挥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不是通货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优先选用金银条块进行资本转移，只发生在用它们支付比用其他形式的资本支付更为便捷有利的情况。

在赞同富拉顿批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严格区分货币的各种职能等做法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他的错误所在：其一，没有明确对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属性加以专门说明，而是直接将它和资本等同起来，虽然他后来实际上区分了作为资本特定形式的货币和资本一般。其二，金银发挥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就在于它们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和独立等价物的货币，它本身就是货币问题。其三，在国际贸易中用以支付的并不是随意采取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而是必须采取货币这种特殊形式的价值，用金银来进行传送。

与银行学派相反，以塞米尔·劳埃德（Samuel Loyd）为代表的通货学派拥护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他们通过论证货币流通中各个因素的作用，得出“通货的价值取决于其数量”的错误结论。具体而言：（1）在通货的价值、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可以流通的当然只是一定量的通货；（2）在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货量只取决于通货的价值；（3）在通货的价值和流通的速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货量则只取决于交易的价格和数量。另一方面，如果流通的是纸币即纯粹价值符号，那么这种货币的流通量就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本位。在马克思看来，上述论点显然将纸币流通和铸币流通混同起来，因而是错误的。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也有站在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之上或之间对他们做出评价的人，他就是詹姆斯·麦克拉伦（James Maclaren）。他批判银行学派只是提出用以进行国际贸易的金银条块被专门储备起来，却没有阐明这些储备起来的金银不受供求规律的影响，甚至

没有影响到物价的原因。麦克拉伦对此解释到，这些金属储备不是剩余收入即消费的货币而是剩余资本，其“使命”为再生产商品，而不是单纯去市场上换取商品；换句话说，它不会增加供给，因而不能增加对商品的需求。此外，麦克拉伦也反驳了李嘉图和通货学派的做法，他认为流通手段或货币供应量不可能无限增加，仅靠发行纸币也不能弥补贵金属输出所造成的亏空，用它来防止物价的自然下跌更是无稽之谈。马克思只是摘录了麦克拉伦的上述论点而没有做任何评述，但实质上暗含了他对此的部分肯定态度。笔记本 VII 的写作也到此为止了。

以上以插叙、评论和摘录等形式分散于不同研究课题之中的阐述，大概只是马克思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货币的形式问题所做的准备。总括这些思想，仍然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通过对关于货币形式的理论分析史的科学系统梳理，为准确地揭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奠定理论基础。

三、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

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较为成熟的社会形式里充斥着货币的各种形式，如计算货币、观念货币、铸币和信用货币等。尤其是金属货币即金银作为支付手段在世界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乃至一切资产阶级关系的货币表现。一方面，这些在货币本身之外的、看似无限多样的形式，掩盖了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给我们理解后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找到货币的形式规定性，离不开对流通的准确把握，因为货币既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又是货币流通的主体；它既存在于上述作为分离的流通环节中，又存在于总体的流通中。在上述情况下，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解了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以解决货币分析的主要困难之后，就要结合关于简单流通的分析来揭示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对金银充当货币材料做必要的分析。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指出，考察简单流通中或直接流通阶段上的货币形式，首先需要明确简单流通这个一般概念，具体而言：其一，简单流通的特点，

或者说与复杂流通的不同。前者是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后者则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再回到一个中心，以银行制度为中心的流通即是如此。换句话说，简单流通只是自在的流通，它表现为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简单的反复和交替，而不是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其二，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即“商品—货币—货币—商品”（W—G—G—W）和“货币—商品—商品—货币”（G—W—W—G）① 的关系。这两个方向相反的简单流通却是相互适应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又决定前者。一方面，商品流通中一些因素不仅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反而直接或间接决定商品货币流通。例如，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都决定着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决定商品流通。考察影响货币流通的主要因素，即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速度，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才能进行。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所引起的诸多因素——交换者人数即人口数量、人口城乡分布、商品生产的绝对量、商品流通的相对量、交通运输工具和工业等——的变化和发展，带动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其三，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和具体环节。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意味着，作为商品流通结果的货币，而不是作为商品流通的环节（中介）的货币，成为货币自身流通过程的起点。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是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的统一②——这两者才是它的具体环节，而不是简单的买（G—W）和卖（W—G）的“恶的无限”。③ 由此可见，找出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还是要从考

---

① 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初稿中，马克思才正式将商品流通的公式订正为 W—G—W，将货币流通的公式订正为 G—W—G。

② 这种理解不免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色彩，但被马克思赋予了现实的和具体的内容。他关于简单流通所做的不是抽象分析，而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读者理解的角度来说，将马克思关于简单流通的理解先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并进行归纳，无疑对把握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有所裨益。然而，这样做容易造成对主要内容的掩盖，似乎流通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加之符合马克思写作过程原貌的考量，笔者还是在阐述货币的不同形式时，将它们“归属”的简单流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顺便揭示出来。

③ “恶的无限”在黑格尔那里是指同一件事情按以下公式无限重复：“某物”成为“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又是正在成为“他物”的“某物”，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马克思认为，商品换成货币和货币换成商品的不断更替，实际上构成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要素。此外，流通还呈现出连接在一起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的现象。商品换成商品，是通过商品换成货币和货币换成商品这种间接方式来完成的。买和卖都被设定在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中，形成这两种规定的统一。

察作为简单流通总体运动第一个环节的商品流通开始。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乃至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关于货币的形式规定性都是从商品流通中，而不是直接从货币流通中得来的。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流通首先使交换价值从而规定为价格的交换价值流通，或者说，交换价值从而价格使货币进入流通中。这意味着商品流通要具备两个前提：其一，商品预先确定为价格。从这一点来说，“流通就是价格的设定，就是商品转化为价格的运动；就是商品作为价格而实现”①。其二，交换总体的形成。流通中存在的不是个别或任意的交换行为，如物物交换、实物贡赋和封建劳役，而是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行为体系，即或多或少在社会整个表面上一直进行着的交换总和或交换总体。要言之，商品交换过程即货币的形成过程“先于”商品流通，后者表现为前者连续进行的过程的整体。

货币的第一个形式规定性是与交换价值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当商品被规定为交换价值时，它本身的自然存在又使其不能适应这种规定性。货币就作为中介使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换句话说，货币就是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即货币商品。同样，用货币商品来表现的与它相等同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与此同时，随着一切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一种特殊材料或特殊商品上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独立化存在，货币也将不再作为货币商品存在于一切商品之外。“当货币成为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独立的东西以后，交换价值就表现在那个作为主体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货币的规定性上。”② 同样，表现在货币规定性上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由于任何交换价值本身都是在量上被规定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一般尺度就成为每个交换价值和与之相等同的货币之间的尺度。货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价格则表现为用货币来计量的交换价值，货币因而成为价格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规定。”③ 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货币则在价格上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所包含的数目的单位。综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8.

② 同①139.

③ 同①140.

上所述，商品在流通中将自己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货币商品的价格这个过程，同时把货币商品表现为价值尺度，从而表现为货币。要言之，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商品作为价格是同一个过程。

然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它作为价格标准不完全是同一回事。马克思分析说，货币作为商品之外的独立存在物，使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是有差别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直接规定性，而价格则是商品的反思规定性，因为它表现为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的自然存在即作为使用价值，和它的直接规定性相分离。在价格中，商品在与货币发生关系的同时，又只能观念地而不是实在地表现为货币，因为货币具有和商品不同的实在性。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这种最初的规定，总是充当计算货币，与其现实存在即充当货币商品的数量无关，其原因在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即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价格作为货币的想象额，本身也不需要一定量实在的货币①。但是，货币的自然物质实体仍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对一切商品的一般的关系，而是一定重量的金银。由此可见，货币由价值尺度向价格标准的转化，必然需要一定的过程。“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②。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货币观念本位学说的错误就是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它作为价格标准完全混淆了。

（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这并不足以完成商品的实际交换。交换价值还需要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然后再作为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用公式表示就是 W—G—G—W。只有通过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运动，商品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同

---

① 马克思认为，货币最初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是一切商品的代表；而一切商品作为价格，即实现在头脑中的交换价值，则在任何形式下都是货币的代表。这样看来，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量根本无关，一来从它自身的过程来说根本不需要任何实在的货币，二来商品通过货币来计量的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尺度，即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的数量，詹姆斯·穆勒货币数量论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一点。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5.

样，只有通过商品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或商品同实在的货币相交换，价格才能得以实现。在上述过程中，货币表现为交换手段、流通手段和价格的实现者。虽然价格的实现表现为货币流通的结果，但它仍然是商品流通的前提。“商品只有事先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即获得**价格规定**，表现为**价格**，才能实在地同货币相交换，转化为实际的货币。”①

进一步考察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不难发现，货币在商品流通中通过实现价格的方式帮助个人用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商品（W—W），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商品只有通过运输工具才能实现空间和时间上的实际流通，只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对此无能为力。通过货币来流通的不是商品，而只是商品的“所有权证书”。在商品流通中，商品同货币相交换，不论是卖（W—G）还是买（G—W），所实现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马克思指出，为了实现价格，货币就必须存在一定的量；确定为货币单位的金银的重量必须有一定的数目，才能适合货币的上述规定。价格本身是商品流通的前提，因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使命首先在于通过事先确定自身的量或数量来实现这一流通。另一方面，既然商品流通过程的进行是为了货币转化为商品，从而实现用一种商品来交换另一种商品，那么，货币在进入商品流通中后就仅仅在一瞬间出现便消失了，货币的实体就在于不断表现为这种转瞬即逝且自我扬弃的东西，表现为这个中介行为的承担者。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起作用的唯一规定性就是它在流通中的量或数量，而不是其作为金银的物质存在。当然，从商品流通的整体过程来看，货币事先确定自身的量和它在流通中的量往往是不同的，后一种量的规定性还要取决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流通速度。

同样，作为纯粹流通手段的金银，或作为金银的流通手段，对货币作为特殊自然商品的属性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商品流通中所表现出来的商品和作为特殊商品的金银相交换只是一种假象，只是一种分离的流通环节。这个假象或环节会随着下一个的环节即金银和商品相交换以完成商品和商品相交换而转瞬即逝。W—G 这个分离的环节固然能够表明货币单位现实地代表一定量的金银，但它只是部分地实现了的价格。在观念上设定为同一定量金银相等的商品，似乎在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4.

实际交换中并不能换回同样多重量的金银。也就是说，货币是一定量的金银这个价格的实在性，注定要不断地消失和扬弃；它始终只能看作中间的、起中介作用的实现，而不能看作最后的实现。

既然价格的实现不是最后的行为，体现货币的自然材料就是无关紧要的；它表现为一种偶然的东西，并且消失在交换行为本身中。例如，伪造的货币一旦被当作真正的货币来流通，它在整个商品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同后者一模一样。真正的货币在转瞬即逝的中介过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而一旦脱离了商品流通这个过程，货币就又成为已实现的价格。概言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目的在于实现价格是一回事，而它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价格的过程则是另外一回事。正是由于货币已经表现在价格中，它作为纯粹流通手段在川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不再起到价格尺度的作用；正是由于货币只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而消失于流通环节的总体中，它在流通中也不再起到实现价格的手段这个作用；正是由于处于这种转瞬即逝的实现价格的不断运动中，货币只是交换价值从而是价格的代表。

如果说设定在价值尺度形式上的货币是计算货币，那么设定在流通手段形式上的货币就是铸币。作为铸币，货币一方面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将它的使用价值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合而为一，并且只是与其自然材料无关的符号；另一方面丧失了它的普遍性，具有了民族性和地方性——既获得了“政治头衔”，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也在同一民族和国家获得了不同的名称等。① 更为重要的是，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规定性上，货币的量是计量的；相反，在作为价值尺度的规定性上，货币同它本身的量无关。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且构成矛盾。这两种形式规定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统一起来，用以解释如下现实情况：当金属货币的材料掺假即在金银中加入便宜的金属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和价格上涨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劳动时间或生产费用这个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内在决定因素的降

---

①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并没有对铸币做进一步阐述，但他已经意识到要这么做。“应以专门的篇作如下补充：（1）**货币作为铸币**。极简略地论述铸币制度。（2）对金银来源地的历史叙述。金银的发现等等。金银生产的历史。（3）贵金属以及金属货币价值变动的原因；这种变动对产业和不同阶级的影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1.］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确实是这么做的。

低，而且是因为“流通手段同时既是作为尺度的货币的材料，又是价格作为最后价格借以实现的材料”①。而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被印有一定量实在货币的符号取代——的情况下，流通中所需的一定数量范围内的纸币仍按照十足的金银价值来进行流通，则是因为货币只具有充当流通手段的规定。

（三）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

从简单流通中包含的两个要素即商品和货币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有两种形式的流通：一是货币作为中介来实现商品同商品相交换；二是货币以商品为中介同自身发生关系。如果进一步把简单流通看作它本身所完成的循环，而不是看作商品和货币的交替，那么，它就表现为二重的东西：W—G—G—W 和 G—W—W—G。货币在其中分别表现为流通的手段和目的。这样一来，仿佛以商品抑或货币作为起点，对于考察纯粹流通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对于 W—G—G—W 这个流通形式而言却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商品和货币有着特有的区别即不同的“命运”：前者最终会被抛出流通，不论是在生产行为中被消费，还是在消费本有意义上被消费；后者则会永远留在流通中充当发动这一循环的永动机。

或许有人会质疑 G—W—W—G 这个流通形式存在的意义。除非出现量的差额即利润，否则货币和货币最终相交换就成了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抽象，就像人们把生命的循环只描述成“死—生—死”一样。相对而言，W—G—G—W 则至少实现了商品的交换以满足交换者的实际需要。于是，货币似乎具有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形式规定性就够了。马克思并不同意上述说法，因为现实中经常发生从而能够发生货币和货币之间没有差量的交换。这个经济现象成为可能，就必须把 G—W—W—G 看作流通的特殊形式。上述循环就意味着货币还有第三种形式规定性，从货币表现为流通的目的，以及货币由于是循环的结束而能够跨出流通而具有独立的存在，都能得出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这第三种形式规定上，货币作为完成了的、具有独立性的货币本身，有着三种规定：

第一，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和间歇的铸币。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6.

货币流通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货币流通的总体运动又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统一。因此，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既是商品流通的结果，又是货币流通的起点和终点；既以货币的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又是它们的统一，从而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的存在。那么，货币具有独立存在即作为货币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货币自身流通的存在已经意味着货币作为货币自身这个形式规定性的存在，并且产生于货币流通之前的商品流通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于商品，意味着它作为特殊商品（金银）能够被积累下来，并因而成为**贮藏货币**，即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有两层内涵：其一，货币是一般形式上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它作为这样的交换价值总是表现为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其二，正是作为货币的特殊物质实体的金银的独立性，才赋予了货币以独立性，并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而不是抽象代表。此外，既然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是流通的产物，而流通同时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特殊交换形式。因此，货币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也和流通发生关系，并进入流通中。如若不然，它就不是货币，而只能是金银这样的单纯自然物。“货币的独立性本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这正是作为 G—W—W—G 的结果的独立性的特点。”①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是从货币的本质和货币流通的角度阐述货币的第三种形式规定性的，没有论述这种形式是如何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也没有详细阐明这个形式除贮藏货币之外的表现。② 他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分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笔记本 B’ 中进行的。出于论证完整性的考虑，应当将这些内容补充进来进行综合阐释。

在马克思看来，仅仅考察商品流通的分离环节即卖和买，会产生商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② 在“1857—1858 年手稿”的主体部分，马克思关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阐述只有两个小自然段，分别位于笔记本 I 第 48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167 页）和笔记本 II 第 7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190 页）。他关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世界铸币）的论断则散见于笔记本 II 第 3-4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179、180、182 页）。在分析货币的这两个规定时，所应用的材料包括以上内容和笔记本 B’ 中的相关内容。

品同金银相交换的假象，但这不意味着考察这两个分离环节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商品流通正是由于不断地卖和买相分离的过程，才成为这两者的统一。或者说，正是因为商品流通中存在着个人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的劳动产品相交换的直接同一性，分裂为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它才能够打破商品交换在时间、空间和交换者即个人上的限制。正所谓“没有人卖，也就没有人买”。尽管如此，谁也不因为卖而马上就去买。一旦商品流通在卖的环节上被中断，即商品在它的“金蛹”形式上停顿下来，金银作为货币就与流通手段分开。相应地，货币会随着卖者对它的占有而成为贮藏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分离环节的买本身又被分裂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买。每个个人都是他生产的商品的卖者和满足其社会生活所需其他商品的买者。他的生活需要是不断更新产生的，与之伴相随的就是不断地买而不卖，而这又以卖而不买为前提。这样，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变成**暂歇的铸币**。

第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

随着货币由于货币贮藏而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并且具有独立性，它就能在这个规定上在流通内部取得另一个独特职能，即一般支付手段。马克思分析说，从卖的角度来考察，它的两极，即商品从卖者手中过渡到买者手中和货币从卖者过渡到买者手中，应当是同时出现的。这是商品流通得以完成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起着购买手段的职能。可是，正是货币的这一职能，却导致上述两极的存在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在互相支付的性质中，就包含这样的可能性：今天进行了支付，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支付，等等。”① 这样，卖者和买者的关系就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在卖的形式中，商品仍然在流通着，可却改变了自己的第一个形态变化，推迟了向货币的转化。相反，从买者的角度来说，第二形态的变化，即货币向商品的转化，在第一形态变化之前便完成了。这种被推迟了的由商品转化成的货币形态，赋予了货币以新的形式规定性即**支付手段**，从而使货币不再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形式，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卖的两极在时间上的分离即期卖，是从简单流通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现代信用制度的产物。在简单流通中就有期卖的以下具体情况：第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0.

一，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商品和付清款项。卖在这种情况下是观念上，准确说是在契约形式上完成的，并没有出现具体的商品和货币。在这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支付手段的形式尚且结合在一起，同一些商品所有者彼此作为卖者和买者反复交替出现。第二，商品的价格在货币上的实现迟于其使用价值的位置变换。使用价值在商品使用了一定期限后而非商品实际移交时才真正被让渡，正是这种时间移交和真正转让在时间上的分离，才造成上述情况。第三，商品所有者之间存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各种商品生产时间的长短各异和先后不同，使得个人作为卖者出现时，作为买者的他人还未出现。并且，在买卖在同一些商品所有者之间更加频繁反复进行时，卖的两极更加适应他们的商品生产条件而彼此进一步分离，从而加剧卖者和买者关系向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转变。这种关系作为现代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显然在后者产生以前就十分发达。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规定虽然产生于现代信用制度形成之前，但随着现代信用事业的发展而表现得更为明显，它作为支付手段的作用在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它作为流通手段即买卖中介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代生产方式发达，因而信用事业发达的那些国家里，货币事实上几乎只是在零售贸易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小额贸易中以铸币的形式出现，而在大规模交易领域里几乎只表现为**一般支付手段**。只要支付平衡，货币就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即相交换的价值量的纯粹观念上的、想象的尺度。货币的亲自参与只限于结算为数较小的差额。"① 与现代信用制度相适应的不再是简单流通，而是复杂流通。后者彻底扬弃了货币在简单的金银流通中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物质的重要性。

第三，货币作为世界货币。

关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这一新的规定，马克思是通过区分货币在国内流通（国内贸易）和世界流通（世界市场）上的形式，并且从以下两个维度得出来的。

第一个维度：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前两个规定即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使它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不论是从概念还是从存在方式来说，货币都变为一般商品，因而是贮藏货币和支付手段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17.

之外的新规定，是对前两种规定的否定的统一。如前所述，货币只有表现为商品本身，才能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要金银表现为货币，它就同国内流通和世界流通发生关系，且不被后两者所吸收而保持独立性。这样，金银充当货币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不论是被看作财富一般，还是被看作未来生活资料的可靠物质贮备，都将作为后备基金用作国际支付手段。在国内贸易中，货币完全被当作一般支付手段发挥一般交换手段的职能；相反，在世界市场上，这两种形式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支付平衡机制遭破坏的程度越是严重，货币作为一般交换手段发挥国际支付手段的功能表现得越是明显。为了支付国际贸易中的差额，货币首先要贮藏货币的形式，以金银实体形式而存在。此时，金银在货币形式上作为抽象财富，在履行国际支付手段时，使用的不是它们的职能，而是它们本身，故而能够打破特殊使用价值的特殊需要对交换价值的限制。正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而作为商品本身的存在，才使它在世界市场上不受任何要求直接使用金银的需要的限制。概言之，货币在以金银的形式用以支付国际贸易差额时，就等于复归到商品本身这个本质规定上获得新的形式规定。

第二个维度：货币作为货币本身是对它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否定的统一，从而在复归到商品本身的本质规定上获得新的形式规定。一方面，货币在完成了的货币形式上也将价值尺度当作自身的规定包含在内，同时也是对价值尺度的否定。起初，货币的计量单位无非是作为金属货币的金银的重量部分；货币作为货币和它作为重量具有同样的计量单位。只是由于同这种重量分割相一致的金银条块的名义价值同其实际价值相分离，金银作为金银和它作为货币这两种形式而采取的计量分割才会相分离，这样，一定量的金银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为执行这一职能而获得自己的名称。“因此，在世界贸易中金银只按重量估价，而不管它们的花纹怎样；也就是说，金银从作为铸币的金银中抽象出来了。”①

与此同时，货币作为货币本身同时将铸币当作自身的规定包含在内。从这个肯定的意义上说，扩大了流通范围的货币就是**世界铸币**。货币作为世界铸币，同时又是对它作为流通手段即铸币形式的否定，因而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总是已经实现了的价值。而货币作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25.

为价值量就在于它的直接物质性即金银的重量。作为铸币，货币的使用价值与它充当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相一致；相反，作为世界铸币，货币实际上失去了通货资格。如果说货币作为铸币还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那么，货币要作为金银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就必须将铸币重新熔化并完全还原为重量。“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完全以它早在原始物物交换中发挥作用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出现。”① 由此可见，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规定与它的本质即商品本身有关，而与它的形式规定无关，它的材料即金银就是一切。“在这一规定上，金银作为形式仍然是到处通行的**商品**，是商品本身。”② 正是由于作为商品本身，金银才能无所不在且不受空间范围的限制。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同其形式规定无关的性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货币不是由于铸币形式或作为符号，而是作为金银才有价值。金银正是作为一般商品和普遍等价物的性质，才在建立世界市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此时，只有货币的金银含量才有价值，货币被国家所赋予的铸币形状没有任何价值。国内贸易受世界市场的制约越全面，这种铸币形状的价值就越小直至完全消失，并最终只表现为赋税，而不再存在于私人交换中。其次，作为世界货币这种一般商品，金银无须再回到简单流通的出发点，甚至连简单流通本身也不必要了。世界市场越是被国内贸易所制约和囊括，世界货币本身就越是进入流通。只不过这种流通已经不再是货币作为货币本身的流通，而是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这本身已经超过了货币在其抽象的形式规定性上来理解。

综上所述，马克思总结道：“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形式，实际上并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而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是货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中，货币最引人注目地以它的单纯而又具体的形式充当货币，充当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同时既不充当尺度，也不充当流通手段。这是货币的最原始的形式。只有在货币在所谓国内流通中能够作为尺度和铸币**分立出来**的同时，这种最原始的形式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23.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0.

才表现为**特殊**形式。”① 正是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形式上，才在开辟和发展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由上文可知，在货币在流通中取得自己各种形式规定性的过程中，金银等贵金属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接下来自然要问：金银与货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思认为，货币材料固定到金银上，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并且作为基本结构一直流传到资产阶级社会，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所掌握。因此，金银而不是别的商品充当货币材料的问题，本身超过了资产阶级体系的范围。另一方面，何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材料，又取决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属性。换句话说，某种特殊商品必须成为当作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主体。既然金银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或“化身”，那么它本身就没有超过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金银与货币关系问题的“越界”和“不越界”，使得它被回答起来看似复杂，实则很简单：“贵金属所特有的自然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的属性，适合于这样一些经济职能，使它优于所有其他商品而成为货币职能的承担者。”② 这也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的意指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应当在货币的形式规定性上考察金银充当货币材料的问题。金银同其他商品的比较优势，是由货币形式及其职能决定的。首先是金银用作价值尺度的优越性。充当货币的商品作为劳动时间的化身，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必须能够表现纯粹量的差别，正像劳动本身一样。表现纯粹量的差别对充当货币的商品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具有质的无差别性，即均质性，从而在等量情况下具有等同性；二是易于分割和重新合为一体，从而在不损害其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按照商品的价值量把一般等价物划分为若干部分。金银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还易于被发现和获得，即淘金和掘金；不需要科学和发达的生产工具，只需要人的最简单劳动即可。马克思由此总结道：“交换价值本身要求有共同的实体，并且使一切差别化为单纯量的差别。在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26.

② 同①340.

货币作为尺度的职能中，一切价值首先都化为计量商品的单纯不同的量。贵金属就适合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些贵金属表现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天然实体。”① 此外，金银满足单纯量的差别要求所具有的特性，对于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同等重要，因为任何一块货币都不具有个性，而且在流通中归还回来的不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只是等量的同一材料。

其次是金银用作流通手段的优越性。金银执行流通手段这种经济职能的首要条件是便于进行实际的流通。金银的自然比重和经济比重都比较大，它们一方面可以用较小体积表现较大重量，另一方面由于比较稀少而使较小体积对象化着较多劳动时间，即包含着较大交换价值，从而使运输和转让等等都很便捷。

再次是金银用作贮藏货币的材料的优越性。其纯粹的物质属性主要包括不损坏、耐久、不易氧化和难溶解等。此外，还有一个由金银的物质属性所表现的美的属性。金银的自然光泽华丽，不论是金橙黄明亮，还是银洁白纯洁，都使它们成为显示富裕、奢侈，装饰和满足自发节日需要的材料，从而成为财富本身的最直接表现。金银的柔软和延展性，使其不适于用作生产工具，而适于装饰材料和器皿，用以满足除自然需要或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需要。金银以美的属性成为剩余的积极形式，而不是消极意义上、非必要的剩余物。作为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用于交换的必要使用价值的剩余，不一定与反映个人对自然关系的日常用品这个剩余物相交换，还有与超出自然需要范围外的、反映个人的社会关系的节日用品这个剩余物相交换。②

最后是金银的可变形性使其成为货币的天然材料。货币所执行的各种不同职能，如充当一般商品、铸币、奢侈品原料、积累材料等，充分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2.

② “金作为一种**剩余**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常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7. 并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4-345.］

地显示出它在不同形式规定性之间的变换。与之相适应，金银可以在条块、铸币和奢侈品等形式之间来回变换，不受一成不变的、一定的使用形式的束缚；既不丧失它们作为原材料的价值，也不损害生产和消费的过程。

当然，金银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本身也表明它的限度——不能作为直接存在的货币而具有固定不变的价值量，也就是不能同货币的形式规定性直接等同起来；尽管它较其他商品的平均情况而言还是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量。另一方面，金银不能直接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考察货币形式及其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时完全忽略它。相反，撇开金银本身价值变动对一切经济关系的一般影响不谈，仅仅考察金银之间价值对比的变动，就会发现它们对于金银流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通常在同一个或不同的国家里同时充当货币材料。这种不断变动的纯经济原因必须归结为生产等量金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而劳动时间本身又取决于金银的自然存在的相对数量和取得它们的金属状态的难度。只有将金银供给变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正确解释金银流通及其同货币形式的关系。

四、货币形式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

从生产总体的分离的环节来考察，货币既是非生产的又是生产的。就流通本身而言，不论是作为它的手段还是作为它的目的，货币都是非生产的，因为它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和目的。就生产一般来看，货币又是生产的，因为它在跨出流通后以不同于产品的方式，成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一般的要素的前提。另一方面，从生产的总体来考察，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所表现的一切规定，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货币本身，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个人参加总生产或把他自己的生产当作社会生产来对待时所处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但是，个人相互间的这些关系表现为物的**社会关系**。"① 那么，人的社会关系如何被颠倒为物的社会关系？（笔记本Ⅰ第48页和笔记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2.

II第1-3页）这种物的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占有规律是什么？[①]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建立在这个占有规律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王国[②]，进而扬弃它呢？

（一）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从货币完成了的本身的形式来看，货币表现为一般财富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同时又成为由作为特殊有用性的商品所构成的财富总体。这是由流通中的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得出来的。每种特殊商品就其自然存在而非价格而言，只是由于它和它所满足的某种特殊需要的关系，才成为财富的要素，表现为财富的一个及其个别的方面。与此相反，货币则可以完全抛开它作为贵重商品的特殊有用性，而成为完成了的价格和满足任何需要。商品只有以货币为中介才具有以上属性。而货币对一切商品从而对整个财富世界以及财富本身，都直接具有这种属性。一般财富在货币上是形式又是内容本身。与此同时，既然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在货币上实现了价格，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即由作为财富要素的一切商品共同组成的财富总体。另一方面，正是货币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实体即金银，才赋予了它以独立性。货币在这种特殊物体的独立性上成为独立化的一般交换价值，成为“万物的结晶”。这种独立化的一般交换价值又是与一切独立的特殊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③] 一旦如此，货币可能在这种实体形式上被单个的

---

① 从文本具体内容并结合马克思在《资本章计划草稿》中的提示对照看来，笔记本II第8-12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中的部分内容（笔记本B’第21页、笔记本B’’第1-3页）是基本重合的，并且都属于马克思命名的“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这个部分。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中的相关内容更为翔实和系统，笔者接下来论述的内容主要以它为文本依据。

② **“既然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是前提，**并且这个前提是从考察流通本身中显露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假定，那么在流通中自然就会得出一个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0.）

③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3.

个人所占有，从而由商品的“奴仆”一跃而成为商品的“上帝”。

起初，货币在实体形式上被个人占有，究其实是一种与个人个性毫无关联的纯粹偶然行为。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本身是简单流通的结果，不以它可能的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相反，商品作为自然财富的个体，它在被交换价值取代之前，以个人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个人出于自身某个方面而把自己对象化在物品中，他的对物品的占有就成为其个性发展的表现。例如，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然而，货币在成为商品的主宰者即拥有了对一切自然财富的支配权之后，个人占有货币这种与个性发展毫无关联的偶然行为，成为对整个商品世界的支配权，并逐步演变为欲望和劳动乃至对他人关系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马克思对此做了如下具体分析：

首先，货币成为致富欲的唯一对象。

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即贪欲，致富欲即货币欲，只有在一般财富对象化在一个特殊物品上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这种规定上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由此可见，货币既是致富欲的对象，也是它的源泉，因而是它的唯一对象。货币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它以交换价值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就是共同体，它不允许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因此，以货币为唯一对象的致富欲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

其次，货币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随着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致富欲就作为所有人的欲望创造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才能成为产生一般财富的不竭源泉。与此同时，货币又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又意味着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必须是雇佣劳动。正是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其目的直接就是货币，一般财富才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当劳动的目的不再是获取特殊产品以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特殊需要，而只是货币或一般财富的时候，个人的劳动就在货币的驱使下没有止境。此时，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作用，而是起生产作用。

最后，个人对象化在货币上的社会关系成为对他来说的外在关系。

在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物质代表的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而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货币同时成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与个人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直接生产货币，反过来，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这两者共同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① 货币同时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和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因而直接成为现实的共同体。任何生产本来都是个人的对象化。但是，个人在货币上的对象化却被颠倒了，它不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上的又外在于个人的对象化。易言之，货币所表征的个人的社会关系被完全颠倒成为物的关系。

（二）简单流通中的占有规律及其表现

在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形式规定性正好构成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借以相互交往的规定性。从简单流通中考察货币关系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而流通本身是一种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的运动。因此，从简单流通本身来考察货币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必然涉及占有物和占有者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其表现的占有规律问题。

基于流通只是交换总体的一个要素或环节这个认识，马克思对简单流通的考察不仅以交换为起点，而且将这个认识贯穿到全部相关研究的始终。他指出，交换主体表现为商品所有者，是交换所涉及的整个运动的第一个前提，简单流通自然也不例外。若使上述前提成为现实，就必须付出新的等价物。这就意味着在交换之前就存在商品所有权，即不是通过流通而占有的商品的所有权。其中，第一种所有权直接产生于流通之外的商品占有者的劳动，而劳动则表现为对商品的最初占有。第二种所有权则是通过流通来转让自己的商品，以占有他人的商品。第一种所有权是第二种所有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通过流通而实行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第二级的占有。**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在流通中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①。由此可见，所有权（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这是从流通的观点上得来的。同样，也可以得出交换者成为他自己的商品的所有者这个前提，而不是他怎样成为这个所有者。后者是一个发生在简单流通背后的过程，并且在简单流通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不管是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的私有者，才能成为流通的主体。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简单流通过程，就会发现私有权的前提作用和私有者的主体作用在其中并不显现出来，对象化在它们上的商品反而表现为流通的前提。流通本身就是这样运动：自己的商品成为交换价值（货币）即社会产品，而后者又成为自己的商品，即个人的使用价值或个人消费的对象。换句话说，商品作为交换价值首先是个人自己劳动的对象化，然后通过自己劳动的转让即等价物的交换，从而占有他人商品即他人劳动的对象化。个人的主体性及其社会关系最终表现为物的主体性和物的关系。这样，简单流通中的占有规律就表现为：（1）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商品；（2）产品的让渡或产品向社会形式的转化。

另一方面，产品从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也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后者实际上是分工的物质存在，即适合不同需要体系的不同质劳动。因此，交换主体在生产中从属于社会劳动的分工，构成交换的涉及整个运动的第二个前提。从流通的角度来考察，对于个人生产商品而言，自己的产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却不是直接的生活资料，而是直接的交换价值；只有当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在货币上取得社会产品的形式，并且能实现在不同质的他人劳动的任何形式上，才能成为个人的生活资料。由此可见，个人只有为社会生产才是为自己生产，而他人同时也在另一个领域中为个人劳动。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虽然直接是个人劳动即特殊劳动的对象化，但实际上是社会劳动即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又因为交换者本身从属于社会劳动的分工，所以，分工包括一般分工和特殊发达形式的分工在内，成为交换者生产交换价值的前提。

与交换主体表现为商品所有者一样，社会劳动的分工作为流通的前提，也在简单流通背后发生关系。不仅如此，在分工所产生的各种复杂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8.

的经济关系中简单流通消失了。

马克思分析说，生产交换价值的个人的生产的私人性质，受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条件基础上的分工所制约。这些经济条件本身又全面地制约着个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同他人的联系，即或多或少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个人作为独立主体在流通过程中发挥作用，个人与他人都作为发生简单买卖关系的自由私人生产者在流通中相对立，以除此之外更为复杂的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可是，简单流通却呈现出由如下内容构成的脉络：（1）商品首先必须转让，这意味着个人的直接产品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是作为这样的产品而存在的；（2）货币事先被认定为一般劳动的直接对象化的唯一物；（3）特殊劳动的产品必须通过货币来证明自己是一般劳动的对象化，与此同时，一般劳动又通过这个过程而确立为外在物即货币。

在简单流通呈现为上述内容的情况下，个人为了证实其私人劳动是一般劳动，其私人劳动产品是一般劳动产品，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作为其劳动的特殊内容的特殊使用价值，同时是他人的需要对象；而他人为了获得这种使用价值而将自己的产品作为等价物（货币）让出。因此，分工在简单流通中仅仅表现为下述的结果，即在流通的前提中：（1）个人的直接劳动不生产直接满足其需要的生活资料；（2）一般社会劳动作为可以分成各种特殊门类的自然发生的总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同时存在劳动的特殊化。此时，简单流通中的占有规律就表现为：每个主体都为了满足个人的社会总需要的一个方面而占有互相补充的商品。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从社会劳动的分工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本身消失了。

（三）流通对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实现

流通本身作为范畴或概念，同样有形式和内容（作为本质的内容）之分。流通的内容和形式分别表征着不同的社会关系。鉴于货币形式本身是从简单流通中产生的，考察流通表征的社会关系，自然成为理解货币所表征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

从流通的内容的各个方面来看，是对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实现。

首先，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物质变换这个方面来说，若没有这种客体中介，作为交换价值所有者的个人彼此就没有任何关系。

只有到了货币关系中，个人在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货币关系中，不论是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还是由个人自觉组成的共同体，对于个人都表现为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独立的个人相互交往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和外在的联系，恰好表现出个人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个人，在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对象化的手段。”①

其次，流通中的劳动的特殊化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

如果个人生产的是自己直接的生活资料，那么他的生产就不具有社会性质，其劳动就不是社会劳动。而在相反的假设下，个人作为私人进行生产的内容就由社会联系所决定，从而使他的生产具有社会性质。与此同时，作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一环，个人为满足所有其他个人的需要而劳动。对个人来说存在的社会依赖性，并没有让个人失去可以自由从事这种或那种劳动的意愿。相反，个人的天赋、爱好以及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他对特殊劳动的特殊关系。因此，劳动的特殊化在个人这里实际上表现为，出于他本身精神的和物质的特殊性而采取的一种社会特殊性的形式。在这里，个人将产生于他的本性及其特殊前提中的劳动的特殊性，同时看作需要的某种特殊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活动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实现。这样，分工就被理解为特殊个性的再生产，这种个性因而既成为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也使个人能够以其特殊活动为中介而享受一般生产活动，参与到全面的社会享受之中，从而彰显出个人的自由。

最后，流通中个人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别，或者说，个人的劳动和商品的物质差别，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

个人是他人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个人为生产满足他人需要的商品而劳动，这是上述自然（物质）差别的具体表现。它会产生以下两种情况：其一，个人在交换行为中作为契约双方相对立。他们先是互相承认对方的所有者地位，而且将个人意志渗入到自己商品中——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5.

前者是后者的“人格”，然后按照共同意志即实质上以契约为中介，通过商品的互相转让实现互相占有。其二，个人意识和共同意识相对立，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对立。个人在进行交换时首先会产生利己意识，即个人对于他人只是手段，而对于自己才是目的。这种利己意识会变成一种互惠意识——个人只有同时作为自我目的或自身手段，才能成为他人手段，并最终表现为整个交换行为的内容的共同利益，因为这种互惠意识所反映的互相关联对于交换主体双方都无关紧要，个人的利益对他人有利害关系只在于它成为他的利益。

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行为在它的法的形式上已经包含着自由的因素，即自愿的交换和不使用暴力进行占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同时作为自我目的和自身手段意味着他能够自我复归，进而实现完全自由。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只是私人利益的全面性。它虽然作为事实存在于交换主体双方的意识中，并且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预先存在的，但却不是交换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决定因素，而只是存在于作为交换主体自身反映的私人利益的背后，存在于在同他人的私人利益相对立的个人的私人利益背后。仅这后一点来说，个人尚且能获得这样一种安慰感：尽管他的私人利益未能得到满足，但他的对立的私人利益的满足，恰好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普遍利益的实现。不仅如此，个人还能获得这样一种“庄严的”自豪感：当一切个人都不顾他人而实现其私人利益时，恰好实现了作为私人利益总体的共同利益。这样，每个主体都成为整个交换过程的最终目的。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一切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交换主体，即回到自身。因而就是实现了个人的完全自由。①

由此可见，自由这个关系同交换的内容（个人需要和使用价值）、交换的法的形式有关，而同交换的经济形式（交换价值）没有直接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通从各个方面来看是个人自由的实现；与之相适应，由各个方面构成的流通过程就其本身来看，也就是从它的经济形式规定来看（因为流通过程仅仅是交换价值的运动），则是社会平等而不是社会自由的充分实现。

作为流通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交换价值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要素：作

---

① 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上述论证同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参见本书导言的第一部分和第二章的第一部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合理的一面。

为流通主体的交换者、作为交换对象的等价物和作为中介的交换行为。这三种要素虽然也表现为不同于经济内容的自然内容，但在经济形式上都相互联系并统一到交换价值这个规定。对此，马克思做了如下具体解释：个人只是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即作为价值相等或“活”等价物的人互相对立，因为个人成为交换者，正是交换价值所赋予他们的社会规定。作为这样的人，他们之间甚至不会产生任何质的差别。即使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者和需要交换的人相对立，他们也都是同一的、一般的和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代表，并且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等量的交换价值。个人作为交换主体彼此价值相等和互相对立，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这是在交换行为中被证明的。他们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交换主体和等价物的作用是相互的。作为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对象化，等价物本身价值相等，并且在交换行为中证明彼此价值相等和彼此无关。个人只有通过等价物及其交替才分别表现和证明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也成为彼此漠不关心的人。

交换的内容和交换的形式，分别实现着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而这决不意味着否认交换的经济形式之于实现个人自由的作用，因为个人作为交换主体成为彼此漠不关心的人，就是具有独立性的人；也决不意味着否认交换的内容之于实现社会平等的作用。同黑格尔的“内容是形式的根据”这个论断相类似，交换的内容作为交换的经济形式的根据，是个人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也是他们作为生产者所发生关系的前提。马克思在此使用了反向论证的手法。他说，如果个人和他人的需要相同，他们所占有商品的自然特性即使用价值亦相同，也就是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同一对象中，他们在生产上就不会有任何关系。只有个人在需要和生产方面有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从而在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化。“他们的需要通过他们的劳动和商品的物质差别而互相满足，这使他们的平等成为实现了的社会关系，并且使他们的特殊劳动成为社会劳动一般的特殊存在方式。”①

（四）货币制度是平等和自由制度的实现

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我们一般地来考察个人在他们的经济过程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9.

中的社会联系，我们就只须遵循这个过程本身的形式规定。”① 如果说流通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实现，那么，产生于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之于这种自由和平等的作用为何，自然成为马克思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至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需要在此进行考察，这就是此处的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是在何种性质上或何种意义上的，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

暂时抛开后一个重要问题不说，单表前一个问题。从货币的三种形式规定性来看，它实际上只是上述自由和平等关系的现实表现，而决不是要消除这些关系。这一点在货币的前两种形式规定上并不难被理解。马克思分析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职能恰好在于使商品表现为同质性的东西，因而能够在量的差别上实现价值相等即成为等价物。在流通着的铸币上，平等甚至在物质上得到了表现，只存在形式上的差别，因为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出现在何人手中是无所谓的，个人都交替地同他人换位。交换者在流通中虽然存在质的差别，即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作为商品和货币相对立，但是他们的换位是不平等的同时是确立和扬弃的过程，以至不平等只表现在形式上。就交换的过程来考察，个人对他人都表现为流通手段的所有者，因而本身表现为货币；观念上表现为价格的商品本身也是货币，其身上的特殊自然差别也会不断由于流通而消失。同样，当货币在它的第三种职能上出现时，它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由于扬弃了支付和交换上的一切特殊差别而实现平等。“它使人人在货币面前平等，但是货币只是他们本身的对象化的社会联系。”②

比较难于理解的是，当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出现时，却似乎取消了最初的平等。某个个人可能会比另一个人富有，占有更多的对一般生产的权利证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决不是由他们在流通中的交往关系本身即互相对立时发生的经济关系造成的，而是同他们的自由意志、勤劳节约和道德品行紧密相关的。个人在流通中以货币形式获得的财富，只能是他以商品形式付出的财富，决不能靠牺牲他人来捞取；个人享受财富内容的同时，他人则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这本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0.

② 同①361.

身就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连财产继承权所确立的和一直延续下去的不平等也无损于这种平等。个人的最初平等同上述法律关系本身没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也决不会由个人被他人代替而产生出来。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不可避免地会消失个人自由和平等，财产继承权则恰好使社会规律的效力超越这种自然的影响而巩固了它。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个人只是货币的个体化因而也成为不死之物。重要的是，财产继承人只有将货币重新投入流通中，才能使它作为享受品来实现。就像约翰·斯图亚特所说的那样，正是挥霍这个“令人惬意的平等派”①，使得不平等重新成为平等。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流通中的差别不过是货币和商品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又在流通中不断地消失。正如交换价值是社会存在一样，平等在这里也表现为社会产物。货币作为实现了的交换价值，从而货币制度作为发达的交换价值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平等和自由制度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中，对于个人而言，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都表现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的对象化，而他们本人作为货币的占有者则表现为社会过程的地位和身价都相等的执行者。因此，不仅自由和平等是在交换价值过程中得到证明和肯定，而且交换价值过程是它们的生产基础和现实基础。换句话说，作为纯粹观念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交换价值过程及其各要素的一种理想化表现；而作为具体实在即已经实现了的自由和平等，不管它是在具体法律、政治或经济上，还是总的社会关系上发展起来的，都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物而已。

上述情况不仅在逻辑上被论证出来，而且也为历史所证实。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它正是建立在上述情况之上的，并且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最终得以实现。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后者的内容主要是地方性的，它恰好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反而因此毁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都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而古代世界的基础只是直接的强制劳动，中世纪的基础是服从于同业公会

①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 367.

的特殊化劳动。与此同时，不可否认后两种劳动之于前一种劳动的作用。简单流通中的要素在古代世界的自由民范围内得到发展，例如，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即法人，在罗马法中已经得到了阐释。就其基本规定来说，罗马法虽然与交换尚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但它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的“先声”。

（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

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过程上的，而交换价值本身表征着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这种自由和平等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这个大的社会形式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自由个性，克服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的现实“症结”，扬弃全面的异化，马克思早在笔记本Ⅰ中就做出阐释。关于这部分内容，笔者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有过完整的论述，故而在此不再详叙。到了笔记本 B’’ 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两种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流行思潮，从侧面上彰显出他本人致思路向的独特的超越性。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在货币上实现为价格以及简单商品的流通等都成为表面的过程。从简单流通中就能得出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和平等。此时，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种表面过程的深处进行着的另一些较为复杂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和平等是不是消失了呢？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蒲鲁东主义和经济和谐论。蒲鲁东主义者试图证明，交换价值这个在观念和时间上都是普遍自由和平等制度，为货币和资本等形式所歪曲。只有回到最初的和概念上（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的交换价值，实现劳动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为了反对上述论断，经济和谐论者干脆将上述疑问归结为一个伪命题：所谓资产阶级社会总体从表面进到更深处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是个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消失，只是一种假象。交换价值确立的自由和平等在货币和资本等形式上仍然存在。

综观上述两种思潮，它们实质上犯了同样的错误，都无视交换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从而忽略了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暂时性。马克思认为，这种客观性和历史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交换价值作为历史的前提，决不是产生于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自然存在；相反，它已经使个人完全成为由社会决定的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整个生产中，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这同时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否定。此外，分工等作为交换过程的前提，又使得个人在它们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交换者关系。

其二，在交换价值基础上实现的生产关系的较高级形式，决不会只停留在只存在形式差别的简单规定性上。正是由于忽略了上述情况，蒲鲁东主义者通过回到“最初的”和“真正的”交换价值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幻想；尽管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制度的矛盾（工资和资本的对立）已经有所察觉。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经济和谐论者才做出只停留在最简单经济关系上的平庸论证和儿戏般的抽象①，甚至还忽略了早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蒲鲁东主义和经济和谐论的批判，马克思开始对他的整个思路——从货币的纯粹形式上考察它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评判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得失，以找寻实现真正的自由个性的路径——做进一步反思。诚然，这种做法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一面。但是，它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和更为复杂的规定联系起来，不易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反而会被他人利用这一做法，将这些内在的对立掩盖起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② 这也就能够解释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最终放弃了上述做法。当然，这种放弃也决不意味着马克思此时的货币关系说毫无价值；相反，它足以成为表征马克思哲学

---

① “这实际上是断言，并且是通过**抽掉**社会生产过程比较发达的领域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办法来证明，一切经济关系都不过是简单交换即商品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这些规定的始终不变的关系的各种不同名称而已。”（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3.）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5.

的特质的一个重要范例。

五、货币的自我解体及其向资本的过渡

除了未能与较为发达的形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之外，论证货币关系自身还面临着无法被固定理解的困境，因为货币形式的辩证运动并不会随着它获得作为货币本身的形式规定性而停止。马克思反复强调，货币作为离开简单流通并同这个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规定的否定的统一，从而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并在流通之外完成向资本的过渡。

（一）货币形式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

就货币本身的形式而言，它作为流通手段是对它作为价值尺度的否定；它作为货币本身既是流通手段本身即铸币的否定，也在它只是作为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被否定。这是马克思早在考察产生于简单流通的货币形式时就已经得出的结论。

从货币本身完成了的形式来看，随着它获得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和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规定，积累货币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唯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货币表现为退出流通的货币，表现为致富欲本身对象和致富的本质过程合而为一。这样，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都和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货币相对立。一方面，在作为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的货币上，财富只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另一方面，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才能实现。对于个人而言，货币在流通中作为流通手段而消失，这种消失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我只有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①

究其实，货币在作为不以“我”的个体性为转移的、绝对可靠的财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8.

富的同时，又是完全在“我”之外的、有可能会因任何偶然性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之物。这种情况在货币的三种矛盾的形式规定性上兼而有之。特别是在作为货币本身的规定上，货币的自相矛盾表现为，它应当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只代表价值可变的一个同一量。这样，货币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实现着自我扬弃。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即流通的过程。由此可见，货币抛离流通获得独立性却在于依赖流通，因而它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积累货币而不积累财富，并不可以增加货币。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形式的财富的积累，货币本身会随着其积累增加反而会减少价值。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往往表现在金银上，它总是与最终消失在消费中的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丧失。所以，积累金银表现为从流通中反复取出金银，同时把财富保存起来不让它进入流通。这一点也为历史所证实。马克思指出，在古代世界中，积累金银最初表现为王室和僧侣的特权，被他们用作炫富的节日用品、祭祀的供品、公共的艺术品和应急的保障手段等。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积累金银同个人发生完全秘密的关系，它掌握在个人手中就是把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保存起来，以应付外部世界的变迁等等。金银是个人财富的证明，而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随着货币在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发展，炫富欲从而炫耀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的现象也发展起来。如果说野蛮人看重的还只是金银的光辉，那么，现代的个人则着眼于金银不是用作货币，而是同流通相对立的形式。在这里，货币与它的关系的承担者相矛盾，进而否定了自身。货币本身体现在金银上，意味着它在每一种形式上——不管是一般商品，还是特殊商品——都是片面的。当货币作为纯粹的一般财富的形式被否定时，它必须实现为实际财富的特殊实体即金银；而一旦货币这样被实际证明为财富总体的物质代表，它却必须要同时保持自身作为一般形式。要言之，货币同时是作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是作为对于个人表现为外在的和偶然的财富形式的自身的否定。

我们不仅能从货币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中得出其自我否定的结论，而且反过来说，考察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进一步发展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

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① 交换价值在商品流通中只表现为观念货币和铸币，作为计量单位和数量的存在。但是，如果把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交换价值作为价格和作为铸币的规定，不论是作为观念的计量单位和一般劳动的想象材料的存在，还是作为价值符号、价值的抽象的和转瞬即逝的存在和物质化的表象即象征性存在，都在它作为货币的形式上首先被否定了，但同时被包含在内，从而固定在一个对流通保持独立的化身中。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如果从流通的形式本身来做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货币只是作为尺度和铸币出现在商品流通（W—G—W）中的“流”（G），表现为基础和内容都毫无变化的物物交换（W—W）的中介形式。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中包含的各种规定所经历的转化只是形式上的。其中，价格只是交换价值用流通本身的语言来表达的通俗用语；而铸币则始终只是商品交换的手段，没有加入任何新的内容。它们实际上只是商品的“交往”用语。因此，个人的反思意识将处于尺度和铸币规定上的货币看作任意的、为便于使用而采取的发明。作为货币本身的货币却并非如此。诚然，它还是个人在流通中所发生的关系而自行产生的社会产物。但是，一旦金银或其他特殊商品发展成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就不再需要依赖社会协助和个人意志而成为货币。货币因其物质实体（金银等）同个人相对立而获得了一种表现为天命的权力。此时，人们的意识就会起来反对货币的这种权力，反对这种表现为纯粹“错乱”（Verrücktheit）的金属统治。

货币作为货币本身所包含的对作为尺度和铸币的它自身的否定，表征的社会关系及其后果是：“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这一点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中，而且是表现在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义、最难捉摸的形式——扬弃了一切中介的形式中。况且，这种表现既然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只是由生产中的相互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般的各个私人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它也就更加严酷。”② 正是由于货币从“奴仆”变成“主人”，使自然财富贬值和各个等价物的同等地位消失，一些古代的哲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75.

② 同①377.

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反对货币成为货币本身的自我否定。举凡：柏拉图把货币看作交换的象征和为日常交换服务的手段，把它的形式固定在尺度和铸币上，极力反对用作储藏手段①；亚里士多德用“易货”和“贩卖”这两个名词，区分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对立，并将前者视为合乎自然的和合理的形式，将后者斥为违反自然的和不符合目的的形式②；布阿尔吉尔贝尔作为货币主义的最激烈反对者，强烈攻击货币表现为同其他商品相对立的唯一价值的规定，竭力反对货币表现为贮藏货币和支付手段的规定③。概言之，他们反对的是交换价值本身成为流通的内容和目的即交换的目的而获得独立的形式，并最初发生在货币的简单的、可以捉摸的形式上。

货币在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之后，不论是外在于流通，还是重新进入流通，都将继续否定自身。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同时失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如同埋藏于深山老矿之中一样，货币既不再作为金银服务于流通，也不是商品本身形式运动即流通的一个要素。在后一种情况下，不管是否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货币所包含的价值都消失于同它相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从而重新成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失去其不灭性。

（二）货币向资本过渡的必然性④

不管是作为只从事流通的东西，还是作为与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的东

---

① “在城邦内部，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各人所制造的东西呢？须知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呀。交换显然是用买和卖的办法。于是，我们就会有市场，有货币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柏拉图. 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5-26.）

② “从前的人们各自所有的各种物品，或者太少或者太多：因此以有余换不足。‘交易’[物物交换以适应相互的需要]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随后看到的‘贩卖’[收购他人的财物，继而把它出售给另外一些人，以牟取利润]已经是致富技术中不合乎自然的一个部分了。”（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5.）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36.

④ 马克思在笔记本II和笔记本B’’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既有重复，又有所不同。从笔记本II的现有内容（第12-23页）来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性和逻辑过程的论述交织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划分，也没有拟定标题。到了笔记B’’中，马克思在拟定标题（向资本的过渡、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严格划分上述必然性（第4-15页）和逻辑过程（第16-19页）的基础上，又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包括货币形式的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等。鉴于此，笔者将上述两部分内容分别置于本章和第五章的相应部分进行讨论。

西，货币都否定了自己。如果货币在自我否定后停止进入流通，就会硬化为贮藏货币，而这显然又与货币自我否定的结果相矛盾。可见，货币的自我否定并没有消灭其辩证运动。在它本身的流通（G—W—G）中，货币向商品的转化只是一种形式变化（G—W），其目的在于使它再现于最适当的形式上（G—G），即作为最适当的增殖了的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增长，是价值本身所能发生的唯一过程；它只是作为简单流通的对立物，通过货币的自我扬弃而在货币流通中表现为货币的积累。由此，马克思将流通定义为“设定为价值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的过程”①。

马克思认为，从流通这个新理解上可以得出货币向资本过渡的必然性。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形式，货币的运动除了自身的增长即量的增长以外，别无其他。货币的质就在于量的增长，而它本身同时又始终只是一定的价值量、一定的金银量。正是量上的界限同质相矛盾，货币才要经常地越过自己的界限而实现新的形式。对于将自己固定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来说，它能够保存自己就在于不断越过自身在量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同它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因此，发财致富或自身增大就是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目的本身；自身增大也就是再生产，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在再生产中价值得到增大。这样，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已经实现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合而为一，这就意味着货币开始向下一个形式过渡。

从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形式上考察也是如此。作为量上一定的价值量，货币只是一般财富的有限代表，用财富的交换价值来确切计量。此时，货币根本不再具有在其形式规定性上应该具有的那种能力，即作为财富总体或“万物的结晶”购买全部商品的能力。作为一般财富的形式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就成为一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身量的界限的欲望；而这种欲望的对象化就是货币向下一个形式过渡的过程。

实际上，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唯一职能就是交换，它只有通过交换过程本身不断自我倍增，才能保持自身作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价值。这种自为的价值的能动性就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即生产性。货币作为贮藏货币显然无法发挥交换的职能，也不作为使用价值发挥职能，而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2.

是僵死的和非生产的东西。贮藏货币的增长只能来自流通的外部添加。只有重新有商品被投入流通，并且交换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它才能作为货币被保存下来。此时，交换价值就不再是货币。另一方面，如果货币重新进入流通，它也不再是交换价值了。也就是说，货币所过渡到的下一个形式，既是不在货币形式上的交换价值，也是不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从流通中产生并独立化，但又重新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而使自己永久化和自行增殖（倍增）的货币”①。

除了上述逻辑的过程以外，历史亦不乏简单流通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作为统治生产的交换价值的例子。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就是一种以流通即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运动或趋势。起初，流通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来自物质层面。从事交换的中介人，比如古代世界的闪米特人，中世纪社会的犹太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等一再地出现，贸易继续不断地发展起来，剩余产品就会反复不断出现。在这里，剩余产品的生产，即以超过使用价值的多余产品的形式提供交换价值的生产，是流通的前提。随后，需要的范围不断扩大，为满足新需要的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了。此外，对外贸易对改变本地生产也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流通和交换价值的运动在特定地域内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取决于本地发展的程度和外来影响的强度。16 世纪英国的发展状况就是一个典型。尼德兰工业的发展推动着羊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羊毛用作交换手段来出口，耕地变为牧场，小租佃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要言之，生产开始完全由流通决定而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

综上所述，简单流通已经在逻辑上和历史上证明为在它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转化为资本的要素。接下来，马克思自然要开始讨论资本的问题了。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87.

第五章　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上）

随着创作深入到关于资本的探讨，马克思的思路变得极为清晰起来。不同于探讨商品和货币时逻辑方法（辩证法）的“被动”介入和批判，马克思在“资本章”开篇时就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第一，资本的辩证运动不同于货币的辩证运动，它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应当从生产总体而不是仅仅从流通中加以考察。第二，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别资本或特殊资本，即资本的一切形式和一切方面，都属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从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区分，能够清楚展现**资本总体**的逻辑结构。从“1857—1858 年手稿”的现有内容来看，马克思未能完成他关于资本总体探讨的庞大计划，而只是对资本一般做了系统的梳理，并探讨了它的生产总过程。

按照**生产总体**的概念，即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统一体，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从这个总过程的各种规定来看，作为其**要素**的不仅仅是资本一般，而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作为其**环节**的不只是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资产一般的流通过程的不断交替，而是商品交换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及其各个过程之间的过渡过程（环节）；作为其产物的不只是各种形式的资本，而是商品的二重性规定、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作为货币的资本、资本一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作为其一般性规定的同劳动相

对立的资本及其各要素；作为其特殊化规定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作为其个别性规定的利润和利息）。① 与此同时，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又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不仅如此，这个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还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考察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虽然能够以它的要素或产物为直接研究对象，但是必须要结合它的具体环节及其表征的社会关系来综合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且系统地理解这个总过程，并以此观照和把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从而找到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式和通往未来社会形式的正确道路，实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产生于生产总过程的不同抽象领域。货币从商品流通中取得它的各种形式规定性，而资本取得它的形式规定性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中，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即资本一般最终产生于生产领域，它的产生过程涉及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多个复杂环节。仅仅是资本同劳动相交换这个环节，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同于简单交换（流通）。作为资本的货币，还不是资本一般，只是资本一般的前提；它只有经过简单生产过程、价值增殖过程和这两者的统一（生产出来的资本本身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以及和各种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才能成为资本一般。② 因此，考察资本一般的产生过程即它的生产过程，应当将它经历的各种过程和全部外部条件囊括进来。值得注意的是，将各种过程和外部条件综合起来考察，决不意味着把产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实际运动全面展现出来，而是阐明上述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

---

① “在资本概念的形成中需要阐明的……**第一个因素**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出发的。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因素**是从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出发的；**第三个因素**把资本设定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资本积累……以资本为前提，以**现存的**资本的关系为前提，因而也就是以资本同劳动、价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利息以及利润的关系为前提。”［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0.］

② “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重要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已经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总的来说，既然整个生产以资本为基础，也就是说，资本应该实现它的自我形成的一切必要要素，而且应该包含实现这种自我形成的条件，那么这三个过程的统一也应该得到实现。”［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7，383.］

现。后一种方式之所以是合理的，主要是因为：产生资本的现实运动即现实关系可以看作资本一般的辩证的生产过程；而考察资本一般，即把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形式固定下来，则是为了避免考察各种资本的错综复杂情形所带来的混乱。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过程

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货币向资本过渡的产物，它首先是超过了货币作为货币的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是货币规定的更高的实现。我们必须对这个新的规定加以说明。其次，作为资本的货币不是资本的较低级的形式，而是存在于资本之前的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同时又是资本一般的前提。因此，理解作为资本的货币概念，是完整把握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再继续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价值变化和现实条件。

（一）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内涵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阐明作为资本的货币概念应当将其置于简单流通中。其要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第一，货币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既是流通的前提，也是流通的结果。这是从货币流通（G—W—G）的形式中得出来的。但是这种形式的实质（G—G）在简单流通中不具有任何内容，只是表现为过程中的交换价值形式。第二，货币的独立性本身只是对流通的否定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即同流通关系的终止。这种否定关系不是货币在其完成了的形式上被贮藏起来，而是它作为商品流通（G—W—G）的结果，在流通的这个形式之外具有独立的存在。第三，货币本身被规定为特定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而不是表现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一方面，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看，简单流通本身包含着实在的物质变换（W—W），从而使货币本身表现为生产工具。另一方面，简单流通本身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它的要素先于它本身而存在，而不是由它本身创造出来。“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

① 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只是简要地提出了这四个要点，关于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则是在笔记本B”中进行的。

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无所作为而消失。”① 产品本身又是作为环节的生产的产物。因此，简单流通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而不再表现为量的交换这个最初的简单性。只要如此，货币就一般来说也就表现为生产工具，只不过没有设定在它作为货币的规定上，而是设定在它作为资本的规定上。第四，货币作为资本也表现为以流通为中介而发生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即利息和资本的关系。

既然货币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不仅作为结果退出流通，而且像它成为商品时那样重新进入流通并实现自我保存，简单流通的形式同时又要求同一交换价值交替成为货币和商品，而交换价值本身在上述形式变换中并不保存下来，那么，货币在流通中就是货币和商品这两者，并且在两种规定变换中保存自己。由此，马克思将简单流通表述为这样一个自在的、尚未表现出来的过程：交换价值在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规定上交替出现，并且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个规定的对立面实现自我保存，即在商品上作为货币保存自己，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上述情况作为前提，包含在简单流通向资本一般的过渡中；并且伴随着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形成，逐渐表现为自为的过程。

同样，对于作为资本的货币来说，商品和货币本身从而简单流通本身，都只是作为它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抽象规定而存在。为了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作为资本的货币不断地出现在简单流通中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上，但不只是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而是在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作为资本的货币］是商品和货币的统一，然而是这两者的过程中的统一，它既不是商品又不是货币，同时既是商品又是货币。”②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货币不仅表现在作为独立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同流通相对立，而且也表现在作为独立化的东西从流通中生成。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价值变化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首先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变化**，因为资本作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0.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0.

为简单流通的结果最初存在于货币的简单形式中。作为资本的货币既然已经使货币固定在贮藏货币这个规定上的那种物（金银）的独立性消失了，因而能够同等看待每一种商品，并且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商品形式来保持其独特的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不用束缚在任何商品的特殊实体即使用价值上同它们相交换；二是变换为商品时仍然是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换句话说，资本借以存在的材料只是为了交换价值的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而不是满足个人消费的对象。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独立性只是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论存在于货币形式中或商品形式中，都使自己作为交换价值保持下来，并且它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为了自行增殖。"①

除了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及其形式变化外，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还发生着**使用价值的变化**。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的真正独立性在于同它本身的对立物使用价值相对立。它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内在否定即积极存在来自我肯定和自我证实。在货币形式上，交换价值只是由于一种积极的抽象即抽象掉使用价值才保持独立性，并表现为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的唯一方法。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的作用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因为它自身的现实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交换价值表现为价格的形式规定，而是交换价值表现为附着在使用价值上的转瞬即逝的形式规定；不是使用价值在观念上被扬弃，而是使用价值在现实中被消费。这种消费是商品的现实肯定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否定。"货币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仅仅在想象中的、可以捉摸的存在。然而只要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消费本身被规定为交换价值的创造，并被规定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单纯手段，商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就不过是处于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的证实。"②

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的自我证实的唯一可能在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因此，对象化在货币上的交换价值只有同劳动相交换而占有劳动本身，才能在它作为商品的现实存在形式上自我保存和自我证实，而不是仅仅表现在货币的形式规定上。对象化在作为资本的货币上的交换价值亦是如此。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4.

② 同①395-396.

对于货币而言，使用价值从而对象化劳动只是使它自我保存和自行增殖的方式，而不是使它消失于被消费的商品中。相应地，与货币相对立时出现的只是表现为任何一种一般实体的商品，后者的形式规定性和内容都是无所谓的；易言之，就是特殊使用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然而，对于作为资本的货币则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对象化劳动的任何一种方式都表现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可能存在方式，它从货币形式变为商品形式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对象化劳动的任何一种方式又都不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这样看来，唯一能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即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非对象化劳动不是对象化劳动的反面或绝对否定物，而是潜在地包含着对象化劳动的可能，因而是唯一能够构成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物和补充物的使用价值。由此可见，从货币形式到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中的使用价值的变化，就是对象化劳动向非对象化劳动的转变。

以上是通过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的结果而得出的结论。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来考察也能得出同一个结论。马克思分析说，货币可以转化为这样一种表现——一切特殊商品作为对象化劳动的存在方式而都成为交换价值的表现，但本身并不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失去其简单性质的可能性不在于同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对象化劳动相交换，而在于同它本身不直接采取的唯一使用价值形式即非对象化劳动相交换，同时是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直接使用价值即劳动相交换。概言之，货币只有同劳动相交换才能实现为资本。**“货币作为可能性上的资本，它可以交换的使用价值，只能是生成、生产和增殖交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只能是劳动。”**①

此外，货币转化为资本所实现的使用价值的变化还可以表述为：与其内容相分离的纯粹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内容与形式合而为一的使用价值。诚然，不论是在简单流通的场合，还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场合，交换价值都只有同使用价值相对立才能实现自身。这里的交换价值显然是从它自身的形式规定来说的。但是，在前一种场合，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是使用价值的形式即这种或那种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内容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7.

因处于经济形式关系之外而无关紧要。而在后一种场合，使用价值的内容则是经济形式本身的基本经济要素。

（三）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

对象化劳动和非对象化劳动的区别，还可以从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的区别、客体化的劳动和主体劳动的区别上来理解。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主体劳动和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①，都是同义语。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有着准确的认识："如果劳动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② 与此同时，劳动能力作为非资本和特定的商品而存在。货币作为资本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即非资本相关联才存在，只有同这种否定发生关系即相对立才成为它本身。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能力。货币作为资本只有同作为它的概念上对立的那种商品发生关系才成为它本身。这种商品就是劳动能力。

不仅如此，劳动能力作为资本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它的消费同劳动的对象化从而同交换价值的创造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就是生产劳动。相反，劳动作为满足直接需要的劳务即非生产劳动，同资本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一切劳务被劳动者用以同资本家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后者所消费，只是收入的消费，而不是资本的消

---

①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一般使用"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这个术语，极少使用"劳动力"（Arbeitskraft）这个术语。直到《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才将这两个术语等同起来使用："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0. 马克思在另一处有类似的表述："**对象化**劳动的唯一对立物是**非对象化**劳动，同**客体化**劳动相对立的是**主体**劳动。或者说，同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但空间上存在着的劳动相对立的，是时间上现存的活的劳动。这种劳动作为时间上现存的非对象化（也就是还没有对象化的）劳动，只有作为**能力**，可能性，才能，即作为活的主体的**劳动能力**，才能够是现存的。同资本这一坚持独立的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只能是活的劳动能力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4-395.）

费。尽管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内的范畴，但是劳动者作为交换的一方不是同作为另一方的资本家相对立，他们的劳动只是为了取得货币因而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属于这一类的劳动者。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密最早做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他以能够生产价值作为这两者的区别，并且将生产劳动者定义为替资本家生产出包括工资和利润在内的全部价值的人。① 马克思对斯密的上述见解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在本质上即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有着合理性的一面。② 相形之下，对斯密的上述见解提出反驳的其他经济学家，或是胡说八道，或是谄媚资本家，其论点根本站不住脚。例如，施托尔希和西尼耳以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作为反驳论断，显然错误地将自然产品和劳动产品混为一谈了；现代经济学家不加分析地提出和千方百计地论证，凡是替资本家劳动的行为都是生产劳动，根本没有触及生产劳动的本质。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详细展开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说明。他虽然只是将其作为题外之言，但还是表明了继续详细考察的意图。到了笔记本 III（第 14 页）中，马克思在结束对资本的简单生产过

---

①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毫无所费。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物的价值便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还工资的价值，并提供利润。”“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并提供利润。”“把资财一部分当作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财，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用，以后又构成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03，317-318，305.）

② 马克思在此只是对斯密的观点做了一个结论式的评价，没有展开具体分析。直到“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才用大量篇幅来分析和评价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做的区分，指出这种区分虽然在定义上有相互矛盾之处，但这仍然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因而成为斯密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然而，斯密的做法也有不合理性，这就是超过了生产关系的范围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鉴于此，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看作劳动的社会规定性，而不是劳动的自然属性。[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9-154.]

程的讨论后，再次对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做了阐释。出于遵循马克思论证顺序的需要，笔者在此暂不论述这部分内容。

言归正传。除了劳动能力的几个同义词之外，马克思的以下三种不同说法表达的也都是同一个意思：（1）货币成为资本的第一步是货币同劳动能力相交换，以便通过劳动能力将商品的消费转化为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证实；（2）使货币成为资本的交换只能是货币同那种与它本身处于概念上特定对立中的商品之间的交换，而不是货币同普通商品的交换；（3）使货币成为资本的唯一交换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所有者（资本家）与活的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工人）之间的交换。要言之，货币成为资本首先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简单流通内部交换者彼此只是作为卖者和卖者相对立，因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工人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可以使用的商品出售，而货币所有者能够用货币交换这种商品。在这种场合，工人就是自由工人。使工人成为自由工人的条件是：第一，工人是自己活的劳动能力的自由所有者，从而能够支配它并把它当作商品；第二，工人用他自己活的劳动能力这种唯一的商品，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即对象化劳动，来换取自己的劳动，因而，他的这种商品又是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处于他自身之外的商品而存在。也就是说，工人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同时，还受到作为货币所有者的他人的限制。“对他的需要和要求仅限于使他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①，实际上才是自由工人的真正定义。

进一步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从交换主体和交换物的角度来看，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明显可以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人同资本相交换**。工人用自己的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即同样具有价格的使用价值，同资本出让给他的一定量的货币即交换价值相交换，进而换取满足他需要的商品。**二是资本占有活劳动而生产**。资本换来的劳动能力即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力使资本得到保存和倍增，从而成为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即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这两个过程不仅可以在时间上完全分开，而且还在内容（本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接下来，马克思就要对这两个过程分别做出详细的分析。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二、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

资本同劳动相交换分解为形式和内容都不同的两个过程，表明这个总体过程并不属于简单交换（流通）的范畴，这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一方面，从形式上来看，简单流通中并不存在二重的过程，用货币交换来的商品只是简单流通过程的目的，而不是它本身的最终目的。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简单流通的形式毫不相干，它属于在流通以外实现的纯粹物质方面的事情，表征的只是自然状态的个人同他的个别需要对象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相反，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中，用货币交换来的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并且其用途构成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资本同劳动相交换与简单劳动在内容（本质）上区别，是通过前者内部的两个过程之间的比较和区别，也就是它的自我区别，而不是通过这两者外表上的关联或比较而产生的。正是由于资本家用货币买来使用价值能够用以生产即创造价值的特有形式①，才使得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第二个过程与第一个过程区别开来——前者属于与交换完全不同的生产范畴，后者仍然完全属于流通范畴，从而构成这个总体过程同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之间的区别。

再进一步而言，资本将它的对象化存在的一部分即货币，同工人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的对象化就在自身内部中分成了对象（劳动资料，包括原料和工具）和劳动；这两者的关系构成了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相应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就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这种劳动过程由于具有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纯粹抽象性和纯粹物质性，又在资本内部表现为在资本的物质内部进行的构

---

① “只是由于用货币买来的使用价值的特有性质，就是说，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就是劳动能力的消费，就是生产，就是起对象化作用的劳动时间，就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消费，由于这种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实际存在就是交换价值的创造，——只是由于这种特有性质，货币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才变成特有的交换 G—W—G，在这种交换中，交换价值本身成为交换的目的，而**买来的使用价值直接就是提供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9.）

成资本内容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是作为一方出现，或不是作为一方本身的差别出现，也不是作为单纯的结果（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出现；这个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内容。"①

（一）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前提

如前所述，资本同劳动相交换起初仍然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只是由于用来交换的商品特有的使用价值才使它越出这个范围。因此，**简单流通是资本同劳动相交换（从而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的前提**。马克思认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作为简单流通关系而存在，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即处于两极形式上的等价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发生在流通内部的关系不是货币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货币和活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劳动本身不属于简单流通范围，但它并不损害简单的交换关系。劳动本身的活动作为劳动能力的对象化活动，其作用就在于使劳动能力实现为使用价值。同样，购买劳动能力行为也不损害简单流通的关系，因为它只是占有使用劳动能力的要求权。

这种简单流通关系作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前提，从而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出发点，不只是逻辑的结果，更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货币所有者只是作为货币的人格化）在流通领域内找到劳动能力这种商品，只有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和旧社会生产关系的衰亡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经济变革的运动，方能得以实现。自由工人正是产生于社会经济的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与此同时，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还成为资本本身生成和存在的前提。一言以蔽之，"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②。

正是对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前提的历史性的揭示，才弥补了叙述的辩证形式——考察简单流通作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从而资本一般的逻辑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3.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8. 关于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具体内容，马克思是在笔记本 IV（第 45-53 页）和笔记本 V（第 1-15 页）中进行阐述的。笔者将在本章的最后两个部分对此做进一步解读。

前提的过程——的局限性。换句话说，这种辩证形式只有在明确自己界限即“生成”的必然性而不是绝对性或永恒性时，才是正确的。这个界限同时也是资本一般概念的限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简单流通本身确实是作为资本的前提和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的，因而，我们只需通过对这个前提的逻辑考察就能揭示出资本一般概念。但是，这种揭示只是表明资本一般在现实中的必然性，也就是资本在现实中如何作为必要形式，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相结合的必然性，并没有使资本一般成为永恒的观念而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在将经济范畴看作逻辑范畴的同时，强调它的历史性和社会规定性，是马克思贯穿于“1857—1858 年手稿”中的那条“红线”——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一种具体应用。

（二）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

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过程具有简单流通形式的共性，即商品—货币—商品。对于工人来说，交换的目的就是满足他自己的直接需要。他交换而来的，是直接的必需品即生活资料，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或财富形式。“他得到的虽然是货币，但只是作为铸币来用，即只是自行扬弃的、转瞬即逝的中介。”① 与此同时，这种交换本身却有着不同于其他简单流通的独特内容。马克思对此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能力这种商品并不具有处于劳动者之外的独立性，而是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之中。

这种非对象化的商品只能通过工人来实现对象化。工人同时作为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和它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而存在。因此，工人向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或他的身体，而只能是对他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只要资本家买来对工人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就意味着交换的完成。至于资本家如何使用这种支配权，用工人的劳动能力来做什么，都完全无关紧要；尽管他的支配局限于一定的劳动和若干劳动时间，而且他只能按照劳动能力的一定性质来使用它。

第二，劳动能力这种商品所能换取的交换价值，既取决于对象化其中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也同对象化劳动和劳动时间毫不相干。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244.

劳动能力即非对象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是对立的关系，是造成这种表面矛盾的原因。工人的劳动能力只是作为它身体的才能而存在，因而它所能换取的交换价值，只能由它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也就是说，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这个对象化劳动不仅包括维持工人生命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还有使工人能够发挥出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而不是资本家使用工人的劳动能力时形成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计件劳动报酬制度看似是对劳动能力的购买，实则只是计量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劳动时间的另一种形式。

第三，工人在交换中同资本家相对立而实现的平等，只是骗人的表面现象。

工人用作为一般财富形式的货币得到等价物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他和资本家之间的非交换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之所以与交换关系毫不相干，是因为工人是处于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性质和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在简单流通范畴之外的规定。因此，这种外表上的平等已经被破坏了。“但是，这种外表却作为工人方面的错觉存在着，而且在对方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从而使工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发生变形，而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关系。”①

不只是如此。从简单流通来考察，工人将其使用价值换成财富的一般形式，使得他在得到的等价物的界限即量的界限内，从而像其他的交换中一样转变为质的界限，即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然而，正是由于上述简单交换的前提的存在，工人在交换中不受特殊对象和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所束缚，他的享受范围才只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他只是占有等价物而没有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从而把他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来。② 此外，工人享受范围的相对的界限还会使他作为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② 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没有交换价值。只有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相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能力的支配权，才具有交换价值。不是工人作为交换价值同资本家相对立，而是资本家作为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价值和失去价值，是自由劳动的条件和资本的前提。相反，劳动者作为奴隶却具有交换价值。尼古拉·兰盖（Nicolas Linguet）由此认为，劳动者成为自由工人是一种退步。马克思对于这种退步说批判到，作为奴隶，劳动者在形式上被设定

消费者而具有的生产者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者的作用。

第四，工人将交换来的铸币在财富的一般形式上贮藏起来而致富，还要受其作为阶级存在的一般条件的极大制约，因而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理论上讲，只要工人在交换中得到铸币，就有可能把它积蓄起来，从流通中抽出作为一般财富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铸币转化为贮藏货币。[①]可是，工人进行交换的目的是获得生活资料以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唯有牺牲自己的需要，即禁欲、节约和紧缩消费等，才能真正占有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货币。这是工人通过简单流通本身唯一可能产生的致富形式。另一方面，禁欲还会在简单流通之外以这样一种更积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人更多地放弃休息或经常地更新他的劳动能力，也就是勤劳。由此可见，勤劳和禁欲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这一点正好印证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觉：资本家正是通过节欲、节约和勤劳等来增加资本才成为资本家的[②]；尽管这种错觉对于产生它的时期，即资本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

为物；作为工人，劳动者在形式上被设定为人格。从物到人格，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与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相对立的，必须是作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劳动。只要劳动者作为交换价值，产业资本等发达的资本就不可能存在。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上述观点。工人如果想要保持他的人格，也就是作为和资本家一样的法律上的平等者，就必须始终把自己的劳动力（劳动能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工人一旦将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从自由人退回到奴隶。（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① 从理论上讲，除了货币积蓄而致富这个可能性之外，简单流通中包含的作为铸币的货币，即它转瞬即逝的性质，决定着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不能生产财富的可能性。“工人出卖的商品的内容决不会使商品超出流通的一般规律：工人通过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只能以铸币为中介取回一个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处在另一种为他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当然，这样的行动决不会使人致富，而必然会使行动的完成者在过程终了时恰好回到他最初的出发点。”[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② 斯密强调，资本家应从节约和勤劳相结合的方面来增加资本。“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10.）

发展起来的时期，是有意义的要求和想法。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这种错觉之后，却又阐释了更加离奇的看法：资本家而非工人自己向工人提出禁欲的要求。

然而，理论上的可能性未必转化为现实。工人通过禁欲和劳动来占有财富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一旦工人进行交换时把财富形式作为目的，而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反而不仅得不到任何财富，甚至还会失去最初的交换目的即使用价值。这是由工人在简单流通中的一般条件决定的。这个一般条件作为一切简单流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总的交换价值量的一定性："任何人投入流通的并不比他取出的多，而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也只能和他投入的一样多。"①

在总的交换价值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整个工人阶级付出勤劳和禁欲的结果无外有两种可能：其一，假设全体或大多数工人过度勤劳，那么他们所增加的只是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的数量，而不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从而工人劳动的一般价格即工资，反而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普遍降低。即使工人因工资暂时得到普遍提高而普遍有所积蓄，随后而来的工资普遍降低也会将他们拉回到应有的水平。其二，个别工人的勤劳和节约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工人的懒惰和浪费。平均而言，工人通过禁欲至多能做到承受生活资料的价格变动，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与赚取财富毫无关系。这也正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这个普遍要求本身又有着限度。每个资本家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而决不要求其他工人节约；他要寻求一切办法如增加商品的诱惑力和工人的新需求等，来刺激工人的消费，用任何词句来修饰他的这个"虔诚的愿望"都不为过。即使工人真的能用禁欲的方法实现货币积蓄，也是在为资本家节约。工人为了保存财富并取得收入，只能进行储蓄以获取最低利息。这种行为反而加强了工人的依附地位和资本家的力量：当经济繁荣时，资本家从工人的储蓄中赚取巨额利息；当经济危机时，资本家掌控的银行会吃掉这些存款。

由此可见，工人通过最高限度的勤劳和禁欲的结果也只能是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所采用的手段就会毁灭他自己的目的，而且必然会使工人降低到爱尔兰人的水平，降低到这样的雇佣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6.

工人的水平，这样的工人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① 这个结果显然作为通例而存在。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凭借毅力、体力、耐性、吝啬等等而实现他的铸币向货币的转化，只是他的阶级和他作为交换者而存在的一般条件的例外。

第五，工人同资本相交换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这种重复本身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实际对立关系。

简单流通本身并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交换的完成就意味着它的结束。只有重新投入商品，才能重新开始交换。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却有所不同。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就意味着能够源源不断地投入劳动能力这个商品。工人只要通过出卖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支配权，来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资料，从而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这种交换的自我更新能力，表征着工人具有人格的自由。尽管如此，这种自由是一定限度的，不足以改变工人始终在维持自己物质需要和生活资料的境况。“工人在不断重复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②

在重复交换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工人同资本家的对立。工人将自己全部劳动能力按照一定的期限进行交换，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拿出来交换。（正是由于这样，资本家给予工人全部的劳动能力的报酬也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分期支付。）这既不意味着工人必须休息一定的时间才能重复同资本的交换，也不意味着劳动构成了工人的资本。工人劳动的界限即它的中断，才真正是被理解为工人的资本的东西。要言之，工人不是永动机。相反，资本家却希望工人是永动机，其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的生命力。工人和资本家实际上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相对立，而不仅仅是简单流通中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相对立。工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等的斗争就是工人和资本的实际对立关系的证明。

（三）资本占有活劳动的生产过程

当活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形式即工人的身体中与资本相对立（分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5.

② 同①251.

离）时，它本身是非对象的，不能单独自己进行活动，因而只是潜在的价值源泉。它通过与资本相接触，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到此为止，就一般的交换过程或普通的流通范畴而言，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算是完成了。在交换之后，资本作为存在于对象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占有了非对象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劳动本身就成为资本的构成要素。接下来的过程就是劳动能力的消费，以及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首先是它存在的特殊实体和它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通过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资本本身才成为过程。

最初，工人拿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交换，因而资本作为货币即自为设定的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换句话说，资本只是对象化劳动的象征或表现形式。随着资本占有活劳动并作为后者的存在形式，它就成为对象化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活劳动比作“酵母”，把资本自身的过程比作“发酵”。这样，资本在“主动”占有劳动后表现为被动的东西。“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对象化在资本的物质中。”①

然而，从资本的内容来说，它对劳动的关系作为对象化劳动对非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和它的物质的关系。因此，资本作为劳动的物质，其实体只能是原料和劳动工具。马克思指出，前一种形式即无形式的物质，是劳动的有目的地创造形式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后一种形式即物质的手段，是劳动作为主体的活动和它的对象之间的“传导体”。在资本的被动内容同作为主体活动的劳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随着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消费，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从运动形式转变为静止形式。整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产品。它是整个过程中被消费的自身作为过程的资本的各个要素——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融合而成的中性的结果，而不是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本身作为产品的规定。后者只是作为整个过程的前提而存在，与原料和劳动工具之间没有质的不同；主体活动只需占有它们就行，而这本身并不是劳动过程。而在作为整个过程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6.

结果的产品中，资本的各个要素既被消费而融入其中，又被不断再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本身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这种消费不是物质本身的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不是物质的扬弃，而是物质的设定，即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对这种扬弃的扬弃。与之相适应，它的结果不是“无”，而是“有”；不是对象的单纯主体化，而是它本身再次成为某种对象。当然，就产品的一般性质而言，作为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

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将资本占有劳动的生产过程的特点，以及和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的区别，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作为整体在占有活劳动后，同时与作为对象化劳动和作为单纯劳动对象的自身发生关系。与此同时，资本作为货币的部分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是要素。相反，资本作为货币的部分在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中，表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

第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将自身的形式和自身的内容区分开来，而且还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和它们彼此的关系。相反，在工人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中，资本作为货币的实体对于形式规定是无关紧要的。再往前，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替成为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规定。

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自在地表现它自身作为形式和作为内容的关系。在上述过程中，这种关系本身只被设定在资本作为内容的规定中，与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毫不相干。资本的内容是由资本的两种物质要素即原料和劳动工具构成的。“而这种物质要素自身作为物质（原料和工具）和作为形式（劳动）是不同的，并且作为两者的关系，作为实际过程，本身又只是物质的关系——是这样两种物质要素的关系”①。劳动和资本本身的对象要素差别只是对象的差别，即静止的形式和运动（活动）的形式的区别。重要的是，**资本作为资本的一切形式规定都消失了**，就像货币的形式规定在价值形式中消失一样。正是由于资本只表现为被动的对象，它包含的一切形式关系就都消失了；正是由于资本只表现为简单的生产过程，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个异于资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0.

本的实体（对象化劳动）的东西，就根本不进入这种过程中。资本甚至只是以其固有实体的物质存在形式（原料和劳动工具）表现出来，而不完全以这个实体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资本自身的过程和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本身是相一致的，都表现在物质方面。它具有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共性，不带有任何特殊经济规定性。

（四）资本家“在场”的限度

综观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整个过程，其中出现的只是自在存在的资本，只是资本作为货币的存在和它作为自身内容的存在。自为存在的资本和作为它的必然表现的资本家，根本没有参与其中。最初同工人本身相交换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作为货币的部分；进行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工具消费的还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本身固有的实体，即它作为对象化劳动的存在。由此可见，资本的生产过程最初并不表现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首先表现为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要言之，**生产一般是资本的前提**。与此同时，资本也没有表现在它自身作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上，而只是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上。正是由于这个在过程本身中进行的抽象而非任意的抽象，也正是由于资本家所表现出来的没有“在场”，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把资本看作一切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并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

但是，他们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不仅是因为完全忘记了资本作为经济范畴的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而且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在资本简单生产过程中“在场”的限度，即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过程中，劳动作为劳动本身即作为自为存在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工人；而在第二个过程中，资本虽然表现为自在的存在，但是资本作为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整个过程的前提，预先就作为自行保存的交换价值而存在，即作为自为存在的、利己的价值，从而必然表现为资本家。资本在它的简单生产过程中只是在部分环节上暂时地同单个资本家相脱离。就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整个过程来说，资本作为资本本身的形式规定，始终没有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这不仅是从观察的角度产生出来的，也不

是从逻辑上得出来的，而且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当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被看作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时，必然意味着资本家的“在场”，因为这种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正好就是资本家，而不是纯粹的物。审视以约翰·布雷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我们需要的是作为纯粹的物的资本而不是资本家的说法①，不难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犯了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的错误。资本家失去了自为存在的资本也就丧失了成为资本家的属性。同样，工人一旦失去自为存在的劳动，如通过继承、盗窃等得到货币，就不再是工人了。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同样表明了以后做进一步阐释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在笔记本 V（第 15 页）中实现的。他主要是从资本的概念本身和资本家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这两点上进行分析的。笔者在此暂时不讨论这些内容，留待后文中进行。

（五）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力

既然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中包含着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那么必然要涉及劳动的生产性和资本的生产性问题，即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力问题。这也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争论许久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再次明确提出，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② 从工人同劳动相交换过程中的价值变化，也能得出这个定义。在同资本相交换的过程中，劳动作为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是这种交换的前提条件。就像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劳动的交换价值也是由生产费用，即生产出工人的劳动能力所消耗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对于资本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才是交换价值。劳动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些货币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这些商品又被工人所消费。由此可见，

---

① “生产者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像货物本身与提单一样。”（约翰·布雷.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袁贤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62.）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并没有直接引述这段话。直到“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才这样做。[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5.]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4.

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是非生产的。它只是对于资本才成为生产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生产劳动的上述定义，马克思特意选取了同它相对立的两个典型论点及其推论进行评判。

一是西尼耳关于钢琴制造者和钢琴演奏者的观点。[①] 钢琴演奏者虽然不生产钢琴，但如果没有他的演奏，钢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只把钢琴制造者算作生产劳动者，钢琴演奏者却不算，简直岂有此理！可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出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不可否认，钢琴演奏者生产音乐，满足了人们对音乐感的需要。他的劳动只能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由此而推论，有些经济学家从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的角度——他能够唤起新的需要，并引起为了获得满足这种需要而更加努力地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将所谓非生产劳动说成是间接生产。这种说法实际上承认了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二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应当同消费相联系。这种观点具有部分合理性。生产和消费终究是有区别的，但也有着联系。不管是为非生产消费而劳动，还是为生产消费而劳动，都总是以它们生产或再生产的资本为条件因而是生产的。由此得出的推论，即生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也具有部分合理性。但这个观点太过于抽象，它同样适用于奴隶。只有与工人相对的主人财富，即与劳动相对的财富形式本身，才是资本。因此，上述推论修正为生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资本的人，就是合理的了。

从劳动的对立面资本上理解经济意义的劳动的生产性，决不意味着资本的非生产性。仅仅把资本看作与劳动对立的对象、被动的东西和物质，从而推论出资本是非生产的，看似顺理成章。事实上，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的漏洞，这就是完全忽略了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限度，或者说，实现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从自在意义上说，活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要素是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的支配权和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换言之，这种转化只有在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资本是否具有生产

---

① 此后，马克思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时再次提到了这个观点。［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5.］

性，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在这种资本构成生产基础的情况下，劳动本身也只有被资本占有和吸收才是生产的。自为地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如果只是同资本相对立，就必然是非生产的；作为工人活动的劳动，由于只加入了形式上发生变化的简单流通过程，也是非生产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生产力是互为前提的和相互依存的。资本构成了生产劳动的前提，而劳动的生产性又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性。从上述认识出发，马克思批判了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性的几种典型观点。

首先，以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生产劳动的倒置和换位为依据，提出保存雇佣劳动和扬弃资本的诉求，是自相矛盾的。持这种要求的人恰恰忘记了生产劳动和资本劳动力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从资本的方面来看，它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和换位；另一方面从劳动的方面来看，雇佣劳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也是这种变体，是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工人的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

其次，资本因作为物质的东西而不是生产的这个观点，忽视了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的实质。持这种观点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如李嘉图、西斯蒙第和萨伊等，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到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的实质，而且在资本是否是物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他们先是想到了资本的物质实体和资本作为原料；后来在意识到这种物质要素不能把资本变成资本的情况下，将资本说成是价值；最终又认识到资本终究是一种与价值不同的规定，便再次回到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形态。例如，李嘉图把资本看作生产新劳动时的积累劳动，即单纯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工具；又如，萨伊甚至将资本作为劳动工具的独立性视为对资本的索取权，提出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概念。这些重复性论断并无任何深刻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表明资本和劳动所发生的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即使撇开资本不谈，马克思对劳动的如下理解就要比李嘉图等人的高深得多：“**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在这里已存在着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①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9.

最后，“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① 的论点，只是一种同义反复。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无非是在说“价值是价值”，因为资本本身就作为设定为交换价值的规定；无非是在说“劳动就是劳动”，因为劳动除了生产以外什么都不是。在这里，判断的主词不过是宾词的别名，这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根本不能反映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以上关于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的全部分析，不过是以资本的物质方面为出发点。资本自身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规定性，虽然没有进入这个过程，但仍然是存在的。从资本的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就是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

三、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

诚如马克思所言：“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② 根据这种“前提辩证法”，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由于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结果即产品，是资本的物质要素融入其中，同时又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所以，这个过程的前提就是资本；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是资本的物质内容，即它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所以，这个过程的前提就是资本的形式规定性，即资本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概而言之，资本的价值是生产过程的前提。

当价值作为主体出现时，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同时就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即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和倍增；与之相一致的是，资本和劳动的不同职能。这些内容并不难以理解。同样，劳动如何增加使用价值

---

① “我们说劳动具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商品，而是因为我们假定它隐含着价值。劳动价值是一种循果溯因的类比说法。劳动的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一样，是一种虚构。劳动从事生产，而资本获得价值，因此，人们为了简略起见，把两步并作一步，便说成劳动价值；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语言的规则；可是，理论家们却不应该把这看成一种事实。”（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9.）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

这个属于简单生产过程中的事情，也是一目了然。[①] 既然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已经作为前提而事先明确，因此，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关键不在于此，也不在于劳动为个人即生产者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劳动如何为他人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劳动如何能创造出比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要言之，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剩余价值、不变价值和再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区别，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和形式规定，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方法等问题。

从“1857—1858 年手稿”的原貌来看，马克思关于上述问题的探讨分散于整部著作里，在笔记本 III-VII 中都有所涉及，缺乏一定的逻辑性，甚至不乏前后重复、稍显烦琐的内容。鉴于此，笔者在这里不再按照手稿的叙述顺序进行分析，而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所提供的思路和线索（《资本章计划草稿》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做一种逻辑建构式解读，并对其中的核心论点做凝练和概括，以清晰且完整地展现马克思的思路。

（一）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必然性

我们首先来看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必然性，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于笔记本 III 第 17-20 页。马克思分析说，就其表征的社会关系即形式规定而言，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工具与原料）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从而价格构成的。在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中，资本的各个组成要素只是经历了物质变换，而没有任何价值的变化。它们从活动的、过程的形式开始，到在产品上凝结成静止的、客体的形式为止；他们过去表现为产品的基本的互不相干的先决条件，现在则成为产品本身了。因此，产品的价值只能等于已经对象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定物质要素的价值总和。这个等式就是：产品价值＝原料价值＋劳动工具中已消耗部分的价值＋劳动价值。

---

① “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因而，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0.］

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决不意味着它的物质存在形式变换没有意义。相反，这种物质变换即生产过程的完整性，是资本价值自行保存的唯一条件；否则，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就白白消耗掉了。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已经包含在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的条件中，因而成为资本的价值自行保存的前提而存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从而在产品中作为价值自行保存，生产过程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由此可见，“产品价值＝资本价值”只是分析判断，而不是综合判断。① 它只是表明，在生产过程中预先存在的资本价值分解为一定量的价值，以便作为单纯的价值总和再现于产品中。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马克思特意举了纺纱的例子。假定资本最初在价格上是100塔勒，不管是50塔勒的棉花＋40塔勒的工资＋10塔勒的纺织机，还是60塔勒的棉花＋30塔勒的工资＋10塔勒的纺织机，最后都存在于价格100塔勒的棉纱上。② 100塔勒的这种再生产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的纯粹的自行保持不变。在这里，发生的只有价值的运动，它从作为整体或统一体经由数量分割到表现为一个总和。所谓“总和”，就是在产品本身中并不存在的，只是由生产行为中发生的分割所造成的加总的规定。

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除了数量上的简单分割和加总之外，还有形式上的要素加在价值上，而这种价值要素又表现为生产费用。“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不是在它们的物质规定性上保存下来，而是作为**价值**保存下来，这些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以前**就已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③ 因此，“产品价值＝资本价值”和“产品价格＝生产费用价格”，是同一个分析判断命题：它只是表明了资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自行保存，即资本价值的纯粹同一性。

---

① 按照康德的说法，分析判断是指判断的宾词只说明判断的主词所包含的内容，而综合判断是指它的宾词会给主词添上主词没有包含的特征。

②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阐释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时经常使用这个例子，后来干脆把货币单位都直接省略掉了。事实上，这种例证法并非马克思所独有，而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常用手法。这种方法以其形式的直观性，达到了理论深入浅出的效果。尤其是在李嘉图等人将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马克思更加需要用例证法来解释其剩余价值理论中难于理解的地方。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常说的产品价格取决于它的生产费用，并不是在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费用价格的意义上使用的。他们理解的生产费用是大于原有资本的东西。他们所提供的公式是：产品价格＝原有资本价格＋利息＋利润。① 在这里，产品价值要大于资本价值。若非如此，他们就无法解释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公式的合理性，有的经济学家如乔治·拉姆塞（George Ramsay）指出，如果利润不是预先存在的，交易就不可能完成。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说法错误地将生产和交换混同起来了。简单流通只是把价值设定为等价物，无从说明价值的增加。重要的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看，产品价值大于资本价值，只有价值被理解为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才存在；这就意味着资本发生的只会是物质变化，而不会是经济变化。很明显，通过产品价值大于资本价值这种方式来实现资本价值的自行保存，同资本的概念即设定的交换价值相矛盾。

在产品价值等于资本价值、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费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唯有找到上述等式中被忽略的线索，才能解释清楚劳动如何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为此找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资本作为劳动相对立的存在；另一条则是生产风险的存在。他指出，前一种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能够作为非工人而生活。他必须将原有资本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去换取满足其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因而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如果资本的价值只是自行保存的，而不是自行倍增的，就会被资本家消耗殆尽，整个生产过程也会停滞。另一方面，生产风险必须得到补偿，因生产力提高而不断发生的资本贬值必须得到补偿，这是政治经济学常识。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是自行倍增的，这些补偿就无从谈起；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是自行倍增的，就意味着否认生产风险从而生产过程的存在。假定资本价值的不倍增，就是假定资本不是生产的实际环节和特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假定资本不表现为生产条件和生产费用不具有资本的形式。一言以蔽之，资本价值的单纯保存而不倍增，是同资本的本质相矛盾的。这就是说，资本价值自行增殖是必

---

① “当有人说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110时，他是这样计算的：原有资本＝100（就是说，例如原料＝50，劳动＝40，工具＝10）＋5%利息＋5%利润。”［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然的。

随着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果被揭示出来，整个资本的简单生产过程就被完整呈现出来。这样一来，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资本本身从而**资本一般**的前提。马克思在此以插叙的方式[①]将这个前提总结为以下几个：（1）**生产一般**，它是一切社会状态即人类所共有的无历史性的一般物质生产过程；（2）**简单流通**，就其总体和要素来说，它本身已经是一定的历史产物；（3）**资本**，它是具有非历史性的**生产一般**和具有历史性的**简单流通**的统一。这里很清楚，资本一般不是生产一般的规定；相反，只有分析完资本所赋予生产一般及其规定的各种特殊性即历史，才能够抽象出生产一般和交换价值。当生产一般只是作为资本的要素出现时，才能够显示出它的规定的历史性即特殊性。就像对各个特殊资本的抽象把握中会显示出资本的一般历史前提一样。鉴于此，马克思开始对“五篇结构”的构想进行初步反思，认为只有完成对资本的生产总过程的全部阐述时，生产一般和交换价值一般等的全部规定才能显示出来。

（二）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及其实质

对于马克思来说，反证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必然性，只是表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比它预先存在的价值要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他下一步要证明的，必然是资本价值实现自行增殖的过程，也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产品价值即资本价值就是对象化在资本上的劳动时间。后者表现为由分别对象化在原料、工具和劳动价格上的劳动时间所组成的总额。其中，对象化在原料和工具上的劳动时间始终保持不变，它们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只有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上的劳动时间从而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即一定量（时间）的活劳动相交换。这种生产过程中的交换不是等

---

① 马克思在这里（笔记本 II 第 20-21 页）插叙了体现其研究思路及其变化的几段重要内容，主要有：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因素；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区别和联系；资本一般的前提；资本一般和生产一般的本质区别。[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1.]

价的，并且活劳动时间要大于劳动价格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①；否则，就不存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了，要么是交换在简单流通中就完成了，要么是连简单流通的过程都不会发生。

实际上，资本同劳动相交换，从作为其结果的劳动价格这个规定来看，对于工人是简单交换，但对于资本家必须是非交换，因为他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付出的价值，也就是资本的价值增殖。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劳动价格所象征的劳动时间，与工人加在资本上的劳动时间相等，资本家就只是用交换价值的一种形式交换了它的另一种形式，也就只是资本价值的自行保存，没有起到自为存在的资本的应有作用；而工人压根就没有进入简单的交换过程中，因为他已经事先从资本家所付的报酬中得到了他劳动的产品；资本家也就成了“为普鲁士国王干的”（pour le roi de Prusse）②。

正是劳动价格中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区别，活劳动时间大于劳动价格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产生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鉴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不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是现代新的经济学家——在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上的困难性③，同时为了便于人们容易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使用了假设例证的方法。他说，假定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正好需要一个工作日，这就意味着工作日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毫无存在的意义。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从而自我保存更是无从谈起。为了自我保存，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只能劳动。这样，资本和劳动、工人和资本家就没有任何区别。原料和工具也不再是资本的物质要素，后者对前者的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了。

与此相反，假定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少于一个工作日

---

① 从工人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来看，劳动价格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就是维持工人生存的必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对象化在活劳动中的劳动时间原本就大于劳动价格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在前者中除了后者外，还有工人为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熟练劳动能力）或某种特殊技能而耗费的劳动时间。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活劳动还只是劳动本身即直接的劳动能力，而不是熟练劳动能力。剩余价值的产生与熟练劳动能力无关。

② 这里是“白干的”的意思。

③ 从“1857—1858 年手稿”的叙述顺序来看，马克思是阐释完剩余价值的实质之后，插入了对这一内容的深入剖析（笔记本 III 第 24-27 页）。因为这部分内容的插叙性在马克思本人这里是极为明确的，所以，笔者将这部分内容统一整合到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部分中，在本书第六章做相关的解读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比如，半个工作日），这就意味着资本家只支付给劳动价格半个工作日，便得到了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整个工作日。剩余价值就产生于这多出来的半个工作日中。正是没有任何东西同这多出来的半个工作日相交换，表明了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资本；有了资本就能够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而占有了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原因亦在于此。剩余价值和等价物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是超过后者的价值，而且还在于等价物的一般概念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相等，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不是源于流通，而是必须产生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此外，这多出来的半个工作日，对于工人是超过他维持生命所直接需要的强制劳动或剩余劳动。工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劳动则是必要劳动。要言之，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达而已。

与价值的所有形式一样，剩余价值的背后也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不仅具有一切价值（交换价值）的实质，表征着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而且还反映出工人对资本的人身依赖关系和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是较为不平等的：工人通过劳动本身创造出剩余价值，却只能得到维持其生存、满足其直接需要的生活资料；资本家仅仅是占有资本而不劳动，反而得到了全部剩余价值。相较于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剩余价值所表征的个人的现实悲惨境遇显然要严重得多，前一种情况毕竟“仅仅是”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全部个人都是异己的。扬弃这种悲惨境遇的难度，也远远超过了消除全面异化，后者只需要使全面异化发展成为人的发展的极大制约即可，也就是异化本身的发展“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

不只是如此。如果从单纯使用价值和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的实质即它所表征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明显，甚至被完全掩盖，反而彰显出资本的历史使命中进步和“伟大”的一面：不断产生出剩余劳动以推动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当资本的本性——作为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融入它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的时候，上述进步性和“伟大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

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①

资本的历史使命的进步性和“伟大性”表现得愈明显，剩余价值的实质就被掩藏得愈深。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任务和使命，不仅仅是明辨资本历史使命的损益，将剩余价值的实质从诸多积极的表象中剥离出来，更是要扬弃剩余价值所表征的个人的悲惨境遇。在他看来，上述目标只有在资本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资本历史使命的终结的地方，才能开始谈论。在前一种情形下，资本是非生产的，且不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后一种情形则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 剩余劳动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2) 普遍的勤劳，历时资本占有劳动从而占有普遍财产的漫长岁月，重新发展成为新的普遍财产的源泉；(3) 普遍劳动由于资本的本性不断地驱使社会劳动力向前发展而达到极为发达的程度，从而推动“劳动的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的社会既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产，又将科学地对待劳动的不断发展和愈发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使个人不再从事那些可以由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

(三) 不变价值与再生产的价值

如前所述，在资本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中，资本中的劳动部分，即直接同资本相交换的活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中的其他部分，即实现在原料和工具上的劳动，又发生了怎样的价值变化呢？从简单的生产过程来考察，劳动通过工具的传导作用在原料上并使之具有使用价值。这种原料的使用价值又是如何被保存到产品中的呢？此外，使用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具有交换价值。可是，彼时的资本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交换行为。那么，这部分的交换价值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同样，工具所消耗的也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进一步追问，工具和原料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否要由劳动来补偿价值呢？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

上述疑问可以用前文所举的例子形象地表达出来。100 塔勒的资本＝50 塔勒棉花＋40 塔勒工资＋10 塔勒工具。40 塔勒工资＝半个工作日的对象化劳动，而资本让工人劳动一个工作日，也就是实际创造出 80 塔勒的价值和 40 塔勒的剩余价值。在工具和原料的使用价值没有通过交换转化为交换价值的情况下，资本家用 100 塔勒的资本实际上只生产出 80 塔勒的价值，他亏损了 20 塔勒。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只能由劳动再去创造大于 20 塔勒的价值去解释。另一方面，40 塔勒的剩余价值不足以补偿 60 塔勒的原料和工具的消耗。由此可见，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不是由劳动来补偿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公式来考察，棉纱价值＝50 塔勒棉花＋10 塔勒工具＋80 塔勒劳动价值＝140 塔勒。一个工作日对象化劳动＝80 塔勒。此时，工人只有一个工作日，并且不能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两天，工人显然无法在 80 塔勒之外再创造 60 塔勒。究竟该如何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呢？

在马克思看来，回答上述问题并不困难，只需用劳动过程来考察简单生产过程即可。

从劳动过程来看，劳动首先需要有减轻劳动的工具和由劳动体现在其中并且赋予其形式的原料。在简单的生产过程中，作为物的原料的形式易逝性用作制造出物的有用性。如果不是棉花本身预先有了纱的形式，工人就不可能生产出布及其更高的使用价值来。当棉花逐步变成纱、布、印染布和衣服等形式时，既将棉花的实体保存在这些形式中，又使物质因越来越适合消费的需要而越来越有用，直至取得直接成为消费品的形式。物质的消耗及其形式的扬弃成为人们的享受，这意味着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使用本身。由此可见，简单的生产过程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不断被后一个阶段保存下来，就是旧的使用价值因创造出来的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换句话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有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正是活劳动通过使未完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① 然而，活劳动的这种作用不是主动的，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0.

而是被动的。它只是由于按照劳动本身的目的对原料进行加工而不断使之成为新的劳动对象，直到劳动产品最终形式的完成为止。也就是说，不用增加新劳动，只需活劳动行为本身就能使劳动产品的旧使用价值保存下来。“由于劳动产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重新被当作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性，作为产品的劳动便得到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便得到保存，这种保存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① 要言之，活劳动即劳动本身使原料的使用价值最终被保存到了产品中。原料的使用价值的保存，同时也是过去对象化在原料上的劳动，而不是活劳动增加的对象化劳动被保存下来，因而原料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即交换价值也被保存下来了。

同理，工具的使用价值的保存也是由劳动过程决定的。但是，工具的交换价值再现到产品中，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是预先存在的价值的单纯保存，因为工具作为资本的要素同时就是规定了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价值。这种保存不需要工人投入新的劳动。

综上所述，与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同，不是活劳动的量而是活劳动的质，保存了原料和工具已经包含的劳动时间：一方面，原料和工具中旧的价值的保存没有花费工人什么，他通过劳动行为本身就能够补偿原有的劳动时间，无须为此追加特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家也没有花费分文，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相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劳动的质。从劳动过程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来看，作为实体要素的工具和劳动，同作为主体要素的活劳动相区别；从价值增殖的过程来看，它们则是分别作为“不变价值”和“再生产的价值”，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前者只是保存了自己的价值，后者不仅再生产出自己的价值，而且将新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加入到产品中。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作为活劳动的质保存了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表征着这样的现实：资本家只是占有了作为前提的劳动和工具，而把它们保存到产品中的价值装入口袋。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工具和原料，工人就不能进行劳动。马克思指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的背后，却是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关系。劳动的这种使工具和原料“起死回生”的自然力，不再是劳动本身的力量，而是变成了资本的力量。因此，工人自然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0.

不会再得到资本支付的报酬。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包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一方获得利润，另一方获得工资。这就意味着劳动同它的对象存在要素（原料和工具）的分离，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已经被扬弃了。而这种分离本身却构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的基础，是对它们的关系的肯定。正是这种分离的扬弃，使资本和雇佣劳动始终处于对立关系，因为资本家不会对这种分离的扬弃支付任何报酬。资本家只是给了工人维持生命的生活材料，就占有了活劳动，并无偿得到剩余劳动和活劳动的质。由此可见，这种分离的扬弃不是真正意义上使工人复归自身，重新占有自己的活劳动的扬弃。

（四）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剩余价值的产生表明，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成为资本本身的目的。从劳动过程来看，剩余劳动的增加不外有两种方式：单纯延长劳动过程和降低必要劳动，后者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劳动强度的增加来完成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相一致的。上述两种方式分别意味着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总量（绝对劳动时间）和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前一种方式产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后一种方式产生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具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形式规定。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做出上述简要的概括，但是在一些论述中提出了上述概念，并且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做了阐释。由于上述内容在“1857—1858 年手稿”不是按照这样逻辑化的顺序进行的，而是不断地交替出现的，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些内容进行提炼和总结。

按照手稿的叙述顺序，他首先阐述了剩余价值和生产力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阶段一定的前提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是和劳动过程的长度有关。因而，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谈的是相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的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的实质时已经阐明了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在此主要论证的是生产力提高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马克思还是沿用了讨论剩余价值产生时的那个例子。为清楚起见，笔者将马克思的论述以表格的形式展现出来，具体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生产力提高到的倍数	必要劳动量	相对减少量	剩余劳动量	剩余价值量	相对增加量	剩余价值的增幅
不变	1/2 工作日	0	1/2 工作日	1/2 工作日	0	0
1	1/4 工作日	1/4 工作日	3/4 工作日	3/4 工作日	1/4 工作日	1/2
2	1/8 工作日	1/8 工作日	7/8 工作日	7/8 工作日	1/8 工作日	1/4
4	1/16 工作日	1/16 工作日	15/16 工作日	15/16 工作日	1/16 工作日	1/8
8	1/32 工作日	1/32 工作日	31/32 工作日	31/32 工作日	1/32 工作日	1/16
……	……	……	……	……	……	
1 000	1/1 000 000 工作日	1/1 000 000 工作日	999 999/ 1 000 000 工作日	999 999/ 1 000 000 工作日	1/1 000 000 工作日	1/1 000 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1）劳动生产力提高使剩余价值的提高多少，取决于必要劳动即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那部分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比例；（2）当生产力提高到无穷大的程度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相对增加量却趋向于无穷小；（3）剩余价值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比例，但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增加不能和生产力按同一个数字比例增加，反而会越来越慢。

马克思由此将相对剩余价值增长同活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关系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力提高能够增加资本价值的原因在于它减少了必要劳动，而不是它增加了同一个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量。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能够增加剩余劳动，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剩余价值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因而它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精准计算。

第二，剩余价值的增加数不是生产力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劳动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它除以生产力的增加数的余额。如上表所示，假设必要劳动＝1/4 活的工作日，生产力提到 2 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就是增加了 1/8 工作日［1/4－(1/4÷2)］；生产力提高到的倍数是 2，而利润只增加了 1/8，后者和前者之比居然是 1∶16。换句话说，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的价值的绝对额，取决于活的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那个可除部分。所以，在生产力保持一定比例提高的情况下，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

第三，生产力提高之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它意味着作为前提

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越大，活的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增加量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一方面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产生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即使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随着价值增殖比例的不断缩小，价值增殖越来越困难，以至提高生产力对于资本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样看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的关系具有内在矛盾。为了破解这种矛盾，资本势必会找寻增加剩余价值的其他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上述结论的适用范围。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只有是资本的生产力，才是劳动的生产力。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上述结论才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形下，问题只是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价值增长之间的纯粹抽象关系。一旦不从这种一般形式上来表述时，就属于利润学说的范畴了。

以上是从价值增殖的过程考察得出的结论。如果从生产过程来考察，问题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这种生产的特殊方式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此并未立即做出专门讨论，而是混杂在关于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和利润等的讨论中。此外，他还在讨论完利润后专门增加了关于机器的分析。

首先是劳动的协作。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增长是由于劳动的集体的和联合的性质，即使劳动之间的简单协作也决不是劳动量的单纯增加。生产过程中的工人联合不是工人本身进行的，而是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作为工人自身的存在，而是作为资本的存在，这种联合对于工人是偶然的。不仅如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并且所涉及的不是劳动本身，而只是劳动的产品，因为工人只是围绕资本劳动而自在地存在着。① 当然，工人在这里只限于同积聚的资本相交换而联合，因而会随着产品被生产出来迅速消失。

---

① “资本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等等活干（这种形式至今还同工业并存）。**可见，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遇到的。**这些分散工人的统一点，只在于他们同资本的相互关系，在于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从而他们创造的超出自己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8-589.］

其次是按照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的分工。工人在上一个阶段的联合结束后，迅速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联合，即资本使用他们在同一个工厂中共同劳动。资本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工人的单纯协作上，必定要超越这个阶段。从生产的形式来看，工业工厂和手工业工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早期的工厂就在同一空间使用集中的工人，并同时进行工人的不同方式的劳动。也就是说，整个工厂分成了若干个阶段，每一阶段操作又被分配给特定的工人去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则形成了工场内部的分工。由于生产的目的在于剩余价值，所以，就不像在工场手工业那样注重产品的质即使用价值，而是产品的量，也就是大批量生产。

最后是大机器的发展。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通过协作和分工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还是与大工业生产有着区别的。工场手工业之所以取得较高的剩余价值，只是因为同时使用很多的工人。这里占优势和使工场手工业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仍然是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还比较少。① 同工场手工业相比，大工业生产所实现的变革不是以劳动本身为起点，而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从而造成了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工具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对活劳动作用于原料起中介作用；相反，在大工业生产中，工人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即对机器作用于原料起中介作用。工人在工场手工业中把工具当作“器官”，相反，机器在大工业生产中则代替工人而具有“劳动能力”。

机器代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决不意味着**“机器的价值等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的价值”**②。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能力的余下部分的剩余劳动时间，按照劳动能力数量减少的同一比例增加。否则，新生产的价值就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从生产过程来看，机器代替部分工人投入到其中，意味着工具价值的增加和劳动价值的减少，原料价值始终保持不变。这样，产品的价值从而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由于资本在

---

① “如果事先认定，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奴隶自在地就是结合的，因为他们属于一个主人），那就是以下面这点为前提：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这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一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仍然比较少。”［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0.］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8.

剩余劳动时间这方面所多得的东西，会在作为对象化劳动而加入生产的那部分资本中失去，所以，上述情况决不可能成为对资本采用机器的刺激。

诚然，使用机器可以节约劳动。但是，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单纯节约劳动，而是节约必要劳动和产生剩余劳动。资本使用机器的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表现为，资本仅须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产生出同一价值或更多量的使用价值。机器的特征由于符合上述表现而同生产力的增长直接联系起来。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使用机器这种生产力的增长，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发生："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不仅［在绝对量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比例大于机器价值对所解雇的工人的价值的比例。"① 而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要么是因为原有工具价值的全部扣除，要么是因为资本余下部分的剩余劳动的增大。前者意味着所使用资本总额的减少，尽管剩余劳动在量上保持不变；后者意味着用于作为劳动对象的原料的资本部分必须增加，因而所使用资本总额的增加。由此可见，使用机器具有内在矛盾，既有可能引起所使用资本的绝对减少，又有可能引起它的绝对增加。这种内在矛盾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生产力提高的关系的矛盾，是一致的。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

（五）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自身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在于增加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形式规定，即绝对剩余价值。当生产力增大到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程度极小的时候，就意味着可以在抛开生产力的提高不谈时，探讨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实际上，马克思阐述剩余价值产生时所举的工人余下半个工作日就是增加的绝对剩余价值。

然而，受自然的限制，作为资本价值增殖的源泉的"活的工作日"总是有限的。就单个工作日而言，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很简单，只需将工作日延长到自然和法律所允许的界限即可。而且，在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达到了这个界限有可能导致剩余价值无法增加。另一方面，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29.

存。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多寡之间没有实质上区别。假定所有的工人都劳动同样长的时间，且每个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人数多的工人中每个人生产的剩余劳动就与人数少的工人中每人生产的一样多。这就是剩余价值率，单个工作日就是它的一种表现。当然，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是不同的。为了确定这个数量，除了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长度之外，还包括在空间上有多少个劳动日被重复。由之，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增加更多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活的工作日”的限制。“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① 这样看来，延长工作日的一定界限可以由增加工人人数来代替，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量。资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总是力图使用尽可能多的工人。

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随着劳动生产力发展不断减少的矛盾，只是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因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产生了矛盾，从而构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一方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需要尽可能多的工人；另一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变成不必要的。它们作为相互矛盾的资本趋势而对立地存在。与此同时，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可见，“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减少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② 究其实，此处所谓的资本的趋势，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关系中的一种应用：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的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却又不存在。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现代人口理论虽然对此不甚了解，但已经将这些矛盾作为矛盾表述出来了。③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8.

② 同①379.

③ 马克思此后专门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笔记本 VI 第 15-16 页），笔者将在下一章中分析这部分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既产生出剩余劳动，又产生出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而后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才是非生产劳动。负劳动首先适用于作为自为的资本而存在的资本家，其次适用于与资本一同分享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包括只是靠收入而非靠资本生活的仆役阶级。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也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和负劳动（非劳动）的对立，是同财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财富的发展在这种对立上实现了现实性和可能性的统一，它既是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又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个人只有同时满足了他人的迫切需要并为后者创造出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才有可能满足他自身的迫切需要。马克思的上述说法显然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色彩，但同时有着自己的思想特质，探讨了生产制度赋予财富发展的不同形式。“在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① 这些内容尽管超过了剩余价值生产的范围，在这里尚属于体外之言，但已经可以被提一下，作为理解剩余劳动的重要补充。

言归正传。资本力图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是将互相矛盾的两种趋势统一起来，从而成为活生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随着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它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出现，并且延续到资本的生产总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正如我们在“1857—1858 年手稿”后面的部分所看到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和利润的内容中，都有对使用机器之于剩余价值的作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等的阐释。

四、资本一般的形成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价值自行增殖，即直接或间接占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一切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这个规定只适用于资本，是资本区别于其他财富形式或生产发展方式的抽象表现，并且能够表现资本主义生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0.

产方式的特殊的历史性特征。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价值增殖的过程，正是资本一般的形成过程。资本一般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资本一般的全部形式规定的完成。马克思认为，完整地考察资本一般概念，需要阐明以下三个因素：（1）作为货币的资本；（2）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本身；（3）设定为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资本积累。这三个要素之间依次作为前提而存在。其中，第一个因素是资本一般的前提；第二个因素即资本的生产过程，形成的是资本一般的一般性规定；第三个因素以资本本身从而现存的资本关系为前提，包括资本同劳动、价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利息及利润的关系为前提，相应地形成了资本一般的特殊性规定和资本一般的个别性规定。①

从现实来看，除了生产过程以外，资本的形成过程还包括它的不断自我更新和再生产过程。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两者的前提是大为不同的，具体表现为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的内容的不同，并进一步表现为占有规律的转化。

（一）资本一般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探讨，大都以插入的形式分散在“1857—1858年手稿”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1）资本一般是资本作为价值所独有的一切形式规定的总和，是资本作为价值区别于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的抽象表现；（2）资本一般既作为经济范畴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同时本身又是现实的存在；（3）资本一般和特殊资本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资本一般是从根本上使各个特殊的现实的资本成为资本的规定，各个特殊资本的抽象规定表现为资本一般内部的种种差别；（4）考察资本一般时需要阐明作为货币的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设定为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资本；（5）资本一般和生产一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资本一般形成于带有生产一般性质的资本生产过程中，而关于生产一般的理解只有对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全部阐释结束时才能够完成。②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0.

② 同①269-270，279-280，440-441.

通过这些要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从资本一般的角度考察资本生产总过程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资本一般同“具体关系”（现实内容）和“许多资本”（各个特殊资本）相区别的研究意义。① 表面看来，资本一般中的逻辑学性质要大于经济学性质，但实际上绝非这么简单。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② 如同对任何一般抽象规定的考察一样，我们在考察资本一般时似乎也应该重点讨论它的现实内容。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竞争和信用制度是典型的经济现象，但它们对于考察资本一般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竞争中包含着许多资本的互相作用，这意味着要以许多资本的存在作为前提；信用中的整个资本，对于单个资本表现为一般的因素。要言之，自由竞争和信用制度中所涉及的都是资本的实际运动和具体关系，而不是资本在理论上的一般表现。

不仅如此，考察资本一般时要抽掉竞争和信用的原因还在于，它只是资本的内在规律的“执行者”而非“创造者”。马克思继续分析说，资本是并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的存在，其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由于资本的本性在于占有剩余价值而增殖价值，所

---

① “在已经以资本本身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对于单个资本来说，代表原料和工具的那一部分资本，表现为作为这个资本的**前提的**价值，同样，也表现为这个资本所购买的**活劳动**的前提。这两项［原料和工具］归结为由**他人的资本**生产的……因此，在单个资本中表现为前提的东西，我们叫作不变价值的东西，不过是由资本生产的资本的前提，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都是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的。每一个资本就其本身来考察，都可归结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死劳动。归根到底，撇开没有价值的自然物质不说，任何资本除了劳动以外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即使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都成其为资本这一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3.］“各个资本有各种不同的量。但是每一单个资本的量**和它自身是等同的**，因而，只要考察的仅仅是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它就和任何的量等同。但是当我们考察两个资本的差别时，那么，由于它们量的差别，就出现了一种质的规定的关系。量本身就成为它们相互区别的质。**这是**关于如何把考察资本本身同考察资本跟其他资本的关系区别开来，或同考察资本现实状况区别开来的**基本着眼点**，在这里资本的量是唯一的例子。”［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2.］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1.

以，这种相互作用表现为不同资本之间的互相排斥。由此可见，竞争就是资本的一个形式同另一个形式的关系，即资本同其自身的关系；就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就是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因而成为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和它的最适当的形式。正是通过竞争，符合资本本性、资本概念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才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也就是说，竞争只是资本内在规律的重要推动力。同理，作为竞争前提的信用关系亦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要抽掉竞争和信用的内容，从资本一般开始，以便能够直接探讨资本的内在规律。

从资本的内在规律来看，它首先表现为资本关系的基本前提，即资本和劳动关系，以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动力的作用。既然剩余价值是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对资本内在规律的考察应该从生产过程开始。必须说明货币如何超过它单纯作为货币的性质而成为资本，然后是资本如何通过活劳动而产生剩余价值，最后是剩余价值生产如何导致了资本和它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不考虑不同资本的存在和区别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一方面，剩余价值的产生是资本本身同活劳动相交换的产物，与资本究竟是何种形式即许多资本无关；并且后者很容易被人们加上它的概念中本来不包含的含义，甚至错误地把它和它的构成物质直接等同起来。①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配会掩盖它产生的实质，很容易让人错误地将剩余价值和利润看作资本的一部分，从而把资本本身误作为劳动之外的财富源泉。这样看来，只有以资本本身或整个资本，也就是资本一般为起点，才有可能把资本概念真正讲清楚。

（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众所周知，资本一般并不是资本的完成形式，资本的形成过程也不只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它还包括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从再生产过程中理解资本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

① “当规定资本的概念时，会遇到在规定货币概念时所没有遇到的困难。……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9.]

件本身表现为从外部由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这些**外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不论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①

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两种剩余资本的区别。马克思分析说，资本最初的生产过程的结果是资本占有以产品形式而存在的剩余劳动，这种产品必须要通过流通过程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前提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这个价值作为前一个过程中的结果，为了自身重新增殖所必须采取的特殊形式——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过是剩余劳动本身的形式。在前一个过程中，资本生产的物质条件（原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具有的规模，必须能够使活劳动不仅作为必要劳动的存在，而且还作为剩余劳动的实现，并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行为，即资本自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实现价值增殖。然而，资本一旦进入再生产过程，就会发现上述假象的消失。“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② 这就是说，资本生产中形成的剩余资本（剩余资本Ⅰ）完全是劳动本身活动的结果。相反，资本再生产中形成的剩余资本（剩余资本Ⅱ）却是资本本身活动的结果。随着剩余资本Ⅰ进入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在资本再生产中把必要劳动的条件和它身上潜藏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都变成作为资本的存在。剩余资本Ⅰ转化为剩余资本Ⅱ的过程，就是劳动的现实性和劳动丧失现实性的过程。

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来看，剩余资本Ⅰ的前提是资本家占有作为价值的资本，并且用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同活劳动相交换。换句话说，资本家通过交换占有他人的劳动。到了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剩余资本Ⅰ作为剩余资本Ⅱ的前提而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的劳动。在形式上，第一个过程是公平的等价交换关系，而第二个过程是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1-442.

② 同①442.

不经过交换的所有关系。这样，所有权同劳动的分离呈现出不同的前提，从而造成所有权规律和占有规律的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剩余资本Ⅰ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前提无非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而，剩余资本Ⅱ同剩余资本Ⅰ的关系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①

（三）所有权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从简单流通到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劳动和所有权这三者的关系表现出如下过程：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其中，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各种关系）也可以被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即劳动与所有权的互相否定或彻底分离），只要把资本和雇佣劳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Aneignung）的过程即可。"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② 在上述过程中，彰显出两种所有权规律和两条占有规律。但是，所有权规律与占有规律不是完全等同的。一方面，就马克思本人对概念的使用而言，占有与所有权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前者是指将外在于自身的对象占为己有，而后者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表现为所有者对某物具有的排他性的权利。另一方面，从文本内容来说，马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9-450.

② 同①463.

克思对这两种类型的规律已经做了区分，尽管这些区分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么明显。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使用的是“所有权关系或规律”这一术语。其中，第一条所有权规律是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所有权规律则是劳动与所有权的相互否定，并且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分析资产阶级所有权时提出的（笔记本 IV 第 50 页）。在第一个规律向第二个规律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渡环节：产品以私人所有物的形式拿到流通场所中，即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①（笔记本 II 第 7 页）。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中，马克思才第一次使用“占有规律”这一术语，并列了“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没有标上手稿中的页码）与“占有规律的转化”（这里标注的是笔记本 VI 第 1、2 页和笔记本 VI 第 37、38 页，而不是笔记本 IV 第 50 页）两个标题。

到了笔记本 B’ 中，马克思又阐述了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两种表现：（1）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占有产品，（2）产品的让渡（Veräußerung）或产品向社会形式的转化（笔记本 B’ 第 17－19 页）。其中，“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占有产品”表明劳动与所有权还是同一的，这体现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并作为其前提而存在，因为只有承认劳动是所有权的基础，即承认自己的劳动是最初的占有过程，才能实现劳动者间各自产品的等价转让（Entäusserung）以及劳动者对他人产品的第二级的占有。一旦产品发生让渡或向社会形式转化：“自己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货币），即社会产品，而社会产品又成为自己的产品（个人的使用价值，个人消费的对象）”②，他人就可以通过货币直接占有劳动者的产品，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就已经产生了。到了《资本章计划草稿》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马克思才在“占有规律的转变”的标题下标注了“笔记本 IV 第 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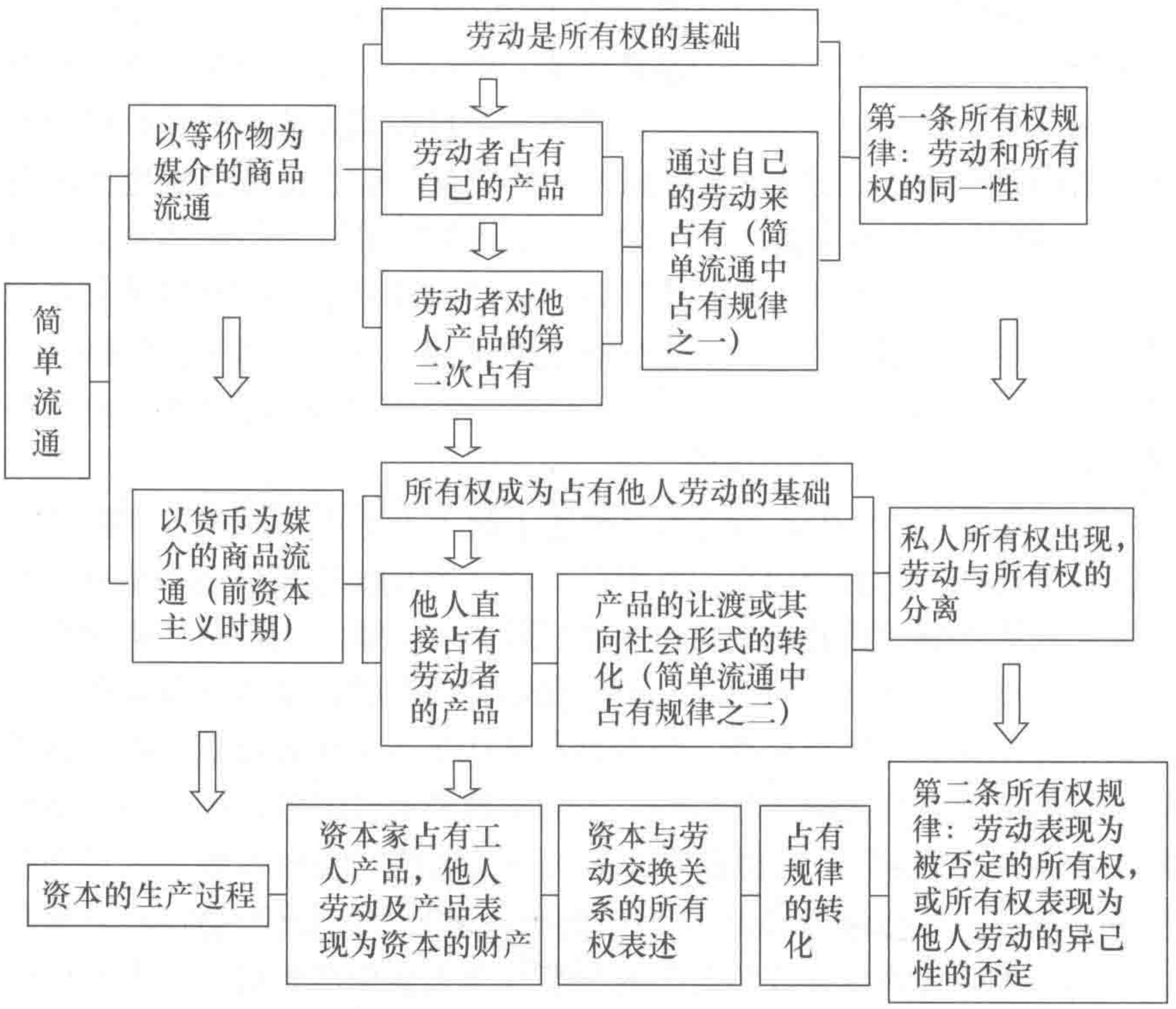
通过上述内容的梳理，我们就能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条所有权规律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50.

即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性＝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即第一条规律的第一个表现≠第一条占有规律；两条所有权规律转化的中间环节即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第一条占有规律的第二个表现；第二条所有权规律＝占有规律的转变即第二条占有规律。① 为清楚起见，谨将上述内容列下图所示：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将这一内容直接概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时期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其中，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是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具体内容是商品生产者对自己的商品具有所有权，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占有他人的商品；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则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工人生产的产品，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却不能占有产品，他们只能保持劳动力以便作为商品继续出卖。而且，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还会不断扩大与深化：在资本的一次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一次性地占有；在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不断反复地占有；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不断扩大地占有，并且用已占有的剩余价值再去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3-678.）

如上图所示，“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是简单流通的前提，“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则是简单流通的展开形式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的基本前提。尽管上述同一性作为大前提可以贯穿到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之中，但是简单流通中表现出来的是劳动与所有权的等价交换，而资本与劳动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假象（Schein）——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剩余资本，资本与资本家还无偿占有了他人劳动及其产品。因此，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仍旧把劳动是所有权的基础当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而且还把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规律当成是一般规律推广到简单流通时期的社会，甚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这种幻觉是显而易见的。”① 至于政治经济学家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所有权规律错误的理解基础上的“自由和平等的王国”，也根本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在劳动与所有权分离即所有权支配他人劳动的前提下，资本与劳动之间是绝对不平等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上述所有权规律的考察只是就劳动产品而言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下，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的所有权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旧社会形式中的主导力量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属物。马克思对此也进行了考察（笔记本 II 第 23-24 页）。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所有权；相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土地所有权则离不开资本这个前提，因为在历史上确实表现为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在资本改变土地所有权形式的历史过程中，围绕土地所有权的基本社会阶层也在发生转变：封建地主→地租所得者；租佃者→现代租地农场主；农奴、农民→雇农。在上述阶层中，资本决定产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关系，资本支配土地所有权进而决定现代租地农场主对地租所得者的关系。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9-350.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阐述了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佣劳动的历史过程。不同于雇佣劳动自发地过渡到资本，土地所有权向雇佣劳动的过渡则具有双重性质。

从肯定的方面来看，雇佣劳动最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即近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后来则是在近代土地所有权形式确定后由土地所有者创造出来的。一方面，在资本最早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使其转变为货币地租的时候，作为资本经营的农业就转化为产业化农业，茅舍贫农、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无地农民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在现代土地所有权下，在土地上必然会出现过剩人口，土地所有者就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而他们只能流动到城市以雇佣劳动为生，这样雇佣劳动就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由于雇佣劳动过渡到资本是自发进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资本→近代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资本。

从否定的方面来看，土地所有权同时被资本和雇佣劳动所否定。一方面，资本在设定了土地所有权后，实现了自己的双重目的，即农业产业化和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此时，资本就将土地所有权的存在看作它和旧的土地所有权之间关系解体的产物。一旦如此，土地所有权就成为对利润的限制，而非生产需要的东西。因此，资本竭力取消土地所有权的私有性质，把土地交给国家所有，从而使整个社会都转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雇佣劳动的发展是与资本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雇佣劳动既力求资本家将土地所有者当作“赘瘤”切除以减轻赋税等，又要求分割大地产以成为直接为消费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从而彻底摆脱雇佣劳动的地位。如果说资本只是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否定土地所有权的形式，那么雇佣劳动则是通过否定土地所有权，实现对资本从而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否定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资本否定独立价值，这恰恰也就是资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们的否定就是**雇佣劳动**。接着就是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和由此对资本的否定。也就是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物的雇佣劳动。”①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8-239.

五、资本的形成史与原始积累

对于任何一般概念的考察来说，证明它的起点即终点只是抽象的结论。概念只有以历史的方式被考察，也就是具体化之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明。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得到概念的说明，同时概念也获得了历史基础。这里的历史方式不只是逻辑过程，还是实证的历史过程。关于资本一般的考察也不例外。马克思认为，已经包含在资本一般概念中的辩证发展——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作为产品的资本本身只是叙述的辩证方式——虽然对于理解经济范畴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需要用历史的分析来加以弥补。“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① 因此，在叙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需要重新回到起点，在流通领域内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过程及其条件，也就是资本的形成史和原始积累。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资本生成所必需的积累因而已经作为前提和因素包含在资本一般中，即资本形成以前的积累；后者则是已经形成资本的积累。原始积累已经包含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对立和这种对立的独立存在中，因而，与劳动对立的原始积累和与积累对立的活劳动（无对象的劳动），是在资本一般的形成中需要阐明的因素之一。起初，马克思虽然意识到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本质区别，却还是将这两者共同作为资本一般形成的第三个要素，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直到对手稿做进一步加工和整理时，马克思才将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抽离出来，并置于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中探讨。

（一）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历史起源

如前所述，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能力成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2-453.

为商品，从而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过渡到资本的流通领域。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重点就在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剩余资本 I 向剩余资本 II 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在历史中完成的。对剩余资本的转化做历史的考察，就是对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起源的说明。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作为资本关系的条件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这些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史而非资本的当代史。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活劳动能力同它的条件和自我保存的资料相分离，从而作为单纯的主观的存在而存在；（2）独立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必须作为使用价值而具有足够的积累，以便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产品的生产以及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或客观材料；（3）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自由交换，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奴役关系而基础的关系，因而必须是以交换作为中介向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的方式，直接购买他的劳动的生产，而不是以直接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的方式，占有他的劳动的生产；（4）自由交换的价值那一方，即以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形式来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那一方，必须以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为最终目的，而不是只满足于创造使用价值或直接的享用。如果不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活劳动能力只是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交换各自的劳动，或者活劳动能力只是独立的价值一方的财产，资本关系从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就不存在。

然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的关系中的情况，或是属于简单流通的关系，或是属于非雇佣劳动关系，从而无法构成资本的关系。用货币购买服务的行为属于前一种情况，资产阶级以前各种关系解体时期中偶然出现的零星自由劳动者属于后一种情况。马克思对此逐一做了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所谓服务，即一方所消费的服务或者通过向另一方提供生活资料的服务，不过是一方要靠另一方创造一个预定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后者劳动的对象化。这种个人服务正是马克思之前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在个人服务中，双方实际上互相交换的只是使用价值。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后者给前者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此只是表现为劳动的完成时态和进行时态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差

别。在农民供给裁缝布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付钱给医生要求治病等场合里，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是完全一样的。

当交换的一方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的形式时，作为独立化价值的货币非但没有增殖价值，反而丧失价值；这里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作为收入的货币只是由于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而不可能变为资本，从而也决不可能使活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即使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服务同收入相交换的全部行为，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和所有非生产阶级，也仍然是这样。资本中作为收入的部分同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虽然决定于资本生产的一般规律，但丝毫不改变上述关系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不管传统等等赋予这种个人服务多么崇高的性质。”①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它们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只是客观形式的规定和主观形式的规定——相交换，而是作为保持自身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相交换。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和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非内容，后者才是交换的内容本身。

出于同样的理由，资产阶级以前各种关系解体时期中偶然出现的零星自由劳动者，也不能归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尽管购买这些人服务的目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一方面，购买零星自由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价值，即使这种生产的规模再大也丝毫不改变这一点。另一方面，购买者可以出售这些自由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来获得货币，也就是说，自由劳动者创造了价值。但是，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是为了这些产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种劳动的购买只是在将他人劳动用于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的“伪装”下进行的。不可否认，随着这种自由劳动者的不断增多和上述交换关系的日益扩展，诸如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等旧的生产方式就有可能会解体，从而为真正雇佣劳动的产生做好准备。然而，这些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自由劳动者也有可能在出现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没有做任何改变。

因此，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只能产生于这样的场合：劳动能力的购买者出卖这种商品，只是将它用作保存和增殖他所拥有的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劳动者成为自由工人，他不仅具有人身自由，而且他用以交换的唯一商品就是自己的劳动能力，不可能去交换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

（二）资本原始积累以前的所有权形式

马克思在前文考察两种所有权规律转化时是以劳动产品为中心的，然而与“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性”相关的不只是产品的占有，还有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的占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极为必要的。

马克思首先总结到，作为资本的历史条件的雇佣劳动的前提有：(1) 自由劳动的形成及它同货币相交换，并以此产生货币与价值增殖；(2) 自由劳动与实现它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实现上述条件的历史进程就是小规模的自由土地所有权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的解体。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自然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即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上述两种所有权形式是“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性”的另一个表现——这里不是说劳动是土地所有权的基础，即“占有”（besitzen）土地［这里不是这种占有（Aneignung），因为它就意味着个人具有了土地所有权］是个人劳动的结果，而是说占有土地是个人劳动的前提。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劳动材料，所有权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为此，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三种土地所有权形式，具体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所有权形式	原始共同体的土地所有权	古典古代的土地所有权	日耳曼时代的土地所有权
典型代表	亚细亚社会	古希腊、古罗马社会	日耳曼公社
组成形态	部落共同体（实体） 个人不过是偶然因素 村庄是土地的附属物	共同体（虚体） 个人相对独立 土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	共同体只是松散的联盟 个人是独立主体 家庭为单位的散居

续前表

所有权形式	原始共同体的土地所有权	古典古代的土地所有权	日耳曼时代的土地所有权
具体特点	土地所有者与占有者的分离 共同体拥有土地所有权 个人只是占有并使用土地 个人财产就是公社财产	土地所有者与占有者的同一共同体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土地所有权互为中介、并存 个人可以拥有私有财产	共同体土地所有权以“公有地”的特定形式存在 个人土地所有权占主导地位
共同特性	占有土地是劳动的前提而非结果；共同体成员身份是个人占有土地或拥有所有权的依据		

由上表可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必须凭借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才能占有土地，“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①。在上述土地所有权形式下，个人绝不可能像单纯的工人那样以单个的点的形式被表现出来。共同体与个人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共同体成员就是基本前提，因为共同体是个人对土地关系的中介。另一方面，个人对土地所有权的一定的形式又决定了共同体现实存在的具体形态，不管这种以共同体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权是表现为共同所有权，还是共同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并存，抑或私人所有权在它同共同体所有权的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若要使共同体本身照老样子存在下去，就必须让共同体成员的再生产在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下进行。一旦个人试图改变自己与共同体的关系，他就是在改变与破坏共同体，同样也在破坏作为共同体的经济前提的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当然，这种经济前提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作为它“本身的辩证法”的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贫困、货币关系、战争和征服等都会破坏和影响它。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被**作为前提的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地或又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①

在上述形式下，个人关心土地所有权、从事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如何实现财富（Reichtum）最大化，而在于如何建立最理想化的共同体并造就最好的共同体成员。从生产的目的来看，古代社会的观点似乎要比近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崇高得多，前者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生产的目的，后者则将财富看作以生产为直接目的的人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单从财富的真正本质——在普遍交往中实现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的对象及方式②——来审视古代人和近代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们都存在局限性：前者追求的只是其所处的共同体成员的发展（例如，在古罗马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使其公民拥有更多的特权，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不是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后者则是在财富的全面异化下，把人的内在本质完全空虚化。因此，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所有权能够以实现人的普遍性与全面性发展为目的的财富的最大化，最理想化的所有权形式是什么？换句话说，所有权的起源或最初形式到底是什么？

探究所有权的起源必然要涉及蒲鲁东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所有权的起源归为保障信用制度、维系家庭和财产平均分配等非经济因素，以及把土地所有权笼统地说成是所有权最初形式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蒲鲁东讨论的只是土地所有权而已，这种所有权体现的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个人对土地这一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个人凭借劳动占有土地，而是占有土地作为个人劳动的前提条件而存在，并且个人占有土地是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8-479.

②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9-480.］

所说："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① 因此，不能简单地就把土地所有权归结为所有权的最初形式。马克思还推论：既然蒲鲁东认为一切所有权都是在具有非经济起源的土地所有权的范例上建立起来的，那么作为资产阶级所有权形式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在他那里自然也会被"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形成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蒲鲁东所说的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②。要言之，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产物。

在批判蒲鲁东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所有权的最初形式。

首先，所有权最初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占有，即人以共同体天然成员的身份为中介，将其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他本身的自然前提与身体的延伸。人本身的存在以及人在劳动之前以前提方式存在的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即人对土地的关系）才是所有权的起源。个人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存在也就意味着：在两者的关系中，共同体是主体，而个人是客体。因此，这里的自然生产条件具有双重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由此可见，所有权就是人对生产条件的占有，即"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作是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③。

其次，最初的所有权只有通过生产本身即人对生产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tatige，reale Beziehung）才能实现（verwirklichen）。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能动的生产活动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即实现现实的占有（wirkliche Aneignung）。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0.

② 同①481.

③ 同①485.

最后，所有权最初（在它的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进行生产的劳动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身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自己的东西，因此，所有权也会依照上述生产条件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要言之，最初的所有权总是与其所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当然，这里的生产力是指共同体本身或劳动主体相互之间的联系，即社会分工和交往关系；而生产关系则是指整个共同体的分工与协作关系。

关于所有权最初形式的最后一种规定，马克思是按照如下逻辑结构展开的：（1）既然生产条件是能动的、现实的，那就表明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例如，在古罗马城建立之前，狩猎区是由部落在那里狩猎而形成的，土地由于部落成员的耕作才成为其身体的延伸；随着罗马城的建成，在其周围的土地被罗马公民耕作后就使得生产条件变得不同了。（2）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组成共同体的个人便作为所有者被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① （3）再生产行为本身不仅会带来其客观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即生产者的个人也会发生变化。生产者个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向自然学习改变自身，他能够磨炼出新的品格、形成新的观念、造就新的交往方式以及产生新的需要和语言等等。（4）个人的改变一旦造成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必然会使共同体刻上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印记，以共同体为中介，或者更确切地说前提的所有权亦是如此。既然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权的最初形式是以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共同体与所有权的最初形式就必然会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个人便从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出来，人类社会就正式步入市民社会阶段。这样一来，马克思便从历史的角度将资本原始积累之前的所有权形式与之前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描述衔接起来了。

（三）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考察，是从劳动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6.

和所有权同一的维度所做的资本原始积累前史的考察，那么，马克思接下来就要从劳动和所有权分离的维度，对资本原始积累本身做历史的考察，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如何被历史提供的。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成为自由工人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劳动作为所有者的关系，即他作为所有者在从事劳动的各个不同形式解体的情况下才会实现。一是劳动者把土地当成自身的无机存在、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领域的关系的解体。具体而言，就是劳动作为部落共同体成员的关系的解体。二是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关系的解体。行会和同业工会的解体是它的具体表现。三是劳动者是生活资料所有者的关系的解体。“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作为（真正的）帮工，他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师傅所有的消费储备。”① 四是劳动者和活劳动能力对于自身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关系的解体。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奴隶和农奴被奴隶主和农奴主占有并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活劳动能力同它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就是上述关系解体的表现。随着劳动者作为所有者关系的四种形式的解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具备了。

上述形式的解体同时表现为资本的第一个公式。在这个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等关系都是被当作非所有权来发生着关系的。换句话说，资本的第一个公式是对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工具所有权、生活资料所有权和劳动所有权的否定。与这些否定相伴随的，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主要所有权形式的解体。

第一种形式是**最原始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土地所有权是统治所有生产方式的关系。重要的是，土地同时作为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而存在，因而劳动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关系中潜在地包含着对以上三种东西的所有权。这种历史状态作为较为完全的所有权关系，首先在工人同资本的关系中被否定。因此，它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中作为历史上已经解体的东西而成为前提。

第二种形式是**劳动者对工具的所有权形式**。劳动者作为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所有者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与土地所有权并存且外在于土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1.

地所有权的独立形式，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劳动在手工业中和城市中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土地财产的附属品，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因此，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手工业者的财产，只是以他的手工业，以他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中介**”①。行会同业公会制度下的手工业劳动中，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这就是说，构成所有权的要素不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由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所有权形式本身包含着对最原始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的否定，尽管它只有同时作为已经改变的土地所有权的补充物，才能存在。这种形式同样在资本的第一个公式中被否定了。

第三种形式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生活资料作为劳动者的自然条件而存在，土地、工具和劳动本身都已经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这种形式要么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要么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成员的关系。前一种形式同样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关系中被否定，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状态。在后一种形式中，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的前提，侍从对领主的服务关系是构成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生存方式，统治和隶属关系也包括了生产工具的关系，因为个人被当成了生产工具。这一整套旧的生产客观条件的解体，都是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所蕴含的否定性打破的。让劳动者从土地和地主的束缚、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完成了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在罗马共同体和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完成的。

随着上述各种形式的解体，部分民族中的一大批个人开始变成自由工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如土地、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和货币等的使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它们同这些个人的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种形式，作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②这个历史过程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异己否定，表现为大众作为自由工人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3.

② 同①497.

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从而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公式是从非所有权（财产）关系这个否定方面进行的考察，那么，资本的第二个公式就是从财产关系这个肯定方面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过程，应当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详细探究其中发生的关系变化。不能只考察可能存在的资本同可能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间的交换过程，否则，就会得出资本预先占有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必然性。

从它的概念和形成过程来看，资本无疑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马克思指出，对于货币转化为资本来说，货币财富的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如果没有货币财富同活劳动的交换，资本就根本无法形成。“**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①

货币财富的积累首先会形成购买劳动的自由基金。这种积累一部分是通过单纯的等价物交换完成的，一部分包括了高利贷和商人所积累起来的动产，但这两种积累都不是以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具备了一种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权形式中发展起来了：资本是货币。在中世纪，资本的形成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商人和高利贷者，这部分财富与劳动的客观条件能够完成结合，财富才成为了资本。其次，在这个资本的准备时期，行会制度和作为农业附属物的家庭工业是前提。只有经过这个过程，资本才可能产生，也正是局部出现资本家（也许是行会师傅转化而成的资本家）和工人，行会制度、师傅、帮工等才慢慢从整体上消失。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财富的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并因解体的环境而迅速增长和扩大，从而成为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之一。此外，货币财富积累还加速了旧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者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促进自由劳动市场的形成，而货币的作用就是购买这种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货币本身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1.

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这种促进作用。”①

在货币财富积累的作用下，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最终建立了起来。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以商人为中介的交换，同时又加速了货币财富的积累。商人买卖，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以海路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和荷兰的城市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进一步集中所完成的财富积累，皆是如此。随着货币与自由劳动者之间的自由交换，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建立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资本出现以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也就成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

由之，不难对资本的概念做出准确的理解：资本是关系而不是物。② 一方面，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或者说，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因为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劳动本身产物的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对于工人是异己的人格化的财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③。以布雷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人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资本又是一种不同于资本家的作为资本家的存在要素的存在，要言之，生产本身就是资本。既然资本同时是资本家和他的存在要素，所以它就是资本家和构成资本家存在要素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仅仅是普遍看到了资本作为要素这一点，并且只是把这个要素限制到了物质层面，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资本作为人格化了的存在要素的属性，决定了理解其概念规定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货币概念。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2.

② “货币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10.]

③ 同②508.

第六章　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下）

考察资本一般自然要从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开始。可是，资本的生命周期远非止于简单的生产过程。形成于生产过程中的作为产品的资本本身，实际上并不是已经形成的资本，而是在形成中的资本；它的形式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经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及这两个过程的统一，即总的生产过程，是资本达到完成形式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只有从资本一般进入到多种资本、实际的资本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的完成形式。在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中，生产过程的阶段必须通过流通过程的阶段来完成。资本的辩证运动因之变成了一个循环，并从中产生了资本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这些作为资本的暂时性限定因素“硬化”而成的特殊存在形式，在资本一般这个抽象中作为特殊性规定来理解。另一方面，流通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资本创造价值在流通时间里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资本以自身作为前提来计量创造出来的价值。这样，剩余价值就采取了利润和利息这样的派生形式。后者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果实”，也就是作为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的结果而存在。

一、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过渡

为了完成自我更新，作为产品的资本自身包括剩余价值在内，都必

须转化为货币，从而进入流通过程。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既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又是这种统一所产生的矛盾在资本内部的解决。不仅如此，这种矛盾同时反映出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现实困难，反映出资本一般这个形式规定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这样，马克思通过论述资本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发现资本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的矛盾的扩大，自然而然地延伸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及其实质的分析中。

（一）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的可能和必然

资本本身作为产品，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相统一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作为结果的资本尽管比作为起点的资本包含着更多的对象化劳动，从而是更高的价值，但作为价值还仅仅是自在的货币，尚未表现为货币。现成的可以捉摸的东西只是在观念上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不仅如此，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实际上也是价值丧失的过程。资本在价值增殖前作为货币从而设定为价值而存在，在价值增殖后却只是作为观念上的价格而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存在。这个观念上作为一定货币量而存在的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量。换句话说，作为产品的资本必须重新进入简单流通过程才能表现为货币从而成为资本。

作为产品的资本重新成为作为价值的资本，必然要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但是，这种必然性中也包含着偶然性。一方面，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其他一切商品形式“同命相连”：它能否与货币相交换从而实现为价格，只是偶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的根本不同在于：资本家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交换者，而是作为生产者同作为消费者的另一方相对立。消费者为了获得资本家的商品用以自己消费，就要换出手中的货币；而资本家为了获得消费者的货币，则要换出手中的商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消费性生产。这种交换很可能会失败，它仅仅是由于生产者同消费者相分离即可。此外，等价物也是影响这种交换能够实现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交换，这使得它所生产出来的新价值似乎很难有等价物存在。一旦这种交换失败，资本家的货币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产品，非但得不到

任何新价值，反而丧失原有的价值；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也就失去意义。

当然，资本的价值丧失对价值增殖的否定只是一种可能，它本身无论如何还是构成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因此，另一种可能是：过程的产品立即进入流通而实现为直接的价值形式。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同时也通过价值增殖过程表现为非价值。这正是资本生产与资本自行增殖的矛盾所在之一。只有确认这个矛盾的存在并认识到扩大了的其他矛盾，讨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才是有意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于这些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怎样不断被扬弃，而又不断重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①

（二）资本生产与资本自行增殖的矛盾

根据马克思的总结，资本生产与资本自行增殖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过程结果的产品本身的矛盾，它们是简单流通中的所有矛盾在新的形式上的"复活"。

究其实，作为产品的资本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价值性质和非价值形式，就是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矛盾。但是，在资本进入流通过程的主要限制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简单流通中的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些限制首先来自消费量（消费能力）和剩余等价物。从作为产品的一定的使用价值上来说，资本的数量虽然是可多可少的，但在一定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这种限度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特殊效用，又决定于需要消费这种特定用途的交换者的数量，因而决定于消费者对于这种产品的需要总量，即总消费量。从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来看，产品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限制，首先是作为货币的货币量，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的限制。换言之，剩余价值需要剩余等价物。作为消费者的交换者拥有的等价物数量同时制约着他们对产品的需要，因而也可以说是消费能力的一种表现。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这样看来，作为产品的资本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制首先就在于总消费量，后者不仅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还表现为同时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相形之下，简单流通中的产品的限制只在于对象化在这个产品上的劳动量，后者表现为这个产品本身所不具有的交换价值的尺度。如果说简单流通中商品的矛盾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那么，作为产品的资本的矛盾则表现为内容上的差别，也就是作为用途的使用价值和作为需要的使用价值、作为自身的使用价值和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

第二，资本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即资本必须同活劳动相交换的矛盾程度不断增大。

除了作为消费能力的一种表现而成为对资本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制以外，剩余等价物的限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生产上。作为产品的资本不仅必须是消费客体，而且必须同它的等价物即货币相交换。前者的限制在于流通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量，即作为他人的消费；而后者的限制则在于必须把这个剩余等价物创造出来，即作为他人的生产。可是，流通本身不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要求在作为前提的资本生产过程中把这些剩余等价物创造出来。资本同活劳动相交换又是资本生产过程的前提，从而成为资本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制。于是，全部的限制就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即资本必须同活劳动不断交换——而它最初作为一种限制就成了矛盾的表现。现在，一方是资本流通中货币量需求的增大，另一方却是资本流通的前提即自为存在的货币必须同活劳动交换而导致的货币量供给的减少。① “因为剩余货币要成为剩余货币，或者说剩余价值必须同剩余价值相交换”②，所以，以前的矛盾显然就变得更大了。

第三，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矛盾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的范围不断扩大。

剩余等价物或剩余价值这个资本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制条件，本身就包含着在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内扩大生产范围。“流通范围要扩大，而

---

①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对需要和供给的矛盾做进一步说明，因为“要对它们本身进行阐述，就要以资本为前提”。与此同时，他还留下了这样的疑问：“就需求和供给是抽象范畴，还没有表现特定的经济关系而言，也许在分析简单流通或简单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加以研究?”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① 绝对剩余价值即更多的对象化劳动的生产也是如此。相对而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1）扩大现有消费的量；（2）扩大现有消费的范围以扩大现有的需求；（3）生产出新的需要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获得剩余劳动不仅是量上的剩余，而且是质上的剩余，即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和分化。整个剩余价值生产总的范围的不断扩大，不仅扩大了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矛盾的范围，还使资本生产与资本自行增殖的矛盾扩大到了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中。

第四，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和它在自身性质上所受到的限制之间的矛盾。

不论是在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内扩大生产范围，还是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本质上都是通过新的生产部门来创造新的剩余时间。这种新的生产部门的创造，使得一定的生产作为新劳动不断从自身中分离出来，使得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需要体系都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有用性，以至科学只是作为它的体现者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② 由此可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而且创造出一个将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全部囊括进来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范围之外，没有比资本表现得自在的更高的东西和自为的合理的东西。

如此一来，资本就成为塑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唯一力量，并创造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7.

② 同①389.

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对整个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同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个阶段相比，自然界不再被人们视为自为的力量和“神明”，而是人的真正的有用物和对象；对于独立的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再是一种禁忌，而只是为了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克服了神话自然的现象以及传统的封闭的生产方式和需要方式。不仅如此，它还克服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和偏见，打破了人类的地方性发展的困境，摧毁了过去的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需要扩大和生产多样化，以及利用和交换自然力和精神力的各种限制，从而彰显出资本塑造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

然而，与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普遍性和克服各种限制相伴随的，是不断克服和产生这两者之间矛盾的资本生产的现实运动，不是只需在观念上意识到这些限制的存在即可。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也就是这些限制仍然存在时，最终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才是资本本性的最大限制，因而促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生产和资本自行增殖的内在矛盾；这种解决方式同时意味着资本生产从而资本自行增殖的不复存在，并过渡到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根本无法解决资本生产和资本自行增殖的矛盾。李嘉图等人正是由于看不到矛盾的存在而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产生和解决方式。①

（三）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资本生产和资本自行增殖的内在矛盾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这里之所以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是因为资本本身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各个要素间的互不相干和相互独立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种情形而已。在马克思看来，只要阐明资本内在的对生产的**特殊限制**和**资本本性**（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断克服生产的任何限制以扩大生产的一般趋势）之间的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根源。

首先，资本自身包含的对交换领域的限制即限制价值增殖的可能性

① 根据“1857—1858年手稿”的叙述顺序，马克思接下来分析了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McCulloch）和萨伊（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讨论。出于本书叙述逻辑的需要，笔者还是将这些内容统一整合到本章的最后一个部分。

和资本价值的无限度增大相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将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将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一方面，资本只有确立必要劳动，并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进行剩余劳动，才能实现价值增殖，产生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的唯一原因在于劳动是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必要劳动的条件。随着活劳动能力成为交换的中心，交换领域就缩小和被限制了。不仅如此，资本还将工人的消费限制在他再生产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内，使表现劳动能力的价值直接成为实现必要劳动的价值，并力求把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正是如此，资本才表现出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这是和资本发展的一般趋势相矛盾的。

其次，资本内在的对生产力的限制和资本无限度提高生产力的趋势相矛盾。为了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相对剩余时间，资本必然要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与此同时，工人的交换能力随着必要劳动的减少而不断降低，从而成为对生产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越高，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就降得越低；另一方面，产品的数量却不断增大，从而使实现产品中包含劳动时间的困难不断增加，因为工人的交换能力在不断降低，扩大消费的困难不断增加。

马克思将上述两种限制概括为：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限制；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限制。[①] 从资本作为价值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还包括：货币是生产的限制；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些限制既作为必然要素同资本本性相一致，又同资本本性相矛盾。这种矛盾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真正表现出来，即在现实中造成生产过剩。当生产过剩出现时，人们自然会找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必然要素成为限制的一面，但同时会

---

① “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对立，而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界限，因为它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6.］

忘记这些必然要素造成的资本的价值丧失。究其实，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资本一方面把它在流通中所创造的价值同预先存在于它本身中和流通中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作为它创造价值的必要界限；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生产率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和唯一界限。因此，资本在促使自己的价值不断丧失的同时，又不断地成为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障碍。既然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资本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萨伊和蒲鲁东用简单交换来解释生产过剩原因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只听钟声响而不知钟声从何处来”。①

马克思强调，他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只是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而不是对生产过剩的规定性的说明；所涉及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无须考虑其他有产的和消费的阶级。那么，这些萌芽即可能性又是如何转化为现实性的呢？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再次使用了假设例证法，将社会总资本划分为五类，分别用资本 A、B、C、D、E 表示，而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这五类中都是一样的。具体如下表 6-1 所示：

表 6-1

资本家	原料	机器	工资	剩余产品	产品价值
(A) 原料的生产者	40	20	20	20	100
(B) 原料的生产者	40	20	20	20	100
(C) 机器的生产者	40	20	20	20	100
(D) 剩余产品的生产者	40 20	20 10	20 10	20 10	100 50
(E) 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者	40	20	20	20	100

图表中各数据的货币单位：塔勒。

由上表可知，为了保证再生产的进行，资本家 E 需要这样来使用他所得的 100 塔勒的进款：用 40 塔勒同原料相交换；用 20 塔勒同机器相交换；付给自己的工人 20 塔勒，工人再用这笔钱从他那里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这笔钱又回到了他的手中；20 塔勒用来购买维持自身生活的剩余产品。换句话说，资本家 E 必须把他等于 100 塔勒的全部产品同下列各类工人的工资相交换：他自己的工人 20 塔勒的工资；原料生产者 A 的工人 20 塔勒的工资；原料生产者 B 的工人 20 塔勒的工

① 马克思关于萨伊和蒲鲁东的评述内容，笔者放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中进行。

资；机器生产者 C 的工人 20 塔勒的工资；剩余产品生产者 D 的工人 20 塔勒的工资。在上述情况下，构成资本家 E 的剩余价值的是 20 塔勒，即他的全部产品价值的 1/5。对于资本家 E 来说，这种情况——同工资的交换中全部实现自己的利润——是最为有利的：它“表现了唯一正确的比例，按照这种比例资本才有可能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在**交换**中实现他的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①。这样的比例对于其他资本家也是如此，构成他们的剩余价值的都是他们全部产品价值的 1/5。

在这种场合，各个资本家只有通过互相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产品价值。这些资本家不能消费掉自己全部的剩余产品，否则，他们的生产过程的终点和起点就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像没有生长出来一样。这就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限制所在。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为了保证资本从简单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再生产，至少在资本家 D 所在的部门是受到限制的。假定各个资本家只消费掉一半的剩余价值即 10 塔勒，那么，资本家 D 就只能卖掉他的一半商品即只得到 50 塔勒，因而就不能重新开始生产。这样看来，资本在向扩大再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过剩危机了。与此同时，其他资本家（A、B、C 和 E）必须按照之前的比例，将另一半剩余价值即积累下来的 10 塔勒中的 5 塔勒同原料相交换，用 5/2 塔勒同机器相交换，付给自己的工人 5/2 塔勒。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产新的和更多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如若不然，代表资本家消费的全部商品（剩余产品）的资本家 D 和代表工人消费的全部商品（必要生活资料）的资本家 E 会生产过多，资本用于生产的部分所占份额要么比用于工人工资的部分多，要么比用于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多。这里很清楚，普遍生产过剩的原因不在于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过少，也不在于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过少，而在于这两种商品相对于价值增殖过多；更确切地说，这两种商品相对于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过多。

从根本上说，各个资本始终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即资本的这种内部的概念上的分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这种发展决定着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产品分割为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以及剩余劳动本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0.

身又分割为用于消费的部分和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始终有着固定的比例，尽管这种比例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不仅规定了可以交换的数额，还规定了每一个资本进行交换和生产所必须保持的比例。如前文所述，假定产品价值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为：原料占 2/5，机器占 1/5，工资占 1/5，剩余产品占 1/5；而剩余产品又分为用于消费的占 1/10，用于重新生产的占 1/10。那么，资本的内部分割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在这五类资本之间的分配。如果必要劳动对资本中不变部分的比例是 1/5∶3/5，那么，用于资本家和工人消费的资本共计不会超过总资本的 3/10（1/5＋1/10）。不仅如此，资本的内部分割还规定了每个资本同代表它本身的某种要素的另一个资本相交换时所必须保持的比例，从而规定了每个资本都进行交换时所保持的比例。既然原料在产品价值中占 2/5，那么，这部分必须被看作固定的，而生产原料的总资本始终只能交换其产品的 3/5。“**交换**本身使这些彼此在概念上得到规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①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乃至革命会变更资本的内部分割的比例，但是这些比例的基础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也就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能力的比例。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活劳动能力，所占的比例极有可能不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因而不得不闲置起来，最终导致交换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出现亏损。换句话说，现有的资本和劳动能力的消灭，即在生产力发展较低阶段上对象化劳动的价值的相对丧失，是同生产力的（突然）普遍增长相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实质是通过减少生产和活劳动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正确比例。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在危机中发生的价值和资本的消灭，也可以说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相一致的，或者说是意义相同的。然而，这种增长仅仅是相对的增长，只是由于原料、机器和劳动能力的现有价值的降低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真正提高而产生的。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综上所述，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对于交换从而对生产始终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种比例决定着剩余产品中资本消费的部分同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之间的比例也固定不变，这等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固定不变。“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如果剩余价值只是被消费掉，那么资本就好像**没有**增殖，没有作为**资本**即作为生产价值的价值被生产出来。”① 一旦生产超过了上述限制，资本的价值丧失或资本的消灭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发生。无论如何，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或者扬弃这种价值丧失而产生出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都包含在资本的本性中。资本本性和资本对交换和生产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所在。

（四）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成为剩余资本

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过渡，无非就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成为剩余资本。马克思指出，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剩余劳动，它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但是，这种活劳动不可能“无中生有”，它必须要找到一定的客观条件。于是，这种剩余劳动以对象化的形式表现为剩余产品，而后者为了作为资本来实现价值增殖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和劳动的主观条件（活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条件都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结果：（1）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即剩余劳动的一定数额；（2）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形态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3）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异己性，已经达到资本家的人格形式同工人的人格形式相对立的地步，以至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和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剩余资本，都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漠不相干的交换价值。

换句话说，剩余资本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也就是转化为资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这些要素包括：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必要劳动能够再生产出同它自身相交换的价值所需的材料和工具；实现新的剩余劳动所需的材料和工具。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435.

由此可见，从劳动和资本的角度分别考察资本从生产过程向流通过程的过渡，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如果仅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上述过程，只要考察剩余资本即可。当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之产品被重新投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再次增殖了，包含了新的剩余价值，并表现为货币。这里的货币不仅表现为商品已经实现的价格，而且具有了已经实现的资本这种新规定。马克思认为，从货币的形式规定来看，在资本上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和剩余价值的尺度这个规定，它用自身计量自身，而不再只是作为商品的一般尺度的规定；其次表现为流通手段的规定，它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要素使资本同特殊的使用价值相交换——既同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又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而不再是为了消费而同作为一般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最后表现为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性价值，它作为资本在自身之间发生关系的形式上成为商品并进入流通，而不再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后又进入交换以成为货币。由于剩余资本的一切要素都归结为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的劳动，而非同现有价值的交换，资本家单纯占有他人劳动就可以代表自为存在的价值，即在第三个形式规定上的货币，亦即财富本身。“当然，对于这种**剩余资本**来说，作为**最初的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所占有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同他人的活劳动能力相交换。”①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则表现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如下作用：劳动不是将其在客观条件中实现全部当作自身的实现，而是同时将这种实现当作他人的实在并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将自身变成没有实体的、完全贫困的劳动能力同与劳动相异化的、属于他人的实在相对立；不是将它自身的现实性变为自为的存在，而是将它变为纯粹为他的存在，即纯粹的他在，也就是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要言之，劳动把它的客体性变成了自己的非存在即资本，或资本的存在。所以，劳动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它丧失现实性的过程，以至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和劳动本身得以变为现实性的全部客观条件，都成为同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8.

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①

更为严重的是，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通过劳动本身反而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完善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身在创造维持新的活劳动能力本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即剩余资本中的**劳动基金**的同时，还创造出使用这种基金的条件——它只有在剩余资本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会被使用。这样，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本（剩余价值）中，同时创造出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说，新的剩余资本本身同时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既然劳动本身同客观的财富世界等相对立，那么，这两者之间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活劳动能力这个完全贫穷的主体与客观的财富世界这个创造价值的客体之间，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并且不断进行下去。“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等等，等等。”②

在此需要补充一点，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劳动本身对它的客观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还以插叙的方式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扬弃这种异化的方式。在他看来，这种异化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它之所以是必然的，盖因资本价值增殖的前提不在于纯粹的劳动，而在于劳动从它和它的客观条件共生的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历史和现实都充分昭示着一点。其中，在劳动将其生产条件看作属己之物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形式中，——不论是在土地所有权上，还是在行会制度下，——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都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它的前提，因而劳动者的再生产决不是由纯粹的劳动所决定的。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正是由于这种脱离，才使得劳动表现为纯粹的劳动，使得劳动的产品作为对象化劳动和作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独立价值而存在。概言之，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相交换，看似劳动者所有权的条件，实则以劳动者的一无所有为基础。当然，劳动对其客观条件和产品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的必然性中，同时包含着扬弃它的可能性。“它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6.

② 同①447.

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①

言归正传。若从剩余资本的角度来看，就是资本再次被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并且在第三次的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而出现，如此循环往复。可见，资本流通就是剩余资本的生产和交换不断循环的过程。而资本的本性只有在循环结束时才真正表现出来。很清楚，马克思接下来就要考察资本循环本身即资本流通。

二、资本流通中的各种要素及其表现

就考察资本流通而言，已经不再是以正在生成的资本为起点，而是以已经生成的资本为起点。因此，资本流通所经历的是这样的阶段：直接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创造）→作为产品的资本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商品流通）→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货币流通）→原有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资本的生产过程（新的生产过程）。这些阶段实际上是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类要素组成的。具体而言，以交换活动为中介的资本流通，一方面将产品投入到一般流通中以便取回货币形式的等价物，另一方面从一般流通中出来时抛弃资本的货币形式以便再次进入生产过程。这样，资本流通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

由此，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流通包括本来意义的流通过程和本来意义的生产过程。“它们形成资本运动的两大部分，而资本运动表现为这两个过程的总体。一方面是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流通时间。整个运动表现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资本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这种处于过程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既可以看成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整体，又可以看成是资本**一次**周转、**一次**复归于其自身的运动的一定期间。”② 换句话说，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

② 同①6.

资本流通既可以看作个别的独立过程，也可以看作周而复始的周期性过程，即资本周转。考察资本流通本身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并且首先厘清它所涉及的概念和要素，诸如货币流通、资本流通、劳动时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流通费用等；然后考察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对资本流通的影响，以及对价值增殖的限制；最后指明扬弃这种限制所导致的矛盾的方式。

从手稿的原貌来看，马克思不仅在笔记本 V（第 16－32 页）中详尽阐述了上述内容，还在笔记本 VI 中讨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时，以插叙的方式[①]（第 21－27 页，第 31－37 页）再次强调和补充了若干内容。笔者在此的分析就以这些内容为依据。

（一）资本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区别

诚然，资本流通中包含着作为产品的资本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流通的形式，但资本流通和货币流通有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马克思分析说，从形式来看，货币流通具有以下特点：（1）从无数点出发又复归到无数点，但复归点决不表现为出发点；（2）整个过程最终消失在货币这个固定物中；（3）它并不设定价值，后者本身作为前提而存在，因而价格的设定纯粹只是形式上的；（4）它自身的运动是确定的，从而只能依靠外部推动力来加速或减慢。与之相对，资本流通则表现出这样的特点：（1）出发点同复归点表现为合而为一，资本家本身就是出发点和复归点，他先是用货币交换生产条件以便从事生产，然后使产品转化为货币即实现产品的价值，最后重新开始这个过程；（2）整个过程就像一部永动机一样，总是能够重新发动起来，并且分解为各个要素；（3）它本身设定价值，因而价格的设定具有形式的和实质的内容；（4）它自身的运动是由资本本身来扩充的和延长的，加速或减慢都是这个运动的内在要素。

如果从内容上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货币流通只是“徒有其表”；相反，资本流通则具有充实的内容。如同血液循环一样，资本流通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成长和生活的过程。不只是这样。就生产总体而

---

① “在进一步评论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观点以前，我们用一点时间回过来谈谈前面已经阐述的问题。”［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

言，一切纯粹的流通——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都以生产为前提，并且都是产品的流通。产品则全部来自生产过程，后者本身又是资本的过程。这样，货币流通本身就表现为由资本流通所决定。货币流通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如果说货币流通是同资本运动并列的独立运动，那么这种独立性只不过是由资本流通的**连续性**决定的，因此，这一要素可以固定下来，本身可以被考察。”①

随着货币流通成为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构成货币流通的两个要素（商品和货币）相交换所发生的形式变化就变成了内容上的变化。起初，在纯粹的货币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两方都没有作为对方而保存下来，每一方不是商品就是货币；价值本身也没有作为支配自身形式变化的东西而保存下来，换言之，使用价值本身不是由交换价值所生产出来的。而在资本流通中，资本本身在它交替地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变化上，交替地作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式变化上，所保存下来的不仅是自己的价值，而且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自己同作为价值的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资本从一个要素转化为另一个要素表现为特殊的、连续的过程。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反过来说，这个价值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是资本。此外，商品的消费表现为货币流通之外的最终行为。而在资本流通中，商品的消费对于资本不是最终的行为，而是属于生产过程，从而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即设定价值的要素。

（二）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

就作为整体的资本流通而言，其内部作为差别而出现的两类要素就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其中，前者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中所停留的期间，即生产时间；后者则是指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即流通时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和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区别。起初，马克思简单地将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当作一回事，因为缩短一定量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停留时间和缩短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一致的。此外，生产时间还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力和机器的应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应用等相一致，因为劳动时间的缩短即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取决于上述因素。在另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5-536.

一处手稿中，马克思将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一致性表述为：生产时间是由资本设定的他人的劳动时间；资本自身除却它的生产时间，就没有任何劳动时间。①

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着手对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做出区分（笔记本 VII 第 36－37 页）。他指出，在农业生产部门内部，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如下情况：同样的劳动时间可能用在不同的产品上，但这些产品实际所需的生产时间可能显著不同。上述情况只能是由自然条件引起的，例如，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的交替中断和延续，抑或产品完成后无须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且只需保存一定时间使其充分受自然过程的作用等。然而，这种不一致只有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才能有利于农业，因为生产阶段的中断已经决定了农业决不可能是资本最初的“驻所”。只有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资本才能全面掌握农业。“自然条件在这里直接妨碍劳动的利用，即妨碍资本占有剩余劳动。资本遇到的这些障碍当然不会带来利益，从资本的角度看，只会是损失。”② 换句话说，自然条件只能阻碍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本，使其不能和其他生产部门内的资本一样在相同的期间与相同数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

但是，这样的自然条件本身并不能以某种方式使资本的价值增大。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实质在于资本回流较慢，后者不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而是由使劳动变为生产劳动的条件即生产过程的工艺条件引起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等于整个生产阶段内耗费的包括活劳动时间和对象化劳动时间在内的整个劳动时间，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只有活劳动时间并且按照它同对象化劳动时间的比例，才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只有活劳动才能够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将任何价值形式的形成归为生产时间是不可能的。

（三）流通时间对资本流通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即资本流通的循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以二重性而循环地出现。这样，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24.

② 同①64.

资本流通的要素就包括：（1）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2）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及其持续时间；（3）货币按照相应的比例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原料、工具和劳动）；（4）资本中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作为且必须作为特殊要素而存在，因为劳动市场取决于与产品市场的支配规律不同的规律，它主要受到相对人口的影响。其中，第1个要素同价值增殖的一般条件相重合，第3个要素只有在许多资本而非一般资本时才予以考察，第4个要素则属于工资的范畴。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只考察第2个要素即流通时间，以及它对于资本流通的影响。

众所周知，流通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必须要对作为实际行为的流通和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做出区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作为实际行为的流通，即向市场运输产品的运动——流通的空间条件——属于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从而属于生产过程。产品运输到市场上后使其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后者由于花费劳动时间而同时是交换价值。可是，运输无论如何也不构成一种特殊情况，它始终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的继续，从而依赖和来自劳动，尽管它本身确实与生产资本投资的其他领域不同。同作为实际行为的流通相比，在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中加进了一个不是从劳动同资本的直接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而是从流通本身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它既是简单的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又是价值经由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形式变化。

当然，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也需要时间，即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开始直到产品转化为货币为止所持续的时间。这个时间显然决定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次数。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生产的更新取决于成品的出卖，取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即原料、工具、工资；既然资本为了从这些规定中的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所经过的道路构成流通的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要在一定**期间**里通过的……那么，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倍增多少次**，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① 因此，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通时间可以代替资本的量。换句话说，流通时间虽然不决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6.

定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价值的数量。例如，假定一个缩小为原来的 1/4 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作为资本流通四次，而另一个增大到原来的四倍的价值作为资本只实现一次，那么前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同后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至少一样多。

那么，流通时间对资本流通的影响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认为，从时间因素来考察资本流通，资本在返回到同一形态之前的一个周转时间是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构成的。在流通时间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时间越是缩短，相对剩余价值就越是增加，资本周转的次数就能增加。不仅如此，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率。因此，资本就具有尽量缩短生产时间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生产时间一定的情况下，一定期间内的周转次数就会随着流通时间的缩短而增加。所以，资本还要无限地缩短流通时间，尽管它在流通时间等于零时会由于失去运动的场所而消灭。**“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① 这些限制不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产生的限制，而只是外部限制。为了缩短流通时间，除了运输手段的发展之外，资本不仅力求摧毁交换的一切空间限制，从而开拓了延续不断的市场，直至征服整个世界市场为止，而且还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从而发展了一些经济关系，即一切信用形式。

到了笔记本 VII 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上述内容，其要义为：（1）流通时间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本身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这个时间内消失的时间。（2）流通时间与资本的生产率成反比，后者会随着前者减少到零而达到最大限度。（3）流通时间只能形成不创造价值的时间而不能增加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因而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限制。（4）流通只是资本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加以实现的时间，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的时间。换句话说，流通时间只是使价值处于相应的形式规定中，诸如产品的规定转化为商品的规定、商品的规定转化为货币的规定等，而不增加价值量。（5）周转次数决定流通时间，决不表明资本中加入新的决定价值的且属于资本的要素，而是表明流通时间是起限制作用的和否定的要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素。(6)“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而这种趋势又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① (7) 流通时间可以说是对象化在货币中，信用将货币设定为对资本的形式转化起中介作用的，但本身不是资本即价值的形式要素。

(四) 流通费用对资本流通的影响

同流通时间一样，**本来意义上的流通费用**即资本通过流通的各个环节本身所用去的活劳动或对象化劳动的支出，也非但不创造价值，反而是对价值量的扣除。马克思举例说，假定有两个人即 A 和 B，他们都是各自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就要通过相互交换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里很清楚，他们为交换所耗费的时间对于他们的产品及其交换价值，都不能增加任何东西。这种时间的耗费源于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因为 A 和 B 根本不能生产满足各自需要的一切东西。另一方面，A 和 B 的交换时间是同一个时间，他们在交换中耗费的时间完全相等。A 或 B 向对方提出将交换时间的耗费计入各自产品的价值中的要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 A 为自己的产品要 10 塔勒——他的产品的等价物——，又为他从 B 那里取得这 10 塔勒所花去的时间再要 10 塔勒，那 B 会说 A 完全可以进疯人院了。”② 即使发展到资本流通中，资本家 A 和 B 发现可以安排第三个人 C 作为中介，用花费 C 的时间在流通过程上以节约他们的时间，他们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损失得相对较少而已，因为他们必须将自己产品的份额让渡给 C 作为其所耗费时间的补偿。这就是说，C 也没有给产品添加任何价值，反而分得了 A 和 B 的剩余价值。③

从其本性来看，本来意义上的流通费用只限于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再把货币转化为商品，即资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所耗费的时间；它要么是对生产所耗费时间的扣除，要么是对生产所创造价值的扣除。与此同时，这个流通费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产费用，属于资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1.

② 同①12.

③ 在间隔很近的另一处手稿中，马克思再次使用了这个例子，只是赋予 A 和 B 以社会角色即渔夫和猎人而已。同①21.

本主义生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内在费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流通是价值通过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形式变化。**为了使这个过程正常进行所经历或花费的时间，属于**流通的、分工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的生产费用。”**① 由此可见，商人业务或者真正的货币业务，应当从以下意义上理解：仅就作为减少流通费用的中介方式而言，它们给生产增加了东西的原因不在于创造了价值，而在于减少对已创造价值的否定。如果它们使生产者能够创造的价值比没有流通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要多，并且多到支付完资本的非生产费用后仍有剩余，它们就在事实上增加了生产。可是，这些流通活动终究是资本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能从根本上消失。在上述中介方式下，价值之所以增加只是因为流通活动耗费的价值比其他场合要少。

不同于商人的中介行为，资本家在资本流通中损失的时间不能看作劳动时间从而价值的扣除，因为他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只是同工人的劳动发生关系，只是占有并确立工人的劳动时间。要言之，资本家的时间表现为多余的、非劳动的、不创造价值的时间，尽管资本实现了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工人只有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才有可能使维持其直接生存即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对象化；相反，资本家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从事劳动，从而使其必要劳动时间成为自由时间。“所以，就**流通费用占去资本家的时间**这个意义来说，流通费用是不存在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流通费用的讨论是在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相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不完全是一回事。由此也不难理解，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分别且交替地考察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之于资本流通的影响的原因。

（五）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和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其实质就是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生产的连续性和流通时间的必要性的对立。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连续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本质条件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流通同样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每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

② 同①22-23.

一个生产过程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流通过程，后者不断地阻碍着生产的连续性，使其成为偶然性。生产的连续性要求消灭资本的流通时间，因为后者必然表现为对资本的生产时间的扣除；与此同时，资本的流通时间又是资本本性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的实现不是资本在想象中立即由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概念，而是资本作为时间上先后继起的各个状态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资本在“蝶化”以前必须要有一段“蛹化”①时间。

生产的连续性和流通时间的必要性的对立，也就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反复强调，流通时间只有在同生产时间的关系上作为限制和否定时，才能够被考察。流通时间可以看作资本本身进行特殊运动的时间，资本在这个时间内作为只能发生形式转化的完成的资本而存在。生产时间则是资本再生产自身的时间，资本在这个时间内作为处于过程中的、具有创造性的、从活劳动中“吮吸灵魂”的资本而存在。资本既力图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又试图通过充当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中介的各种器官，赋予流通时间以生产时间的价值，从而将各种器官依次规定为货币和资本。这就是信用的两种形式。在后一种形式中，“资本极力使自己区别于单个资本，或者说，单个资本极力使自己表现为区别于自己的数量限制的资本。但是，资本在这上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一方面是**虚拟资本**，另一方面，信用仅仅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即各个资本被实行集中的单个资本消灭的新要素”②。然而，这就超过了资本一般的范围。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只考察资本通过信用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这个方面。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信用是扬弃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的两个办法之一。为了形象地说明信用的作用，马克思举了这样的例子：作为“虚假”买者的资本家 B——已经支付货币但尚未获得产品——充当中介来实现资本家 A 的产品转化为货币。债权人 B 只有当资本家 C 实际购买了 A 的产品后，才会得到支付。对于 B 来说，他提供给 A 的货币

---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用“蛹化”来描述流通过程中商品及其所有者的形态变化。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1-52.

的具体用途——不论是购买劳动，还是作为原料和工具——虽然是无关紧要的，但这部分货币必须足以让 A 得到全部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说，资本 B 取代资本 A 来实现价值增殖，但这两者不是同时增殖。资本 B 固定在 A 的产品中，并且在同资本 C 相交换以前处于闲置状态；而 A 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资本 B。由此可见，信用被资本本身用来消灭生产连续性中的偶然性的这个方面，产生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因而是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换言之，信用作为本质的和发达的生产关系，只有在以资本或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正如各种劳动并非直接成为产业劳动或雇佣劳动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借贷乃至高利贷这种“洪水期”前的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都不构成信用。高利贷虽然就其资本主义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而言是信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就其前资本主义的形式而言却是信用缺失的表现。

资本扬弃资本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的另一个方法是让它并存于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上。在现实中，生产时间并未真正为流通时间所中断。其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个资本都分为分别处于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中的两个部分，并且彼此交替着。换言之，资本过程在它的不同阶段上之所以能够同时并列，只是因为整个资本分成处于不同规定中的若干部分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按照流通时间对生产时间之比的一部分在起作用，另一部分则处于流通中，而不是整个资本在起作用。一定的资本通过信用而倍增实质上也是如此。对于这个一定的资本即原有资本而言，虽然等于根本不存在流通时间，但它所增加的那部分实际上是处于流通的地位。① 上述过程在较长时期内每天都在进行着。一旦资本的两个部分都历经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或者说，资本的一部分重新进入流通，整个资本即总价值就被再生产出来了。此时，资本的每一部分对于它的另一部分都可以看作固定的或流动的，并且它们互相交替地处于这种关系中。这样一来，就顺理成章地延续到关于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及其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分析中。

---

① “如果撇开所有权不谈，那么这又和把一个资本分为两部分完全一样。不是资本 a 分为两部分，也不是资本 b 分为两部分，而是资本 a 把资本 b 吸引进来，然后再分为 a 和 b。关于这个过程的错觉，时常发生在信用迷们当中（这种信用迷很少是债权人，而是债务人）。”［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3.］

三、流通中的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

如前所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这里唯一重要的是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间的区别。与之相适应的，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到了流通过程中，资本不仅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生产和流通相统一的整体，还在各个特定环节上有了区别，并且实际地构成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差异，从而成为对作为整个运动主体的资本的否定。其中，作为整个运动的主体、流通和生产的运动着的统一体以及处在过程中的统一体的资本，就是**流动资本**；作为束缚在特定环节上的和具有自身差别的资本，就是**固定资本**。“作为流动着的资本，它把自身固定起来，而作为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在流动。”① 要言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性。

在马克思看来，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理解为资本一般的形式规定性，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多现象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决定着总要有一部分资本被固定起来，任何刺激——不论是新的需求，还是新的供给——都不能驱使它更多地生产。由此不难理解，仅仅就事论事式地讨论类似于 1848 年加利福尼亚和 1851 年澳大利亚等地发现并开采金矿，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证券交易的刺激和影响，是没有用的。另一方面，包括李嘉图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假定资本全部被使用，因而只能用新资本的创造来解释生产的扩大，陷入了任何生产的扩大都以生产力增长为前提的荒谬中。

仅仅理解了上述内容，远不足以完整诠释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全部规定形式。总的来说，资本流通包括总过程、资本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小流通、资本在生产阶段以外的大流通这三种表现。正是这三种表现或区别，产生出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的形式规定性，即一般性规定、特殊性规定和个别性规定。同讨论货币的形式规定性一样，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也不是抽象地讨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而是将它们置于资本流通中进行考察，并阐释它们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

之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

（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一般性规定

在探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之前，我们回过头来再对资本流通做一番考察。为了清晰地呈现资本流通的各种要素，我们用p代表生产时间，用c代表流通时间，用S代表一次周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用Z代表一年的周期，用U表示一次周转所需的时间，用n表示一年周转的次数，用S'表述年剩余价值量，关于资本流通的公式就能表示如下：

$$①\ U=p+c\quad ②n=\frac{Z}{p+c}=\frac{Z}{U}\quad ③\ S'=S\cdot\frac{Z}{p+c}=S\cdot\frac{Z}{U}=S\cdot n$$

上述公式直接表明资本在一定期间内能够周转几次。现实中的资本不止是一次周转，而是多次周转和整套的过程。在量的方面，资本创造的价值量取决于它在一定期间的周转次数；在质的方面，资本不经过流通阶段便不能重新开始生产阶段。流通时间从这两方面看都表现为生产时间的限制，反之亦然。此外，一定的期间规定为一年的原因在于：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并相当于资本发祥地的温带农业的再生产，是以地球的公转周期即一年为标准的；同样，在依赖于温带农业的工业中，要求增殖的产业资本的周期也是一年。

这里很清楚，资本增殖不止于生产过程中，还处于包含着流通过程的总周转时间中。资本作为价值，为了占有和积累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要缩短由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构成的周转时间，以追求更快的周转。资本不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促进在生产过程中所实现的增殖，而且还通过扩张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条件购买市场，使流通过程更为顺畅。这样，资本反复进行着从生产到流通再到生产的过程，并且在生产和流通这两个方面不断变换着形式。“由于资本在过程本身的每个环节上都是过渡到它的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因而就是表现资本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的可能性，所以每一个这样的环节，同在生产过程中被确立为资本的价值一起，都潜在地表现为资本——从而表现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①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

言归正传。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必须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不断持续周转，否则自身就不能成立。资本经历着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的形式变换，使其价值不断地流动着。在上述形式变换中，资本始终保持着自我保存价值和自行增殖的本性。马克思将整个资本作为价值不断转移和流动中的规定命名为流动资本。资本只要是作为在不同形式间不断变换的价值主体，就都是流动资本。要言之，资本实质上是流动资本。这里的流动资本，指的是贯穿于资本流通的所有阶段中的各种形式的统一的规定性，也就是流动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其所以为一般性规定，是因为一般性将特殊性包含在内，并使后者从属于自己。

但是，资本作为价值主体不是单调的流动。当资本不可避免地停留在产品、商品、货币和生产条件等诸形式时，资本的价值就被固定在每个具体的形式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资本不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它便作为产品固定起来；当资本必须停留在市场上的时候，它便作为商品固定起来。当资本不能和生产条件交换的时候，它便作为货币固定起来。最后，在生产条件停留在自己作为条件的形式上而不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资本就又固定起来，并且丧失价值。"① 他将资本的这个规定命名为固定资本。这里的固定资本，是指限定在资本流通的具体阶段上的具体形式的规定性，也就是固定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只要否定资本让其价值不断流动的本性，非流动资本就等于固定资本。换句话说，在作为绝对的流动资本的资本的增殖这个本质规定中，本身包含着否定的规定即作为固定资本的资本的减值这个限制性规定。作为过程的统一的流动资本具有的价值增殖本性，被作为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固定资本所制约。

（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殊性规定

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可以把大流通和小流通区分开来：前者是资本通过再生产达到的流通，即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再回到生产过程的整个时期；后者是资本同活劳动能力的交换，即始终同生产过程本身同时并行的、连续不断的流通。其中，在小流通中，主要是价值的再生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8.

产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的，资本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将自己的活劳动能力转让给资本家，以此获得资本的货币形式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实现活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能够购买的生活资料在量上和在质上都受到资本的货币形式的限制。此外，工人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的工资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这个劳动时间是将为了再生产活劳动能力而消费的资本的货币形式对象化而得到的，因为被交换的价值总是对象化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进入小流通中的这部分作为生活资料基金或工资的资本，是真正的流动资本。“这种资本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了；而且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即它作为可消费的和直接进入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物质规定，也构成它的形式规定的一部分。”①

而在大流通即再生产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投入到工具中的那部分资本，作为使用价值被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而没有参与流通。它作为价值逐渐减少并转移到产品中，在一定的使用年限内始终作为劳动资料发挥作用。相反，投入到原料中的那部分资本一经被用于生产，就将全部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次性地转移到新的产品中。正是原料即劳动材料的使用价值以其使用价值生产出新的产品，并将价值保存到新的产品中，上述过程才被称为再生产。同投入到工具中的那部分资本相比，投入到原料中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转移速度要快得多。就这一点而言，投入大流通的原料部分与投入小流通的工资部分相等，都属于流动资本。投入大流通的工具部分由于价值的转移在部分性方面和后继性方面有区别，而被规定为固定资本。

这样，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被各自固有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所规定，其价值流通的不再是劳动时间量，而是劳动时间本身。马克思对此总结说：“在流动资本（原材料和产品）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之间的差别上，作为使用价值的各要素之间的差别，同时表现为作为资本的资本在形式规定上的差别。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过去只是量的关系，现在则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表现为决定资本的总运动（周转）的东西。”② 要言之，资本过去纯粹按照其物质方面所做的划分，现在不仅被包括在资本的形式本身中，还表现为使资本分化的东西。如果说生产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4.

② 同①90.

过程内部起初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最终则是劳动产品，那么，在流通过程内部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

如果说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资本只是表现为资本的不同的暂时性规定，即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那么，它们在大流通中就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要言之，就有了资本的两个特殊种类，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殊性规定。具体到现实中一定生产部门的一笔资本，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资本的这两个种类。

不只是如此。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固定资本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流动资本来说，其物质形态往往是固定的。不论是否加入资本生产过程，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总是以特定的形态出现。相反，劳动资料在它加入资本生产过程的前后，却经历了各种不同形态变化，并最终成为机器——更确切地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从而使固定资本之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要远大于流动资本。因此，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①

机器体系则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即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乃至整个资本相适应的存在。与此同时，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也就是它作为劳动的直接手段在最初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完全消失了，转而成为资本本身规定的且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具体而言，在机器体系中，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同活劳动相对立。对象化劳动不仅仅通过占有活劳动，还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了使活劳动从属于它，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第一次不

---

① 另一方面，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对于资本作为价值而言，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它可以将任何一种使用价值都无差别地作为自己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抛弃。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因而不符合资本的概念。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3.

仅仅直接作为产品形式或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形式而出现，甚至作为生产力本身的形式而出现。只要固定资本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资本生产过程，知识技能的积累和作为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到资本中，从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

另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也可以作为资本生产发展深度的标准。马克思分析说，不论是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还是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它们的对象都是提供给消费的产品本身。然而，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本身并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和直接的交换价值，甚至连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都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越高，用于满足直接生产需要的生产时间就越小。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将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和以直接的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将其用于非直接生产的劳动。由此可见，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的大小，取决于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劳动时间的效率，就像相对剩余劳动的多少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

除了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以外，固定资本所表征的矛盾和现实困难也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增长来解决。从其直接目的来看，固定资本的生产毋宁说是为了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而不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资本的直接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既然如此，那么，正是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和**在流动资本的生产中相比，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规模，也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① 要言之，就是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

马克思认为，这样所表征的是财富本身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处于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只是由于这种对立，才能够存在。这是符合资本的本性和趋势的。资本始终是在创造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同时，又将这些时间变为剩余劳动。随着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个人就下降到仅仅是从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6.

属于劳动的雇佣工人的地位，人格就从属于物格。同最简单、最粗笨的劳动资料相比，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越性”的机器体系，竟然迫使个人劳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只有当生产力的增长达到不受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束缚，且工人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的时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作为一种对立物而存在，从而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①

（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个别性规定

在强调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殊性规定表征着区别的同时，马克思还注意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再流通中和再生产中的相互转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使用价值方面和价值方面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形成的形式规定性，就是它们的个别性规定。

首先，究其实，一切资本，不管是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不管是处于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中，始终都是源于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资本本身不能单独地创造价值。资本流通的总过程要以不断的小流通，即工资同活劳动能力或生活资料相交换为前提。简言之，一切资本都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此时，固定资本只有通过一部分流动资本固定下来，也就是成为流动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从而它的各种要素通过上述转化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才能作为资本得到更新。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生产有着双重要求：（1）它只有在其价值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时，才能再同它的各种生产条件相交换；（2）一部分活劳动和原料要用于生产直接的或间接的工具，而不是去生产用来交换的产品。由此可见，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对于对方的生产来说都是前提。而且，只有在资本占有活劳动时，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以及固定资本在流动资本中再生产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其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再生产中没有任何区别。固定资本和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流动资本在大流通中的区别，是由资本的物质存在即资本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同流通的关系造成的。而在再生产中，这个区别必定同时表现为具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双重形式的资本的再生产。每种形式的资本再生产，都是对象化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都是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要言之，它们在资本的价值增殖上不能区别开来。在机器制造厂主从而一切这样的形式中，固定资本在其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中首先作为流动资本而出现，然后才通过**消费**而被束缚在生产阶段上，并作为固定资本同自身之前的形式区别开来。

最后，流动资本是由固定资本的消费和使用引起的，而固定资本又不过是转化为这种特定形式的流动资本。一方面，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时，一部分使用价值以及一部分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只是在较长的循环期内并通过自己在生产中被消费才能最终创造出或实现为对等价值的资本。另一方面，一切固定资本即转化为对象化生产力的资本，都是束缚在特定形式中的资本，因而作为使用价值同时脱离（个人）消费和流通的使用价值。如果不加上流动资本的规定，就不会成为固定资本。

至此，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实现的形式规定性的变化：一个东西（一般性规定）区别为两个（特殊性规定），最后又回到一个东西（个别性规定）。这种复归决不是倒退，而是资本将其内在的本性向外展开时向自身的复归。这些形式规定性是从资本流通即资本再生产中得出来的。后者虽然是资本一般的一个逻辑过程，本身却显示出自立的再生产的结构和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交换和交换体系，以及包含在交换体系中的向作为独立价值的货币的转化，表现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和界限。在资本那里，生产本身在一切方面都从属于交换。这些交换活动，流通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却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只有通过这些活动，才确立为**资本的形式**，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些活动是**资本生产**本身的条件。资本的再生产同时是一定的形式条件的生产，是人格化了的对象化劳动借以表现的一定的行为方式的生产。……向货币转化对于资本本身的再生产是必要的，而资本的再生产必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①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2-143.

四、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

从资本流通即资本再生产中产生的个别性规定来看，资本被规定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相应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变成了能够不断产生出新的价值的东西。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资本不仅将自己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从而赋予各种要素以不断自行增殖的能力，而且还将生产和流通统一起来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并把这种统一的结果同自身区别开来。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就是利润。不仅如此，这些利润还可以投入到资本中而变为一个更大的资本，从而再次成为新的利润的生产的源泉。也就是说，结果再次成为前提并产生出同样的结果。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全部过程做了一番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利润下降的趋势及其限制条件，当然这种考察还是在资本一般的范围内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利润再生产的探讨虽然在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上具有自洽性，并且实现了逻辑建构和理论史分析的结合；但是，它同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相比，显得较为薄弱，没有充分彰显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新特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即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巴师夏等人的利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相关分析，从而使理论史分析只是作为论证的切入点，而不是作为逻辑建构并行的层面而存在。这就昭示着，马克思之后所做的关于利润的考察，会有大量新的内容被补充进来，并且推翻了他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所做的关于利润的叙述方式。事实上，他在“1861—1863 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确实是这样做的。从《资本论》第三卷的篇章标题中就可见一斑。[①]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先来看马克思是如何描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全部过程的。

（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全部过程

马克思在开篇就给我们描述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全部过程，包

① 这些篇章标题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最基本议题，具体包括：（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剩余利润率；（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3）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4）商人资本；（5）生息资本；（6）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7）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括利润的再生产在内。利润作为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而出现，马克思所做的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最终完成而呈现出来。资本在生产中和流通中都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看作价值增殖的要素。与此同时，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也成为资本实现自行增殖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正是在它所历经的过程、时间和形式上，资本由于实现价值增殖而成为具有生产性的事物。资本一方面在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等各种规定上变换着形式，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循环，从而充分彰显其追求剩余价值以实现价值增殖的本性。

从资本的本性来看，剩余价值就是对资本作为资本本身的证实。“资本的运动就在于，它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自身发生关系，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或者说，同由它设定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① 由此可见，资本和剩余价值不仅存在于一种提供根据和被根据的相互规定的关系中，而且这两者之间还可以相互转化，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提供根据和被根据的相互规定关系。资本在不断转化为一系列剩余价值的同时，既在内部为剩余价值提供根据，并设定以此为根据的关系，又在外部给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提供根据，结成以此为根据的关系。要言之，资本不只是为自己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提供根据，而且是通过剩余价值这个“果实”来证明自己就是根据，即“结果实”的东西。

不仅如此，资本还同剩余价值相结合，从而成为更大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不断重复着价值增殖过程。“这样用预先存在的资本的价值来计量的剩余价值，这样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就是**利润**”②。剩余价值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就是利润。过去，在简单的或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现在，资本的所有部分都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换句话说，并非只有可变资本、生产过程和流动资本，才是生产性的；不变资本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流通过程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固定资本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剩余价值率，并且加速流动资本的流通的条件，而都表现为生产性事物。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4.

② 同①145.

表面看来，马克思在利润理论中似乎提出了一个人为的先验结构，实则不然。马克思所做的上述阐释，主要是针对斯密、李嘉图、巴师夏和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等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做法。重要的是，他试图揭示出隐藏在一切表现形式中的现实基础。究其实，直接形式上的利润不过是以资本总价值的比例形式而出现的剩余价值总额。在任何情况下，利润始终用总资本来计量，而后者总是大于用在工资上的即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按照这种理解，不难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决不能大于剩余价值总额；二是利润率在任何情况下所表示的盈利比例，都必定小于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如此一来，利润率就不仅掩盖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真实比率，而且总是表现得比这个比率要小得多。

既然利润率从一开始就在质上与剩余价值率不同，那么它的运动规律最初也会同剩余价值率的运动规律完全不相符合。实际的剩余价值虽然增大，利润率却有可能下降；实际的剩余价值虽然降低，利润率却有可能提高。利润率取决于资本总价值的事实，决定着它取决于以下条件：（1）剩余价值率本身的量；（2）资本价值的形成，即积累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3）周转时间的差别所影响的剩余价值的规模。

利润的形成和它的真正实现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们之间就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利润的真正实现与生产价格有着直接的关联。利润只有在为资本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的价格中才能得到实现，因而其现实性取决于所得到的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上述实现的过程只是发生在交换中，因此，对于单个资本的利润来说，不是受资本的剩余价值即资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的限制，而是同资本在交换所得到的价格的余额相关。即使资本的实际生产费用也就是它所推动的剩余劳动没有实现，利润也可能存在。然而，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即以另一种方法来计算的剩余价值本身，通过上述交换活动决计不会增加或减少。换句话说，发生变化的只是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间的分配，而不是剩余价值本身。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利润始终是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斯密、李嘉图和巴师夏等人才永远无法解释清楚利润率下降的事实。

（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及其限制条件

在完整清晰地呈现出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后，马克思接下来分析出

资本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发展固定资本的结果就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他先是对这种趋势从经济学材料中做了历史性的考察，其要义有：（1）斯密试图从各种资本相互间的竞争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即资本积累→劳动需求增大→高工资→利润率下降。然而，竞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种规律的执行者，而不是发现者。由此可见，斯密在解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方面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2）李嘉图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归因于土地产量的递减规律所引起的级差地租的增大，即资本积累→劳动需求增大→粮食需求增大→限制土地耕作→粮食价格上涨→名义工资上涨→级差地租增加→利润率下降。但是，李嘉图没能区分开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因而无从解释利润率的下降。（3）韦克菲尔德尝试通过考察资本的适用场所的不断增长来解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却是重复了斯密的观点从而重复了他的错误。（4）巴师夏和凯里尽管承认利润具有随着生产资本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个事实，但强调利润作为总额会随着生产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劳动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会随之增长，资本则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掩盖了利润率下降趋势所表征的现实中的劳动和资本的对抗。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理论都没有深入到对资本本性的认识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恰好存在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而要求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中。早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的关系时，马克思就已经论证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率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符合这一点。“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是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①

为了更直观地认识上述观点，我们在此不妨用公式来表示。我们用M表示剩余价值，用V表示可变资本，用C表示不变资本，用m'来表示相对剩余价值率，用p'来表示利润率。此时，相对剩余价值率趋向于不断下降就表示为$\frac{V+M}{C}\to 0$；相应地，$p'=\frac{M}{C+V}<\frac{V+M}{C+V}<\frac{V+M}{C}\to 0$。

对于限制利润率下降趋势，马克思首先指出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扣除、创造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和垄断等条件来实现。当然，后两个条件由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6.

于涉及多个资本和竞争，也就是超过资本一般的范围，而并未引起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做过多的讨论。

除此之外，就是机器体系这个使固定资本增大并与劳动生产力提高相适应的条件了。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如何运用好这个条件来限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机器为基础的剩余劳动的特点是，减少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时间，其表现形式是使用较少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使用较少的工人。第二个要素是，生产力的提高本身应当由资本付出代价，而不是无偿取得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调整投入到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中的固定资本和投入到活劳动中的流动资本的比例，也就是调整分别投入到工具和劳动中可变资本的比例，就能够限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举了如下例子：

如果以前用 240 英镑工具和 2 400 英镑的可变资本，为生产 480 英镑的剩余价值，需要雇佣 100 位工人，花费 10 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和 2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的话，那么现在用可变资本的一半 1 200 镑购入新的机器装置，相对地就节约了 240 英镑工具，而剩下的 1 200 镑用于雇佣 50 位工人，让他们每人进行 4 小时的剩余劳动，就生产出同样的 480 镑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计算中，剩余价值率从 20%提高到 40%，并且投入的资本总额只是因为工具的节省而减少，所以利润率也从 18%提高到了 20%。

然而，这种限制条件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远非长久之策。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工人的数量即同时并存的劳动日，被拥有更高劳动生产力的机器体系所代替而逐渐减少。相反，投入到机器体系中的固定资本为实现生产的连续性，而消耗更多的原料。此时，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相比变得多了起来，作为利润率上限的活劳动减少就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这样，为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机器体系反而成为限制利润率的原因。

五、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

在“1857—1858 年手稿”中，与揭示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相伴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1.

随的，是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考察。实际上，从进入资本流通的分析时起，马克思就形成了逻辑建构和历史评论并行的“双轨制”模式，并且一直延续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和“1861—1863 年手稿”中，甚至在写作《资本论》时有过专门作为理论史分析的第四册的构想。换言之，“1857—1858 年手稿”中就包含着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

马克思所做的理论史分析大多是分析性的摘录和批判性的评述，主要涉及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家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以萨伊、巴师夏和西尼耳等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几乎涵盖了当时重要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主要观点，举凡：李嘉图混淆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做法；李嘉图在资本价值增殖上的模糊认识；蒲鲁东关于生产过剩的失败解释；韦克菲尔德关于李嘉图的雇佣劳动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矛盾的说明；马尔萨斯将劳动量和劳动价值混为一谈的做法；凯里关于资本对工人来说变得便宜的理论；等等。为了避免由于对这些经济学材料的过多阐释，而掩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性，笔者在此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结构来整合这些经济学材料，择其要义进行论述，并阐明这个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在“1861—1863 年手稿”中的发展。

（一）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活劳动时间大于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产生了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由于看不清这一点，才会很难来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

其中，斯密虽然认识到劳动对于价值创造的作用，但没有将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即雇佣劳动，并且将价值由劳动价格即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混淆起来；也没有理解资本作为它本身的规定性，仅仅把货币看作资本的表现，从而将资本的产生归结为流通中的节约。要言之，劳动不是雇佣劳动，资本不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斯密只能以最简单粗暴的形式将利润和地租的存在作为前提，才能说明剩余价值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李嘉图首先反对斯密混同劳动价格决定价值和劳动决定价值的错误做法，将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对象化其中的劳动时间。“简单地说，

李嘉图的思路是这样：产品互相交换——因而资本和资本相交换——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量进行的。工作日总是和工作日相交换。这是前提。”① 这就足以表明，他是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唯一懂得剩余价值的人。但是，李嘉图从来没有弄清楚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劳动决定的根本区别所在，因而其认识只能止于同一产品中包含了更多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并且产生出各种理论缺陷，诸如价值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地租理论的片面性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错误性。②

此后，现代经济学家围绕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分析，展开了诸多争论。例如：拉姆塞将能够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归结为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多于支付过报酬的劳动；韦克菲尔德批判李嘉图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从供求关系影响劳动价格的角度探讨剩余价值的产生；昆西出于维护李嘉图而把剩余价值说成是生产费用中不用任何花费所创造的价值中得来的；等等。然而，不管是李嘉图的批评者，还是他的维护者，都重复了李嘉图所犯的错误，也就是把剩余价值看作从资本的价值中产生出来的。申言之，这些现代经济学家甚至不比早于他们很长时间的重农学派“高明”到哪里去。重农学派将资本看作不同于货币的且能够自行增殖的独立交换价值，因而懂得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本身，懂得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从他们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视为不断产生于简单流通中的简单流通的前提而非要素这一点来看，重农学派就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可是，重农学派只考察纯粹的生产过程，完全抛弃了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形式，从而将剩余价值的产生错误地归结为劳动所利用和支配的自然力即农业。

除了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之外，马克思还摘录和评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生产及其条件的诸多解释。举凡：马尔萨斯错误地将劳动和劳动能力区分开来，从而得出资本的加入不会使劳动报酬发生任何变动的谬论；凯里从供求角度来分析工人劳动的价值，反而得出有悖于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5.

② 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讨论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也做过少量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史分析，只不过这一小部分内容是以题外之言的形式出现的。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321. 笔者在此不再过多讨论。

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的结论，即工人必须更少地劳动以获得资本即占有生产资料；罗西错误地将资本和技术意义上的工具完全混为一谈了。除了批判之外，马克思还充分肯定了约翰·威德（John Wade）对劳动联合之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性的观点。

到了“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关于剩余价值产生问题的理论史分析，扩展为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理论史分析。归结起来，他在这个部分中做了两个历史评述——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劳动理论。[①] 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是从其纯粹形式的方面，而是局限于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上，来考察剩余价值，因而无法认识到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这种方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他们关于生产劳动的庸俗争论。生产劳动实际上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从经济事实中抽象出了不同的价值定义，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劳动定义。综观这些争论，无一例外地没有认识到雇佣劳动是价值通过自身运动而产生新价值的唯一可能。

通过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理论史分析，马克思得出并证明了所有的价值形式只有采用了资本的形式才具有现实性这个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支出，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商品）自在地是资本（正像**劳动能力**自在地是劳动一样），因为，1. 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也只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 财富的对象的要素自在地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因为这些要素的对立面——雇佣劳动，也就是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是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存在的。”[②] 换句话说，通过现实的资本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就能够得到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本质理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雇佣劳动则是生产劳动的唯一形式。

（二）关于资本流通的理论分析史

从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考察来看，关于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以及

---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0-232，263-265.

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5.

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形式规定，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相应地，马克思所做的关于资本流通的理论史分析，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萨伊和蒲鲁东对于生产过剩危机的错误理解。众所周知，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从萨伊那里得来的。萨伊认为，产品只能同产品相交换，或者说，用产品来抵偿劳动，因而生产过剩不过是一种产品生产过多，而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少而已，因而从根本上构不成危机。在这里，萨伊完全忽视了简单流通和资本生产的基本特性。一方面，他只看到了使用价值之于产品交换的作用，完全忽视了交换价值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产品即资本同劳动相交换属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不是简单流通，因而也无法谈到生产过剩问题。

蒲鲁东虽然看到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产生，但却错误地将其归结为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他的问题就在于：（1）混淆了价格和价值；(2) 把同价值规定本身无关的关系扯进来了。价值规定总的来说绝不能包含任何加价，而工人所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着利润，这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应当从价值增殖的角度阐述生产过剩的发生路径。“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方面，马克思重点评述了斯密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了斯密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做出区分——资本家把他个人消费的剩余资产分别投入流动资本（货币、食品、原材料、成品）和固定资本（机械、生产工具、业务用建筑、土地改良手段、劳动能力）中——的做法，另一方面批判了斯密对资本流通结果的错误认识。斯密所说的流动资本是从流通周转出来的且创造了利润，固定资本是停留在生产原点创造利润的，他没有搞清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他指的从流通周转出来或没有周转出来是站在使用价值的流通的角度来看的，所谓带来利润是站在改变了所有者的价值的流通角度来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1.

看的。

此外，马克思还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要素的论点。例如：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将流通过程称为经济周期，并通过分析流通过程各个阶段的差别来探讨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等等。

不同于“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在“1861—1863 年手稿”中没有就资本的流通过程写作专门的笔记。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直接使用“1857—1858 年手稿”中的相应部分，也可能是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理论批判性并不突出。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和利润”这两部分内容相比，“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主要内容是单个资本的运行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是一个过渡性的章节。其中的经济学观点大多数都沿用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不同之处仅在于做了概念上的区分。排除了经济学批判的功能之后，“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节就只剩下了逻辑的作用，写作难度相对是最小的。此外，在整理思路时，马克思往往会通过批判某一经济学家的具体理论来推进自己的理论工作，相对脱离于经济学批判之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自然无法在“1861—1863 年手稿”中占有大量的篇幅。

（三）关于利润和利息的各种解释

如前所述，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有关利润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马克思主要是在“利润章”中进行分析和评述的。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各个笔记本中的论点，笔者在此对两类要点做出归纳：一是将利润和剩余价值混同起来，仅仅从纯粹的生产过程考察利润的产生。例如，马尔萨斯根本没有认识到利润作为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利润应当按照所预付的活劳动，即其价值客体地体现在工资上的活劳动来计算，而不应按照全部的预付资本即生产费用来计算。二是将资本而不是劳动作为利润从而财富的源泉。例如，罗德戴尔仅仅从资本的流通过程出发，通过考察固定资本中机器体系的作用，错误地将利润理解为收入的派生的源泉。这两类说法显然都没有从资本生产同资本流通相统一的角度来，只是片面地认识利润的产生。

到了“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资本和利润”部分中

共列了五个历史评述部分，分别是“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问题）”、“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利润理论”和“庸俗经济学”。这些评论也可以分为两类，即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评述和关于地租理论的评述。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这里同“1857—1858 年手稿”相比，要丰富和完善了许多，并且形成了体系化的评述。

其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实质上是探讨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与剩余价值的起源重合，却是与它不同质的问题。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例如工人的工资、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来自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预付的货币提供了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产业资本家本身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资本家利润的新增货币量从何而来呢？马克思对此分析说，资本生产将自身二重化为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两种资本生产的相互交换就解决了货币来源的困难，价值的抽象性在此时完全得到了自我克服，从而将自身的抽象规定性实现在资本生产之中。因此，产业资本家的预付资本提供了社会其他阶级的收入，而产业资本生产和金的资本生产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提供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收入进行了详尽且系统的批判。

至于地租理论，它虽然不属于资本一般的范围且与价值无关，但却会极大地影响生产价格。马克思在第 X－XII 笔记本系统地评述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并将其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①。简单而言，马克思试图证明，地租是地主对资本家利润的掠夺，而且地租将会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最终消失。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2.

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意义

通过前文对“1857—1858 年手稿”的诸多思想细节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的不断尝试。这种尝试虽然是在“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但实际内容只涉及《资本》分册的“四篇结构”（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中的第一篇。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在回溯马克思所完成的理论任务和哲学批判方法的基础上，首先阐释它们在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建构中的作用，然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做出总结，最后论述政治经济批判的逻辑建构在当代实践格局和思想图景中的价值，从而完成对“1857—1858 年手稿”的总体观照和把握。

一、系统整理“专题论文”的不断尝试

从“1857—1858 年手稿”的原貌来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由诸多“专题论文”组成的文集。马克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内容的系统化。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一）写作提纲的不断改变与完善

从写作“1857—1858 年手稿”的过程中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

第一版正式付梓后不久（1868 年 4 月），马克思就有过至少 15 次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提纲的考虑。为了便于直观，笔者在此列表如下：

序号	时间	结构	出处
1	1857 年 9 月	第一篇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第二篇　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 第三篇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第四篇　生产的国际关系 第五篇　世界市场和危机 （以下简称为“五篇结构”）	《文集》第 8 卷，第 32—33 页
2	约 1857 年 11 月	第一篇　生产一般及其规定（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 第二篇　生产的内部结构 第三篇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 第四篇　生产的国家关系 第五篇　世界市场和危机	《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第 180—181 页
3	约 1857 年 11 月	第一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资本的一般概念 资本的特殊性 资本作为货币 第二篇　竞争 资本积累 利润和利息 资本流通 交换 竞争 积聚	第三篇　信用 第四篇　股份资本 第五篇　货币市场 第六篇　财富的源泉 第二册　土地所有权 第三册　雇佣劳动 第四册　国家 第五册　对外贸易 第六册　世界市场与危机 （以下简称为“六册计划”）	《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第 220—221 页
4	约 1857 年 11 月	第一册　资本 资本的一般性 （资本一般） 1. 资本一般的一般性 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和劳动 资本的各要素 2. 资本一般的特殊性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3. 资本一般的个别性 利润和利息	资本的特殊性 1. 积累 2. 竞争 3. 积聚 资本的个别性 1. 信用 2. 股份资本 3. 货币市场	《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第 233—234 页

续前表

序号	时间	结构		出处
5	约 1857 年 11 月	对五篇结构的初步反思 第一篇　生产一般 第二篇　1. 交换价值一般	第二篇　只有全部阐释完资本，才能讨论生产一般和交换价值一般	《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第 280—281 页
6	1858 年 2 月	第一部著作　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 第二部著作　六册计划 第三部著作　经济范畴发展史		《文集》第 10 卷，第 150 页
7	1858 年 4 月	六册计划 第一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1. 价值 2. 货币 3. 资本	第二篇　竞争 第三篇　信用 第四篇　股份资本	《全集》中文 1 版，第 29 卷，第 299 页
8	1858 年 6 月	第一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1. 价值 2. 货币 货币一般 货币的三个规定 贵金属 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 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3. 资本一般 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绝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 原始积累 占有规律的转变 资本的流通过程	《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第 299—312 页
9	1859 年 1 月	六册计划	第一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1. 商品 2. 货币或简单流通 3. 资本一般	《文集》第 2 卷，第 588 页
10	1859 年 2～3 月	第一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和利润	《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第 585—593 页
11	1862 年 12 月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实质上是第一册第一篇第三章即资本一般的内容	《全集》中文 1 版，第 30 卷，第 636 页

续前表

序号	时间	结构		出处
12	1863年1月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1. 导言：商品，货币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3. 绝对剩余价值 4. 相对剩余价值 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6.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 7. 生产过程的结果 8. 剩余价值理论 9.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1.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2.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3. 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 地租 5. 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6. 利润率下降的规律 7. 利润理论 8. 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 9. 收入及其源泉 10.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11. 庸俗经济学 12. 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第446—448页
13	1865年7月	资本论　前三册	第四册（剩余价值学说史）	《全集》中文1版，第31卷，第135页
14	1866年10月	资本论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全集》中文1版，第31卷，第535—536页
15	1868年4月	资本论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1. 利润 2. 运动 3. 利润率趋向下降	4. 商人资本 5. 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 6. 超额利润之转化为地租 7. “三位一体”公式	《全集》中文1版，第32卷，第70—76页

凡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简称为《文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简称为《全集》。

从上表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明显分为延续和放弃“六册计划”这两个时期。随着他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就已经制定好“六册计划”，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以生产一般为研究起点的“五篇结构”。

按照最初的提纲，“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三册，即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只是草拟了一个梗概，只限于基本的叙述。至少在1862年12月以前，马克思并没有将上述内容从整部著作中抽走。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① 此后，马克思逐步放弃了“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计划，只是将它们尤其是关于世界市场的部分，最终放到了《资本论》的第三卷中。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无法得知马克思放弃“六册计划”的准确时间。马克思1863年1月拟定的提纲中，仍然是对《资本》分册的第一部分与第三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和利润”的内容的细化，以及进一步整合。到了1864年和1866年成形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手稿中，《土地所有权》分册和《雇佣劳动》分册的基本论点被收入其中。这样，“六册计划”最终缩减为《资本》分册了。

马克思关于“六册计划”的变动还不止于此。根据最初的提纲，《资本》分册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这四篇（以下简称为“四篇结构”）。“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1年手稿”只限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到了1862年底，马克思仍然将《资本论》（第一部分）的计划限定在“资本一般”这一篇中。“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② 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1863年1月），马克思就拟定了《资本论》第三卷的提纲，从而打破了《资本》分册的“四篇结构”。此后，他愈发重视“资本一般”篇的内容，

---

①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36.

② 同①.

而将其他的几篇基本论点收入了《资本论》的第三卷中。

关于《资本》分册和《资本论》三卷本的内容之间表面的对照，具体如下表所示：

“六册计划”	
第一册　资本	《资本论》三卷本
1. 资本一般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结构
(1) 生产过程	第 1 篇　商品和货币 第 2 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3～5 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 6 篇　工资 第 7 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2) 流通过程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3) 利润和利息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2. 竞争	第 1～3 篇　利润和利润率
3. 信用	第 4 篇　商业资本
4. 股份资本	第 5 篇　利息和信用
第二册　土地所有权	第 6 篇　地租
第三册　雇佣劳动	第 7 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册　国家	
第五册　对外贸易	
第六册　世界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上表所罗列的内容对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中仍然在讨论“资本一般”以外，《资本论》第二和三卷，已经超出了“资本一般”的范围，讨论的是“许多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的“许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资本一般”篇的后两部分同《资本论》第二和三卷直接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做法。

(二) 对“资本一般”的使用和放弃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放弃了围绕资本一般所展开的逻辑结构。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1) 避免给人们呈现出一种辩证逻辑的“先验结构”，尽管马克思运用概念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将“先验结构”作为先于现实的一般规律，而在于揭示特定观念的

现实前提；（2）强调现实的辩证运动的肯定方面中包含着否定方面，从而为现实的社会变革运动打下基础①，而资本一般的辩证运动容易给人们呈现出只是肯定的结果。

然而，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的放弃，决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相反，“1857—1858 年手稿”乃至“1861—1863 年手稿”具有不同于《资本论》的独特思想的原因，恰恰在于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

所谓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就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价值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现为价值概念克服自身的抽象性、获得全部具体规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个环节。

首先，商品是资本一般的逻辑起点。价值在商品中既具有最抽象的形式规定性，却又是最无形式规定性的抽象，即体现在特殊使用价值中的一般劳动时间。其次，货币是资本一般的逻辑中项。价值在货币形式中克服了无规定的抽象性，获得了新的形式规定性，成为通过简单流通来实现增殖的对象化劳动，从而实现了自为的存在。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抽象的，因为它需要以人们对货币的普遍认可为前提。资本是资本一般的逻辑终点。最后，价值在资本形式中克服了自己的抽象性，获得了不依赖于人的自在的独立性。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中，价值既是自己的前提又是自己的结果：资本存在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后者又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本身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因此，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自我创造、自我更新、自行增殖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也就是说，价值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外表。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以资本一般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从而意味着他已经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就在于，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阐明了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类似的理论。

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从物质动因出发来解释资本。比如，

---

①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李嘉图的一般利润率理论就是从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资本家需要参照既定一般利润率来为产品定价，保证产品能够顺利交换出去以获得收益。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而言，无论他出于何种动机、凭借何种身份，都必须受到一般利润率的客观外在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同马克思一样，也把资本主义生产视为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他们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为依据，将利润看作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并且试图从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抽象出关于交换价值的计算方法，即一般利润率，以此来确定资本的价值。19 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路，其内部分歧只在于如何对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进行抽象，从而产生了各式的价值理论；他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现实的经济运动违背了一般利润率，其内部分歧只在于如何计算或确定一般利润率。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了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使得运用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要么直接从社会生产的物质动因出发而陷入政治经济学的诸多争论中，要么直接认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而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泥淖。

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批判在批判德国观念论方面显然是成立的。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是经验论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这两种看法都是在人头脑中的抽象，孰优孰劣一时难分。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构为前提，这两种抽象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批判和超越，首先“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①。黑格尔辩证法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因而能够成为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从它的“神秘外壳”中剥离出来，得到了一个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成果就是资本一般的逻辑结构。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从物

①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质对象身上剥离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科学方法，运用辩证法来揭示作为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将社会关系和承载这些社会关系的物区分开来的缺陷，同时也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发展。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

诚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哲学，是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但是，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哲学，还是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解释框架，即用哲学方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经济现象，完全忽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本来意义上就具有的内在合一，甚至缺乏对诸多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方法——诸如生产总体辩证法、范畴和现实关系的辩证法、简单流通中的货币形式辩证法、生产总过程中的资本一般形式辩证法等——的进一步提炼和总结。有鉴于此，笔者以“1857—1858 年手稿”为范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哲学方法、逻辑建构和理论归旨等方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蕴做出总结。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

简单地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离出来，但仍然具有哲学性质。“经济哲学是一门综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现的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由原初的综合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经济学已经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离出来的情况下，为应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需要，又开启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整合之路。”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而然地具有哲学性质。

关于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的直接批判对象——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诸多详细的论

① 魏小萍.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式. 光明日报，2017－08－28.

证。他们也在重点阐释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地方。[①] 可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关于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的批判是什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方法有着怎样的理解？他的批判具体体现在“1857—1858 年手稿”的哪些地方？他又是如何彰显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性质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议题值得我们去梳理清楚与深入探究。

笔者在此仅以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对斯密的批判为例，就能解释清楚上述议题。

事实上，斯密围绕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理论政策的讨论，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看到了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并从物质生产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即需要和劳动出发，以工场手工业劳动为经验事实，将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逐步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同样，他所论述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正是上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经验论方法，赋予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部分合理性。

除此之外，上述体系还有着鲜明的道德哲学色彩。斯密的最初的设想是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囊括到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他通过对全部共同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探讨，达到揭示个人同时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目的、过程和形态这个理论诉求。具体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斯密将私人利益作为个人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并且把它定义为“自爱”。“自爱”的不利方面在于，使个人为了实现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需要而陷入对财富的追求中无法自拔。此时，作为判断克制私人利益能力的“道德情操”，就能够使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活动，从而为了建立具有行为原

---

①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在理论出发点上实现了由‘价值’到‘商品’的过渡，创立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学说；（2）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商品’概念的谬误，实现由‘劳动商品’到‘劳动能力’商品的转变，建立了科学的狭义剩余价值理论；（3）在上述进展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实质，建立了科学的狭义再生产理论。”[孙乐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经济哲学问题的新突破.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5）.]

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私人利益的实现就是普遍利益这个总体的实现。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意味着斯密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探讨物质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前提和批判对象的各式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不管是基于“需要—满足”关系来解释经济规律自然和谐的巴师夏，还是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按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约翰·穆勒，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经验论方法和道德哲学基础。

马克思本身并不否定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和经验论方法的部分合理性，而是反对只是抽象地考察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决不意味着可以从物质生产的结果作为抽象范畴出发，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决不意味着可以通过对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对象本身的考察，来进一步揭示这些范畴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后两者的谬误在于将物质生产看作全部生产过程的永恒形式和普遍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作为一定的社会阶段的历史产物而存在，从而看不到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所起到的作用。有鉴于此，马克思在《导言》中就确立了以现实的个人及其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为起点，来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一旦如此，就能够揭示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此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道德预设，包括“道德情操”、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哲学基础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事实面前，就已经不攻自破，因而也不值得马克思再对此做任何评论。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是“1857—1858 年手稿”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界自开始系统研究这一手稿时，就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和联系①、唯物史观的运用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

① 刘永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方法论研究.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安启念. 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维度——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谈起.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史的统一、历史现象学及其逻辑[①]等方面进行阐释，得出了颇多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命题大多是从国外研究中“引入”进来的，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研究的既有结论，却也形成了独到的重要观点。然而，这些哲学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它们中哪些是他在创作“1857—1858 年手稿”前“预设”的，哪些是他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发现并最终总结出来的，哪些是他本人觉得尚不成熟的。上述内容大多被国内学者所忽视，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来逐一揭示出来。

除了资本一般的逻辑建构以外，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所阐述的重要哲学方法莫过于生产总体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作为“理论预设”，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之前。其中，生产总体辩证法几乎贯穿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的逻辑建构的全部分析中，举凡：简单流通的总体运动是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的统一；简单流通总体运动的具体环节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不是“商品—货币”（卖）和“货币—商品”（买）；简单流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转化为资本的要素；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不是一个起点和终点合而为一的“简单圆圈结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生产和流通的“螺旋上升式结构”；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的要素不仅仅是资本一般，而是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的具体环节不是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资产一般的流通过程的不断交替，而是商品交换过程、货币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等一系列过程及其各个过程之间的过渡过程；资本一般的生产总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一个具体环节，从而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等等。

我们再来看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1857—1858 年手稿”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种范例，诸如：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货币的历史起源和它在简单流通中的形式规定

① 张一兵. 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初探——《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 (2)；重新遭遇异化：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最后逻辑层面——《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的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 (5).

性；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雏形”；等等。由此可见，逻辑过程考察和历史过程考察相结合，以及理论史之于理论建构的意义，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马克思而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合理性就在于：第一，逻辑方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一适当的方式。它既看到了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和逻辑上出现的顺序几乎一致的一面，又可以避免穷尽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材料所造成的弊端，即解释的无目的性，以及漫无止境从而舍本逐末的工作。第二，逻辑的方式也是历史的方式，是摆脱了具体形式和各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历史的方式，因为现实与观念、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实际上又是密不可分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

如何“加工”手中的经济学材料，或者说，系统整理呈现在面前的“专题论文”，是马克思创作“1857—1858 年手稿”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里涉及马克思创作计划的不断改变，以及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问题。罗斯多尔斯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无疑最具代表性①，国内学者也往往沿着他的路向“接着讲”②。此外，内田弘的解释也在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客观而言，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少许的不足就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和终结、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时机即具体语境问题。这对于马克思所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来说，却又是必不可缺的。

按照马克思的最初思路，是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切入点，通过批判一些错误理论如经济和谐论、工资固定论和劳动货币论等，来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价值、货币和资本）探讨的。这种思路具有逻辑建构上的合理性，然而，这样的一种逻辑建构，对于马克思来说，同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他在《哲学的贫困》

---

① 罗斯多尔斯基.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 魏埙，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张开，译. 教学与研究，2014（4）.

② 张钟朴.《资本论》第一部手稿（《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5）.

中所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就是上述做法的典型代表。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时髦”做法是在开头用一个总论部分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比如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应当首先直面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生产一般，并制定新的研究方法。为此，马克思中断了前述的批判工作，转而进行《导言》的写作，并着手制定了“五篇结构”。随后，“五篇结构”逐步演化为“六册计划”，后者的“初稿”最早出现在笔记本 II 中。① 对比“五篇结构”和“六册计划”初稿，可以发现马克思探讨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大的变化，他只是丰富了资本向多种资本发展过程的内容。

此后不久，在充分借鉴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后，马克思按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顺序，将“六册计划”初稿中关于资本的六个部分（“资本六篇结构”）调整为三个部分（“资本三篇结构”）。“资本三篇结构”不仅比“资本六篇结构”逻辑性更强，而且变更了之前定位不准确的地方，诸如：产品、原料和工具被划入资本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中；利润、利息从资本特殊性中剔除，归入资本的一般性；资本作为货币被准确表述为资本的一般性中的“资本的个别性”。马克思虽然对研究结构有了更为逻辑化和清晰化的认识，但实际需要探索的内容并未减少，他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只是完成了关于资本一般性的探讨。由于资本一般性自身又蕴含着一般性、特殊化和个别性，所以，为了避免概念上使用的混乱，马克思用“资本一般”代替资本一般性，并在笔记本 M 中写下了新的提纲（第一稿），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一般展开论述。

在马克思不断调整写作计划的过程中，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出场”问题至为重要。从时间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改造是“被动”进行的。辩证结构不是作为预设的结构出现在“1857—1858 年手稿”中，而是逐步被马克思所意识并加以改造的。在写作“货币章”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他所做的“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阐释，确实符合本质内在反思的部分过程。这就极容易给人们造成只是在考察一些概念和讨论概念辩证法的假象，甚至给一些批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221.

评家们留下只是在模仿黑格尔式唯心主义叙述方式的口实。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要对历史的和现实的辩证运动，即“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货币”，做一番详尽的梳理和考察。

在上述考察中，马克思尤其注意到了商品和货币并存所带来的矛盾。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揭示出“产品→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的过程，而是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即同一、差异、对立和矛盾的具体内容，更在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现实困难表现。由此，就引出了马克思关于如何克服商品和货币所带来的矛盾，如何解决它表征的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彼此独立的个人互相间的全面依赖，即人与人的关系颠倒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分析。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归旨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哲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的理论归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这样看来，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关于“社会三形态”的论断颇具哲学色彩。“《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一生 15 年黄金时期的研究成果，它对唯物史观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① 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阐释汗牛充栋。笔者在此并不否认这些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是指出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问题，即马克思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所谓“社会三形态”理论的。这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哲学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手稿”中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述，始于对商品和货币并存所带来的四重矛盾的揭示。这些矛盾分别为：交换价值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交换行为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交换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货币的二重化所导致的矛盾。此外，他还关注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困难，并且对一些理论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做了摘录和评述。随后，马克思又指明导致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并找出这种交换的若干现实条件：

---

① 孙承叔.《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与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理论国际会议论文集，2010 年 7 月。

生产者的一切旧的固定依赖关系的解体；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社会分工。由此可见，这种交换所表征的不是概念的“生成”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必然关系，即个人必须先将其全部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和货币，再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并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交换表现为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都用货币来计量。此时，这个“行情表”不仅意味着物的社会性脱离人而独立，而且还意味着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全部个人都是异己的，即全面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异化本身的发展就“孕育着”消除它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和货币关系互利共生，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独立一起增长，这种矛盾的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人们去消除经济危机就是在试图消除全面的异化。另一方面，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它们带来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在全面异化的基础上，商业活动又使这些物重新从属于个人，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个人都可以通过“行情表”等来获知其他个人的交换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情况，并力求使自己的上述活动与之相适应。这种对普遍的交换和生产的情况的了解，即一种“比较”，不仅使单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发生联系——“比较”取代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还对供求关系产生实际影响。“**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①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前述观点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毫无疑问，个人在创造出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根本无法将由物的依赖性实现的个人的联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来看，在不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人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发达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物的限制性，即个人受不以其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这两种限制都属于个人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个人在发达的形态上虽不能摆脱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外部关系或条件。然而，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终究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

不是“依赖关系”的关系，反而使“依赖关系”成为普遍的形式。除个别的个人偶然“战胜”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以外，其他大量的个人仍旧受它们控制。只有属于一个阶级或联合体等的每个个人，作为全体来消灭这些外部关系或条件，才能真正地克服它们，从而真正建立起“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

三、当代思想图景和实践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当代思想图景和实践格局中重新审视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决不意味着能够完全重复或直接照搬马克思的做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再是“显学”，也不能形成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观照。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来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但对于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而言，仅仅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不足以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生产，更无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经济模式。与政治经济学的“没落”相伴随的，是当今时代的五花八门的、种类齐全的经济学学科分支：在研究范围上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在难易程度上又有高级、中级和初级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又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是理论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以及它所包含的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等，成为热门学科。

不可否认，经济学门类的精细化研究，作为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高度专业化和精细化特点的一个缩影，对于指导个人的实践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研究将理论和实践、逻辑和现实愈发割裂开来的弊端。在所谓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等的演变发展史，完全忽略了逻辑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特定观念或概念的现实前提。此外，理论经济学研究在强调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的同时，忽视了历史本身的现实性，也就是没有将逻

①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辑和历史统一起来，从而极容易关注到许多无关紧要的经济学材料，甚至随时打断理论建构的进程，陷入漫无目的的各种解释中。

而在所谓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的研究方式无非是：抽样调查→样本分析→得出结论→建立模型→现实应用。表面看来，这种方法实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出发点即抽样调查不是建立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解之上的，而是按照某种方法进行的、实际上是某个既定结论所做的对这个结论的证明。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所依据的还是经济学的原理或教条。如何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观照当今社会经济生活，找寻隐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人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作。

与此同时，哲学的发展当前也已经呈现出部门化的趋势，并衍生出政治哲学、环境哲学、价值哲学、管理哲学等各种门类，它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哲学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上述领域中去？究其实，问题的提出已经包含了答案。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就是在上述领域之上的。哲学和经济学再次结合的产物决不是经济哲学，而是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形成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把握，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首先，在解释世界方面，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合一的题中之义在于：哲学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前提；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使现实“照进”哲学中，从而构建出一种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新哲学。其次，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应当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找到社会和历史的新的辩证运动，而不是以实证哲学的“工具理性”为原则。否则，就不可避免地沦为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缺乏对现实的提升和超越。再次，哲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结果，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化结构，而是在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中调整其内容的动态结构。关于时代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应当不断被纳入这个结构，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最后，实现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统一，既要对经济学和哲学有着全面的了解，又要不断借鉴二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切莫对它们一知半解。在这方面，马克思长达近 40 年的“原本批判”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还是将现存的价值、货币和资本作为前提，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分析出它们的价值规定作为研究基础，因而没有超过马克思批判的范围。作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归旨还是实现价值增殖，而不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建构的理论落脚点在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的个人，根本动力则是人自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它们共同决定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归旨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中深入研究社会规律时，应当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和落脚点，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一旦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学的任务就不再是找寻通过人为地组织生产来实现劳动的交换价值的方式，也不再是研究如何通过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效用价值，而是探究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消灭价值，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社会发展中以关注现实的个人、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全球化时代给现实的个人所带来的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的社会化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人们的交往范围、需求及其满足方式愈益扩大化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愈发泛滥，并且蔓延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的个人不仅单纯且幼稚地看待社会问题，甚至还产生了反社会的倾向。再加之私有制和劳动的对立、阶级对抗的缓和，使得解决个人普遍交往的扩大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之间的这种现实和理论的扭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虽然不能在马克思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到直接的现成答案，但是可以在他扬弃各种异化和矛盾的分析中找到解决上述现实困难的方式。由此可见，回归马克思的文本，梳理出他所做的思考和阐释，就必然成为一件极具意义且亟待开展的工作。本书所做的研究犹如冰山之一角，从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中找寻开启解释和改变当今时代的“钥匙”，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一、关于“1857—1858 年手稿”的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6 卷. 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6 卷. 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MEGA2 II/1. 1. Berlin：Dietz Verlag. 1976.

8. MEGA2 II/1. 2. Berlin：Dietz Verlag. 1981.

二、与论题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1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2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48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9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手稿（单行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三、与论题相关的其他哲学和经济学著作

1. 黑格尔. 小逻辑.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 杨一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 黑格尔. 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5. 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 柏拉图. 理想国. 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 卢梭. 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9.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0.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1. 亚当·斯密全集：第1卷. 蒋自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3.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 赵荣潜，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4.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 胡企林，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1.

15.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 海派经济学，2004（3）.

16.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7. 威廉·配第. 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 陈冬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8.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2卷. 胡尧步，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9.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伍纯武，梁守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0. 蒲鲁东. 贫困的哲学：上卷. 余叔通，王雪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 约翰·布雷.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袁贤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2. 巴师夏. 经济和谐论. 唐宗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3. 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 刘学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4. 休谟经济论文选. 陈玮，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5. 卢森贝. 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 李侠公，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26. 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7. 哲学家黑格尔的经济学贡献. 李光林，编译. 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第19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8. 罗斯多尔斯基. 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教学与研究，2014（4）.

29. 内田弘. 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 王青，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0. 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选译）. 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1. 马塞罗·默斯托. 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 闫月梅，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2. 罗斯多尔斯基.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 魏埙，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33.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欧力同，吴仲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4. 图赫舍雷尔.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马经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5. 内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张梧，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6. 望月清司.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 韩立新，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7.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38. 顾海良. 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9. 聂锦芳. 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0. 杨金海.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5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41. Bruno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 Bd. 3, 1845.

42.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Dublin 1770.

43. William Gouge. A short history of paper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hiladelphia 1883.

44. Germain Garnier. 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ntiquité, jusqu' au règne de Charlemagne. T. 1. Paris 1819.

45. Samuel Bailey.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London 1837.

46. Adam Heinrich Mü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 1809.

47. David Urquhart. Familiar word as affecting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London 1856.

48. Thomas Wright & John Harlow. The currency question. London 1844.

49. H. C. Care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art 1. Palala Press 2015.

50. H. C. Carey.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cholarly Publishing Office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6.

51. 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 1856.

52. G. F. Vaugh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 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3. No. 9.

53. Georg Lukàcs. The Young Hegel.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1975.

54. Кауфман.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Rezension zu: Капитал. Т. 1. Спб. 1872.

55. Vygodski. The story of a great discovery: how marx wrote 'Capital'. Tunbridge Wells 1974.

56. Antonio Negri. Marx au-delà de Marx. Paris 1998.

57. Jacques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58. Lucien Sève. Penser avec Marx auiourd'hui. Paris 2004.

59. Herry Denis. L'《Èconomie》de Marx. Historie d'un échec. Paris 1980.

60. Ferenc Tökei. A társadalmi formák elméletéhez. Budapest 1968.

61. György Márkus. Marxizmus és 'antroplógia'. Az emberi léyeg fogalma Marx filozó fiájában. Budapest 1966.

62. Predrag Vranicki. Historija maksizma. Zagreb 1975.

63. Gajo Petrović. Smisao i zna c enje Marxovih Grundrissa. Zagreb 1974.

主题索引

本质规定　201，228，336

必然性　7，9，11，13，14，20，40，44，53，115，128，179，189，197，238，248，249，262，274，277，280，292，309，312，320，323，331，367

必要劳动　162，279，283－288，293，317，319－321，339

必要劳动时间　89，129，130，158，173，175－177，283，288，317，329，331，340，346

辩证法　3，11，16－22，27，30，31，38－40，42，45－48，57－59，69，122，127，128，131－133，135，195－197，199，201，202，204，206，219，251，273，289，303，359－361，364－366，370

辩证运动　6，7，18，19，46，47，122，127，196，197，245，249，251，311，359，367，370

剥削　30，59，63，83，120，344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44，293

财产（所有权）关系　28，120，309

差别　5，7，12，17，43，71，89，90，95，117，119，127，132，133，136，140，141，143，150，162，166，171，173，175－177，188，192，221，230，231，238，240－242，244，261，268，290，291，294，300，314，315，326，334，337，338，344，351，365

抽象劳动　178
储备　80-82，84-86，214，215，217，218，307
存在形式　77，141，142，165，168，185，186，206，241，244，255，266，267，269，275，311
大流通　334，336-338，341
地租　53，57，61，62，64-66，69，97，103-107，109，110，112，120，125，141-143，155，161，164，188，297，298，342，345，347-349，352，356，358
地租规律　352，356
独立存在　192，206，221，225，291，299，300，322，368
独立的个人　172，179-181，193，205，238，243，279，367
对象化劳动　148，149，171，256，257，259，262，263，267-270，277，278，281，282，287，288，294，299-301，312，315，317，318，320，322，323，330，334，338，341，344，346，348，359
对象化劳动时间　90，172，177，208，278，327，337，339，341，348
二重性　46，47，57，154，155，165，167，251，327，362
法则　65，66，71，76，91，98，102，103，107，108，110-113，121，363
反题　17，58，64，70，188
非生产（性）劳动　257-259，271，289，300，356
分配　10，53，56，57，60-62，65，74，80，87，98，103，104，106-113，118-122，125-127，156，164，174，189，190，286，292，304，320，344，363
分配规律　69，103，106，107，110，112，118，131，154
副本批判　2，11，15，27
革命　11，12，18，22，24-26，28-33，36，37，40，55，89，115，124-126，175，209，211，320，359，361
个别性规定　47，121，252，290，334，340-342
个人自由　3，14，44，47，113，237-242
工场手工业　100，134，286，362
工人阶级　29-31，34，37，54，79，113，119，265，318
工资　32，34，37，45，48，50，53，57，58，60-63，65，67，

68，70－79，91，97，103－107，109，110，112，119，124，125，155－157，162－164，173，244，258，265，275，281，283，318－320，328，337，340，344，345，347，348，351，352，358，365

工作日　34，37，130，163，266，278，279，281，284，285，287，288，346，348

共产主义　4，15，24，26，27，29，34，36，38，40，59，64，70，73

共同体　6，14，102，112，113，115，164，180，181，190，215，216，234，235，238，302－308，310，316，362

孤立的个人　102，113－115，135，303，363

古典政治经济学　3－6，10，11，46，60，61，63，64，67－69，71，96，97，100，102，107，114，144，153－155，157－160，162－165，170，175，176，179，181，211，239，248，264，265，278，316，347，359－363

雇佣劳动　32，34，68，72，73，75－79，88，93－95，125，134，138，144，161，164，234，235，272，283，289，292，294，298－302，305，333，347－349，353，354，356－359

合题　17，58，64，188

活劳动时间　89，278，327，339，347

货币材料　212，218，224，230，232

货币流通　47，84，85，150，208，212－220，222，225，247－249，251，253，324－326，364

货币数量论　34，211－217，221

价值尺度　58，69，83，88，90，106，149，155－157，162，174，207－212，216－218，221，223，224，228，230，232，241，245，247

价值丧失　312，313，318，321

价值增殖　252，270，278，281－283，285，287，290，293，294，302，310，312－319，321－323，325，328，329，333，334，336，341，343，347，350，371

简单劳动　162，174－176，230，260

简单流通　44－48，95，148－152，195，218－220，224，226，227，229，233－237，241，243，245，249，250，253－256，258－

266，272，276－278，294－297，300，312－314，348，350，355，359，361，364

简单生产　252，258，261，269－271，273，274，277，281，282，314

金银　81，82，87，88，159，207，208，211，213－218，221－233，246－249，255，315

经济范畴　18，29，31，46，48，52，55，58，60，66，68，70，131，136，137，139，141－143，152，153，157，162，178，188，196，258，262，269，270，272，290，299，305，355，365

经济关系　4，29，68，86，93，94，116，135，139，143，146，171，183，209，232，237，241，244，260，270，314，329

经济规律　59，60，64，66，85，97，363

经济和谐　45，48，50，59，60，63－69，71－73，75，76，91，117，243，244，365

经济和谐规律　63

经济危机　24，32－35，37，45，55，59，63，66，70，78－88，91，93，96，186，191，215，216，265，360，365，368

精神生产　127－131

具体劳动　178

绝对剩余价值　95，283，287－289，314，315，346，355，356，358

可能性　7，8，61，111，119，124，181，182，185，186，191，226，256，257，264，265，279，289，293，312，315，316，318，319，322，323，335，340，344，368

克服　13，15，17，21，65，69，88，111，113，187，189，190，192，193，243，316，352，359，361，362，367－369

劳动产品　27，53，57，111，163，180，205，206，226，237，243，258，271，281，282，295，297，302，338

劳动货币　45，48，50，79，80，82－84，87－91，146，211，365

劳动日　58，158，173，174，288，346

历史过程　23，55，59，98，138，147，153，164，197，212，230，261，297－299，305，306，308，309，365

历史条件　116，126，136，139，302

利润率　107，342，344-346，351，356，358，360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252，340，343
流通费用　325，330，331
流通工具　81，87，222
流通时间　311，324-333，335，343
流通手段　85，90，99，134，207，211-218，221-224，226-229，231，232，241，245，247，248，253，301，313，322
逻辑过程　49，131，248，253，299，341，365
逻辑和历史　19，31，46，67，145，262，364，365
逻辑起点　45，48，60，145，146，148，152，153，165，359，364
矛盾　9，12，16，18，22，28，29，33，36，45-48，51，53，55，56，58，60，61，63，68-70，73，77，85，88-90，93，101，104，106，115，125，128，129，136，143，145，147，149，153，165，166，169，172，181-189，191，195-197，199-202，205，206，213，217，223，242-246，249，258，263，272，276，281，285，287-289，304，312-317，321，325，331-333，339，347，367，368，371
内在矛盾　24，30，34，37，87，101，245，248，285，287-289，316
奴役　32，55，125，172，173，300
蒲鲁东主义　35，36，50，59，79，80，88-91，187，188，210，211，243，244
契约　5，26，72，86，89，112，114，209，210，217，227，238，239
起源　10，11，16，20，25，29，39，48，69，71，72，75，116，120，149，188，193，196，201，202，206，299，300，304，305，352，364
区别　17，83，94，95，106，118，131，133，141，160，162，166，175，176，185，193，195，197-201，216，217，224，257，258，260，263，267，268，270-272，274，277-279，282，286，288-293，299，301，319，325，326，332，334，337，340-344，348，352，363
权力　32，57，68，87，94，143，179-181，189，204，231，235，247，293，323，368

权利　8，114，116，120，241，294

全面发展　23，32，46，130，181，191，192，204，304，368，369

人口　33，34，57，60－62，65－67，70，93，94，103，109－112，119，127，134-136，155，156，219，288，298，328

三段论　88，121，122

商品交换　46－48，89，93，98，147，150，156，159，160，162，168，181－184，186，187，203－206，208，212－214，216，220，226，244，247，251，260，364

社会关系　15，20，26，29，31，47，48，56，70，87，102，113，115，116，130，133，142，143，166，170，172，175，176，178－180，190-193，231-233，235-237，240，242，247，252，274，361

社会平等　44，47，237，239-241

社会形式　36，46，47，52，87，92，94，115－118，120，121，125，128－130，137－145，148，159，160，162，165，175，178，180，190，192，201，218，236，243，252，262，269，295，297

生产工具　23，58，62，117，125，126，148，173，202，203，230，231，253，254，297，308，350

生产关系　28，31-34，46-48，55，58，66，67，78-80，87，88，93，102，104，117，119，121，122，128，130，137，141，144－146，166，169，170，178，179，181，190，191，193，210，232，235，237，242，244，250，252，258，261，270，272，276，279，294，305－310，333，362-364，368

生产规律　110-112，118

生产过剩　79，186，316-319，347，349，350

生产（性）劳动　257-259，270-272，327，349，356

生产力　28，32，33，52，63，67，79，98，99，106，109-111，115，128－130，155，172，232，259，261，270，272，276，279，280，283－288，304，306，308，316－320，324，326，329，334，335，339-341，345，346，352，371

生产时间　227，325-327，329，331-333，335，339，343

生产特殊　116-118，148

生产一般　45，46，91-94，96，116-118，121，128，148，232，

242，269，277，290，354，355，357，366
生产总过程　45，47，49，122，251，252，277，289-291，311，346，361，364
生产总体　46，47，118，122，127，232，251，325，361，364
剩余价值率　288，342，344-346
剩余劳动　130，131，278-280，283-289，293，294，300，315，317，319-321，323，327，329，339-341，344，346，348，349
世界市场　63，68，69，93，94，134，144，190，191，216，218，227-230，329，353，354，357，358，368
市民社会　3-5，7-9，14，15，25，27，115，120，304，306
熟练劳动　175，278
思辨　13-17，19，52，101，131-133，136
思维　4，11，14-19，21，92，102，117，118，128，131，132，135，136，138，156，291，370
所有权规律　31，294-297，302
特殊商品　184，187，188，202，203，206，220，222，225，230，233，246，247，256，360
特殊性规定　46，71，290，311，334，336，338，340，341
同一　2，5，16，20，29，46，47，52，61，83，84，90，105，106，110，117，122－124，127，133，137，139，142－144，150－153，165，166，169，171，172，176－178，182－186，191，195－204，206，215，219，221－223，226，227，231，232，240，246，254，256，259，275，279，284，286，287，294－297，302，303，307，329，330，348，367，368
土地所有权　31，93，94，134，142-144，147，297，298，302-308，323，353，354，357，358
无产阶级　16，24-27，29，30，33，36，54，67，175，258
物的关系　47，138，172，183，191，193，233，235，236，367
物质生产　19，23，28，31，34，37，46，56，96，98，100，102，103，107，113，115－118，127－131，139，190，269，271，275，277，339，360，362，363
现实的个人　15，16，23，29，31，46，48，55，112-114，116，

121，124，127，131，135，140，145，176，363，371
相对剩余价值 44，95，274，283-289，314，315，326，329，343，345，349，355，356，358
小流通 334，336，337，340
协作 139，285，286，306
信用 35，36，55，60，70，80，87，88，93－95，109，144，187，188，218，226，227，291，292，304，329，330，332，333，353-358
形式规定（性） 45，47－49，147，148，150，151，171，183，184，198，201，206，211，213，215，216，218－226，228－230，232，235，239，241，245，246，249，251，252，255，256，268，269，273，274，283，287，290，311，312，322，325，329，333－335，337，340，341，347，350，359，364
扬弃 7，15－17，21，22，27，46，113，199－201，222，223，227，233，239，241，243，246，247，249，255，262，267，268，272，279-281，283，289，313，321，323，325，331-333，371
一般商品 184，202，206，210，217，227，229，231，246
一般性规定 46，251，252，290，334-336，341
异化 5，6，8－10，15－17，27，40，46，53，55，90，101，124，191-193，204，243，279，304，322，323，364，368，371
庸俗政治经济学 10，46，96，97，118，154，163，316，347，361，363
有机（统一）体 20，177，305
原本批判 2，11，15，27，28，45，48，50－52，56，57，59，77，83，84，91，95，96，342，370
原始积累 34，41，49，95，277，299，300，302，306，307，355，356
在场 269，270
占有规律 44，49，95，233，235-237，289，290，294-297，355
哲学方法 2，25，30，31，45，46，48，57，66，69，96，108，112，127，131，361-364
征服 112，120，125，126，128，134，139，212，303，329
正题 17，64
周转时间 329，335，344

铸币　94，208-214，216-218，223-229，231，232，241，245，247，248，262，264，266
资本（的）本性　292，316，317，321，332，345
资本流通　49，95，290，312，314，324-331，334-336，338，340-343，347，349-351，354
资本循环　324
资本一般　45，47，49，95，122，144，217，251-254，261，262，277，285，289-292，299，311，312，332，334，338，341-344，346，352-355，357-361，364，366
资本周转　106，325，329
资本主义生产　1，23，24，31，32，40，41，47，55，56，93，94，115，116，120，122，130，131，146，147，158，250，252，261，262，286，292，297，302，303，306，308，312，316-318，320，321，323，324，327，330，331，333-335，338，340，345，349，356，358-361，363，364，369，371
自我否定　90，163，245，246，248，249
自我解体　48，245
自行增殖　49，249，250，255，256，273-280，289，310，313，315，316，326，329，336，342，343，348，359
自由发展　67，100，130，193，292，367，371
自由个性　23，32，47，181，193，204，243，244，340，369
自由劳动　263，300-302，309，310
自由时间　129，130，331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聂锦芳　主编

第一卷　滥觞与勃兴
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聂锦芳 著

第二卷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　黄建都 著

第三卷　思想的传承与决裂
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李彬彬 著

第四卷　异化的探寻及其扬弃
“巴黎手稿”再研究　刘秀萍 著

第五卷　思想的剥离与锻造
《神圣家族》文本释读　刘秀萍 著

第六卷　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　聂锦芳 著

第七卷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八卷　“革命”的非模式化解读
1848—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文献研究　彭宏伟　崔　爽 著

第九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
“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　杨洪源 著

第十卷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再研究　王　嘉 著

第十一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资本论》议题再审视　彭宏伟 著

第十二卷　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　王　莅 著

ISBN 978-7-300-25476-0

定价：1980.00元（全十二卷）